

老兵口述抗战①

——随枣、百团、上高三大会战

李么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口述抗战．随枣、百团、上高三大会战 / 李么傻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075-4259-2

I．①老… II．①李… III．①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
史料—中国 IV．①E29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853 号

老兵口述抗战① 随枣、百团、上高三大会战

* * *

著 者： 李么傻

出版策划： 兴盛乐

责任编辑： 李瑞虹

特约编辑： 蔡荣建 袁 钰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5-4259-2

定 价： 36.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那场战争

很多年来，从寻找抗战老兵开始，我的梦境中总会出现炮火连天的场面，听到震耳欲聋的冲杀声，我一次次从梦境中惊醒，望着窗外月上中天，树影婆娑，心如蝉翼一样抖颤不已。那一刻，总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战争中的很多故事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人们忙忙碌碌于赚钱和致富，却忘记了祖辈曾经的惨烈和辉煌；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各种影视剧都在竞相上演那场战争，却因为缺乏生活基础而显得虚幻而不真实。

那场战争到底呈现着怎样的形态？

这些年来，我自费寻找并采访过几百名抗战老兵。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战老兵，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是为

了告慰和外公一样的祖辈们，也是为了让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了解我们祖辈的故事。

现在，这几百名抗战老兵，有的已经溘然长逝，带着战争的回忆行走在我们未知的那个世界里；有的已是耄耋老人，行将就木，百病缠身，然而，一说到那场战争，他们立即悚然震动，眼睛炯炯发亮，像一匹即将走上前线的战马。那场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从老兵们的口中，我听到很多战争细节。当年的日军坐着轮船从日本本土来到了上海，轮船上还运载着大炮和坦克；而川军穿着草鞋，背着步枪，饿着肚子，奔走千里，来到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当年的日本军人人手一册《士兵操典》，他们最低文化程度也是小学毕业；而中国很多士兵是被抓了壮丁，大字不识。当年的日本军人在走上战场前，每人最少打够 300 发子弹；而中国很多壮丁上了战场，还不知道步枪怎么使用。当年的日本军人对枪支和机械设备使用极为熟练；而中国军人缴获了汽车不会使用，砸毁汽车大灯，以为汽车就成了瞎子，无法开动。当年的日本下级军官手持指挥刀在后督战，日军士兵组成冲锋队形，战斗力很强；而中国下级军官带队冲锋，伤亡极大，因为中国文盲士兵无法理解作战要领。当年的日军士兵烧杀抢掠，不会饿肚子；而中国部分军人因为缺乏营养，患上了夜盲症……李宗仁说：日军从军

官到士兵，俱训练有素。宋希濂说，抗战时期，一个日军士兵的战斗力相当于七八个国军士兵，日军一杆步枪可以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进攻；只有像 200 师这样装备最好的军队，才能和日军人数相当的一个旅团打成平手。

走访老兵这么些年，那些书籍中出现的战役名字，在我的心中渐渐变成立体，变得丰满，我无限接近了这一场场战役，那一个个人物的面容，那一场场情节和细节，也变得异常清晰，似乎触手可及。

因为武器和兵员素质等的差距，中国军人付出了极为惨烈悲壮的牺牲。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中国军人伤亡 300 多万，抵挡长达八年，如果算上东北战场，则抵挡长达 14 年。

我们回头。望这场血与火交融的战争，依然会被深深感动。历史并不遥远，老兵永远不死。

把我的心，放在这场战争的祭坛上，祭奠为了抵御外侮而浴血奋战，并英勇捐躯的祖辈们。

伏惟尚飨！

李么傻

2014 年 11 月 17 日

目录

引子 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那场战争.....	5
第一章 “活关公” 张自忠	11
老兵口述.....	11
喜峰口的大刀队	20
汉奸骂名由此来	53
临沂血战.....	80
惨烈的潢川	110
随枣会战.....	138
将军一去.....	158
第二章 百团大破袭.....	182
老兵口述.....	182
美国人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	190
“三枪八路”	206
夜袭井陉煤矿	218
一门山炮建奇功	232
今天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	248
娘子关战斗和东团堡战斗.....	260

伤心关家隘	276
左权将军牺牲	304
第三章 上高会战.....	327
老兵口述	327
纯属无事生非	334
惨烈的外围阻击战	347
负伤了，很难得到医治	365
搞后勤的县长是共产党员	379
33 师团擅自离去	392
游击式防御战术	406
34 师团被包围	415
国共合作的经典战例	433

第一章 “活关公” 张自忠

老兵口述

【李长维】

我当年是被抓壮丁的，编入了川军，然后出川作战。当时我们那一排人都是新兵，只有排长是老兵，我们连怎么打枪，怎么投掷手榴弹都不会，排长就给我们示范。由于时间紧急，我们是边走边训练。从重庆到山西前线，近千里路，全部都是靠双腿走出来的，每天走 100 多里，一直走了两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吃上小米和玉米，后来走到湖北境内，小米和玉米都吃完了，就只能吃黑豆。在农村，黑豆是给牲口吃的。可是没办法，除了黑豆，再没有吃的了。

川军很苦，穿的是草鞋，身上是单衣，来到山西前线，已经到了冬天，雪花飘飘，天寒地冻，但是没有棉衣穿，每天晚上都有人冻死。

走到山西后，参加了忻口会战，打败了。日军的大炮很厉害，我们还没有看到日军的面，炮弹就从天上落下来，死了很多弟兄。

忻口会战失败后，我们又赶往山东去参加徐州会战。这一路上还是走。走着走着，前面喊：“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们赶紧躲避，树下面，草窝里，什么地方能躲就在什么地方躲。可是头躲进去了，身子还在外面。日军飞机炸弹落下来，又死了很多弟兄。

我们武器不如日军，每场仗都打得很艰苦。

【阮明刚】

我 16 岁那一年，在姨妈家的田地里干农活，突然被抓了壮丁，家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上面有壮丁名额，保长完不成任务，见到生人就抓。

抓了壮丁后，我被编入 59 军 38 师，军长是张自忠。我们开往山东台儿庄前线，这一路从湖北走到了山东。

刚刚赶到徐州，张自忠就给大家开会，严明纪律，说日军占领了我们家园，老百姓都在受难，谁敢欺负老百姓，就是欺负他，“你想操，就去操你姐你妹去。”这是张自忠的原话。

当时，日军有坦克，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只能用手榴弹去炸，大多数时候是浑身缠满手榴弹，滚到坦克下面去炸；个别聪明的战士，爬上坦克，揭开盖子，把手榴弹扔进去。

我们军队中最好的是重机枪，但是非常稀少，我没有见过大炮。我是轻机枪手，一挺轻机枪 17 斤重，我力气大，和日军白刃战的时候，我抡起机枪砸倒过日军。

张自忠右边脸上有颗黑痣，黑痣上有一撮毛，看起来很威严，他经常开会对我们说：“日本人死一个少一个，中国人死一个补一个，所以中国不会灭亡。”

有一天黄昏，我正在擦枪，突然听到有人哭着说：“司令

牺牲了。”然后，就看到师长黄维刚挥舞着大刀片子喊：“有种的跟我走，给司令报仇。”当时大家都想，司令都让人打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那天晚上，我们和日军展开一场血战，夺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后来，日军发动报复袭击，我们的一个川军团被打光了，就在我家乡附近的山上。好多年了，那座山的山路一到夜晚就没人敢走，说是有鬼。

【郭荣昌】

1938 年的一天，我在河南泌阳县行政公署休息，38 师师长黄维刚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他就让我做他的警卫员。那一年我 20 岁。

后来，我父亲辗转打听到我当兵了，禁不住号啕大哭。那时候有句话这样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当兵不久，我就参加了潢川保卫战，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我们一个营打得最后剩下 13 个人。日军不但有大炮，还

有毒气，他们一看打不过中国人，就放毒气。

我们营剩下的这 13 个人编成了一个班，我被任命为班长。（阮明刚也提到了一个营被打得只剩下 13 个人，他口中的地点是台儿庄，也许有人记忆有误，他们都在 38 师，两人说的可能是同一场战斗。）

张自忠牺牲的时候，我是排长。

有一天，大家得知张自忠牺牲，都非常悲愤，师长黄维刚带着大家向日军发起反击，几进几出。当时我端着轻机枪，带着敢死队向日军冲杀。在白刃战中，我的额头被日军刺刀挑伤了。日军的三八大盖比我们的步枪长，他们拼刺刀的战术中，最让人难防的是挑，明明看到他落于下风，突然刺刀挑上来，就让人防不胜防。

这场战斗，我们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曹廷明】

我 21 岁的时候跟从张自忠将军抗日，给他做警卫员。在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负伤了，张自忠将军把他的大衣盖在

我的身上，让人把我抬到后方医院治疗。

几个月后，我伤愈归队，就一直待在张自忠将军身边。

张自忠将军平易近人，私下里喜欢和我们勤务员开玩笑。有一次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还没有，他就说等抗战胜利了，给我介绍一个。张自忠将军个子很高，身材魁梧，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很严厉，其实他对人非常好。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我们的军队抢回了将军的遗体，日本人纠集兵力进行报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就转移了。转移前，我奉命烧毁了张自忠将军的两箱子兵书，不让留给日军。现在想起来很后悔，那是张自忠将军的重要遗物，当时怎么能烧毁呢？

【何宏钧】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四川应征入伍，那时候我 19 岁。

我们从四川走到山西前线，中了日军的埋伏，伤亡惨重。当时的山西已经到了冬天，我们还穿着离开四川时的单衣和

草鞋，想换件棉衣，换双草鞋，都没有。每天晚上都有人冻死。大家为了取暖，夜晚抱在一起睡觉。

第二年2月，我们开往台儿庄，打了一仗，迫击炮排排长战死，我因为有文化，接任这个排长，参加了滕县保卫战。

我们在滕县死守了四天，从3月14日清晨到18日，仗打得非常惨烈，日军有六七十门山炮，我们一门山炮都没有，只有迫击炮。

因为不能野战，武器不如人，师长王铭章就把城外的部队都调到了城里坚守。东门、南门、北门都用沙袋和石头堵死了，只留下西门。17日早晨，日军用飞机投弹，炸开了东门和南门，日军拥进城里，杀声震天，到处都在巷战。我带着伤员撤退到了西关车站。

17日夜晩，巷战仍在继续，王铭章看到没有援军，而滕县即将失守，就带着其余的人撤到西关，准备组织残部防守，没想到腹部中弹身亡。

滕县最后失守了，我们伤亡5000人，日军也伤亡两三千人。

【仵德厚】

你说那个电影《血战台儿庄》里有个敢死队队长，我没看过这电影，我们这里好多年都没有演过电影了。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日军已经打进城，占领了西北地区，我们接到了增援的命令，就开进了城里。我当时是营长，挑选了 40 名精壮小伙子，趁着夜晚，就背着手榴弹，拿着大刀摸到敌人的阵地上。

我们和敌人隔着院墙互扔手榴弹，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就在脚边冒烟，我们又丢过去，院墙都被炸塌了，我们就趴在倒塌的院墙后面，和敌人打。

当时打得声势很大，也不知道谁死了，谁还活着，活着的人就一直向上冲。天快亮了的时候，战斗结束，敢死队 40 个人只剩下了三个人。

我是高小毕业，后来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被改编成第 30 师，从士兵一步步干上来，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是 30 师的营长。

【潘絮兹】

我以前想着做一名画家，或者是作家，后来抗战爆发了，我就入伍，被分配在 38 师政治部做艺术科员，上尉军衔。38 师很有名，在台儿庄战役的临沂血战中，打出了威风，打败了日军的“钢军”第五师团，当时的指挥是张自忠将军。

38 师在湖北和日军打过多次，这时候师长是黄维刚，张自忠将军升为 33 集团军总司令。日军在战场上有不遗落尸体的习惯，可是在湖北，我们多次打得日军无法收拾尸体。

张自忠将军最后一次和日军作战，我就在他的身边。当时他只带着 2000 人渡过襄河，与日军作战。

渡过襄河后，我们和日军大部队遭遇。部队被打散，我们几个文职干部在小洪山觅路行走，依靠稻田里即将成熟的稻米充饥，后来来到了兄弟部队里，当天夜晚收听敌军电台，得知张自忠将军牺牲了，我们哭作一团。

喜峰口的大刀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独立抗战四年。第一年，处于防御阶段；从第二年到第四年，处于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的三年里，中国军队取得了随枣会战、百团大战和上高会战的胜利。和防御阶段的胜利比起来，相持阶段的每场胜利都是战略性的，具有极高的含金量。不但收复失地，挫败日军，而且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随枣会战，表现最杰出的，是张自忠将军；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取得的辉煌战果；上高会战，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成果。

张自忠将军的经历很悲壮。

他在长城喜峰口战役中，率领 29 军 38 师与日军激战；

29 军撤离平津后，他轻信日军谎言，留下祸根；日军占领北平后，他易装潜逃，此后被骂为汉奸；他来到济南，想投奔“逃跑将军”韩复榘参加抗战，他站在门外，听见客厅里的韩复榘说：“快滚！”他含泪离去，韩复榘后来因为一枪不发丢掉济南而被蒋介石枪毙；他趁夜色回到家中，安排后事，给了女儿和堂侄女每人一点钱，说这是她们的嫁妆，然后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悄悄离开，这是他见到孩子们的最后一面；他来到南京，投奔李宗仁，满脸愧色，低头不语，李宗仁、冯玉祥，还有 29 军军长宋哲元在蒋介石面前力保张自忠，蒋介石让他戴罪立功，担任由 38 师扩充而成的 59 军军长。

张自忠回到了 59 军，他对将士们说：“我回来就是为了死。”台儿庄战役中，临沂危急，李宗仁电令张自忠解围。时，临沂城中被日军所困的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九年前的中原大战时，同为冯玉祥西北军的张自忠和庞炳勋与中央军作战，庞炳勋叛冯投蒋，夜晚偷袭张自忠，让张自忠差点丧命，张自忠发誓：“此生不与此等不义不仁的小人共事。”然而，此时，张自忠放下了个人恩怨，义无反顾奔袭临沂，解救庞炳勋，他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说：“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犹死。”此役，59 军歼灭日军 5000 余人，救出庞炳勋。

那些岁月里，他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死”，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从离开北平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战死沙场；从离开女儿和侄女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不再回来；他要用死亡来洗刷汉奸罪名。

59 军警卫营士兵曹廷明直到现在都能记得张自忠将军的形象，他衣着简朴，光头大个，威风凛凛，每逢战况危急的时候，他就带着警卫营冲在最前面，战局为之逆转。他后来升任 33 集团军司令。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 33 集团军很多将领和张自忠身边的人，哭劝张自忠将军打仗不能身先士卒，不能冲在最前面，要以自己的生命为重。张自忠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怕死，如果我们不怕死，日本人敢这么猖狂吗？我死了，总司令还有人当，还有人率领你们抗战，怕什么？张自忠在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谈话中也说过，自己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

舍身成仁的时机很快就来临了。1940 年 5 月，枣宜会战开始。

会战开始后的第六天，张自忠不听众将劝阻，安排好了各部队攻防部署后，又把军中诸事托付给自己的代理人冯治安将军，然后去战况最激烈的襄河东岸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一向生活简朴，着布衣布鞋，不戴帽子，而那次渡河作战，

他穿上了呢子将军服，戴上了大檐帽，大家都明白将军这次是要与日军同归于尽的。

张自忠将军率领 2000 名战士驰援河东，当时，河东的三个师各自为战，伤亡惨重，张自忠来到后，士气大振，同仇敌忾，给予日军极大杀伤。日军发现 33 集团军是一支劲敌，便从参加会战的四个师团中，抽出两个师团攻击河东的国军，张自忠将军陷入四面围困中，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

日军感叹于张自忠将军的忠烈，将他掩埋在方家集的一座山上，砍木为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老兵郭荣昌和阮明刚说，38 师师长黄维刚闻知张将军英勇捐躯，悲痛欲绝，亲自带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方家集，郭荣昌和阮明刚都在其列。他们找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坟莹，开棺取出遗体，运往重庆。而第二天，日军也接到了要将将军遗体运往汉口的命令。而当时的汉口，已成为沦陷区。

张自忠将军遗体运至第 33 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湖北宜城，全军官兵跪迎痛哭；将军的遗体沿着长江运至重庆时，蒋介石率领军政要员集聚码头迎灵，蒋介石抚棺大哭。

张自忠将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

阮明刚说，张自忠将军殉国后，第 33 集团军官兵在《士

兵手册》中写道：“是谁杀死了总司令？此仇不报不是人！”

杀死张自忠将军的是日军 39 师团。

一周后，日军 39 师团偷渡白河，第 33 集团军英勇抗击，击毙了 39 师团 233 联队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日军 39 师团不得不退回白河。

四年后，33 集团军击毙了当年率部主攻张自忠将军指挥部的日军原 231 联队长、时任第 62 旅团长的横山武彦少将。

君子报仇，四年不晚。张自忠将军的军队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张自忠将军似乎天生就是军人，可是当兵的时候已经 25 岁了，早就过了从军的年龄。他是软磨硬泡才进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可是一进入军队就显示出了极为出众的军事才华，很快就被任命为连长。当时，全连 126 人，他训练有方，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训练方式，这 126 名士兵中，后来成为军长、师长的就有十个，而旅长、团长一级的就更多了。一个连队里居然走出这么多的将官，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自忠将军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是关羽和岳飞。由于张自

忠将军作战勇敢，屡挫强敌，当时人们送他“活关公”的美誉。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勇猛过人，斩颜良，诛文丑，名震华夏；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关羽义字当先，千里走单骑，下邳约三章，只为桃园三结义。张自忠长城血战，二战临沂，萧县阻击，武汉鏖战，襄西大捷，他的勇猛不输于关羽。大敌当前，舍弃个人恩怨，共赴国难；忍辱负重，含羞忍垢，为国只求一死，他的忠义更超过关羽。关云长之忠，只为了刘备；而张自忠之忠，为了国家民族。

关羽败走麦城，麦城在今湖北当阳；张自忠殒身南瓜店，南瓜店在今湖北宜城，两地相距 100 多公里。

张自忠将军第一次对日作战是在喜峰口战役中。

喜峰口战役的主力是 29 军。29 军军长是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29 军下辖三个师，37 师师长冯治安，38 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 2 师师长刘汝明；37 师下辖两个旅，38 师下辖两个旅，暂编第 2 师仅有一个旅。后来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当时在 37 师当旅长；后来任共和国水利部和农

业部副部长的何基沣将军为赵登禹的副手，任副旅长；在张自忠将军牺牲后，率领便衣敢死队抢回张将军遗骸的黄维刚将军，当时在 38 师当旅长。而后来在抗战时期为人们熟知的董升堂、王长海、李九思、曹国佐等一大批人，这时候都还是营团一级的军官。

喜峰口战役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战役也是载入中国历史课本的一场战役，因为这场战役，中国人用传统的大刀和血性，战胜了日本的精良武器和武士道。

29 军属于国军里的杂牌军。

此时，29 军是西北军仅剩的一点血脉。中原会战后，中央军获胜，阎锡山退入山西，而冯玉祥所部的 30 万西北军仅剩下两万人，在阎锡山治下，暂居一隅。西北军残部先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 3 军，后又改编为第 29 军，军长为西北军的宋哲元。

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驻扎晋北的 29 军做好准备，他们知道早晚和日军必有一战。

西北军属于杂牌军，而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又遭排斥，

长期在国外，远离权力中心，而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比如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等都在中原大战的时候投奔了蒋介石，所以属于西北军的 29 军备受冷落，武器装备极为落后。不但粮饷不足，缺乏重武器，弹药缺乏，就连样式陈旧的步枪也数量不足，而且这些步枪连一把刺刀都配不上。

当时，29 军驻扎在山西，山西自古出产钢铁，民间铁匠众多。29 军将领征集民间铁匠，为士兵们铸造大刀。

中国民间制造的大刀是用一整块钢铁捶打而成，异常坚硬，刀背很厚，看起来就显得沉重，手柄较长，可以单手挥舞，也可以双手持握，刀尖倾斜，十分利于劈杀，刀柄末端有一个圆环，上面绑缠着红色绸布，挥舞起来猎猎作响。我在小时候曾经见到过一把这样的大刀，重量大概在四斤左右。爷爷说这把大刀当初是为了自卫的，村中每家每户都有一把。29 军的士兵们，由民间铁匠们打造的，也是这样的大刀。

再反观日本刀，日本刀刀身修长狭窄，非常锋利，选用精钢制作，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讲究，所以显得很美观，就像工艺品一样。在日本，也只有铸剑师才能锻造日本刀，不像在中国，寻常铁匠就能打一把中国刀。

然而，精雕细凿的日本刀与粗砺拙朴的中国刀比拼，却总是难以占到上风。为什么？因为中国刀是实战的产物，不

是观赏的工艺品。中国刀无论钢质、刀身长度、工艺以及外形的美观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中国刀的宽厚和重量弥补了种种不足。中国刀刀身很宽，日本刀难以削断；中国刀很重，它的重量弥补了锋利的不足，足以砍断窄窄的日本刀。

这就像，在健身房里训练出来的拳手，打不过在农田里摸爬滚打、皮坚肉厚的乡村拳师，超市货架上的袋装食品，没有乡村农家野菜的营养丰富。

29 军每人都装备了一把大刀。

29 军将士的个头基本都很高，赵登禹身高 190 厘米，挥舞起大刀来，几十个人也不敢近身。张自忠身高 180 厘米，体形魁梧，孔武有力。29 军人人都会使大刀，而这些将领们更是刀术高手，他们个子高，力气足，势大力沉，小个子的日本人怎么会是对手。

据说，死在赵登禹刀下的日本人足有上百。

29 军中常年有一批武术教官教授刀术，最著名的是河北镖师李尧臣。李尧臣为 29 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此种刀法简单易学，实战性强，深受欢迎。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普遍很穷，装备很差，为了弥补弹药的不足，都配备了大刀。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和桂林保卫战的

桂军老兵骆首瞻说，他们连有一个士兵，每次人家休息，他总在磨刀，刀磨得非常快，把十只布鞋的鞋底擦放在一起，一刀下去，全部砍为两截，这么锋利的刀，砍在日本人身上，日本人怎么受得了？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士兵独自与五名日本兵缠斗，四个日本兵的脑袋都搬了家，第五个吓哭了，枪一扔，跪在地上求饶。

我的外公是老八路，他也说过，和日本人格斗，大刀是最好的武器，一格一挡，大刀就奔向了日本人的身子，日本人想防都防不住。大刀使好了，几个日本人都不是对手。

然而，能把这样一把沉重的大刀挥舞起来，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29 军都是北方人，身材普遍高大，身体结实，而且这些人都是从连年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兵。29 军激战日军的喜峰口边，有一个惠民村，村民说，当年 29 军来到喜峰口的时候，每天早晨都在操练，几百人几千人在旷野一起练大刀，刀片挥舞，像下了一地雪花。29 军战士都力气很大，他们休息的时候，比赛看谁能搬起打麦场的碌碡；29 军士兵也身手矫健，他们抓着房檐下的椽头，一纵身，就上了房顶。

日军一来到华北，就遇到了精通武术的 29 军，只能说日本鬼子运气太差。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已经装备了飞机、坦克，而 29 军只能

装备大刀。

为了用我所长，攻敌所短，29 军只能采用奇袭和夜袭。

河北省迁西县滦阳镇喜峰口惠民村的老年人说，每一座阵地，都是白天日本人攻进来，夜晚中国人赶出去。日本人还在睡觉，枪都架在院子里，中国人就攻进来，很多日本人还是光溜溜的，就被砍死了。日本人的尸首堆得像山一样，这一堆，那一堆，架着火烧，浓烟滚滚的。

惠民村老人说的，这就是当年名震中外的喜峰口战役。

喜峰口战役，29 军大刀队天下闻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3 年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分兵攻占东北第四省热河省。民国时期的东北共分四省，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辽宁的朝阳、阜新地区。守卫热河的是汤玉麟所部。

日军攻打热河，汤玉麟的军队不放一枪，向南逃跑；29 军人跃马欢，向北迎击。当 29 军的先头部队快要赶到惠民村的时候，与汤部的逃跑部队相遇，汤部还嘲笑西北军说：“你

们 29 军行啊，爱出风头，有本事你们就上去啊。”

惠民村的老人们说，西北军在进，汤部在退，各占着道路两边。汤部装备好，枪炮好，穿得好，还有马拉的大炮；西北军都是步枪，每人后面背着一把大刀，穿的是土黄色棉衣，有的士兵衣服还露着棉絮，但是看起来精神饱满。汤部一个个嬉皮笑脸，西北军一言不发，低着头只顾疾走。

3 月 9 日，日军两个旅团占领了喜峰口，宋哲元命令距离喜峰口最近的 29 军 37 师一个团夺回前沿阵地。这个团的团长名叫王长海。当时，王长海团驻扎在河北遵化，距离喜峰口还有 100 多里。王长海命令全团全体跑步前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已经到了夜晚。

王长海决定趁着夜晚，突击日军。特务营营长王宝良对战士们说：“弟兄们，快跟我来，杀贼雪耻，正在此时！”他身背大刀，身先士卒，走入了夜色；连长一看，营长走了，也身背大刀，走入夜色；战士们看到营长连长都走了，赶快跟了上去。夜半时分，他们悄无声息地攀上喜峰口东北高地，然后从背部抽出大刀，对日军展开了纵情杀戮。

激战到黎明，特务营夺回了喜峰口东北高地，而营长王宝良壮烈殉国。

老兵们说，29 军作风顽强，训练有素，训练内容就有一项是潜行，走路要求高抬轻放，不能发出声音，偷偷接近目标，突然发起攻击。

29 军是当年抗日军队中最富有武林传奇色彩的一支队伍，也是最富有侠义色彩的一支队伍。

天亮后，29 军的后援部队陆续赶到了喜峰口，37 师的冯治安、赵登禹都来了，因为马匹奇缺，赵登禹是骑着骆驼赶来的。

天亮后，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立体攻势下，又夺回了阵地。

夜晚，29 军决定再次发动夜袭，用大刀将日军砍出去，大刀队由赵登禹带领。

大刀队中有一个班长名叫侯万山。在出发前，侯万山说希望自己死后，两个孩子能够得到抚恤。赵登禹说，我们 29 军生死与共，有我的就有你的。这晚突袭中，侯万山手中的大刀砍下了七名鬼子的脑袋，刀刃都卷了起来。黎明时分，激战了一晚的大刀队饥肠辘辘，炊事兵送来了一大包大饼，背在背上，摇摇晃晃地爬上了阵地，被日军机枪手发现。侯万山扑倒了炊事兵。炊事兵得救了，而自己却牺牲了。

侯万山的两个儿子后来被 29 军军长宋哲元收养。

惠民村的老人说，那天晚上，喊杀声响了一夜，天亮的时候，500 人的队伍，只下来了 20 多个人。

赵登禹这天晚上砍死了几十名鬼子，他的左脚也负伤了。

日军占领了喜峰口的第三天，37 师全部赶来增援。现在，双方对阵形势，日军是第 14 混成旅团，中国军队是 29 军 37 师。混成旅团是日军在九一八事件后特有的一种军队编制方式。事变前，日军仅有 17 个常设师团，每个师团下设两个旅团。而事变后，因为需要向中国境内大量派兵，日本就将每个步兵旅团扩编，增设炮兵、骑兵、工兵、坦克兵等兵种，可以独立作战，这就是独立混成旅团。这些独立混成旅团，很多以后又扩充为师团。日本本来想仅仅用三个月就能够灭亡中国，没想到居然打了那么多年。



赵登禹

3月11日夜晩，29军37师兵分两路，一路由赵登禹旅长率领，一路由佟泽光旅长率领，又开始偷袭日军。29军没有重型武器，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只能选择奇袭，他们只能用这种最悲壮的方式来赢取胜利。

赵登禹这一路摸进了日军的骑兵大队，这支骑兵大队刚刚来到喜峰口增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强悍异常的29军大刀队趁着夜色摸进了他们的兵营里。

惠民村的张旺魁说，日本鬼子的骑兵骄傲得很，他们可

能完全没有把穿得破破烂烂的 29 军放在眼里，他们连站岗放哨的都没有，马拴在马圈里，枪架在院子里，人都脱得光溜溜的躺在炕上睡觉，马刀挂在墙上，一排排，很整齐，房子里还生着炉火哩。29 军一直摸到了日本鬼子的跟前，日本鬼子还没有一个发觉的。29 军没有客气，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日本鬼子的脑袋全被砍下来了。天亮后，日本人的营房里没动静，村子里几个胆子大的就去看，看到日本鬼子的脑袋像西瓜一样滚了一地，身子光溜溜地摆了一炕，地上是一层血，都是日本鬼子的血，黏稠黏稠的，人踩上去，鞋底都被粘住了。

这一夜，200 名日本骑兵全被杀头，一个不留。

骑兵大队，驻扎在日军后方。

另一队也战果辉煌。

张旺魁说，这一队也顺风顺水，没有碰上岗哨，直接就摸到了日本人的指挥部里。日军指挥部在一座寺庙里，寺庙里住着 20 个日本鬼子，都是军官，29 军杀死了这些军官后，还从里面缴获了很多资料和地图。从寺庙里出来，29 军又分开几路，摸进了日本鬼子的兵营，也把他们全部杀死了。这

一晚上没有听到枪声，日本鬼子都是被从脖子处砍下了脑袋，他们做梦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张旺魁还说，这一队日本鬼子是炮兵，兵营外就是十几座大炮，炮口都朝着一个方向。大炮太重了，29 军带不走，就把炮弹堆放在大炮下，再把柴火放在炮弹上，点燃了。火焰一起来，29 军就兴高采烈地跑远了。大火烧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是震天动地一阵响，大炮都被炸了，炮管子飞到了半天里。

日军第 14 混成旅团的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夜之间就被 29 军消灭殆尽，而且是用日本鬼子最恐惧的死亡方式：砍头。

日军认为，被砍了头，就永远进不了靖国神社，永远要做孤魂野鬼。

当时，日军为什么在炮兵驻地和骑兵驻地都没有设置岗哨？有两个原因，其一，自九一八事件以来，日军从来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抵抗，所以骄傲轻敌，认为中国军队不敢主动出击。在喜峰口，他们没有想到，这支衣着破烂的军队，居然不按照常规出牌，不和他们在战场上拼马刀，居然玩阴的，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剁下了他们的头颅。其二，在排兵布阵时，最前方是步兵，步兵后面才是骑兵和炮兵，日军的骑

兵和炮兵没有想到，29 军居然趁着夜色迂回偷袭，绕过步兵，直接攻击后方的炮兵和骑兵。

天亮后，日军炮弹的爆炸声惊醒了在前方悠然酣睡的步兵，他们看到后方火起，才明白屁股上被 29 军捅了一刀，他们狼狈不堪地蹬裤子穿袄，扛着三八大盖向后方增援，没想到半路上又遇到了 29 军的埋伏，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仓皇逃窜，在硝烟弥漫中哭爹喊娘，在刀光剑影中狼奔豕突，在崎岖道路上哀怨悲伤。张旺魁说，逃回营地的，只有一小半，一大半都被打死了。

这一役，29 军用大刀片杀死日军近千名，仅仅军官就有 63 名，最高的官职是炮兵大佐。

后来，日军将阵地后退 30 里。

日军极为害怕 29 军的大刀，为了保护自己，日军连夜赶制了几千个铁护脖，戴在脖子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戴着，上厕所的时候戴着，甚至连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在睡觉的时候被 29 军砍下了脖子，这个丢人的事件流传深远，深入人心，连大本营都知道了。大本营把铁护脖的先进经验交流给了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所有日军都须臾不离铁护脖，铁护脖就是他们的护身符，铁护脖对他们来说，比亲娘还亲。

但是，这次，29 军不削他们的脖子了，改为劈他们的脑袋。老人们说，29 军都是大个子，比日本人高一个头，抡起大刀，从上往下劈，把日本人劈为两半。

日军战报中说，此役丧尽“皇军的名誉”，是皇军进入支那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

当年的日本报纸还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 60 年来未有之侮辱。”

而中国的报纸则评论说：“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

12 日开始，日军增兵，29 军亦增兵，战况更为激烈。

惠民村的周志强老人说，29 军一个个都是好身手，他站在山上，亲眼见到过双方拼杀，三个鬼子拿着刺刀围攻一个大个子中国战士，这个中国战士手持大刀，一挡，再一转身，鬼子的刺刀就刺空了，中国战士一扭腰，一抡胳膊，一个鬼子的脑袋就滚下来了，顺着山坡骨碌碌滚出了好远。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刺来，中国战士一矮身，大刀就奔向了鬼子的双腿，把一条腿齐茬砍断，你看这刀快不快？也就是一眨眼工夫，两个鬼子都报销了，第三个鬼子吓破了胆，转身就跑，

但是鬼子腿短，跑不快，大个子中国士兵腿长，几步就撵上了，把这个鬼子从右肩到胯骨，斜劈成两半，你看看这 29 军厉害不厉害？

周志强说，29 军个个都会武术，会武术的打不会武术的，七八个都不是对手。29 军打鬼子的时候，那一年他才 11 岁，在山坡上放羊，那面山叫做老婆山。羊在山坡上吃草，他眯着眼睛打了个瞌睡，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29 军的几千人从他眼前过去了，脚步很轻，大气也不喘，每个人背上都别着大刀，山风吹过来，大刀上的红绸子呼啦啦飘。这老婆山村里人也翻，可是走到半山腰总要歇息一会儿，才有力气继续翻山，这 29 军都是铁打的，翻个山连在乎都不在乎。

周志强所说的事情，应该发生在 3 月 14 日以后。因为从 12 日到 14 日这三天，喜峰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战，武器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日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不得不从喜峰口撤离，转而攻向罗文峪。

《大公报》记者对 29 军有这样的记载：

虽遭受敌人之强烈炮火，亦不稍退。……吾军用手榴弹投掷较远之敌人，较近者则挥大刀砍杀，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29 军 217 团有一个战士，外号叫老毛子，甘肃人，力大无穷。部队在攻击日军一个阵地时，受到日军机枪阻击。日军在土墙上挖了一个洞，机枪从洞口伸出，一见到中国军人就扫射。老毛子匍匐到了机枪下，突然跃身而起，抓住滚烫的枪管向外拉，手掌上的肉皮都被烫破了。墙后面的日军看到有人抢机枪，也奋力向内争夺。老毛子大喊一声，双脚蹬着墙壁，把土墙蹬塌了，把日军机枪手埋在了墙下，也把机枪抢到了手中。

在当时的传说中，29 军每个人都威风凛凛，像故事中的传奇英雄一样。220 团有一个战士，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只知道是陕西人。日军坦克冲来的时候，他胸前挂满了手榴弹，趴在地上假装牺牲了。坦克来到了跟前，他突然跃身而起，钻到了坦克的下面，拉响了手榴弹。这名战士壮烈殉国，日军的坦克也被迫停下来了。

抗战老兵黎宁说，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一直很差，面对日军的坦克没有丝毫办法，就只能用血肉之躯去炸毁钢铁机器。

日军对 29 军害怕到了骨头里，他们驻扎的时候，不但戴着铁护脖，而且在营房四周都驻扎了岗哨，不但驻扎了岗哨，

还装上了铁丝网；不但装上了铁丝网，还通了电；不但通了电，铁丝网上还挂了很多铜铃。即使这样，日军还感到不安全，他们夜晚睡觉的时候都不敢脱衣服。

29 军的大刀片，29 军的夜袭，让日军成为了惊弓之鸟。



宋哲元

由于 29 军一见日军就痛下杀手，战争进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一个活口，宋哲元就告诉 29 军战士说：谁能抓到一个活的，就奖励 100 元。战士们私下里笑着说：100 元钱，哪里有一刀痛快？所以，战士们一上战场，一见到日军，还是一刀劈为两截。宋哲元责问各团团长，仗打了这么久，怎么会抓不到一个俘虏？团长们笑着说：战士们一上战场就只图杀个痛快，忘了军长的话。

当时，不论是前方后方，都是踊跃抗战的景象。

《遵化党史资料》记载：

宋哲元把 29 军指挥部设在省立五中，卫生所设在城隍庙中。五中的男生负责给阵地上运送弹药，女生负责救护伤员。城内的商家店铺纷纷慷慨解囊，前线需要什么就捐献什么；各医院、药店更是无偿提供药品、纱布和医生。成驮子的烙饼，成大缸的炖肉，整箩筐的煮鸡蛋等，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中共党员国西亮按照遵化县委的指示，到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出任武术教师，每天往来于各军营中，传授实用刀术。3 月 16 日，第 228 团在罗文峪至山楂峪十多里长的长城阵地歼敌 300 多人，仍未攻下敌阵。刘汝明决定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夜里派三个连的大刀兵摸进敌营地，一气砍死日军 200 多人

后凯旋而归，一时震动中外。雄壮豪迈的《大刀进行曲》很快在军营内外唱响。3月18日，29军乘胜进攻，在罗文峪山口歼敌500多人，把日军逼退十余里。

228团，隶属于38师，38师师长为张自忠将军。刘汝明，为29军暂2师师长。

日军在29军面前屡屡受挫，白天用飞机、坦克抢占的阵地，夜晚总是被29军用大刀片夺回去。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闻听喜峰口和罗文峪战况，大为惊讶，亲自来承德指挥。

武藤信义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从下层军官一步步升上来的，最后官至关东军司令，在他担任关东军司令的时候，后来中国尽人皆知的冈村宁次是他的参谋副官。长城抗战刚刚结束的1933年7月，武藤信义就升为陆军元帅，他的职位甚至比日军口中的“军神”乃木希典还要高。

在长城抗战之前，武藤信义依靠以第2师团为主力的关东军，占领东三省。第2师团，代号“勇”。20年前，在日俄旅顺战役中，第2师团攻打俄军守卫的弓长岭，当时弹尽

粮绝，乃木希典向大本营请求火炮支援，大本营回答：“炮弹没有，骨灰盒管够。”乃木希典只好带着两万把刺刀向弓长岭发起自杀式攻击。经过三天激战，俄军退却，而第2师团死亡1.7万人，此后，第2师团被天皇赐以“勇”的代号。旅顺战役中，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胜典、保典也先后死亡。日军要掩埋他这两个儿子时，乃木希典说：“等到我死了，再一起埋葬。”乃木希典最后也是死在中国，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后，就得黄疸死了，参谋副官冈村宁次把他的尸体护送回了东京，父子三人终于能够在阴间见面了。

第2师团是日军最富盛名的一个师团，它的师团长分别是：乃木希典、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吉本贞一……每个人都在日本战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2师团的噩运就接踵而至，势不可当。在瓜岛战役中，第2师团被美军围困，几近全军覆灭。后来，日军舰艇来到瓜岛接应第2师团时，第2师团的残兵败将连走出丛林走向舰艇的力气也没有，他们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眼看着舰艇就在蔚蓝的大海与金黄的沙滩间，可就是无法走近舰艇。后来，有一部分终于走到了舰艇边，可是连攀缘舷梯的力气也没有，最后一头栽倒在海水中。据战后的日本老兵回忆，瓜岛的沙滩上，举目望去，到处是第2师团横七竖八倒毙的骨瘦如柴的尸体。

仅有的几百名第2师团士兵乘着舰艇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仙台，第2师团又名仙台师团，在故乡扩充完备后，又返回了太平洋战场，进驻缅甸。当时，中国驻印军正在缅北连战连捷，日军第18师团被打得失去了抵抗能力，日本大本营派第2师团营救第18师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驻印军，早就不是两年前的野人山觅路突围的那支军队，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第18师团不但没有被救出，第2师团也被拉进了死亡的泥沼。几场战斗过后，第2师团最精锐的第4联队，3800人走进了缅北丛林，仅仅有70个人满身伤痕地爬出来。

此后，第2师团离开了中国驻印军纵横驰骋的缅甸战场，去往越南休整，幸运地一直等到了日本投降。

武藤信义来到长城抗战战场的时候，没有带第2师团。此时，在东北取得一连串胜利的第2师团，回到日本，享受天皇的召见。武藤信义曾经感叹，如果有第2师团，长城战场的形势完全就不是这样。

然而，即使第2师团来了，也不一定是29军的对手。

进攻长城的是日军第6师团和第8师团。而坚守长城的，除了29军，还有中央军第2师、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一个师。中央军第2师师长黄杰，第25师师长关麟征。黄杰，

以后还参加过远征军滇西反攻；关麟征，出生在陕西户县，人称陕西冷娃，此时是 25 师师长，杜聿明、张耀明、郑洞国此时都在他手下供职。25 师是母鸡中的战斗机，它孵化出了一大批抗日将领。

罗文峪激战三日，双方均死伤惨重，每日死亡人数均在 2000 人以上。

在喜峰口，在罗文峪，在古北口，在山楂峪，在长城热河境内的每一处垛口，在垛口下的每一座村庄，中日双方的军队都在昼夜激战，死尸堆积，几乎与长城垛口相齐。

连日激战，双方的体力消耗都达到了极限。3 月 19 日夜晩，百名日军穿着便衣，效仿 29 军进行夜袭山楂峪一线阵地的一个连队，遭到迎头痛击。诸葛亮说，曹操常常断人粮草，自己的粮草岂能不派重兵把守？29 军常常夜袭，自己的阵地怎能让对手乘虚而入？日本人没有仔细研究《三国演义》。

然而，因为太过劳累，战士们看着日军逃离了，也没有力气追赶。而日军经此打击后，以后再也不敢夜袭了。

夜袭是 29 军大刀队的专利，别人岂能复制？

长城抗战留下了很多传奇。

遵化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当时 29 军每个师都有一支大刀敢死队，每支 500 人。大刀敢死队把日军吓破了胆。有的日军一看到大刀举起来，就扑腾一声跪下去，嘴里连声叫着“爸爸，爸爸”。等于是让 29 军饶了他。29 军不饶，还是一刀剁了鬼子的头。还有的日军跪在地上，吓得眼睛一闭，嘴里咕噜不断，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我不想打仗，我不想打仗。”也有的说：“我是朝鲜人，不是日本人，饶命饶命。”

日本在侵略中国前，已经占据了朝鲜，日军就从朝鲜征兵来侵略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大刀名扬海外，美国大兵看到大刀对日军极强的威慑力，也在一些军队中装备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在太平洋的硫磺岛战役中，六万美军中的一部分装备了大刀，而美式大刀完全就是中国大刀的翻版。据说，后来美军感到大刀劈杀日本人太过凶悍，而且还需要中国式的武术技巧，而不再在军中装备大刀。

29 军如此凶悍，得之于他们平时严酷的训练。38 师被当

时的人们称为模范师，38 师的训练方式也推广到了 29 军。

张自忠长于练兵。

29 军 38 师一直驻扎在北方，有时还驻扎在塞外，夏季酷热难耐，冬季滴水成冰。只要没有战事，38 师每天急行军几十里。冬天，在最寒冷的午夜，38 师每个人要在规定的最短的时间里，凿开坚硬的铁板一样的冻土，挖掘出可以屈伸作战的散兵坑；夏天，在最炎热的午后，38 师每个人都要赤足走在滚烫的沙漠上。下大雨的时候，38 师在雨中冲锋，完成队列操列；下大雪的时候，38 师赤足走在积雪中，锻炼意志。而每次训练的时候，张自忠总是手持教鞭，走在最前面。

这种练兵法，与中国武术中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如出一辙。

而且，天气再冷，38 师也只能穿一件棉衣，棉衣里是短裤背心；天气再热，38 师也不能解开纽扣，不能摘掉帽子。

张自忠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

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

大刀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

(1937年)

稍快 英勇地

麦 新词曲

1=C $\dot{1}$ $\dot{1}$ $\dot{1}$ — $\underline{5 \cdot 6 \ 5 \cdot 3}$ $\dot{1}$ $\underline{3}$ 5 —
大 刀 向 鬼 子 们 的 头 上 砍

6 0 $\underline{6 \cdot 6 \ 6 \ 5 \ 6}$ $3 \cdot$ $\underline{5}$ 2 — 2 $\underline{2 \cdot 2}$
去, 全 国 武 装 的 弟 兄 们, 抗 战 的

$\dot{1}$ $\underline{2}$ $\underline{3 \cdot 2 \ 5 \ 0}$ $\dot{1}$ $\dot{1}$ $\dot{1}$ $\underline{2 \cdot}$ $\dot{1}$ 6 $\dot{1}$
一 天 来 到 了, 抗 战 的 一 天 来 到

5 — 5 0 2 $\underline{2 \cdot 3}$ 6 $\underline{6 \cdot 3}$ $5 \cdot$ $\underline{5}$
了。 前 面 有 东 北 的 义 勇

5 0 $\underline{6 \ 6 \ 5}$ $\dot{1}$ $\underline{7 \cdot 6}$ 5 6 3 $\underline{0 \ 5 \ 6}$
军, 后 面 有 全 国 的 老 百 姓, 咱 们

$\dot{1}$ $\underline{7 \ 6 \ 5}$ $2 \cdot$ $\underline{3}$ $\underline{5 \ 5 \ 0}$ 6 $\underline{5 \cdot 6}$ $\dot{1}$ $\dot{1}$
中 国 军 队 勇 敢 前 进! 看 准 那 敌 人,

1 $\underline{0 \ 6 \ 5}$ $\dot{1}$ $\dot{1}$ $\underline{0 \ 6 \ 5}$ $\underline{2 \ 2 \cdot}$ $\underline{x \ x \cdot}$ 0 $\dot{1}$ $\dot{1}$
把 他 消 灭, 把 他 消 灭! (喊) 冲 啊! 大 刀

$\dot{1}$ — $\underline{5 \cdot 6 \ 5 \cdot 3}$ $\dot{1}$ $\underline{3}$ 2 — $\dot{1}$ — x 0
向 鬼 子 们 的 头 上 砍 去。 (喊) 杀!

张自忠一向强调官兵一致，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呢子将军服只在从容就死的时候才穿上了。他和士兵吃一样的

伙食，修筑工事的时候，和士兵一起抬土、挖坑……

几年前，我在河北省迁西县的喜峰口战场故地，见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抄录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记》，碑记是这样写的：

喜峰口，古称兰陁，位于迁西北部，奇峰耸峙，险要天成，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平津，长城抗战全面爆发。宋哲元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临危受命，开赴喜峰口一线，据险抗敌。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亲临前沿，指挥督战；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裹伤陷阵。全军将士挥舞大刀，浴血拼杀；关内民众舍生忘死，奋勇支前。硝烟弥漫，日月因之失色；刀光闪烁，倭寇为之胆寒。自三月九日起，战数昼夜，毙敌五千余。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于喜峰口外！”捷报传开，举国振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唱彻华夏。

长城抗战，浩气长存；中华神威，永光万世！

然而，29军的英勇抗战，难以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不利。

4 月 10 日，日军分路进攻长城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内之南天门，并以大队飞机轰炸海阳镇。

第二天，冷口失陷，日军蜂拥南侵。守卫喜峰口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一个月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但承认伪满洲国合法，而且放弃了在华北的部分主权。

一场让人荡气回肠的战争，却是这样的结局，令人叹惋。

汉奸骂名由此来

《塘沽协议》签订后，29 军撤军。

此后的两年里，29 军一直驻扎在察哈尔省，当时的察哈尔省，与伪满洲国接壤，也就是抗日前线。

1935 年 8 月，29 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与北平、天津两个市。张自忠任 38 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后来担任张自忠参谋处长的张宗衡回忆说，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精力都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马匹车辆人员，他都要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是年轻力壮但身体稍微矮小的士兵，他都要另行编排成队，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技术特别看重，所以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1936 年，全师有两个旅换成了捷克式步枪，

旧枪补充新增加的两个新兵旅。那时候，因为 29 军名气很大，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英雄，所以察哈尔的强壮年们都以能够入伍为荣。

在美国没有与日本开战前，这时候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是德国造和捷克造。捷克造轻机枪，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今，我们还能在反映抗战的电影中看到捷克式武器的身影。

这时候的 38 师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四挺，有掷弹筒两门，连长也配了德国造手枪一支。这种手枪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中经常能够看到，俗名有很多：二十响、盒子炮、自来得二十响、快慢机。这种手枪最多可以连发 20 颗子弹。

然而，即使这样，38 师的武器装备还是远远不如日军的。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人数大致与日军一个中队的人数相当，都为 150 人到 180 人。38 师此时一个连有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而日军一个中队有八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九门掷弹筒，另外还装备有迫击炮。还有一些中队装备有马匹和坦克、重炮。

所以，换装后的 38 师仍然和日军不能等量齐观。

日军与 38 师日日相望，屡屡挑衅，总想找点事端，引发战争，趁机进犯察哈尔省。38 师严阵以待，坚决回击。有一次，38 师保安团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犯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失守，张家口危矣。然而，日军不知道张自忠到底有多少底牌，也不敢贸然进攻，就派人来试探虚实。张自忠给日军捎话说：“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演练，如发生意外，一切后果应由日军负责。”

张自忠绵里藏针的强硬态度让日本人害怕了，此后不敢再觊觎大境门。

张自忠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

张宗衡回忆说，察哈尔省张北县有一个收税的，蛮横霸道，殴打了小商小贩，张自忠听说后，不但让这个收税的赔偿了医药费，还把他撤职查办。有一个士兵，因为家穷，把妻子卖到了妓院，张自忠拿钱赎回了士兵的妻子，让他们夫妻团圆。

不久，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

天津是一个多事之地，那时候，各国都在天津设有领事

馆，划分有租界，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尤其是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超等公民，视中国人如猪狗。



张自忠

宋哲元和张自忠知道中日必有大战，所以偷偷通过关系

购置设备，充实部队，并给天津的警察装备了新式武器。天津有大沽造船厂，张自忠在此制造了一批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还制造了大量子弹，全部用来装备 29 军。

张自忠上任不久，就把 38 师特务团秘密调进天津，穿着警察衣服，名为保安团，防备战争发生。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保安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岐穿着便衣，出外购物，误入日租界，被两名日本特务发现，抓进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打，污蔑他是奸细。张凤岐始终称自己是茶馆的职员。

天亮后，几名日本特务持枪押着张凤岐，乘着卡车，去他说的那家茶馆对质。卡车经过天津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看到张凤岐被五花大绑，满脸伤痕，就喊来同伴，拦截车辆。卡车上的日本特务不但不停车，还向保安团开枪。保安团奋起还击，当场击毙日本特务一名，击伤两名，包括卡车司机，而保安团自身没有伤亡，张凤岐趁乱逃脱。卡车上的日本特务看到这伙中国警察动真格的，吓坏了，卡车司机顾不得裹伤，开足马力逃走了。

死了一个日本人，伤了两个，事情弄大了，日本领事馆

找到张自忠，叫嚣要枪毙张凤岐和“杀人凶手”，为死了的日本特务偿命。

张自忠派人谈判说，张凤岐只是去日租界购物，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活动，你们抓张凤岐是误会，保安团击毙日本人也是误会，你们把张凤岐当成了奸细，保安团把日本人当成了土匪，这一切都是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引起的。

日本领事馆理屈词穷，但要求将张凤岐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死了一个人。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意叮嘱保留张凤岐的军籍，薪水照发，照顾家眷，每天派人给张凤岐送饭。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令张凤岐归队抗日。7月28日凌晨2时，天津保安团，其实就是38师特务团向日军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蒙受了一年冤狱的张凤岐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在天津，中日双方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表面上一团和气，亲善友好，而实际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中日双方都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都是笑里藏刀，绵里藏针，谁都不愿撕破脸皮。中国在加紧备战，扩军练兵；日军的战争

机器也在悄悄开启。

有一次，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谁是最高来宾的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田代皖一郎和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多田骏、中岛今朝吾是日本军校的同学。“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田代皖一郎是被抗日志士炸死的白川义则的参谋长。七七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

田代皖一郎是一名中国通，那时候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早年都以商人、学者的身份来到过中国，刺探中国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做准备。

张自忠闻听田代皖一郎的无耻要求，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义正词严地说，英国租界为中国领土，日本驻军天津系不平等条约所致，日本驻军所在地，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主人，如果以田代皖一郎为最高规格的来宾，那么中国方面就绝不出席。

英国领事馆权衡再三，终于将张自忠将军待为最高来宾。

外交无小事。张自忠将军争执的，不是最高来宾的那张座位，而是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还没有出租车，都是人力车夫。有一次，英国巡捕殴打了一个人力车夫，全市大哗，但英国巡捕拒不道歉。张自忠通知全市所有人力车夫，不要出入英租界，不要拉送英国人。英租界里没有人力车夫，交通不便，这些养尊处优的大腹便便的英国贵族老爷们，出入漫长而蜿蜒的租界，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痛苦不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前来交涉，惩办打人凶手，张自忠才让人力车夫进入租界。

在张自忠之前，天津所有的外国企业，那时候叫洋行，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却不缴纳任何捐税。张自忠来到后，首先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一家贩卖羊毛的英国洋行，在轮船上装满了羊毛，准备开赴英国，张自忠命令保安团扣押了。英国领事馆怒气冲冲地赶来交涉，声称自大清《辛丑条约》签订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给中国地方缴税。张自忠义正词严地回应：“占我河道，必须纳税，不纳捐税，不准开船。”当时正逢夏天，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包围了英国轮船，英国水手们汗流浹背，却又不能离开轮船。炙热的阳光照耀着羊毛，羊毛如果不赶快运往英国晾晒，就会腐烂发臭，最后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商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自忠安稳得像钓鱼台上的渔夫。最后，英国商人被迫缴纳了所有捐税，才被放行。

此后，天津所有外商，不管从事哪一行生意，即使他卖狗不理包子，也得给天津政府纳税。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的“汉奸”之路，需要从他“出访”日本说起。

1937年4月，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去日本，成员有38师旅长何基沣、黄维刚等十几人。他们去了东京、奈良、大阪、名古屋等城市。

当时，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而张自忠居然率团前去日本“访问”，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于是，有人说张自忠是去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有人说，日本人给了张自忠很多钱，还给了一个日本娘们。

张自忠回到国内后，才得悉自己已经被辱骂，被报纸称为汉奸。

中国人讲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瓜地里系绑鞋带，在李树下整理帽子，看到的人都说你在偷瓜偷李子。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张自忠去日本“出访”，难怪会被人骂为汉奸。

被人骂为汉奸，张自忠很痛苦。

有一次，张自忠喝醉了酒，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人们骂我是汉奸，把我的骨头砸碎了，看能不能闻到一点汉奸味？”

然而，他除了向手下的军官们表白，他还能说给谁听？

不久，一场鸿门宴上演了。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而中国出席的军官，则是29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这场宴会，宋哲元摆明了就是想杀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据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回忆，当时出席宴会的除了29军的一些军官，宋哲元还邀请了北平社会名流吴佩孚等人。吴佩孚在对日态度上，一直很强硬，果然具有中国顶级军阀的范儿。

宴会开始，宋哲元致祝酒词，日本方面顶替土肥原贤二出席的，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都是说中日世代友好，应该继续友好下去。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虚假的套词，但还是热烈鼓掌。

酒至半酣，一名日本军官唱起了日文歌曲，尽管中国军官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日本人，日本人唱，我们也唱，唱得比他的声音还要响亮，还要有气势。何基沣旅长立即站在桌子上唱了一曲《黄族歌》。有人说，《黄族歌》的歌词是李大钊写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双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盘铁砚，后哲先贤。

何基沣旅长歌声刚落，一个日本军官又唱起了日本歌曲。

当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唱什么，但是双方都在嘶声歌唱，都想将对方比下去。日本军官的歌声刚刚停歇，38 师副师长李文田立即接口唱了一段京剧黑头。京剧黑头，铜锤花脸，威势赫赫，气贯长虹。日本人一看比不过，就两个人来唱，一个站在桌子上，一个站在桌子下。

37 师师长冯治安悄悄来到董升堂旅长身边，暗示他出去打套拳。董升堂，是红军将领董振堂的大哥，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红军西路军惨败时，董振堂也壮烈牺牲。董升堂、董振堂，出生河北，两兄弟功夫都非常了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董升堂离席，站立中央，他身躯高大，如山峰兀立。突然，他伸拳踢腿，虎虎生风。日本军官不会中国武术，就拿着一把倭刀出场了。李致远旅长看到后，就悄悄叫来传令兵，速速去拿自己的柳叶刀，这把柳叶刀，是用最好的钢打造的。日军一把倭刀还嫌不够，又有两把倭刀出场了，围着董升堂虚张声势，肆意挑衅。董升堂大怒，取来一把大刀，横劈竖砍，威风凛凛，三把倭刀不敢再近前，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恰好此时李致远的柳叶刀送来了，李致远持刀在手，围绕着日军表演了一套地趟刀法，日军不得不步步后退。

接着，双方开始比赛酒量，一碗接一碗地喝，用的是吃

饭的小碗。李致远回忆说，当时想着，就是喝死了，也不能输给他们。

唱歌比不过，练武比不过，喝酒还是比不过，日军开始比赛，看谁能变态。一名日本军官赤膊上阵，把裤带绑在额头，把点着的香烟，口中叼三支，鼻孔中塞两支，两只耳朵各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同时吸同时吐。

比唱歌可以，比武术可以，比喝酒也可以，但是和日本人比变态，那是不可以的。

29 军的军官置之不理。

日军看到 29 军不接茬，就铺张纸，拿杆笔，开始比书法，29 军踊跃迎战。你写一张，我写一张，争得不相上下。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吴佩孚出场了，他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握笔在手，气沉丹田，龙飞凤舞，一挥而就，铁马金戈，一气呵成。日本人看着老头的书法作品，垂头丧气，连继续比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日军来到宋哲元的酒席边，喊着号子抬起来；29 军的旅长团长们马上来到河边旅团长身边，也把他抬起来。日军喊一声号子，举一下宋哲元；29 军的军官们喊一声号子，将河边高高地抛起来。日本人一看，又举起了秦德

纯副军长；29 军的军官们一看，也举起了松岛。

当时，宴席上乱成一团，热烈的气氛下掩盖着凶险，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37 师师长冯治安担心会出危险，喝令两边都把放下。

随后，宋哲元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假话，河边也说了一番虚情假意的套话，都说今天的宴会很好，气氛热烈，互相亲善，然后不欢而散。

当时，战争的机器在悄悄运转。中国在悄悄扩军，日本也在悄悄扩军。中国华北和日本海的上空，战云密布；越来越多的火药堆积在这里，就等着一星火花突然点燃。

然而，不知道这一星火花什么时候会点燃。

1937 年 7 月 7 日黄昏，斜阳的余晖照耀着永定河畔的宛平城，这个黄昏和以前的很多黄昏一样，宁静安谧；然而这个黄昏却又与以前的很多黄昏不一样，它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天黄昏，日本华北驻屯军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宛平城外实弹演习。枪声阵阵传来，像重鼓一样敲击着宛平城里每个中国人的心扉。驻扎在

宛平城里的第 29 军 37 师 110 旅 219 团 3 营战士站在操场，大声唱歌：“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城内的歌声压倒了城外的枪声。

夜晚 11 时，日军号称演习结束，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索，遭到 219 团严词拒绝，双方对峙。

一小时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交涉，说日军演习完毕，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而此时宛平城外又响起了枪声，怀疑是中国士兵击毙了这名日本士兵，然后潜入宛平城里，要求搜查。冀察政务委员会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又过了一小时，荷枪实弹的日军走向卢沟桥。卢沟桥建于永定河上，直通宛平城，距离北平仅有十余公里。卢沟桥一失，北平门口敞开。

排长申仲明跳出掩体，阻止日军前行，一排战士伏在掩体的沙袋上严阵以待。日军没有停步，突然开枪将申仲明击倒。申仲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指着卢沟桥的方向，掩体里的一排人全部开枪了，然而，六挺机关枪和几十杆步枪无法阻止日军疯狂的进攻，日军很快就冲上了桥头，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几十名战士看到日军拥上来，就抡起大刀阻击，

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卢沟桥落入敌手。

进攻卢沟桥的日军中，就有“失踪”的志村菊次郎。

当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志村菊次郎在演习的时候，因为拉肚子而离开了军队，日军就此事与国军交涉。20 分钟后，志村菊次郎回到了军队中，但是日军已经骑虎难下，干脆就掩盖了这个消息，继续向国军提出蛮横要求。最后，演变成了七七事变，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

很多史学家认为，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没有想到战争会在这一天爆发，日本也没有想到。一场偶然事件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苏、英、澳、日、德、意、朝等几十个国家参与，伤亡人数将近一亿，战火燃遍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一个士兵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

偶然改变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因为一场暗杀引起了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这样，因为一个士兵失踪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回国了，日本担心秘密会被他说出；1944 年，日本青壮年几乎都战死在了海外战场，志村菊次郎再次入伍，来到了缅甸

战场，被中国军队新一军打死。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战争贩子的名字：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战争贩子的结局。

清水节郎大尉：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清水节郎率 600 名日军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激战长达一昼夜。9 日，中国增援军队赶到，将清水节郎大尉的 600 人全部包围，予以全歼。清水节郎大尉也死在了中国军人的枪弹和大刀片下。

一木清直少佐：七七事变不久后就升为中佐，三年

后升为大佐，任第 7 师团 28 联队联队长，驻守中国东北。又相隔一年后，开往瓜岛与美军作战。这次，他遇到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陆战一师用机枪和坦克，仅以阵亡 35 人的代价，全部消灭了日军 28 联队一木支队 800 人，一木清直在美军坦克前剖腹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七七事变一年后，升任第 4 军中将军参谋长，又四年后，担任 18 师团师团长，参与了第一次缅甸战役，与杜聿明、孙立人交过手。六年后，担任 15 军司令官，其下辖第 18 师团、33 师团、56 师团均被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 18 师团连关防大印都丢失了，56 师团两个联队烧掉了军旗，两个联队的番号在日本军队彻底注销，33 师团也伤亡大半。日本大本营非常恼怒，撤销了牟田口廉也的职务。牟田口廉也羞愧交加，自杀未遂，后被国际法庭审判，再后来孤寂度日，死于 1966 年。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29 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修建祖坟，与日军对峙的是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等将领。

张宗衡回忆说，这些 29 军的高级将领们急电宋哲元，又

派人急赴山东，请宋哲元速速返回，支持一切应变事宜。宋哲元的态度是希望此事能够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到底处于什么程度？何应钦在当年的陈述报告中说，日本现役兵力有 17 个常备师团，大约 38 万人。中国现役兵力 170 万人，第一期可以动员 100 万人参加战斗。这 100 万人包括各地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

而日本内阁的算法是，日本除了 38 万现役军人，还可以立即动员 400 万人参战，包括日本的退役军人，三个月解决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他是有意躲避日军的纠缠。当北京来人向他说明了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后，他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卢沟桥事件。

当时，张自忠也认为和谈是解决的最佳途径。宋哲元前往北平后，与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自忠的支持。不久，宋哲元就下令，取消北平戒严，严禁 29 军与日军摩擦，释放数十名被俘日军。

然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

频向日军统帅部提出，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当机立断，彻底征服中国。不久，十万日军乘船开往中国。

18日，宋哲元和张自忠会见了初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来后就对外宣布：“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原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重病缠身，死期将至。

实际上，此时的香月清司设置圈套，欺骗宋张二人，他的真正目的是，等到援军赶来，一举击溃29军，占领华北。

此时，日军驻朝鲜的近万人已经悄然开至唐山、天津。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经相继秘密调往华北。另外，日军还有16万人，正日夜兼程，扑向平津。

20日凌晨，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和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惩罚罢免抗日人员。

《香月细目》是在宋哲元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而签订人之一的张允荣，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至此，铸成大错。

和谈，和谈，不停地和谈，都是香月清司玩弄的障眼法。

7 月下旬，时机终于成熟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进攻。南苑一带的 7000 余名 29 军战士仓促抵抗，但因听从宋哲元求和部署，没有构筑坚固工事，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失守。29 军副军长佟麟阁、132 师师长赵登禹和 3000 余名官兵阵亡。

时任 29 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28 日下午 2 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 29 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 37 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7 月 29 日，北平陷落；次日，天津陷落。

宋哲元走后，张自忠就职，未经向南京政府请示，改组

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潘毓桂等一批新人为委员，而这些人，后来做了汉奸。

同时，张自忠改编 29 军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这支军队中，除了一部分突围而出外，其余的只能听任汉奸指挥操纵。

平津陷落后，日军先后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任命潘毓桂等汉奸为指挥，张自忠被一脚踢开。至此，张自忠才如梦初醒。他的肠子都悔青了。

他决定逃离。

张自忠怎么会成为汉奸？

新华出版社《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中，收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日本驻屯步兵第 1 联队在七七事变后一周年举行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参加人有少将牟田口廉也、中佐樱井德太郎、中佐一木清直、中佐川本芳太郎等六人。

川本芳太郎说，张自忠来东京的时候，他曾经面见张自忠，对他说：“阁下您现在的立场非常重要，您不了解日本，

对日中关系没有认识，就必然导致日中全面冲突。”他对我的意见十分理解。

川本芳太郎又说，热河战争后，宋哲元一再向日方表示，华北事务如让他处理，一定满足日方的意愿。因此，以他为首建立了冀察政权。这个政权是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樱井德太郎说，冀察政府要同时讨好日本和南京政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宋哲元为了逃避，回到他的老家山东乐陵。恰在此时，张自忠来到了济南，我也去往济南，和他交谈。我向张自忠提出：冀察政权如无日本提携，难以维持。我还见到了韩复榘。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同日本关系恶化，就必然灭亡的利害。因此，张自忠回去后，赶紧多方奔走。

樱井德太郎还在谈话中评价了宋哲元，认为他“小人得志，优柔寡断。日方施加压力，便言听计从；南京口气一硬，马上见风使舵，是一个毫无决断能力的人”。

应该说，正因为日方看不上宋哲元，才选择了张自忠。张自忠做事果断，敢作敢当，是条汉子。可是，他却一念之差，上了贼船。

有的书籍记载，宋哲元离开北京，去往保定，是被张自

忠逼走的。张自忠想取代宋哲元而自立。

这次谈话中，几个日酋还说到了 29 军的素质，樱井德太郎说：“29 军相当正规，集合号一吹，一个旅十分钟之内即可集合完毕。经常训话、阅兵。连长以下将士全在军营生活。军队文化素质不高，所有科目都通过实践。经常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单杠、大刀、刺杀等。战士大都是在 20 岁以下，年轻力壮，训练刻苦不腐化，在中国军队中可谓佼佼者。北京陷落，撤离北京时，该部没有发生抢劫等现象，可见训练有素。”

一切变成泡影，张自忠决定逃离。

为了不让日军注意，张自忠乔装打扮，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后来，在两名美国商人和天津商人赵子青的帮助下，张自忠躲过了日军的盘查，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的家中。

张廉云回忆说，见到父亲的那天，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袍，身体非常消瘦。以前父亲回家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非常热闹。而这次，父亲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沉默不语。后来，父亲把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给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

张自忠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临走的时候，他把张廉云和侄女张廉瑜等几个女孩子叫到一起，给她们每个人手中塞了一点钱，说这是她们以后结婚的嫁妆费。然后，就离开了。

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廉云没有送，因为弄堂里还住着别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在送汉奸父亲。她看着父亲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身影渐渐远去，一路都低着头，显得很悲怆。张廉云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张廉云说，当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送她钱做嫁妆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张自忠就这样走了，走进了抗日战场，走进了南瓜店的血雨腥风中，走进了一座冰冷的碑石里。

张自忠离开天津时，29军军部已经撤往了河南新乡。张自忠乘坐英国商船，去往济南，准备由济南赶往新乡。路过潍坊时，张自忠遇到了以前当连长时训练的一个士兵，此时这个士兵已经是师长了，他就是29师师长李汉章。李汉章看到张自忠，就毫无礼貌地讥讽道：“以前我看你尽看些圣贤之书，你都学了些什么？”

到了济南，张自忠站在门外，副官进去给山东省主席、

同为西北军弟兄的韩复榘通报张自忠来了，客厅里的韩复榘故意大声喊，这个汉奸找我来干什么？

韩复榘给南京政府打电话，通报说张自忠逃到了济南，怎么处置。

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张自忠押解南京的消息，被当时的记者知道了，他们不但登载了这个消息，而且连车次都登出来了。火车一到南京，一群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学生就纷纷爬上火车，要求严惩汉奸。万不得已中，张自忠躲进了厕所。

而就在张自忠躲进厕所的时候，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一直研究民国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何立波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张自忠被押解到南京后，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此情，以为张自忠已被囚禁，便匆匆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读后，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

权辱国，就连贪赃枉法的行为也没有。马彦还说，他给张自忠担保，如果查出来张自忠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先查办他。

不久，钱大钧来看望张自忠，还带给了他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对张自忠说，委座（“委员长”的尊称）说你可以接受记者采访，平息舆论。

当年，蒋介石想把张自忠留在南京，但是熟悉张自忠的冯玉祥知道这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当李宗仁询问第六战区的人士安排时，冯玉祥力荐张自忠任 59 军军长，因为 59 军是原来的 38 师扩充而成的。于是，蒋介石又任命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 59 军军长。

张宗衡回忆道，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59 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张宗衡说，此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临沂血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享誉全国的 29 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宋哲元，下辖三个军，均为原 29 军各师扩编，番号分别为 77 军、59 军、68 军，77 军军长为冯治安，68 军军长为刘汝明，59 军军长一直空缺，由宋哲元暂为兼任，后来由张自忠担任。

有人认为，这三个军的番号，都是为了纪念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七七事变，77 军，明示七七事变；59 军和 68 军，每个军番号数字相加，都是 14，两个 7 相加也是 14，暗示七七事变。

后来，59 军被调到第五战区，隶属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一直很看重张自忠，认为他是一员虎将。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陷。

1937 年 12 月 27 日，济南失陷。

为了将南京战场与济南战场连贯起来，尽快灭亡中国，日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这场战役叫作徐州会战，人们通常所说的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中的一部分。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了 24 万兵力，中国兵力 60 万，日军指挥官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中国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畑俊六以后当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国的作战；寺内寿一以后成为南方军总司令，负责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对美军和中国驻印军作战。此二人以后都晋升为日军元帅。

战事一开，张自忠有了用武之地。

李长维曾在 59 军跟随张自忠将军抗日，在来到 59 军之前，他在川军当兵。

全面抗战一开始，川军就出川抗战，当时，李长维刚刚被拉了壮丁，连拿枪投弹都没有学会，就被匆匆派往战场。

李长维所在的那个排都是新兵，而排长是一名老兵，他们就一边行军，一边训练。那时候山西的忻口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就根本没有训练的时间。

从四川到山西，翻越无数座高山，跨越无数条河流，而这些四川兵只能依靠一双穿着草鞋的脚板奔赴战场。每天都是急行军，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夜晚月亮升上来才能休息，每天只能休息两次，每次 20 分钟，匆匆扒两口饭，又要赶紧赶路。即使遇到雨天，也要赶路，前方战事紧急，容不得休息。

而同时期的日军，从日本坐着军舰来到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坐着卡车开往前线。

李长维说，刚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能吃到小米和玉米，等到了湖北境内，就只能吃喂牲口的黑豆了。吃了黑豆容易拉肚子，可是拉肚子也不能掉队。

新兵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中途休息的这短短的 20 分钟，排长给战士们示范怎么持枪，怎么瞄准，怎么射击，怎么投弹，怎么匍匐前进，怎么躲藏炮弹……等到他们进入山西境

内的时候，新兵们才学会了打枪和投弹。

李长维说，他们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来到山西后，李长维才发现这里奇寒无比，和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四川出发的时候，还是酷暑季节的8月，而来到山西，已经是漫天飞雪的11月。四川兵都穿着单衣草鞋，然而，想补充一身棉衣，没有。夜晚，因为太过寒冷，战士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然而，一上战场，四川兵都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那时候真是同仇敌忾啊，日军是中华民族敌人，再苦也要打鬼子。”何宏钧当年是川军41军的士兵。

李长维所在的部队沿着湖北这条线路从四川开往山西，何宏钧所在的部队沿着陕西这条路开往山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山西。

全面抗战开始前，何宏钧在川军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这批学员尚有一年才能毕业，而现在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川军各个部队里。何宏钧离开四川的时候，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而现在要开往山西作战，他都来不及给老母亲说一声，就背着步枪步行赶往山西前线。

这一路上，何宏钧依然是走了两个多月，翻山越岭，每天行军近百里，赶到了天寒地冻的山西。

当时，川军是中国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差的，人们称其为“叫花子部队”，装备不足，弹药缺乏，出川的时候，有的士兵连一杆枪都没有，扛着大刀长矛就出川了。每人仅有一身衣服，衣服破破烂烂，来不及缝补，又加上连续行军，顾不得洗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浓浓的汗臭味。所以，当川军来到山西后，阎锡山大为不满，他看着这些“叫花子部队”，轻蔑地问：“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民国时期的山西富甲一方，晋商曾经称霸中国经济几百年。阎锡山的晋绥军每人冬装夏装各两身，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所以，他看不起远道而来衣着破烂的川军。

川军怎么能够和晋绥军相比？

何宏钧说，出川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北方会那么寒冷，四川兵都是草鞋单衣，双手双脚冻得红肿，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冻死。当时的川军里连医院都没有，受冻生病了，也只能硬撑着，撑不过的，就死了。每天都能看到平板车拉着尸体倒进壕沟里，然后填埋。

川军战士李长维和何宏钧从四川盆地一路走到了太行山区的时候，张自忠将军所部 59 军的另一名士兵阮明刚，此时刚刚被抓了壮丁。

这一年，阮明刚 16 岁。

一天，16 岁的阮明刚在湖北省随县安居镇的姨妈家做农活，田地里突然来了几个人，穿着黑色衣服。他们看到阮明刚，二话不说，就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带到了乡公所。乡公所里还有一些青年，都和他一样被五花大绑，阮明刚一个人都不认识。到了黄昏，这些人都会被解开绳索，吃了一顿饭后，就跟着几个当兵的人走了。走在黑暗中的乡间小路上，阮明刚牵挂着他放在田地中的农具，还有，姨妈也不知道他突然离开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走了半夜，阮明刚走进了一座兵营里，阮明刚此时才明白，他是被抓了壮丁。那时候，国民政府向各地摊派征兵名额，当地的保长为了完成任务，见生人就抓壮丁，谁家没有钱的也会被抓。

后来，阮明刚才知道，他走进的部队是张自忠的 59 军。在张自忠的严格训练下，阮明刚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再

后来，阮明刚跟随张自忠渡过襄河，向日军主动出击，张自忠将军牺牲于斯。

再后来，阮明刚跟随黄维刚军长抢夺张自忠将军的尸骨，也将日军的指挥官杀死了。

阮明刚被抓了壮丁时，李长维还在川军里。

长途跋涉来到山西前线忻口后，李长维才学会了使用步枪和投掷手榴弹。那时候，步枪和手榴弹是中国士兵最基本的装备。

李长维说，忻口战役打得很惨，尤其是在夜间反攻战中，中日双方发生了混战，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都牺牲了。在抗日战场上，郝梦龄是中国阵亡的第一位军长。

山西战事告一段落后，李长维和何宏钧接到命令，要开往徐州。

李长维、何宏钧、阮明刚，从不同的方向赶往徐州。徐州的上空，战云密布，中日双方的几十万军队在这里集结，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何宏钧最先赶到山东滕县，他所在的 41 军打响了滕县保卫战。41 军的代理军长为川军将领王铭章。王铭章接到的命令是，坚守滕县三天，拖住日军。三天后，大批军队就会来到。

王铭章知道依靠装备简陋的 41 军，是无法阻挡如狼似虎的日军的，他召集全军将士，誓师道：“我们身为军人，牺牲本为天职，虽战至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 20 年内战之罪愆！”

41 军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就开始了攻击。面对排山倒海一般呼啸而来的日军，王铭章将所有的部队收缩进城里，与日军对抗，他坚壁清野，焦土阻击，将城门全部封堵，日军很难攻打进来，而他们也无法出去。王铭章昭告全城官兵：“死守滕城，将士同心，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王铭章和 41 军全体将士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何宏钧说，原定坚守三天的滕县县城，41 军坚守了四天半。攻打滕县的是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兵力多达 7000 人，各种大炮几十门，坦克几十辆，飞机 30 多架，而 41 军没有大炮，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支援，只有迫击炮。这种

迫击炮和日军的大炮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日军的大炮一旦发现目标，就展开地毯式轰炸，而 41 军数量稀少的迫击炮打两炮后，就赶紧转移，否则会被日军大炮轰炸。当时 41 军的装备和日军濑谷支队比起来，就像大刀长矛与机关枪相比一样。

激战一天过后，何宏钧所部的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指挥作战，连长、排长几乎伤亡殆尽，新兵何宏钧做了营部副官。

第二天，何宏钧也负伤了。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猛攻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的藤县县城，城墙倒塌，城门失陷，日军渐渐逼近县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王铭章带着警卫排在十字街道阻击，大呼杀敌，一架日军飞机掠过空中，投弹扫射，王铭章身中七弹，全身浴血。卫士扶着王铭章，王铭章用最后的力气高喊：“不要管我，快杀鬼子。”喊完后，就闭上了眼睛。

警卫排全部壮烈殉国。

电影《血战台儿庄》里有王铭章死守藤县的情节，在日军四面合围中，王铭章拔枪自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王铭章被日军飞机机枪扫射阵亡。

县城的战斗还在继续，每一条巷道、每一座房屋，都在激战。

何宏钧说，到处都是硝烟，到处都是火光，耳朵边到处都是爆炸声，川军子弟们，只要还能动的，就和日本人打。

第四天，枪声逐渐稀疏，日军占领了藤县。在一座大宅子里，300 名重伤的川军子弟，听到藤县失守的消息后，他们拉响了手榴弹，300 人全部牺牲。

何宏钧跟着轻伤员突围出来。

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年从藤县突围而出的川军子弟，仅有 17 人。

此役，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死亡 2000 余人。

何宏钧退出了徐州战场，李长维、阮明刚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了徐州战场。

经历了忻口会战，新兵李长维变成了一名老兵。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因为武器简陋，死亡率非常高，每场战役结束，都要大量补充兵源，而当兵仅仅几个月的李长维，被收入张自忠的军队，成为了 59 军的一名班长。

阮明刚在湖北襄樊训练了两个月后，也跟随着张自忠开往徐州。阮明刚至今还能记得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是 59 军 38 师 114 团 1 营 2 连 1 排 2 班，军长叫张自忠，师长叫黄维刚，团长叫樊立山，营长叫靳云升，连长叫张志国，排长叫谭大胜。步入耄耋之年的阮明刚经常丢三落四，然而对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各级长官的名字随口就能说出。

阮明刚说，张自忠将军黑脸光头，面目凶恶，身材魁梧，疾恶如仇，身高至少也有一米八，看起来威风凛凛。

刚刚赶到徐州的时候，张自忠给大家开会，要求严明纪律，说国家已经危难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遭受苦难，谁也不能残害老百姓。阮明刚记得张自忠在那次会上说：“杀一人如杀我父，奸一人如奸我母。”

战争还没有开始，张自忠先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克扣士兵军饷的贪官，一个是自己的贴身卫士、手枪营营长孙二勇。

59 军没有人不认识张自忠，而张自忠也能够认识 59 军很多士兵。阮明刚说，只要不打仗，张自忠就会和士兵们待在一起，他和士兵穿着同样的衣服，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和士兵们一起吃饭，不认识的人，还以为这个光头大个子是一名炊事兵，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军长。

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记张自忠将军》的文章。他见到张自忠将军的时候，张自忠将军已经升为第 33 集团军司令，司令部设在襄阳与当阳之间一个叫作快活林的小镇上。

梁实秋在文章中写道：

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面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沓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

贵为集团军总司令，手下将士几十万，威势赫赫，为人却如此谦恭。每次经手军饷何止千万，雄踞一方，而生活却如此简朴。这样的将军让梁实秋至死也没有忘记。

张自忠将军是在与士兵们闲谈中，得知有一个克扣粮饷的军需官。张自忠喝令将这名贪官枪毙：国难当头，竟敢中

饱私囊，要此人何用！

枪毙贪官，张自忠将军没有丝毫犹豫，然而枪毙手枪营营长孙二勇，张自忠将军流下了眼泪。

59 军老兵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将军开往台儿庄，大雨倾盆，每个人头上、身上都水流如注，但是，战士们还在一路疾走，日军已经逼近了台儿庄，滕县保卫战已经打响，王铭章带领川军正在与日军殊死作战，中央军、桂军、川军向台儿庄飞快集结。

突然，传来了口令：停止前进。

59 军上万将士肃立雨中。

张自忠从队伍后面赶了上来，雨水像小溪一样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流淌，也一直流到了阮明刚的心里。张自忠阴沉着脸，他口中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水花四溅的泥泞的路面上。他说：“昨天夜里宿营，有一个兄弟糟蹋了房东的姑娘，人家 16 岁的黄花闺女，如今全毁了。”

每个人都知道这下闯了大祸，张自忠最看重的就是军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欺负百姓，他说过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杀一人如杀我父，奸一人如奸我母。”

张自忠目光如炬，他说：“这事谁干的？男子汉敢作敢当，有种的就站出来。”

全体肃立，风声瑟瑟，无人应答。

张自忠的脸色非常冷，他说：“今晚宿营，以连为单位，谁的大腿有抓伤，就把谁给我揪过来。”顿了顿，张自忠大喊一声：“开拔。”

队伍又向台儿庄疾进。

昨天晚上，那名房东家的闺女，抓伤了糟蹋她的那人的大腿。

夜晚，干这事的人被揪过来了，竟然是军部手枪营营长孙二勇。

孙二勇骁勇善战，异常忠诚，跟随张自忠多年。喜峰口战场上，他手挥大刀砍下了 18 颗鬼子的人头；七七事变中，他率队守卫南苑，手下伤亡殆尽，而他绝处逢生；张自忠任北平市长时，刺客刺杀张自忠，他用自己的胸脯挡住了射向张自忠的三颗枪弹，屹立不倒，把凶手吓软了。

然而，今天，孙二勇犯下的是天大的戒律。

张自忠沉吟了足足有五分钟，然后下令：“杀！”

天未亮，雨未停，队伍又出发。

这支英雄的军队，少了孙二勇。

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将军驰援台儿庄，无日不在血战。

突然，一天晚上，有人走到了张自忠将军的身边，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张自忠一看，居然是孙二勇。

孙二勇跪倒在张自忠面前：“军长，我归队了。”

张自忠阴沉着脸，对传令兵说：“给他换衣服，让他吃饭。”突然又加重语气说：“关起来，听候处置。”

孙二勇能够回来，大家都非常高兴。敌我鏖战，旷日持久，伤亡惨重，当下正是用人之际。更何况，孙二勇是一员虎将。

孙二勇为什么能够不死？这事看起来很蹊跷。那天，行刑的士兵也许心中发慌，也许故意放孙二勇一马，也许孙二勇体力超常，那两枪只是把孙二勇打昏了。59军开拔后，当地的老百姓将孙二勇抬回家中，进行医治。伤口快要痊愈时，人们都劝他赶快逃跑，可是孙二勇坚决要回到张自忠身边，

就这样，他一路追到了台儿庄。

这时候，台儿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张自忠痛苦地思索了一夜，第二天仍然决定：杀孙二勇！

所有人都为孙二勇求情，张自忠不为所动，他只说：“我要的是一支铁军。”

军部设宴为孙二勇送行，而所谓的宴席，也就是几盘平时张自忠也吃不上肉菜。众将向孙二勇劝酒，孙二勇来者不拒，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得浑身热血沸腾。

黎明，在刑场，孙二勇请求张自忠能够让他上阵杀敌，他解开自己的衣服，胸脯上后背上都是累累弹伤、刀伤。张自忠让师长、团长们解开衣服，每个人身上都伤痕累累。张自忠也解开了自己的衣服，他的身上也是刀伤纵横。孙二勇说：“军长，下辈子还做你的兵。”

一声枪响，硬汉孙二勇倒下了。

张自忠转身离去，脚步有些踉跄，他的眼中满是泪水。

两天后，59军取得大捷。

这场大捷叫作临沂大捷，是张自忠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战例之一，是 59 军“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经典战例。

阮明刚说，59 军刚从湖北襄樊出发的时候，张自忠就严明纪律，“谁也不能祸害百姓，谁祸害百姓就枪毙谁。”张自忠还说了一句很粗的话：“要靠，就靠你姐你妹去，别害百姓了，百姓给你吃给你穿，就是你爹娘。”

阮明刚说，张自忠容貌威严，脸上有一颗痞子，他要求很严格，士兵们都有些怕他。他没事的时候，就摸着那颗痞子。

在忻口会战中，李长维所在的川军是和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作战；而在临沂大捷中，李长维所在的 59 军还是和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作战。在忻口会战后，李长维所在的川军彻底被打残，所剩无几的弟兄们划归了张自忠的 59 军。

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小的时候，他就抱着建功立业的梦想来到了中国，参加了 1904 年的日俄战争，身负重伤，差点死亡。

日俄战争让板垣征四郎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东北的地

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回国后，板垣征四郎就建议日本先占领东北，稳固基础，然后占领中国。这和日军很有名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想法如出一辙。很快地，和石原莞尔一样，板垣征四郎就将占领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云南和汉口。每到一地，板垣征四郎都会考察地理，绘制地图。在汉口，他与同样来到中国绘制地图为侵略战争做准备的石原莞尔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从此结下了友谊。

九一八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先后在中国生活了 20 年，他像一名不辞劳苦的驴友一样，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对中国的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了如指掌，他比中国的驴友还了解中国地理。

七七事变后，日军计划在河北保定涿州一带举行大会战，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也被调离参战。而不满足于袖手旁观的板垣征四郎带领半个师团，和东条英机遥相呼应，沿着平绥线两侧，向南进攻。阎锡山的晋绥军紧急北上救援，当晋绥军主力进驻大同一线，缠住了东条英机时，板垣征四郎又带领半个师团，像一条滑润的泥鳅一样，沿着太行八陉，飞兵直下，直取平型关，打开山西门户。

太行八陉指军都陉、薄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帑关陉，古称太行八陉。这是今天的中国人

几乎忘记了的军事险境，也是当时的人们很少走通的天堑雄关，而板垣征四郎不止一次在这里走过，绘制了详细的军事地图。当日军进入山西时，他们参考的就是板垣征四郎当初绘制的地形图，这份地形图比阎锡山手中的军事地图更详细。

中国地形复杂，民间方言中，有很多对独特地形的称谓，比如峁、塬、陉，等等。峁只出现在西北地区，指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塬只出现在沂蒙山区，指四周陡削、山顶较平的山；而陉只出现在太行山区，它指的是造成山脉中断的地形。太行山脉，它的绝对高度远远不及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这些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山脉，甚至也不及附近的秦岭，但是太行山异常陡峭，很多地方都是直上直下，壁立千仞，根本就无法攀登。如果不沿着陉行走，只会困死山中。至今，太行山中还有与世隔绝的山村人家。

板垣征四郎攻打山西，实在是疯狂之举，它几乎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山西战事告一段落后，板垣征四郎又来到了徐州战场。

李长维、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奔赴在通往临沂的道路上时，

临沂保卫战已经开始。坚守临沂的是原西北军将领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进攻临沂的是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3军团，虽号称军团，其实只有一个40军，40军，虽号称一个军，其实只有一个39师，士兵仅有一万人。第3军团，就是人们传统说法中的“杂牌军”。

而一万国军居然要抗击日军一个师团，而且这个师团还是日军的第5师团。全面抗战之初，日军的军力达到全盛时期，他们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最少相当于中国三个军。而在临沂，日军一个师团攻击的，却是一个中国师的防线。

庞炳勋原为西北军旧将，在与张作霖的部队作战时，腿脚负伤，走路一瘸一跛，人称“庞瘸子”。庞炳勋作战异常勇敢，每战必身先士卒，兼之智勇双全，累积战功，从士兵升至将军。

大战在即，李宗仁巡视第3军团，其实也就是巡视39师，他对庞炳勋说：“军人当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战场，方死得其所。”庞炳勋说：“打了那么多年，互相残杀，让人寒心。今日与日军交战，死而无憾。”

大战在黎明前打响，第5师团出动了飞机、大炮，向着

临沂城狂轰滥炸，城墙倒塌了，日军的坦克沿着倒塌的城墙开了进来。第3军团拼死坚守，士兵们腰缠手榴弹与坦克同归于尽，冲进城里的日军，又被赶了出去。

日军一连攻打多日，也无法攻入临沂。

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然而，毕竟众寡悬殊，激战多日，第3军团还是无法抵挡第五师团疯狗一样的进攻，日军冲入了城里。庞炳勋把身边的警卫都送到了第一线战场，马夫、伙夫、担架兵、运输兵都从地上捡起枪支参加了战斗。庞炳勋身边再无可派之人，他拿着手枪，等着日军冲进来，决一死战。

当时，庞炳勋被压在了城内一角，渐渐逼近的日军的枪声都清晰可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日军的背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张自忠的59军赶到了。

张自忠的59军是一昼夜急行180里，风雨兼程赶来的。

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的第3军团欢声雷动，军心大振。庞炳勋挥舞着手枪高喊：“杀出去！”

第5师团遭受两面夹击，狼狈退出了临沂城。

当时，庞炳勋没有想到，前来救援他的，是张自忠。两人素有仇隙，曾经一度不共戴天。

张自忠和庞炳勋此前都是西北军的旧将，军阀混战时期，有一次庞炳勋被困，弹尽粮绝，几乎丧命，是张自忠率队救援了他。中原大战时期，西北军和晋绥军联合起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庞炳勋阵前倒戈，投降了蒋介石，转身偷袭张自忠，张自忠差点死于他的枪口。张自忠逃过劫难后，曾发誓说：“与庞瘸子这等不忠不义之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

后来，蒋介石统一各路军阀，张自忠虽与庞炳勋一同效力，但从无来往，即使见面，也是咬牙相向，怒目而视。

日军第五师团猛攻临沂城，庞炳勋危在旦夕，临沂城危如累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手中再无可派之兵，只能派刚刚来到徐州报到的张自忠前去救援。张自忠毫不犹豫地领受了命令，然而，他在回到部队布置作战任务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西北军老将的抵制。他们说，对于庞瘸子这等不忠不义的人，不去攻打他就不错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去救他？

张自忠苦口婆心地给大家做工作。直至今日，59 军的老兵们都记得张自忠在战前动员会上的讲话，他说，庞炳勋当年偷袭我，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那场战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不光彩的。我和庞炳勋的仇，那是私仇。现在，庞炳勋在和日本人作战，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侵犯我河山，杀害我百姓，我们现在要报的，是国仇。在国仇面前，个人的私仇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看着日本人打进临沂城，坐视不救，我张自忠和 59 军的所有弟兄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张自忠一席话拨开迷雾见晴天，59 军高呼：驰援临沂，杀尽日军。

阮明刚说，那年在临沂打仗，打得很惨，日本人有飞机有坦克，59 军都没有，59 军最好的武器，就是重机枪。一个重机枪至少需要十几个人伺候，四个人抬着，其余的人背子弹。重机枪的子弹和步枪的子弹不一样，比步枪子弹要大很多，而且，重机枪非常费子弹，一架重机枪，要配置几千发子弹。而在追击敌人的时候，重机枪边跑边打，四个人抬着，一个人射击，后面是背着子弹的人跟着。所以，重机枪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

59 军的重机枪很少，打仗主要依靠轻机枪。

阮明刚在临沂战役中，是一名副机枪手。

阮明刚说，一挺轻机枪重 17 斤，发射两种子弹，一种子弹的后面是红色的，一种子弹的后面是绿色的。而汉阳造子弹的后面是黑色的。轻机枪手也要求身体素质很好，要求能够一手提着 17 斤重的轻机枪冲锋，不能落在手持汉阳造的士兵后面。

至于为什么有的子弹是红色，有的子弹是绿色，阮明刚没有说。我想，可能是不同的兵工厂生产的吧，因为那时候的轻机枪，不可能发射燃烧弹，也不可能发射曳光弹，它只能发射机枪子弹。

临沂战役中，59 军的子弹不够用，张自忠向李宗仁请求支援弹药和武器。李宗仁只给了一些手榴弹。那时候中国的兵工厂生产不出坦克、大炮，就只好用简陋的设备大量生产手榴弹。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中国的军队才有投弹训练，要求投弹达到多少米，才是一名合格的战士。看看欧洲的“二战”电影，几乎见不到士兵们投弹的镜头；再看看中国的抗战电影，没有一部里面没有投弹的镜头。

临沂战役是新兵阮明刚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

中，阮明刚打死了一名日本鬼子。

59 军来到临沂的时候，临沂几乎被日军全部占领。张自忠下令：冲进城去，杀光日军。这一年来，全国人都在骂张自忠是汉奸，张自忠心中憋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一直渴望着能够喷薄而出，现在，日军就在眼前，他双眼血红，提着驳壳枪就冲了上去，卫兵拦也拦不住。军长身先士卒，士兵们更是战意盎然，他们像一群野狼一样嗷嗷叫着冲向临沂城。

几十年后，阮明刚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战的经历。他说，每一处阵地都经历了反复争夺，死人一堆一堆，像田野里割倒的麦捆子一样，地面都被血染红了，双脚踩上去黏黏的。日本人一批一批地拥上来，战士们用手榴弹把他们砸退了，这时候，步枪已经用不上了，因为步枪打一枪上一发子弹，太慢了，你的子弹还没有换上，日本人已经冲到了跟前。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噼里啪啦地砸过去，像下了一锅饺子。但是，扔手榴弹也有学问，扔得早了，日本人又会回掷过来，造成自己人伤亡。所以，手榴弹的拉环一扯开，心中默数一二三，再扔出来，刚好落地的时候就爆炸。

阮明刚是副机枪手，专门给轻机枪喂子弹。他说，轻机

枪有两个枪管，轮换使用。一个打热了，就换另一个。

战士们奋勇作战，还是阻挡不住日本人如潮的进攻。双方开始拼刺刀。

阮明刚说，日军一看要拼刺刀了，都把子弹先退出来。中国军人不会到没有子弹的时候才拼刺刀，而是给枪里留一颗子弹，装作子弹打完了，和日本人拼刺刀。日本人哇哇叫着扑上来，中国军人也大喊着迎上去。拼刺刀的时候，都要喊叫，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也是为了威吓对方，占据心理优势。抗战前期的鬼子很硬，你喊，他也喊；后期的鬼子很软蛋，你一喊，就吓坏了，转过身夹着尾巴跑了。

有人分析说，日军拼刺刀是真拼，中国人拼刺刀是半真半假，能拼过你，就用刺刀；拼不过你，就开枪打。所以，前期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个个都是拼刺刀的好手，但是，只要一拼刺刀，死的竟然比中国人多。

日军冲上来的时候，阮明刚没有步枪，只有机枪，机枪手牺牲了，他操起 17 斤重的轻机枪，抡得像车轮一样。一名日本兵端着刺刀冲上来，阮明刚一枪托砸在了他的肩膀上，日本兵踉踉跄跄，阮明刚又抡起机枪，斜着砸在日本兵的太阳穴上，日本人倒了下去，脑袋像开瓢的西瓜一样姹紫嫣红，鲜艳夺目。

阮明刚的力气很大。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同村的人说，阮明刚 50 多岁的时候，两个壮小伙也无法近身。今年 93 岁了，他有时候还去地里干农活。

临沂战役前夕，板垣征四郎计算了 59 军和临沂之间的距离，认为 59 军要赶到临沂增援，最少也要三天。而在这三天里，板垣征四郎完全能够吃掉庞炳勋，然后转身对付远道而来的张自忠。他没有想到的是，张自忠的 59 军一昼夜强行军 180 里，赶到了沂水岸边。此时，庞炳勋被压在城内一角，拼死抵抗。

庞炳勋见到张自忠，握着他的手，百感交集地说，老弟啊，为兄过去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来救我。如果你再晚来一步，就只能收拾为兄这把老骨头了。

当时，庞炳勋已经年逾花甲，而张自忠将军 46 岁。张自忠说，庞兄放心，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小弟一定拼死替你打赢这一仗。

此后，庞炳勋与张自忠成为生死之交。

59 军的临沂战役一共经历了五天，从 1938 年 3 月 14 日将士们夜渡沂水，用手榴弹和刺刀向日军猛攻开始，五天后

的3月19日，张自忠下达了总攻击令，59军所有将士高呼着口号，冲向敌阵，战至夜半，板垣征四郎终于胆怯了，以放火为号，日军全面退却。

老兵们说：“五天五夜，都没有睡过觉，实在太困了，就抱着枪猫着腰打个盹，鬼子上来了，又端着枪把鬼子压下去。”

阮明刚说，这五天里，日军白天进攻，依仗着飞机、大炮和坦克，抢占了59军的阵地，而夜晚来临的时候，59军则摸上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与日军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刺刀又将日军赶走。城中拼死坚守的庞炳勋军团也趁势反击，第5师团占不到便宜，只好狼狈逃窜。

老兵们说，日军逃走的时候，光死尸就装了120辆卡车。还有900多具死尸来不及运走，日军只好砍下这些死尸的右手，装在卡车上。

第5师团，日军的甲级师团，板垣征四郎吹嘘天下无敌的第5师团，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一败于林彪，二败于张自忠。号称“铁军”的第5师团，却都败于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八路军之手和一向瞧不上眼的杂牌军之手，板垣征四郎颜面扫尽，痛心疾首，几乎要切腹自杀。

临沂战役，日军伤亡4000余人，而被59军伤亡的，就

多达 3000 余人。第 3 军团和 59 军也伤亡 9210 人，而 59 军伤亡 4482 人，其中军官伤亡 199 人。这场战役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刘家湖之役，59 军全歼日军第 3 大队一千余人。而 59 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全体阵亡的就有 26 旅 678 团 2 营和 113 旅 226 团第 6、第 10 连，114 旅 227 团第 12 连，225 团第 7 连。张自忠看到曾经生死与共的弟兄战死沙场，心情沉重地说，真比油煎心肠还狠。

临沂战役结束后，阮明刚所在的连队仅剩七八个人，他升为机枪手；李长维所在的连队仅剩十几个人，他升为副排长。

而此战，张自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临沂的。在临沂之役前夕，他曾致电西北军旧将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而以后在每次战役中，张自忠都把它当成自己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临沂之役震动全国，而取得临沂大捷的，竟是当初万民口诛笔伐欲置其于死地的张自忠，当时的人们无不惻然，恻然，戚戚然。

张自忠将军一战成名，洗刷了自己身上的汉奸罪名，抹

去了泼在自己身上的积年脏水。

此战之后，再无人说张自忠是汉奸。

此战之后，张自忠升为 27 军团军团长，兼 59 军军长；半年后，又升为 33 集团军总司令。

惨烈的潢川

滕县和临沂的拼死抵抗，为李宗仁在徐州布防，赢得了宝贵的半个月时间。第 20 军团和第二集团军在这段时间里赶到了徐州。

攻占了滕县的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转向台儿庄方向进攻。如果台儿庄被日军占领，日军可从陇海线东面对徐州形成包围，又可从背后进攻临沂守军，协助坂垣师团突破此防线南下。台儿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李宗仁又命孙连仲开往台儿庄坚守。

濑谷支队占领了滕城后，第 10 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得意忘形，他把牛皮吹得震天响，对日本的记者吹嘘：“在第 10 师团面前，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形同蚂蚁。”

矶谷廉介的牛皮确实吹得太早了。紧接着，在台儿庄，濑谷支队进攻受阻，第 10 师团遭受惨重死亡，日本大本营极不满意，将矶谷廉介撤换了，新上任的第 10 师团师团长是筱冢义男中将，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剧《亮剑》中出现过，任日军华北方面第一军司令，经常和那个喜欢吹牛皮的日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山本一木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当然，山本一木是虚构的，而筱冢义男中将和山本一木讨论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是虚构的，因为身为日军第 1 军司令官，根本不可能关注到中国军队一个团的建制，如果这样，筱冢义男的身份应该是旅团长而不是司令官。再说，李云龙所在的八路军 129 师独立团这个番号根本就不存在。翻遍 129 师的战史，也找不到李云龙任团长的独立团、丁伟任团长的新一团、孔捷任团长的新二团的番号。772 团的番号倒有，不过团长不是李云龙口中的“程瞎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名将叶成焕。

在台儿庄战役中，与中国军队对决的，一个是矶谷廉介的第 10 师团，一个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

台儿庄战役打响时，进攻台儿庄的急先锋是第 10 师团的濑谷支队。而坚守台儿庄的是第二集团军 31 师。第二集团

军，说是集团军，其实编制相当于一个军，下辖三个师：27 师、30 师、31 师。

抗战之初，中国的军队编制是比较混乱的。按照作战区域，全国分为十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为蒋介石兼任，后为卫立煌，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团，两个集团军分别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和商震的第 20 集团军，一个军团是汤恩伯的第 20 军团。第一集团军下辖三个军，番号最小的是张自忠的 59 军；第 20 集团军只有 32 军；第 20 军团有两个军，关麟征的 52 军就在汤恩伯军团。第二战区司令为阎锡山，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就在这个战区。第三战区司令最初也是蒋介石兼任，后为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为何应钦。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目前正在组织徐州会战。第六战区司令陈诚。第七战区司令刘湘，作战区域是四川，刘湘死后，因为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该战区撤销。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主要负责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防御，而日军从来就没有打进过这些地方。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主要负责湖南防务，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第十战区是 1945 年才设立的，司令为李品仙，下辖两个军，第 7 军和 48 军。

抗战初期，军是战略单位，师是基本作战单位，而集团军，又介于战区与军之间的战役兵团指挥单位。集团军有大有小，大的集团军下面会有五六个军，而小的集团军，比如

坚守临沂的庞炳勋的集团军下辖一个军，而这个军又仅有一个师。说是集团军，其实只有一个师。

至于军团，又和集团军处于平等位置，抗战开始不久，军团的编制就被撤销了。

31 师在台儿庄经历了一场血战。

孙连仲知道，依靠劣等装备是无法与日军抗衡的，他在战前告诫战士们，白天要依靠地形阻击敌人，夜晚依靠逆袭反击敌人，没有命令，谁也不能退出台儿庄一步。

日军的进攻依然是炮兵轰，坦克冲，坦克后面跟着蚂蚁一样的步兵。31 师面对日军的炮兵只能选择躲避，面对日军的坦克照样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反坦克炮。后来，老兵们就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把 20 颗手榴弹绑成一束，敢死队提着这样的集束手榴弹去炸坦克。即使侥幸炸毁了坦克，而敢死队员也不会活着回来，因为坦克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日军步兵。

10 日后，日军攻破了台儿庄的东南门，侵入城内百余米，同时释放毒气。中国守军死亡高达十分之八。

李宗仁一面催促还在路上的汤恩伯军团疾速增援，一面

询问台儿庄战况，让孙连仲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李宗仁询问孙连仲有无决心，孙连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第二集团军纵然牺牲殆尽，也不后退一步，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孙连仲集合所有可用之兵，准备午夜逆袭日军。

一直在台儿庄苦战的 31 师师长池峰城打来电话，说日军攻势甚猛，我军伤亡几乎殆尽，请示可否让残军退出台儿庄，撤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道：“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有敢过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苦苦支撑到午夜，孙连仲派来的几十名援兵到了，池峰城一看，竟然是司令部的炊事兵、担架兵和一些还能动弹的伤兵。

池峰城想组织敢死队反攻，尽管剩下几百人，而且被日军逼迫到了台儿庄一隅，然而，池峰城还是想反攻，如果不能趁着夜晚反攻，天明日军的飞机、大炮过来轰炸，这仅有的一隅也会很快丢失。

然而，依靠这些炊事兵和担架兵又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反攻？池峰城忧心如焚。就在这时候，城外与另一路日军激战了十多天的 30 师派来了一路援军。

这路援军是一营人马，由营长仵德厚率领。仵德厚当时任 30 师 176 团 3 营营长。

仵德厚家在陕西泾阳，距离我的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属于关中平原地区的西府，而泾阳名字，是因为居于泾河之北而得名。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泾河是一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河流，诗经有云：“泾以渭浊，湜湜其沚。”老祖先据此创造了“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因为泾河水流清澈，渭河浊浪翻腾，渭河是黄河的支流，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泾河渭河交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看到清水浊流并驾齐驱。陕西是十三朝古都，随处捡起一块瓦片，也无不打着历史文化的烙印。

风烛残年的仵德厚，仍然对台儿庄战役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晚上，他带着一营人，是趁着夜色偷偷渡过运河，来增援池峰城的。在一座大桥下面，池峰城向他布置任务，要他冲到城东，与坚守在那里的 31 师一个营取得联系，共同防御城东阵地。

而现在，31 师这一营士兵已经失去联系，他们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仵德厚带着挑选的 40 名敢死队员出发了。每个敢死队员带着七拼八凑才凑齐的 100 发步枪子弹，身后挂着一排四

枚手榴弹，胸前还吊着一排四枚手榴弹，背后插着大刀。除轻机枪手外，每三人一个战斗小组，每组再扛上一箱手榴弹。手榴弹，是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最主要的武器。

摸黑走了几百米，就遇到了日军城墙下的阵地，敢死队先投掷手榴弹，然后在火光中抽出大刀，齐声呐喊着冲上去，将阻拦的日军全部剁翻了。

敢死队冲入了一条街巷，街道两边都是两米多高的山墙。一墙之隔，隔开了日军的兵营和敢死队。两边都看不到对方，但是都能听到对方的喊杀声。手榴弹在山墙的两边飞来飞去，爆炸声接踵而起。一枚日军投掷的手榴弹落在仵德厚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冒着青烟打着转，一名战士看到了，眼疾手快，捡起来丢到了山墙的那一边。

因为隔着高大的山墙，无法射击，双方都在山墙上凿洞，把枪架在洞口向对方射击。那时候，北方的墙壁都是用土垒砌而成，易于凿挖。敢死队在这边用大刀凿洞，日军在那边端着刺刀凿洞，凿着凿着，双方的刀具碰在了一起，就透过山墙向对方乱捅。捅不上了，就把枪架在洞口射击。谁先占据了洞口，谁就占据了优势。

山墙被凿成了马蜂窝，日军把机枪抬过来，架在洞口向敢死队射击，敢死队里的几个壮小伙发一声喊，一齐用肩膀

撞向了山墙，山墙轰然倒塌，日军机枪和机枪手都被埋在了山墙下。

仵德厚率领敢死队经过一夜激战，山墙两边的日军被全部消灭，敢死队冲向城东，与原 31 师的那个营汇合，这个营连日苦战，伤亡惨重。

占领了台儿庄西北角的一股日军，对进入城内的敢死队发动攻击，城外的日军也拥入城内进行增援。仵德厚命令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西南角轰击，日军的断肢残臂在炮声中四散飞溅。仵德厚又命令两挺重机枪架在城墙上，向沿着交通壕增援的日军疯狂扫射，日军的死尸堆满了交通壕，进入的道路被隔断。

几十年后，仵德厚一直记得一个名叫沙纪成的排长。那天，仵德厚命令沙纪成率领一支敢死队向西南角的日军发起攻击，夺回阵地。

沙纪成腰间缠满手榴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带着敢死队出发了。他们来到日军占领的阵地前，被一面高墙阻挡了。沙纪成解下腰间的手榴弹，绑在一起，隔着高墙扔进去，然后，趁着硝烟未散，敢死队搭着人梯翻越高墙。沙纪成第一个攀上去，刚刚攀上墙头，日军的机枪射来，沙纪成掉了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

敢死队又搭起了人梯，在没有攀上墙头时，先把手榴弹扔过去，然后在墙头上架起机枪向里面扫射，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接着，敢死队一个接一个翻过墙头，将围墙内的日军全部消灭。

此役过后，将近 40 名敢死队员，仅有两人幸存，身带重伤。

三天后，中国军队完成了合围任务后，李宗仁下达了全线攻击令。日军矶谷廉介第 10 师团、板垣征四郎第 5 师团阵脚大乱，狼奔豕突，向北逃窜。

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率领的各类杂牌军，以伤亡两万将士的代价，击溃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进攻，横行一时的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被歼灭大半，第 10 师团另一个旅团坂本支队也被消灭过半，第 10 师团被打成残疾，第 5 师团也伤痕累累。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以来，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役。

台儿庄战役也引来了各国军人的观摩，其中有一名来自美国的军人名叫卡尔逊。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部观察员，军

衔是中校。

台儿庄激战正酣的时候，卡尔逊就来到了前线，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还进入台儿庄，与一线守卫的池峰城会见，他自始至终看到了台儿庄激战的场面。

日军被击败后，卡尔逊又来到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台儿庄，他在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人没时间掩埋他们的死者，到处都有黑色的残骸，说明直到最后一分钟，日军还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走到北部城墙外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四辆被炸毁的坦克，坦克兵肿胀的尸体躺在外面。这种坦克是中型的，每辆配置一门 54 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 6.5 毫米的机枪。城北两英里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摧毁的日军炮兵阵地，有近 300 匹战马被击毙。炮群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几辆弹药卡车和拖车翻倒在这些房子的一侧。房子的墙壁变成了碎石瓦砾。墙内有 25 或 35 匹马的尸体，其他地方也到处横着马尸。显然是中国军队 155 毫米的大炮准确地击中了这个地方。”

美国人的叙述笔法很精细，他们能够由表及里，透过结果来分析原因。卡尔逊留下的这份报告，带给我们的阅读快感远远超过当时古板的新闻报道。

关于卡尔逊，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写到。这个喜

欢冒险的美国人，后来来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地，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并把游击战术运用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场，给了日军很大杀伤。



台儿庄战场上缴获侵华日军的坦克车

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在台儿庄惨败，引起日本大本营的极大震惊。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看到徐州附近集结了中国大量部队，便命令第 5 师团和第 10 师团不惜一切代价拖住中国军队，又火速纠集了 13 个师团，向徐州方向疾进。

此时，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多达 64 个师，60 万人。60 万对付日军 40 万人，没有胜算，因为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日军不能相比，而且徐州一带平原丘陵，最适宜日军机械化部队调动。再加上 60 万人聚集一地，后勤补给线又时时遭受日军轰炸，吃饭成了大问题。所以，统帅部决定弃守徐州，向河南、安徽的山区撤退。

即使撤退，中国军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59 军老兵李长维说，我们依靠双脚一天只能撤退一百多里，而日本的卡车和坦克只要三四小时就赶上了。而且，我们的撤退方向，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撤入山区，就会被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全歼。

李宗仁留下了两支部队阻击日军，这两支部队都是李宗仁的起家部队桂军。

梁天恩参加了这次阻击日军追击的作战，他是第 7 军的一名排长。他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丢卒保车之计。然而，除了这种办法，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留下来阻敌的两支军队是：第7军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率领的一个团，坚守宿县，阻击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1033团，坚守蒙城，阻击蚌埠方向西进之敌。

蒙城三日血战，周元牺牲，全团战士2400人，损失大半。

日军的包围圈没有形成，中国军队就撤离了。

张自忠带着59军从山东撤往湖北。李长维说，这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都是空荡荡的房子，因为日本人要来，老百姓们都躲进了山中。有的人家锅碗瓢盆都还在，显然走得很仓促。那时候，一口铁锅就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

天下大雨，士兵们没有地方躲雨，就走进了这些虚掩的或者敞开的房间里，炕面上、地面上都是人，刚刚躺下去就鼾声大作，可是睡着睡着就睡不着了，不断地扭动，不断地翻身，在身上到处抠抓，指甲划过皮肤的窸窣窸窣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后来，有人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走到房子外面，看到雨停了，就在院子里点起了一堆篝火，光着身子，把衣服放在火焰上使劲抖动，火焰噼噼啪啪作响，突然蹿高了，然后再把衣服穿上，回到房子里继续睡觉。很多人看到这个好方法，也跑到院子里，把衣服脱下来，放在火焰上抖动。

掉落在火焰里的，是虱子。

这时候，已经是夏天，但是 59 军的单衣还没有发下来，部队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变换地点，单衣不知道该送往哪里，就算送来了，也不够一人一件。老兵说，那时候，一个班才平均一条毛毯，冬天来了，还穿着草鞋作战。

因为不能讲究个人卫生，有一种叫作疥疮的皮肤病开始在部队里蔓延，皮肤瘙痒，一抓就破，让人痛苦不堪。到了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当地有很多温泉水，水中含有硫黄，可以医治皮肤病。59 军破例放假两小时，大家争先恐后跳进温泉里。

张自忠将军的侄女张廉瑜此后回忆说，1938 年 6 月，伯母患病，父亲派家里的用人宋茂堂给伯父送去一封信。那时，伯父已率部从台儿庄撤下，到豫南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队伍，他的军部设在一个关帝庙里。伯父接到家信后，给伯母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回。这封信字写得很大，只有 34 个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伯父在驻马店休整了几个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又率部开到潢川阻击日军。后来，他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与家联系，让全家迁往上海。

这时候，张自忠升为 33 集团军总司令。

那时候的条件极为艰苦，但是老兵们提起当年的生活，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很多人能够随口咏出当年的文章：壮哉中国，名列四强；物产丰富，人多地广。省有卅五，彼此接壤：苏浙皖赣，川黔鄂湘，云南福建，东西两广，冀鲁晋豫，陕甘宁康，察绥热河，青海新疆，东北三省，新分九疆，台湾收复，失地重光……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的 1895 年被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在 1931 年被日本人占领。

1938 年 5 月，徐州会战刚刚结束；1938 年 6 月，武汉会战又开始了。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

张自忠带着部队刚刚从山东撤退到河南潢川，席不暇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武汉北面阻击增援的日军。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就转入了相持阶段。

这 15 个月里，正面战场一直后退失地，为什么不能视为失败？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话：“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15 个月过后，中国军队实力仍在，而日军却再也无力进攻。抗战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遵循蒋百里的

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中国地域广阔，有着广泛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当年的中国，方针为长期抗战；当年的日本，方针为速战速决。15个月过去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实现了，而日本战略方针失败了。

这15个月里，中国军队组织了四次大的会战，分别为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而大小战斗更以千百计。四次大会战中，最波澜壮阔的是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地域涵盖安徽、两湖、河南、江西。中国参战部队高达118个师，远远高于淞沪会战的70个师；日军的兵力也是历次会战中投入最多的，高达14个师团，是日军所有兵力的一半。

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最后一个重工业城市，日本想当然地认为，武汉丢失，退入西南农业山区，中国就会灭亡。

所以，日本远在七七事变前夕，就制定了第一个占领武汉的计划：华北方面军沿着平汉铁路向南直取武汉。平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当年张之洞修建的，从北平直达武汉。可是，日军占领了华北后，华北方面军却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捆住了手脚，铁路常常被破坏，公路常常被挖掘，炮楼常常被端掉，小股日军常常被歼灭。这一时期，八路军较

大规模的战斗就有平型关战斗、七亘村战斗、广阳战役、晋察冀军区围攻战役、晋西北反围攻战役、午城井沟战斗、易涞战役、神头岭战斗、漳南战役、长岗战斗、薛公岭战斗……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两支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对外。

日军不得不放弃了第一个方案，于 1938 年 4 月又制定了第二个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在黄淮之间集结兵力，沿着平原地带进攻武汉。

第二个方案仍然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行，而不利于中国的草鞋部队行进。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的淮河以北。这个平原由黄河、淮河下游泥沙冲积而成，地形极为平坦，交通便利，阡陌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就在大量日军集结在了黄淮平原地区，准备西向进攻时，花园口决堤了，汹涌的黄河水掀起冲天巨浪，淹没了黄淮平原的所有道路，日军的重型武器陷入黄色的淤泥中难以自拔，汽车、摩托车在泥泞中裹足不前。

花园口决堤，尽管迟滞了日军的步伐，但是却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无数百姓举家搬迁，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途。战争，说到底是为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轰炸花园口，完成了日军想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是一

着臭棋。

花园口被炸后，日军开始实施第三个方案，集中兵力，沿着长江航线进攻武汉。

三个进攻武汉的方案，一个不如一个。沿着平汉线进攻是上策，沿着黄淮平原进攻是中策，沿着长江进攻是下策。如果沿着长江进攻，中国军队只要扼守长江一线，日军就进退两难，而且，几十万日军摆渡，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船只？日军的运营能力远远达不到一次性运输几十万兵力，此时日军兵力被分隔在黄泛区各个地方，怎么办？日军只好将庞大的军队沿着铁路线运到了江苏连云港，然后从连云港装船运到吴淞口，再从吴淞口沿着长江北上，来到安庆，然后在安庆进行集结，然后再水陆两路，向武汉进攻。同时，命令黄泛区各线的日军向武汉集中。这个方案是下下策。

日军折腾来倒腾去，让中国军队有了充足的布防时间。

名为武汉会战，却不战于武汉。

武汉保卫战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将兵力广泛分散在武汉外围，由死守变为游击，从武汉外围的两湖、河南、江西、安徽等地，全方位地牵制日军。

中国军队知道在日军机械化的武器进攻中，武汉难以坚守。所以，一方面命令各地严防死守，一方面将武汉的重工业设备，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在宜昌，然后走水路运往重庆。可是，要运输这些设备，没有那么多船，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挺身而出，不分昼夜地抢运战略物质，当武汉失守，长江枯水期来临的时候，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胜利结束。

徐州会战刚刚结束，在遥远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开始写一篇即将对抗战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论持久战》。

这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毛泽东连写八天九夜，用毛笔书写，一气呵成。

一本美国人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中形象地描写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情景：

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灯光照亮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医生给他赶来诊断后，

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

毛泽东连夜赶写这篇《论持久战》，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中国绝不会亡国。

《论持久战》完稿后，据说毛泽东又修改了七遍，然后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时间持续了八天。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不会亡国，而中国必将战胜的理论。《论持久战》第一次将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后来，战争的进程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测在进行。

《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后，周恩来送给了白崇禧一本，白崇禧阅后，大加赞赏，推荐给蒋介石阅读，蒋介石读后，也非常赞同。接着，白崇禧将《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武汉会战长达五个月，日军始终无法接近武汉一步，武汉的战略物资安全撤离后，中国军队放弃了抵抗，日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武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想法很正确。毛泽东和洛夫、陈云、刘少奇等人所发的《1938年8月6日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毛泽东等人早在武汉会战结束前的两个月，就建议放弃武汉，保存实力。毛泽东是游击战的专家，他知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共产党作战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因为决定战争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

武汉会战中，李长维、阮明刚、郭荣昌跟着59军军长张自忠参加了潢川战斗。

李长维说，潢川战斗的时候，日军攻击很猛，战争没日没夜地进行，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很多次。

阮明刚说，我们那个连守卫一个阵地，半天下来，就只剩下了18个人。

郭荣昌说，潢川战斗结束后，我们一营人只剩下了 13 个人。

郭荣昌出生在河南泌阳。1938 年 6 月的一天，20 岁的身材高大的他从村里出发，去给在县城教书的父亲送夏季的衣服。走到县城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就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刚刚喘了一口气，就看到院子里走出了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男子，腰间别着盒子枪，他和郭荣昌还没有聊几句，院子里又走出了一个身材健壮的 30 多岁的男子，20 多岁的男子看到他，立正敬礼，郭荣昌猜想这个 30 多岁的男子是个当官的，赶紧站了起来。

30 多岁的男子和郭荣昌一比个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问郭荣昌想不想当兵。郭荣昌连想也没有想，就说“想当兵”。

30 岁的男子在郭荣昌胸口捶了一拳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做我的卫士。”

郭荣昌跟着 30 多岁的男子走进了院子，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身体结实的男子，是 59 军 38 师师长黄维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黄维刚的警卫全部牺牲了。

郭荣昌训练了三个月，战争就开始了。与郭荣昌所在的

59 军作战的，是日军第 10 师团。

59 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豫南重镇潢川 12 日，完成临近部队的集结。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59 军大多数士兵都来自北方，不能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恶性痢疾在军中蔓延，药品匮乏，每天都有几十名士兵死亡。然而，当时日军第 10 师团也在奔赴潢川，张自忠只能严令部队冒雨跑步前进。最终，抢在日军前面占领了潢川。

潢川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张自忠将 59 军独立旅放在潢川城里，其余部队在潢川城外梯次防守。

日军全力扑向潢川，张自忠命令防守潢川的独立旅旅长安克敏：“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的棺材！”安克敏命令士兵把潢川四座城门全部堵死，护城河上的桥梁全部拆除，他要求所有人血战到底，“潢川城就是我们的棺材！”

张自忠也在发高烧，拉痢疾，浑身虚弱，但是他强撑身体，指挥作战，他发给全军的手谕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

阮明刚说，大战来临，没有人感到害怕，大家同仇敌忾，

会写字的写血书，不会写字的让别人代写。一名战友把一双还没有舍得穿的布鞋塞到阮明刚手中，对他说：“我没有啥值钱东西，我死了，这双鞋给你穿。”

潢川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第10师团在台儿庄曾被张自忠的59军击败，这次来到河南潢川，第10师团立志报复。59军一见到第10师团，也义愤填膺。在台儿庄战役中，有5000名弟兄倒在了日军的刺刀和枪口下。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郭荣昌说，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向我们的阵地攻击。子弹打光了，弟兄们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端着刺刀冲上去，耳朵里满是喊杀声，尘土飞扬，面对面看不清人，前面的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就这样，打退了日本人一次次进攻。

潢川的外围阵地，日军一连攻打三天，也没有攻下来。后来，日军开始用毒气。

郭荣昌说，毒气是黄色的，毒气一顺风飘过来，长官就

喊：“毒气来了，毒气来了。”中国军队没有防毒面具，就只能把衣服口袋撕下来，或者随便从身上撕一块布，蘸水或者撒尿，把布弄湿，然后蒙在鼻子和嘴巴上。日本鬼子戴着防毒面具上来了，战士们一手捂着布片，一手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杀，战士们倒下了一片又一片，但是没有一个人投降。

日军依靠毒气占领了潢川城的外围阵地黄冈寺，张自忠率领将士退入城中。夜晚来临了，坚守潢川城的独立旅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击，他们腰间缠满了手榴弹，身背大刀，顺着绳索从城墙上溜下来，突然对城门外的日军展开攻击，哪里有灯光火光，哪里就是日军的兵营，黑暗中的敢死队就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突遭夜袭，惊慌后退。潢川城门大开，59军的战士旋风一般冲出，日军措手不及，连退十里，黄冈寺又回到了59军手中。

此后，第10师团担任主攻的冈田旅团因为伤亡惨重，失去了攻击能力，只能监视59军的动向。时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澄净，能见度很高。59军的将士一冲过来，日军就撒开脚丫子一路狂奔，他们把战场当成了操场，把战争当成了中学生秋季运动会。

第七天，第10师团的另一旅团稻谷旅团赶到了。强攻不成，他们改为偷袭。

夜晚来临了，日军精锐沿着淮河西上，攻占 59 军后路。59 军的重锐针锋相对，也开赴潢川以西迎击日军。杀声震天，自夜达昼。

城外激战正酣，然而，潢川城南一直风平浪静，张自忠的军部就驻扎在城南。

午后，一队日军骑兵出现了，他们向城南发起了突然袭击。当时，张自忠身边只有一个营，就是军部警卫营。

突遇强敌，情况危急，日军骑兵就在眼前几十米的地方来回奔突，身边的参谋劝张自忠赶快躲避，张自忠毫不畏惧，拔出手枪，带着警卫营阻击日军骑兵。黄昏时分，日军骑兵终于被打退。

第 11 天，日军依靠重炮和坦克攻陷了潢川西面的阵地，59 军所有将士退入了潢川城中。

日军集中所有大炮，炮口对准潢川城，炮弹雨点般落在城中。城中所有的房屋都已倒塌，城墙也被轰开了一处缺口。接着，日军站在上风口，向潢川城里施放毒气，毒气浓度比前几天加重了几倍，坚守潢川城的 59 军将士伤亡惨重，连 180 师师长刘振三也两次昏迷。张自忠紧急传令下去，让大家把毛巾浸上肥皂水，捂在口鼻上，以挡毒气。

毒气过后，日军又发动了攻击，大队日军从城墙缺口处蜂拥而入，张自忠挥舞手枪，冲上大街，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墙缺口。军长如此神勇，战士们岂能怕死？潢川城里，凡是能动的将士，都拿起刀枪，呼喊着重迎向日军。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撕心裂肺，刺刀和大刀在阳光下如雪片般飞舞，战争进入了最惨烈的白刃战。

日军仗着人多，还在不断拥入城里，战士们虽奋力拼杀，然而难以抵挡，形势万分危急。

张自忠观察了形势，立即组织起一支敢死队，贴着城墙摸到了缺口处，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截为两段。然后，敢死队像楔子一样死死地楔入了缺口，而冲入城里的日军，则一个个被中国军队斩杀，一个不留。

第 12 天，日军将潢川县城团团包围，第十师团决定全歼 59 军。

午夜，59 军坚守潢川 12 天的任务完成了，孙连仲下令撤退。

然而，四面城门都被日军围困，如何撤退？

独立旅旅长安克敏命令战士们用大刀挖掘城墙，那时候，北方小城的城墙都是夯土垒成，一刀下去，就剝出了一大

片。

天亮后，日军重炮猛轰县城，然后奋勇冲进城中，却发现，潢川城里满目焦土，已成废墟，59军早就无影无踪。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一个月，武汉会战结束了。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两个月，南岳会议召开了。

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总结了第一阶段抗战的得失，确定了第二阶段抗战的方针，这就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抗战时期的相持阶段，从此开始。

随枣会战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张自忠的警卫营几乎伤亡殆尽。

59 军余部转战鄂西，阻挡日军从武汉沿着长江航线进入重庆。张自忠升任 33 集团军总司令，下辖 59 军、77 军、55 军。

张自忠的警卫营要征兵，伤愈归队的曹廷明进入了 33 集团军警卫营。

警卫营，就是冒着大雨开往台儿庄的途中，张自忠下令枪毙营长孙二勇的那个警卫营。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警卫营已经换了两拨人。

曹廷明是在台儿庄会战中，坚守一座叫作茶叶山的阵地时负伤的。

坚守茶叶山的那天晚上，曹廷明所在的一连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向山顶上攀爬，日军沿着另一条小道也在奋力攀爬，都想占领山顶。占领了山顶，居高临下，山下的公路就会被掐断。中国军队由当地村庄里的一名乡亲带路，所以进展迅速，少走了很多冤枉路。道路两边长满了荆棘，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和手臂划破。连长跑在队伍里，挥舞着手枪，不断地催促着：“快点快点。”

爬到了山顶后，每个人都累瘫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连长用脚踢着手下的士兵：“起来起来，准备战斗。”

曹廷明和战友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向山的另一面望去，看到日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奋力攀爬，一个个低着头，撅着屁股，显得很勤奋，连喘息声几乎都能听到。连长喊一声：“打狗日的。”战士们的长枪短枪一齐鸣响，日本人突遭打击，异常气愤地啊呀呀惊叫着，很不情愿地骨碌碌滚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的压倒了后面的，前面的尖声惨叫，后面的高声骂娘，将那道山坡炒成了一锅黏粥。

曹廷明说，居高临下打鬼子，都不需要瞄准，一枪就是一个，再一枪又是一个。日军像檣木一样滚出了上百米远，连长喊：“手榴弹！”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丢出去，扔得远的，就在敌群中爆炸了，扔得近的，就滚落到敌群里

爆炸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的断臂残肢和三八大盖枪在爆炸声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军退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开始组织反击，他们依托在树木后和石块后，向山上射击，子弹落在山顶上，落在石头上，打得石沫四处飞溅。山脚下，日军架起了几门大炮，向着山顶发射，山顶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日军的炮火压制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中国军队中不断有人倒了下去。

尘烟中，一颗炮弹落在了曹廷明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打转。

曹廷明说，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连长就对新兵们说过，遇到日本人扔过来的手榴弹，落地没有爆炸，要赶快捡起来扔回给日本人。抗战老兵阮明刚也说过，新兵训练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新兵，拉开手榴弹的环，心中默数一二三，数完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刚好就能落地爆炸。以后的衡阳保卫战中，进攻衡阳的日军 68 师团 57 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之死，与手榴弹有关。当时，他在战壕里给日本士兵示范如何把中国军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他捡起一颗手榴弹，刚刚站起来准备回掷，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射来一发子弹，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了瓢。

日军的炮弹在曹廷明的脚边打转，随时都会爆炸，曹廷

明扑过去，想要抱起炮弹扔出去，可是炮弹像火焰一样滚烫，手心被烧得吱吱作响。一名战友在旁边喊：“鞋！鞋！”曹廷明脱下了鞋子，一手拿一只，夹着滚烫的炮弹扔向山下。炮弹扔出去了，他的鞋子也被带了出去。

日军的炮弹一直轰炸了两三个小时，山头阵地成为一片废墟。轰炸过后，按照日军的作战规律，步兵就会发起冲锋了，连长站起身，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喊道：“日本人要来了，准备好，揍狗日的。”曹廷明刚刚从掩体里走出来，山下突然又射来了一发炮弹，就在他的身前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曹廷明抛出了十几米远，一块弹片划穿了他的大腿，鲜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连长看到曹廷明负伤了，用刺刀划破了他的棉裤，给他包扎伤口。

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甸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

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

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伤兵坐着火车向后方转移，没有受伤的将士沿着阡陌小

径向后方撤退，不能走大路，大路上行驶着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曹廷明坐着火车来到了湖北省房县，房县古称房陵，历史悠久，位于神农架旁边。那时候，日军还没有打到房县，曹廷明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所谓的救治，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伤口割开，把纱布塞进伤口里，来回拉动，挤出伤口里的血块。那时候的医药奇缺，医生救治伤员，都是使用土方子。

几天后，日军的飞机轰炸房县，隆隆的声音从窗外传来，震天动地，能跑动的人都跑出去躲避了，曹廷明刚刚动完手术，双脚不能迈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索性等死。爆炸声接踵而来，房倒屋塌。日军飞机远去后，曹廷明揭开蒙在身上的被子，才发现被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瓦砾和尘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交战双方是不能轰炸教堂和医院的，教堂和医院都有十字标志，很醒目。可是日本人完全不遵守国际法，轰炸医院，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屠杀平民。我在采访常德保卫战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占领了常德的日军，连教堂的牧师也要殴打，那个牧师是西班牙人。

曹廷明伤好后，就进入了张自忠的警卫营，警卫营里几乎都是伤愈归队的老兵。

老兵刘华说，受过伤的老兵和刚上战场的新兵差别很大，老兵能够凭借声音分辨出敌人发射的是什么炮弹，会在距离多远的地方爆炸；能够知道冲锋的时候怎么躲避敌人的枪弹，敌人的阻击点会在什么地方设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敢，更重要的是经验。

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都非常强，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次面临死亡就毫不畏惧，而且知道怎么躲避死亡，不会做无谓的死亡。

这一时期，张自忠驻扎在湖北。

张宗衡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59军在汉江阻击日军，日军大部队向前线的180师和37师侧后移动，形成包围态势。180师师长刘振三和37师师长吉星文没有向张自忠请示，就仓皇撤到了汉江西岸。

当时，战况危急，张自忠将军亲临一线指挥，行至汉江西岸的转斗湾时，突然看到了吉星文。张自忠厉声问道：“你来干什么？”吉星文惊恐不已，谎称：“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自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令

吉星文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吉星文一句话不敢说，带着部队过河阻敌。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时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后来，刘振三也赶紧带着人去往汉江东岸。

张自忠来到后，即刻命令两支援军渡过汉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此战，大获全胜，仅仅战马就缴获了一百匹。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从本土用军舰运来的，宝贝得不得了。

此战后，老百姓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意思是说他像关公一样神勇无敌。

180 师有一个名叫李树人的副师长，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曾经派遣他去桐柏山打游击。张宗衡说，临行前，张自忠一再叮咛他，桐柏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是中国人，一定要共同抗日，不要搞摩擦。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他跟着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桐柏山里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李先念的部队。李先念对他们很好，战况紧急的时候，李先念的游击队就下山伏击日军，牵制日军。

李先念的游击队还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派人送给他们。

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张自忠来到湖北不久，随枣会战就开始了。

随枣会战，就是发生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会战，而随县和枣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横亘于东，桐柏山虎踞于北，大洪山龙蟠于南，再向南，则是辽阔汹涌的长江江面。第五战区李宗仁占据于此，进可攻击武汉的日军，退可坚守四川大后方。

而与第五战区对峙的，是日军精锐的第 11 军。第 11 军是在武汉会战时才编成的一个军，仅仅看看第 11 军的历任司令官，就能够知道这个军名气很大，第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三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第五任司令官横山勇，而横山勇，在 1943 年到 1944 年，更是直接指挥进攻常德、衡阳、桂林的日酋。

随枣会战，是日军第 11 军与中国军队作战。时，11 军司令长官为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战，只是交战

地点有交叉。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而很多报刊错误地报道张将军牺牲在随枣会战。

坚守在第五战区右翼的是王瓚绪的 29 集团军和张自忠的 33 集团军。29 集团军是装备极为简陋的川军。

张自忠预感到恶战在即，他写信勉励 33 集团军各位将领，信中说：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簣，故唯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封信语气诚恳，感人肺腑，读来隐含雷霆之声。

延安的《新中华报》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张自忠将每一次对日作战，都当成了最后一次。每次对日作战，他都抱着必死的信念。

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抗战老兵说，张司令从小阅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随县是阮明刚的家乡。

阮明刚说，当时天都打红了，夜半时分，没有月亮，但是地面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看清楚。他们一个连与日军交战，一天一夜就牺牲了 80 多个人。团长派一名传令兵来要求他们撤退，但是，已经撤不下来了。传令兵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攻上了阵地。传令兵担心团长的手令会落入日本人手中，就一口吞吃了，打完了手枪里的所有子弹，从地上捡起一杆步枪和日本人拼。日本人还在蜂拥而来，连长让阮明刚和另外两个机枪手趴成一排，拼命向日本人扫射，这样才打退了日本人。

部队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全连幸存的不到 20 个人，包括那名传令兵。

阮明刚属于 38 师，师长是黄维刚。

几天后，日军增加了 3000 人，继续围攻 38 师的阵地。黄维刚指挥部队一连击退了日军多次攻击，伤亡惨重。黄维刚向张自忠请求援兵，张自忠已无援兵可派，张自忠斩钉截铁地说，北进之敌被我第 22 集团军击退；敌后路已被我第 22 集团军截断；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胜利。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

38 师英勇奋战，终将日军击退。

22 集团军，同样是一支川军。抗战时期，出川抗战的四川人，总计有 350 万，为出力最大的省份。

38 师里，除了阮明刚和郭荣昌，此时在张自忠手下作战的，还有一个叫潘絮兹的人。

潘絮兹早年在北平上美术学院。全面抗战开始的 1937 年，日军打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美术教师潘絮兹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战队伍。

潘絮兹在来 38 师政治部工作前，有一位同事就告诫他说，38 师是张自忠一手带大的部队，去了那里可要小心啊，张自忠军令很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让退的。

在那一年的冬季攻势中，潘絮兹随同 38 师转战湖北钟祥，部队与日军血战八个昼夜，伤亡惨重，“弟兄们冒着风雪在战壕里匍匐着，用冻僵了的手指扳着机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伤亡已达到了可惊的数目，活着的也都疲弱得

不能支撑了，但总司令命令：不准退！”总司令，就是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连续八天八夜的进攻作战，让部队极为疲劳，饥寒交迫，战士们饿极了，就用手扒开雪层，拔下雪层下的草根充饥。每个人都饿得昏昏欲倒。第九天早晨，突然有人喊：“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38师的弟兄们像离散多日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欢呼雀跃，阵地上一片欢腾。

总司令张自忠来到38师前线指挥作战，还带来了几尊苏联造的大炮。

张自忠将军到来后，马上指挥38师反击，“机枪激响起来了，夹着轰隆重炮的吼叫。敌人的，我们的，搅到了一起。弟兄们忘了一切地猛扑着，越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甚至石块，终于敌人遗弃了一地的死尸、弹药、给养、用具等，狼狈地退却了。”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军训中，潘絮兹近距离看到了张自忠。潘絮兹眼中的张自忠身材挺拔魁梧，又浓又黑的剑眉，一双大眼睛不怒自威，但是又显得稳重典雅，一副儒将的气派。阮明刚在开会的时候也见到过张自忠，他眼中的张自忠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下巴右侧有一颗黑痣，英气逼人，又让人畏惧。

那次军训中，出生在浙江的潘絮兹清楚地记得张自忠说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谈吐幽默，要求大家要以必死的信心上阵杀敌，“我只是求心之所安，一切艰苦我是不怕的，我只有一个字：‘拼’，拼完算完。”

自从从南京回到部队后，张自忠每次公开讲话，都离不开死字。

此战之后不久，有一天，侦察员报告张自忠说，日军 13 师团 103 旅团指挥部驻扎在钟祥县城东北角。

13 师团是日军最早的 17 个师团之一，参加过与俄国争夺萨哈林的战争。1925 年，全球经济大萧条，13 师团被削减。1937 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13 师团得以重建，急匆匆地投入了侵华战争，先参加了淞沪会战，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接着参加徐州会战，然后参加武汉会战，一路得意扬扬，志在必得，没想到在河南固始富金山阻击战中被 71 军歼灭大半。听老兵们说，富金山阻击战结束后，71 军一万多人，也剩下不到 1000 人。

武汉会战结束后，13 师团得到了补充，接着参加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然后又参加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和陈诚指挥

的鄂西会战，这以后，参加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攻占了贵州独山。贵州独山，是日军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地方，也是抗战最后一战的发生地。可以说，13 师团参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13 师团的侵略历史，就是中国的抗日历史。

13 师团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师团的罪恶，居日军所有师团之首。

在一篇日本人所写的《昭和 12 年，支那南京攻略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2 月 12 日，山田支队占领幕府山要塞，第 6 师团一部迂回至下关，国崎支队已渡至江北进占浦口。12 日，支那守军司令唐生智宣布放弃南京，其本人于傍晚渡江而走。”而山田支队，就是日军 13 师团 103 旅团。

《昭和 12 年，支那南京攻略战》中记载：

在旅团一级中，佐佐木道一、山田丹二（隶属第 13 师团）的部队屠杀最多。联队一级，最勇猛的是第 65 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隶属荻洲立兵第 13 师团），屠杀支那战俘和南京平民超过 7 万人……

那天，当张自忠听说日军 13 师团 103 旅团指挥部的方

位后，异常愤怒，又暗自窃喜。他立即决定派遣一支奇兵，端掉日军 13 师团 103 旅团指挥部。这支奇兵，就是 395 团。而坐在钟祥城东北角的旅团指挥部里的，正是杀害中国人最多的 103 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

山田丹二的指挥部距离张自忠的指挥部只有 30 公里。当山田丹二正陶醉在杀人的快乐中时，一支毒箭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射来了。

395 团团长叫任廷材。任廷材听到进攻 13 师团 103 旅团指挥部，激动不已。

张自忠给任廷材打电话说：日军连日作战，已呈疲惫之态，103 旅团距敌前线又远，后方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胜。

任廷材一手捧电话，一手行军礼说：总司令放心，您就等着捷报吧，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当天黄昏时分，任廷材组织全团人马准备出发，他来到了尖刀队，尖刀队有上百人，每人一杆冲锋枪，背插一把大刀，腰缠 12 颗手榴弹，整齐地站成几排。任廷材站在队伍前说：“我们今晚要奔袭的这股日军，在南京杀了我们很多同

胞……”任廷材的话还没有说完，战士们群情振奋，纷纷叫道：“剁了狗日的。”尖刀队一听说今晚去袭击兽兵，士气大增，根本不需要任廷材再动员。

尖刀队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走入了夜色中。后面，是上千名热血沸腾渴望复仇的战士。

当天晚上 11 时许，395 团来到了钟祥县城外，像一群杀手一样，静悄悄地潜伏在如墨的夜色中。那晚也天公作美，没有月亮。任廷材先派出一营战士，将通往县城的所有道路挖断，阻止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剩下的两营战士，突然飞身而起，扑向钟祥县城。

尖刀队一排子弹打过去，日军的哨兵就全报销了。

日军完全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后方，在距离前线几十公里的后方，居然会有偷袭，居然会遭到袭击。战斗刚开始，就进入了白刃战，尖刀队冲进了几乎没有设防的日军兵营里，明亮的大刀片一起一落，日军的人头就骨碌碌滚落了，这完全就是喜峰口夜袭的翻版。很多日军还在睡梦中，还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身首异处了。还有一些日军从被窝里爬起来，被尖刀队像赶羊一样赶得到处乱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还是被赶上的大刀片砍成两截。这股在南京城里肆虐滥杀的兽兵，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103 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睡梦中被四面而至的喊杀声惊醒后，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指挥部，急令日军迎战，可是响应者寥寥，因为大部分日军已经被消灭了。

山田丹二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带着卫队，仓皇逃命。抗战初期，日军都不穿裤衩的，他们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国军要分辨混进队伍中的日奸，只要看看是裤衩还是裹裆布就行了。一直到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第 10 军报务员卢庆贻站在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的楼顶上，还能看到日军敢死队挺着刺刀，只穿着裹裆布向前冲。

此战，山田丹二侥幸逃脱，395 团仅伤亡 280 人，砍下了将近 1000 颗日军的头颅。

将军一去

潘絮兹第二次见到张自忠是在 1940 年 4 月，那时候，发生在鄂北鄂西一带的枣宜会战已经打响。

一次战前会议上，在军部任职的潘絮兹担任记录。一天黄昏，张将军为军部各支部队布置战斗任务，分析了敌我形势和攻击的方位。张自忠的战前部署让潘絮兹眼前豁然开朗，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一下子条分缕析，纤毫毕现。

会议结束后，张自忠没有吃饭，就带着两个 33 集团军的特务连和 74 师渡过襄河，向日军发起进攻。潘絮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好会议记录，也跟着张自忠过河了。

襄河，是汉江的区域性称呼。汉江过了襄阳以后，襄阳境内下游百姓称它为“襄河”。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

74 师装备简陋，战斗力差，是战前临时归张自忠指挥。

它不是后来的整编 74 师，整编 74 师此时叫 74 军，军长是王耀武。74 军下辖三个师：51 师、57 师、58 师。

枣宜会战进行时，正赶上南方的梅雨天气，天天都在下雨，战士们穿着草鞋，行走在民国时代的泥巴路上，“雨落着，脚踩着稀烂的泥浆，跌倒了又爬起，以急行的姿态追击北窜的敌人。这一日，我们到达南瓜店，那是 5 月 8 日的下午。”

潘絮兹对南瓜店这个后来关注度非常高的村庄有过一段描述：这是一个很小的破败的庄子，只有几间草屋，我们分到了一间发着霉烂谷草和牛粪气味的草棚，拥挤着勉强容下 20 多个人。总司令在我们隔壁，也一样是破烂不堪的草棚。多数的人却只能在雨地里淋雨，有人用稻草扎着棚子，也有人在土坡边缘挖起洞子来的，用来避雨。

战士们正在扎着雨棚的时候，张自忠从草屋里走出来了，他对战士们说：“用了人家的稻草，要给钱的。”

战士们说，村庄里没有一个老百姓，日本人的骑兵这几天在骚扰，老百姓都躲进了深山里。张自忠对政治部的人说，老百姓躲进深山怎么吃饭，怎么生活，赶快派人把他们找回来。

潘絮兹和政治部的几个人刚刚动身，张自忠又说，一定

要换上便衣，别惊扰了老百姓，对百姓说话一定要和气。

潘絮兹他们又冒着雨，踩着稀烂的泥浆出去了，傍晚从附近山上带回几个浑身淋得水鸡样的草屋的主人。张自忠又出现在门口了，他亲热地对这几个狼狈不堪的人说：“打扰你们了，老乡，对不起呀！请你们回去检点一下，弟兄们有烧了你柴火，打坏了你盆子罐子，吃了你豆子没给钱的，都到我这里来，找我。现在，”他放高嗓子喊着那胖胖的矮子副官：“彭树林，每家给他 20 元，算是我们住了他的房子，用了他的东西。”

老百姓不要钱，但是张自忠一定要给。

第二天一早，74 师就和日军交手了。

74 师的对手是日军独立混成第 14 旅团。

不久，74 师坚守的阵地失手了，与 74 师并肩作战的 38 师侧翼面临严重威胁。

38 师下辖三个团：112 团、113 团、114 团，张自忠让 112 团在正面迎击日军，113 团和 114 团从侧面迂回包抄，将 74 师丢失的阵地夺回来。被打残的 74 师撤退到后防线。

113 团在左，114 团在右，像两支张开的铁钳，趁着夜色悄悄地摸向日军阵地。

阮明刚在 114 团。

114 团摸上一个叫作王家台子的山顶，大家汗流浹背，坐在地上还没有喘口气，突然看到山下有大批日军。几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几百名日军笔直地站成几排，听站在前面的一名军官训话。那名军官打着手势，看起来很激动。因为距离太过遥远，114 团的战士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中国军人把所有的机枪架在一起，所有的步枪分列在机枪两侧，一声令下，所有的枪支一齐喷吐着战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愤怒的火舌”。

第一波子弹过后，站在队伍前面神气活现地挥舞手臂的日军军官就倒下去了，他被打成了筛子。此前，不知道有多少杆枪支在瞄准着他，而他还在扬扬得意，浑然无知，自顾自地发表“宏论”。

日军突遭袭击，乱成一团，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报复来得这么快，他们还陶醉在占领阵地的快乐之中。

激战过后，日军留下了几百具尸体，剩下的仓皇逃窜。根据尸体数量判断，刚才应该是一个大队的日军。

天亮后，日军独立混成 14 旅团的其他部队赶来了，实施报复袭击，114 团据险坚守，一次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三天过后，114 团和 113 团赶来增援的一个营发起反击，日军来不及运走尸体，就匆匆逃走了。战士们清点尸体，居然有 900 具。日军在战场上有运走焚烧尸体的规定，900 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摆在山谷，说明日军独立混成 14 旅团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独立混成 14 旅团将 74 师打残了，38 师又将 14 旅团打残了。

潘絮兹跟着张自忠向前进发。天空依旧阴雨连绵，耳边依旧枪声不断，这天晚上，他们宿营在距离襄阳 30 里的一个名叫张家沟的地方。

和南瓜店一样，张家沟也是一个非常局促的小村庄。张自忠、苏联顾问、翻译官、参谋长、副官、参谋、地图、电话、文件……塞满了一间房子，连转身挪脚都感费力。潘絮兹和十几个人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抗战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指挥部里，宽敞的指挥桌，挂着地图的墙壁，能够让指挥

官踱来踱去思考问题的地面……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抗战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这些养尊处优再来点潜规则的导演们的想象。

夜晚，陆陆续续有伤员抬来了，潘絮兹忙着登记伤员，检查换药，张自忠也没有休息，他走出屋子，让把伤员都抬到屋子里，免得遭受雨淋，而司令部里的所有人被赶了出来。潘絮兹听到张自忠对副官说：“听好了，不论轻伤重伤，兵，10 元；官，20 元，发下去。”副官嘴唇嗫嚅着说：“这得多少钱啊。”显得很不愿意，可是他又不听张自忠的命令，又赶紧答应说：“是。”

张自忠的司令部很穷，没有多少钱，司令部的人，包括张自忠，都经常吃不饱。

第二天，张自忠留下政治部的人照顾伤员，其余的人继续向前进发。

张自忠这一路危机四伏，日军虽被击败，然而保卫司令部的只是两个特务连，“我们不分昼夜地行军，忍着饥渴，常常和小股的敌人遭遇，发生了猝然的仓卒的争战。”

然而，张自忠总是出奇的镇静，不论面前的日军有多少，

他总是从容地翻开地图，手举望远镜，指挥特务连反击，从来没有过一次慌乱。

潘絮兹记得最激烈的战斗是发生在5月14日的方家集。张自忠带着司令部来到方家集的时候，村子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张自忠指挥战士们扑灭火焰。从烟雾和火焰能够看出来，日军刚刚离去不久，因为日军每次撤退前，都要放火点燃所有能够点燃的东西。

大家正在灭火时，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掠过村庄上空，炮弹在屋顶上爆炸，张自忠的司令部中了日军的埋伏。

张自忠勃然大怒，绰枪在手，对着特务连喊道：“上去，击退他们！”特务连端着冲锋枪，冲出了村外。

激战良久，日军越来越多。张自忠令潘絮兹这些文职干部撤退到半里开外的一座小村庄里，那座村庄只有两间房子，而他自己则留在方家集指挥作战。

日军炮击。炮弹落在那两间房子上，房子坍塌。潘絮兹他们又躲进了一条干涸的水沟里。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炸弹落下来，一层层尘土落在了潘絮兹他们的身上。半里外的方家集上，枪声更加密集，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遮没

了整座村庄。

下午，方家集来了联络兵，他告诉说，总司令安然无恙。大家终于放心了。

枪声一直响着，到了夜晚，才稀稀落落，攻击了一天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的协助下，还是没有攻进张自忠率领的两个特务连坚守的方家集。

日军退却了。

潘絮兹跟在张自忠的后面追击日军，那天晚上非常漆黑，只能看到脚下像一条带子一样的乳白色的小路，大家沿着这条乳白色的带子追击，不时有人掉在了路边的深坑里。前方响起了枪声，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密集，那是特务连与日军交火了，子弹像萤火虫一样漫天飞舞，带着尖厉的啸声从耳边飞过，张自忠丝毫也不在乎，蹿开大步向前追击。潘絮兹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

追出了几里远，他们遭到了日军的反扑。日军的机枪扫过来，大家都趴在了地上。等到潘絮兹再起身的时候，见不到张自忠了。他们几个文职干部在墨染的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枪声渐渐稀疏了，可是，总司令在哪里？

天亮后，潘絮兹才看到他们在漆黑的夜晚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和张自忠走散的那个地方。张自忠站在晨曦中，望着远方，神态平静，仿佛昨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司令部继续追击敌人。到达一个叫作沟原的地方时，他们又与日军发生激战。

当时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只带着几百人的特务连和司令部踏入险地，这种胆识，让人敬佩。

潘絮兹说，当时无日不战，总司令亲自拿着手枪与日军厮杀。

张自忠将军的侄女张廉瑜说，1940年4月15日，父亲通过第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处长李广安，用电台跟身在湖北的伯父联系，他想带我和云妹到湖北前线看望伯父。张廉云口中的云妹，就是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

就在张廉瑜和张廉云快要动身前往湖北的时候，她们突然接到张自忠的回电，电文说：“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张廉瑜说，我们估计，前方肯定又要打仗了。

曹廷明曾经给张自忠站过岗。

有一天晚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给张自忠将军送来了一笼包子，张自忠没在。特务连的吕连长就把包子端出来，和几个站岗的战士分吃了，曹廷明吃了两个。夜半时分，张自忠回来了，问有没有人来找？参谋说老百姓送了一笼包子。张自忠当时正饿着呢，就问：“包子呢？”吕连长老实地说自己 and 哨兵分吃了。张自忠笑着骂了一句吕连长，没有责怪，就自己下面条吃了。

曹廷明说，张自忠是一个貌似威严，其实非常和蔼的人。人们叫他“张扒皮”，是说他训练士兵非常严酷，其实，他心中爱着自己手下的每一个士兵。

枣宜会战开始的时候，曹廷明来到 33 集团军的被服厂担任监工。有一天，他看到司令部的苏联顾问和翻译来到被服厂，他此前给他们站过岗，彼此很熟悉。曹廷明好奇地问苏联顾问：“你怎么来了？”

苏联顾问说：“你不知道吗？总司令不在了。”接着，苏联顾问又通过翻译说：“张司令打仗打得好啊。中国如果有十

个张自忠，土地不会沦陷一寸。”

曹廷明如同五雷轰顶，瘫坐在地上。他不明白，总司令，怎么就不在了？

资料记载，1940年5月15日，张自忠带领1500人渡过襄河，也就是汉江，攻击日军后方。不久，就遭到6000名日军的围困，壮烈殉国。

潘絮兹就是当年这1500人中的一个。

渡过襄河后，所有人都感到形势变得非常糟糕。潘絮兹说，日军不断增援，隔开了这1500人和38师、180师的联系，在奔走的途中，电台也弄丢了，不知道33集团军其他部队的方位。总司令张自忠身边，只有两个特务连和一个不满员的74师。

站在一座小山包上，潘絮兹看到在遥远的天边，有密密麻麻的军队在行进，但是无法分辨是中国军队还是日军。

张自忠把所有人都集合在了一起，他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情况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

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离开队伍！”所有人都肃立在黄昏冷冷风中，聆听着张自忠的讲话。

张自忠又说，今晚不能抽烟，不能打电筒，不能说话，不能咳嗽。我们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包围圈中，但是日本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方位，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当天的张自忠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又饮食不接，痢疾复发，他的脸色蜡黄蜡黄，像陈年的窗户纸一样。

潘絮兹说，这天晚上，我们在山坡下度过了异常难挨的一夜。

5月16日拂晓，战斗就开始了。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对着这1500人驻扎的山坡和村庄疯狂轰炸。村庄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潘絮兹跟着一群人跑到了麦地里躲藏，那时候，小麦已经快要成熟了，有半米多高。

轰炸过后，日军像蚂蚁一样从远处冲来了。张自忠命令道：“带枪的，留下！总部和政治部空手的，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那时候，武器非常缺乏，潘絮兹没有枪，所有文职干部都没有枪。

潘絮兹和没有枪的人向山背后的西北方向转移，路上突然遭遇了一股日军。日军架起机枪向着他们扫射，很多人倒了下去。人群里有人在大声喊：“有枪的站住，架起机枪来，打呀，不要等死呀！”

护送他们的士兵向日军还击，可是压不住日军的火力。

潘絮兹他们且战且走，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又下起了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不断有人从悬崖上滚下去，也不断有人被日本飞机轰炸，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到黄昏的时候，潘絮兹看到身边只有四个人。

他们牵挂着张自忠，可是他们又不知道此刻张自忠在哪里。

几天后，潘絮兹一行五个人饥肠辘辘，在山中辗转，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小洪山。小洪山驻扎着中国军队 127 师。127 师隶属于 22 集团军司令邓锡侯的部队，来自四川。师长陈离曾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后来，127 师在小洪山打游击，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联系紧密，关系很好。

127 师师长陈离安排潘絮兹他们吃饭，得知他们是 33 集

团军司令部的干部后，就说：“你们突围的当晚，收听敌台广播，张总司令已经阵亡了，但我方还不曾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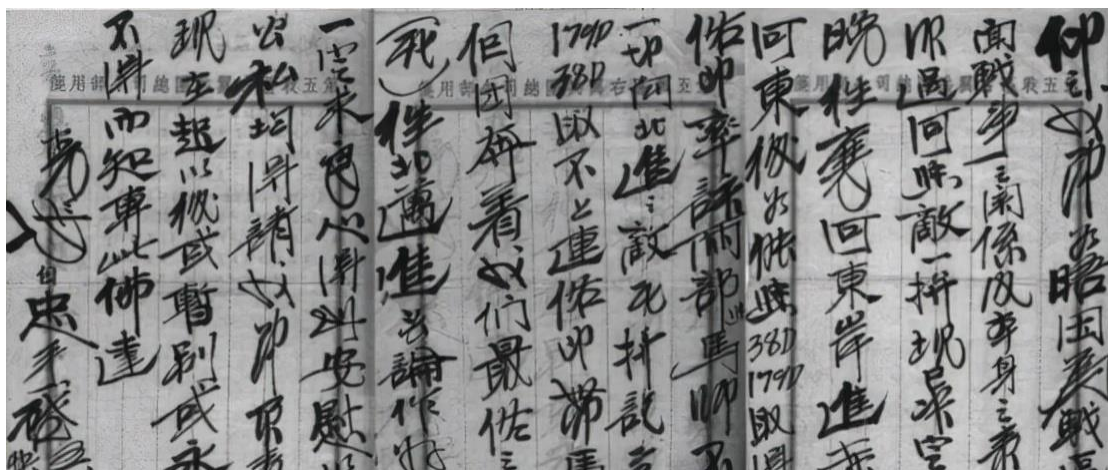
潘絮兹不相信，总司令怎么会死呢？他身体强壮，指挥若定，足智多谋，和日军交战几十次，从无败绩，他怎么会牺牲呢？

潘絮兹想，这一定是日军的阴谋，是日军的谣言。

5月24日，潘絮兹正吃早饭的时候，陈离突然走进了屋子，他说，军政部已经接到了冯副司令的电报，张将军于18日在宜昌伤重牺牲。冯副司令，就是冯治安。

潘絮兹和司令部的那四个幸存者互相望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潘絮兹听到的，不是准确消息。一直到7月7日，重庆才对外宣布了张自忠将军牺牲的经过和消息。



张自忠将军手书

5月16日，潘絮兹这些没有枪的文职干部离开后，张自忠率领战士们顽强御敌。司令部参谋长李文田和苏联顾问多次请求张自忠趁日军包围圈没有形成，赶快转移，由手枪连和74师在后掩护。张自忠坚决不肯，他说：“总司令遇到危险就逃跑，前方战士怎么办？”苏联顾问和张自忠吵了起来，说按照苏军的作战条例，形势不利时，将军可以先撤离。张自忠笑着说：“将军的命就是命，战士们的命就是土疙瘩。”苏联顾问指着四周越来越多的敌人，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张自忠说：“包围有什么了不起的，和日本人血战到底就行了。”

张自忠指挥手枪连和日军作战，掩护苏联顾问撤退到安全地带。一发子弹击中了张自忠的左臂，他边用右手的手枪

还击，边笑着对身边警卫员说：“我是上将衔，今天牺牲了，明年的今天一定很热闹呀。”警卫员要给他包扎，他说：“专心打鬼子，一点小伤，不要大惊小怪。”

特务连击退了日军进攻后，参谋长李文田被派到前方的74师阻击日军。张自忠身边只剩下了八个人。

日军又拥了上来，张自忠带着八个人阻击，头部被弹片擦伤，一名警卫员给他包扎。还没有包扎好，他的胸部又中一弹。又来了一名警卫员包扎，张自忠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然而，警卫员仍然坚持给他包扎，他们舍不得丢下张自忠。张自忠说：“我这样死了很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都很好。”

也许，张自忠在临牺牲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终于能够以死明志了。

日军冲上了山坡。

这股日军的番号是39师团231联队。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书籍，书中这样记载张自忠将军最后殉职的过程。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

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3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身体。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活关公，倒在一名日军的刺刀下。

战斗结束后，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看着张自忠将军的装束和身上搜出的物品，觉得这是一个大官，就用担架将其抬到了距离战场20里的陈家集。在陈家集，与张自忠将军相识的日军第39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仔细辨认，确定这是张自忠，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张自忠的身上共有七处伤口。师团长村上启作深为张自忠的精神所敬仰，命令赶制一口棺材收殓入棺，葬于陈

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那个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将军，那个指挥若定、爱兵如子的将军，此后再没有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他走进了历史中，他的故事会流传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他代表的是中国的抗日军人。他不但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远在北平的张廉瑜此刻还在等待着能够和伯父张自忠见面，她说，5月下旬，我们突然接到伯父战死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无法承受。当时，伯母患有子宫癌，住进了医院里，我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家里人商议后，决定派伯父的儿子张廉珍去重庆奔丧。

张廉珍辗转来到重庆后，还没有来得及安葬父亲张自忠，又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到北平，而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一走进家门，就昏倒在地。

张廉珍奔波多日，都没有见到父母最后一面。

十里长山的百姓说，当年张自忠牺牲的具体地点在杏仁山，和将军一起殉国的有600多人，当年战后的场景极为惨烈，有的战士嘴巴里咬着日军的耳朵；有的战士枪托上沾着

日军的脑浆；有的战士手指死死地掐着日军的脖子，分都分不开；有的战士被日军的刺刀钉在树上……

600 名将士壮烈殉国，而留下姓名的，仅有 13 人。

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到 38 师时，38 师刚刚经过了一场激战，将日军赶出了几里之外。

那天，阮明刚正坐在地上擦拭机枪，突然听到一个战友哭着跑过来说：“总司令叫人家打死了。”阮明刚还没有回过神来，四周就响起了一片哭声。阮明刚相信总司令张自忠真的牺牲了，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阮明刚说，大家都朝着十里长山的方向跪下来，张自忠就是在那里牺牲的。哭声震天。

有人说：“和狗日的拼了，给总司令报仇。”

还有人说：“总司令都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团长樊立山过来了，眼圈红肿，他声音嘶哑地喊道：“是男人的，跟我走，杀光小日本。”

大家全都站起来，跟着团长去报仇。有人抱来了一卷白布，每个人都撕下一条，绑在额头。师长黄维刚也来了，他光着脚板，赤裸上身，只穿着一条大裤头，手上提着一把大

刀，头上也绑着白布。黄维刚举起大刀喊：“今晚杀光小日本，给总司令报仇，有种的就跟我走。”

阮明刚说，大家都在喊着报仇，报仇。然后，脱光上衣，头缠白布，跟在黄维刚的后面冲向十里长山。

时近黄昏，万籁俱寂。

阮明刚在这支复仇的队伍里，郭荣昌也在这支复仇的队伍里。

戴孝复仇，抬棺决战，在中国人眼中是最悲壮的事情。

这场复仇之战异常激烈。阮明刚说，他们连的四挺轻机枪一字排开，冲在最前面，见到日本人就扫射，后面的战士挺着刺刀，举起大刀，齐声呐喊，真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大群大群的日军冲出来了，和他们搅斗在一起，耳朵边都是叫骂声、喘息声、倒地声、刺刀捅进身体的声音。日军被杀尽后，阮明刚看到全连只剩下十几个人，每个人身上都黏黏糊糊，沾满了鲜血。有日军的，也有自己军队的。

剩下的这十几个人仍旧冲向日军的阵地，仍旧大呼酣斗，阮明刚说，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想着报仇，总司令都死

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又与一股日军搅斗在一起，机枪子弹打光了，阮明刚手拽滚烫的枪管，抡起来砸向日军，一名日军的刺刀刺穿了他的腿，他将那名日军的脑浆砸出来了，再也无力站立，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壕沟里。

在这场激战中，郭荣昌也负伤了，日军的刺刀挑伤了他的前额。

黄维刚领着阮明刚和郭荣昌他们在与日军血战，一支手持铁锹的小分队在十里长山搜寻，他们找到日军为张自忠将军树立的那块墓碑后，就挖开坟墓，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放在担架上，抬回了 38 师的驻地。而天亮后，这股日军就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把张自忠遗体运往武汉。如果再晚几小时，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就再也见不到了。

回到 38 师驻地后，阮明刚的一连人，仅剩三个人。

而那天晚上的激战，日军留下了更多的尸体。

阮明刚说，日军打死了我们的总司令，我们也打死了日本一个将军，级别很高，名字叫作六归堂。读音是这样，不

知道具体汉字怎么写。我查找枣宜会战的资料，查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名。不知道是老兵记忆有误，还是资料不全。

但是，老兵很确定地说，当时就是打死了日本一个将军。

张自忠的遗体运到宜昌后，全市降半旗，十万市民冒着大雨，跪迎张自忠的遗骨，悲恸之声，闻于四野。日军飞机在天空中盘旋良久，十万市民，无一躲避。

当时，日军大本营感慨于张自忠将军的忠烈，给航空兵下令三天停止轰炸。

张自忠的遗体顺着长江运往重庆，长江沿岸民众自发跪拜，衔哀野祭，山头路边，萤火点点，纸钱飞散，哭声动天。张自忠的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率军政要员，臂缠黑纱，肃立迎候。灵柩抬上码头，蒋介石抚棺大恸，痛哭失声。在场数万人无不落泪。

16 年后的 1956 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

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唯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原来，当天张自忠率队进攻日军，而日军兵力前移，张自忠将军是阴差阳错地插入了日军后方，被数倍日军包围，壮烈殉国。

有资料显示，张自忠将军参战两年，率部累积消灭六万日军。

枣宜会战还没有结束。

38 师抢走了张自忠的尸骨，而且杀伤了大量日军。日军不甘心，决意报复。

一周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 38 师的阵地。而此时，38 师已经移师襄河西岸，驻扎在襄河东岸的是一个川军团。装备极度简陋，而且人数占据绝对劣势的川军团与日军拼杀一夜，天明后，川军团全部战死。

阮明刚负伤后，就回到家乡养伤。川军团与日军的激战地，就在他家乡附近。

阮明刚指着家乡附近的金鸡山说，川军团牺牲后，都埋在那里的山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每逢阴雨的夜晚，还能听到山中传来的哭泣声。

湖北战场上的枪声渐渐平息，而华北战场上的枪声突然密集响起。那里，八路军即将发起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役。

第二章 百团大破袭

老兵口述

【杨云溪】

我亲眼看到了左权将军牺牲。

1937 年冬天，八路军办事处迁往临汾，我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去投奔八路军。当时的办事处就设置在一座破庙里，条件艰苦得很。因为我有文化知识，被分配在炮兵部队。其实那时候的八路军很穷，没有大炮，所谓的炮，只是迫击炮，

就这还没有多的。

百团大战最后一战是关家垸战斗，那场战斗打得很惨烈，关家垸的地势易守难攻，八路军伤亡很大，彭德怀始终沉着脸，火气很大。

有一次，我看到彭德怀站在战壕边指挥作战，他手举望远镜，蹲靠在战壕的一边，一条腿支撑在另一边。后来大家看到的那张很有名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拍摄的，当时我距离彭德怀只有 100 米。

关家垸战斗中，日军有五六百人，被我们打得只剩下 100 人。后来，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很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出了战场。

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报复。1942 年 5 月，日军大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就是今天的左权县。当时八路军总部有将近两万人，而警卫部队只有两个排，七八十个人，其余的部队都在前方作战。没办法，八路军总部只好撤退。

撤退的时候，左权将军要求断后，他带着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大家撤离。敌人的炮火很猛烈，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他牺牲了，我亲眼看到，当时心里难受到极点。

因为时间紧迫，情况危急，根本就不可能抬着他撤退，更不可能掩埋，所以，大家把他的遗体放在路边，赶紧撤走。

三天后，我们悄悄回去寻找，看到他的遗体还在路边。

【白朝定】

我以前是红军，后来去了陕北，再以后东渡黄河，去了山西战场。

我在山西战场打了八年，经历了很多游击战。记得我们打下过一个煤矿，没有见过电灯，有人就用灯泡点纸烟。那么多煤炭，让百姓搬回家，但是也搬走不了多少，又不能留给日军，只好泼上煤油，烧了。

百团大战的时候，我们打下过日军一辆汽车，但是也是第一次见这东西，没有人会开，也不知道怎么捣毁，那是个铁东西。附近村庄一个老先生说，只要把汽车的眼睛捣毁了，它就开不走。我们就把两个前灯砸毁了。可是，第二天我们再去看，百姓说，昨天夜晚，日军就偷偷跑回来，把汽车开走了。

破坏铁路也是这样，对着亮铮铮的铁轨，没有办法，刀砍不进，石头砸不断，后来，营长来了说，只要把螺丝拆开，就能够卸下铁轨。一卸螺丝，果然是这样。

这些事情都让我感觉到，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打仗也是这样。可是我学不会文化，我宁肯上战场，也不愿意学文化，所以我识字不多。

我的头上有一道伤疤，这是当年和日军拼刺刀留下的。日军的枪比我们的长，刺刀也长，所以拼刺刀的时候占便宜。后来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拼刺训练，也缴获了很多日军枪支，所以，后来日军和我们拼刺刀，都感到害怕。

我们和日军在山西打了八年，日军吓得躲在炮楼里，白天才敢出来，夜晚不敢出来，一出来就遭到我们伏击。

我还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送情报。我们的暗号是这样的，我走进掌柜的房中，脱鞋上炕，把鞋子摆成丁字，如果掌柜的鞋子也摆成丁字，那就说明是自己人。我们就是依靠这种方法对暗号，别人是根本想不到的。

【刘火星】

我抗战时期是游击队员，参加过很多次八路军攻打炮楼的战斗。

日军的炮楼很坚固，八路军和游击队想要攻下炮楼，那是相当不容易，于是我们就摸索出了很多好办法。

有一次，日军炮楼里找人做饭，我们的两名游击队员是当地人，就冒充成厨师，在炮楼里给日军和伪军做饭。等到我们准备攻打炮楼，就派人进去通知厨师，怎么进去？装扮成送菜的菜农，把蔬菜担进厨房，悄悄告诉厨师说，今晚要攻打炮楼了，让他准备好。到了夜晚，我们外面在攻打，这两个厨师就悄悄打开了碉堡的门，我们就冲了进去。我们冲进去后，就占了便宜，因为我们人多，日军和伪军人少，如果短兵相接，我们就能够占便宜。

那时候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枪很少，子弹更少。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把高粱秆折成一寸长的小棒，塞在子弹袋里，远远一看，敌人还以为我们身上背着很多子弹，就害怕了。

因为武器不如人，我们就经常采取夜袭和近战。红缨枪和大刀那时候是最常用的武器。每个村里都有铁匠，铁匠们都有打红缨枪头和大刀的本领。刚刚打出的大刀片，还是红

彤彤的，放在冷水中一泡，最好是冰水，一股青烟冒出来，这样的钢就很硬，砍不断。

【方大明】

我们武工队员在抗战时期，和伪军日军斗智斗勇。

我们那里的伪军，家都在方圆百里之内，伪军依靠炮楼生活，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偷偷出门，骚扰百姓。炮楼里伪军多，日军少，一般伪军都是混饭吃的，有地痞流氓，有兵油子，少数伪军很坏，我们的目标就对准这些顽固的伪军。

我们把这些伪军的情况全部摸清楚了，为了震慑他们，夜晚就拿着铁皮卷成的喇叭，到炮楼下喊话。我们指名道姓说伪军的名字，说你家有几口人，都在那里干啥。伪军一听吓坏了。我们就警告他，你再敢残害百姓，我们就取你项上人头。这叫敲山震虎。

后来，伪军果然老实多了。

有一次，一伙伪军愿意投诚，事先秘密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就假装攻打炮楼，打不下来，装着害怕，逃跑。日军就

命令伪军走出炮楼追赶。结果，这伙伪军就很顺利地归入了我们武工队。

【王政柱】

百团大战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左权起的，彭德怀赞同的。

那时候我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我给彭德怀和左权汇报参战部队的时候说：“正太线 30 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 15 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 12 个团……共有 105 个团。”后来一些写百团大战的书籍中，有的写到了 103 个团，有的写到了 104 个团，有的写到了 105 个团，其实，正确的应该是 105 个团。

我刚刚汇报完毕，左权就高兴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查对一下数字。”

当时，彭德怀坐在一边，他接着就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称作百团大战。”

左权也说：“百团大战这个名字好。”

很快地，彭德怀和左权就向中央军委起草电文，电文最后署名“彭左”，百团大战时期，总部发布的电文，后面都是署名“彭左”，彭是彭德怀，左是左权。

美国人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

外公是一名老红军。

外公在当兵以前，是一名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的异常辛劳贫苦的日子。有一年，刘志丹从陕北高原来到了关中平原，外公家乡开始“闹红”，很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有一个名叫丁子鉴的青年鼓动外公当红军，说红军是穷苦人的部队，进了队伍里吃得饱穿得暖，还能给家里分一斗麦子。外公听了丁子鉴的话，就参加了队伍。

外公刚刚参加红军的时候，没有枪，没有军装，丁子鉴发给他一把大刀。每逢丁子鉴和一些红军开会的时候，外公就扛着这把大刀在外面放哨。不久，这支队伍从关中平原开往陕北高原，外公也跟着去了陕北。在陕北，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外公分到了一杆步枪。

丁子鉴，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作丁本淳。《共和国将帅名录》中记载：丁本淳，原名丁子鉴，陕西省澄城县醴醐人。外公白朝定和丁本淳是同村人。

外公说，那时候，很多人为了了一斗麦子、一斗小米就参加了队伍。

外公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家有弟兄两个，因为家穷，就商量着投红军，到了红军队伍里能吃饱饭，饿不死人。弟兄两个走出村庄后，看到大道上还有一伙准备去投红军的年轻人，哥哥就对弟弟说：“你先跟着他们走，我回家给爹妈说一声，就追你们。”弟弟先走了，哥哥回家。等到哥哥再走到村口的时候，弟弟他们已经走远了。哥哥就开始追，追出了很远，还没有追上，远远看到一伙穿军装的人过来了，是国军。反正都是队伍，都能吃饱饭，哥哥就参加了国军。这样，一个在红军队伍里，一个在国军队伍里，兄弟俩几年都没有见，都不知道对方的死活。有一年，在山西战场上打鬼子的时候，兄弟俩意外碰到了一起，亲热得不得了，说了一晚上的话。天亮后上战场，兄弟两个都战死了。

外公说，那个弟弟就是他同班的战士，名字忘记了，只知道姓黄，是陕西西府人。

外公到了陕北没多久，徐海东领着的红军就从陕南来到

了陕北，接着，毛泽东领着的红军也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徐向前领着的红军也来了，全国的红军都来到了陕北。可是陕北很穷啊，地瘠民穷，山沟沟养活不了这么多的精干小伙子，外公他们的部队就准备东渡黄河。黄河那边是阎锡山的地盘。盛产老陈醋和食盐的山西，那可是当时中国很富裕的地方。

外公他们准备过黄河的时候，突然就听说红军要换衣服了，换成国军的衣服。红军和国军成了一家人，一起打鬼子。红军也不再叫红军，叫八路军。

1937 年冬天，我的外公白朝定穿着灰色军装，和战友们坐着木船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

外公说，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阎锡山的晋绥军衣服是青色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衣服是黄色的，那时候，全国军队的武器不但不统一，而且衣服也不统一。在所有抗日武装中，八路军的武器属于最差的。

外公说，人们一说起八路军，就说是小米加步枪，生活很艰苦。其实，能够拥有小米加步枪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时候八路军连小米都吃不上，步枪也不够用。

小米是北方的粮食，八路军主要在黄河以北的敌后战场

抗击日军，所以就有了小米加步枪的说法。

八路军打的是没有后勤供应的战争。

军粮，从来都是因地制宜。藏身于民的八路，军粮也只能来源于民。老百姓吃小米，八路也吃小米。那些年，小米是北方农民的主食。

在过去几千年的战争中，小米一直唱主角。《诗经》中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淮南子》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晁错的《论贵粟疏》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也说：“桑竹垂余荫，菽稷时时艺。”黍是今天的糜子，稷和粟都是今天的小米。糜子和小米形似，都是很小的颗粒，在北方，糜子因为产量低而很少种植，小米则广泛种植。

在遥远的古代，小米不但是士兵的军粮，还是战马的军粮，可见小米消耗之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给长安城带回了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在西域吃苜蓿草，而来到长安城只能吃小米，所以寿命很短。后来，汉武帝不得不从西域引进苜蓿，中国的战马的食谱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古装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战马吃草的镜头，是导演的异想天开。

只是到了唐代，老百姓的饭桌上，小米才退居次席，面粉和大米开始唱主角，军粮也以小麦和大米为主，但是这时候的军粮，还是以稀饭为主，北方叫沫糊，南方叫粥。古装剧中的将士拿着大饼啃的镜头，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水浒传》中有武大郎卖炊饼，炊饼就是今天的馒头，而馒头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本意是用来祭祀南征中的冤魂，祭祀完后，士兵们拿来享用，居然很美味，于是有了馒头，绵延至今。戚继光抗倭时，为了便于携带，将面粉做成小圆饼，穿在一起，这就是光饼的来历。至今，浙江福建一带还有光饼。

成吉思汗的军粮却又大相径庭。成吉思汗的军队没有根据地，部队走到哪里，给养就带到哪里，而给养就是成群的羊马。到了荒漠戈壁地带，羊群无法生存，就带着马匹，这些马匹不是用来征战的，而是士兵的食物。这些马匹也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中成长，不需要燕麦和苜蓿，它们依靠草根就能维持生命，而且能够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草根，士兵们依靠吃马肉、喝马血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生活在中国元代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元朝有一个将军叫慧元，他把牛奶干燥处理，制成粉末状，装在皮囊里，行军征战时，皮囊里加入水，边跑边震荡，溶解为粥样，饮之甘美，且力气倍增。这就是奶粉的来历。

八路军小米加步枪，可以说又回归到了远古时期，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外公当年是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 115 师。

红军改编是 1937 年 8 月下旬的事情。当时八路军全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115 师、120 师、129 师。115 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组成，师长是林彪；120 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组成，师长是贺龙；129 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师长是刘伯承，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八路军在延安还有一个留守兵团，兵团司令是肖劲光。

《彭德怀自述》中说，红军 28000 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援助，而部队又扩充非常快，所以，给养就非常困难。

外公说，抗战时期，他们一天不吃饭，一晚不睡觉，那是经常的事情；而且，没有枪支，新扩充的战士就拿着梭镖大刀打仗，为了抢一杆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总是要搭上好几条人命。而日本人的《步兵操典》中也有“人在枪在”的规

定，土八路想要抢一杆枪，太难了。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中看到：抗战时期，彭德怀召开会议，大家兴冲冲赶来了，以为开会就能吃饭，没想到彭德怀也没有吃的，大家饿得坐不住，就躺在炕上开会。

抗战早期，八路军能够从国民政府领取粮饷，按照三个师的配置。后来，八路军扩充非常快，但是领取到的，还是三个师的粮饷配置。那时候，整个中国军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国军也常常吃不饱，一直到 1944 年滇缅反攻的时候，大量的国军连棉衣都穿不上，冻死在云南的高黎贡山上。

1939 年南岳会议结束后，抗战由防御转入了相持，国军和八路军有了摩擦，国民政府就停止了对八路军三个师的供应。

八路军只能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抗战开始之初，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在经过同意后，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因为八路军的游击战有着悠久的传统。

游击战术是红军和八路军的传家宝，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更是将游击战发挥得炉火纯青。

彭德怀对游击战推崇备至，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说：

只有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使深入我区之敌，行不安，坐不稳，耳目不灵，手足不敏，造成有利于运动战的条件与机会。不仅如此，即对付敌人武装便衣队的袭击，保卫抗日政权，保卫根据地治安，亦无一不依赖游击战争，这是敌后战争环境与我们的任务决定的。

游击战让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游击战也让日军处处捉襟见肘，被动挨打。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也看出了游击战的妙处，他在 1937 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各战区陆续将部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在抗战之初，当国军处处被动挨打，而八路军的游击战

却很快就收到了奇效。115 师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余人；129 师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 24 架；120 师雁门关设伏，摧毁汽车 500 辆；刘伯承在七亘村三天内两次设伏，歼敌 400 人……尽管每次歼敌数量不多，但是累积起来，这一时期八路军歼敌将近一个联队，而此时的国军却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一个日军联队，八路军的战果可谓异常辉煌。

国军开始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但是国军的游击战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有很大不同。八路军的战术是依靠群众，藏兵于民，在白天，每一个八路军都是拿着锄头的农民；而到了夜晚，每一个农民都是拿起枪支的八路军。而国军的游击战，则没有八路军这样的奇思妙想。八路军的游击战主要是小规模设伏袭击，后来发展到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果辉煌。这就是白崇禧所说的“积小胜为大胜”。

八路军的游击战比国军的游击战更进一步，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八路军的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间自卫武装，灵活机动，作风飘忽，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些，都是国军的游击队没有做到的。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符合游击战的特点，而国军的游击

战，还是敌后阵地战。

1935年，一个名叫埃文森·卡尔逊的美国人来到中国观摩战法，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

卡尔逊在台儿庄战役中看到了中国军队如何奋勇杀敌，深为感动。后来，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名叫斯诺的美国人，两人相谈甚欢。斯诺，就是写出了《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红军的那个美国记者。在斯诺的介绍下，卡尔逊来到了八路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卡尔逊眼中的八路军是信心满怀的，他们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没有抱怨，卡尔逊说，这些八路军能够熟练运用游击战的战术，他们的枪法很准，奔跑起来像一阵风，而且飞檐走壁。

外公说过，抗战的时候，八路军的脚后跟绑着两双火筷子，火筷子现在几乎消失了，就是用来夹煤块的筷子样的铁条，八路军脚后跟绑上火筷子后，退后几步，然后一跃而起，踩着土墙就攀上了墙头。北方的土墙高一丈左右，我每次看到土墙就会想起外公的话，现在即使给我十双火筷子，我也攀不上墙头。

卡尔逊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翻译是周立波，这是一个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家，写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翻译有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精通俄语和英语。几乎所有老外来到解放区，都是周立波担任翻译，除了卡尔逊，他还担任史沫特莱和苏联塔斯社驻华军事记者瓦西里耶夫的翻译。这个周立波是一代文学大家，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很少。

周立波陪着卡尔逊在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了 50 天，依靠步行和骑马行走了 2500 里，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极为感兴趣，他对晋察冀根据地司令聂荣臻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战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还说，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如果有战争，也要这样打游击。

周立波则把这次考察写成了一本书，叫作《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 1938 年的汉口出版了，很快就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汉口还没有沦陷。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

作《劫后的东冶头》，文章写道：

我们走进镇里，不见一个人影；原有好几百家烟火的市镇，凄凉像坟墓；许多房子虽然没有经过火烧和炮轰，但是门窗和一切木器，都被敌人用作柴薪烧掉了。睡觉的炕，都被捣毁，烧饭的锅炉上，撒上了许多大便。

我们走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看，那里有一小仓小米，被敌人烧掉，细粒的小米，变成了整块的焦炭。

日军不但烧光，而且还杀光，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多看他们一眼，他们杀，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杀。

东冶头并不是个例，还有比这个村庄更为凄惨的：

像崔家庄，简直烧成了一片焦土；被轮奸致死的女人，裸露地横尸在路上。有许多女人，裤子被扯得稀烂，可以想见当时挣扎的情形。在长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遭受了青年妇女同样的悲运。

周立波的这本书籍也写到了八路军的战法：

我们的步兵在山路上移动很迅速，惯于奇袭、突击、夜战和埋伏。

我们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蔽，可以迅速获得敌人行动的情报，又可以机密地封锁自己的军情。

我们的将领和士兵，对于各处的地理和地形都十分熟悉。

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手持梭镖的儿童，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实有其事。抗战时期，中国已经无兵可战，连正在贪玩年龄的儿童，也不得不卷入战争。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小哨兵》，这样写道：

壮丁不够的乡村，在路上放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拿着刀矛，固执地检查路人，一定要看到你的路条毫无问题的时候，才放你走。”“北方的小溪流，冬天都结了冰。手持刀矛的小哨兵，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在溪流里滑冰，有了行人来，他们马上走上来。

卡尔逊回国后也写了一本书，记录他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观感，但是远远不如周立波写得好。

八路军的徒弟卡尔逊是美国“二战”历史中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决心成立一支游击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任命他为第二近战营上校营长，运用在中国学到的游击战，无限度地接近敌人，然后突然袭击，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卡尔逊依靠这种在中国学来的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江湖绿林战法，取得了一连串让人吃惊的战果，所以这支部队被美国人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

卡尔逊最著名的战例是奇袭马金岛，马金岛其实是一场佯攻，目的是让守岛日军把瓜岛的日军调过来，以便取得瓜岛反攻战的胜利。卡尔逊带着他的营先乘坐潜艇，偷偷潜上马金岛，然后突然袭击，直取日军指挥部，炸毁军事设施，当瓜岛的大批日军赶来时，卡尔逊的营突然消失了，他们返回潜艇，沉在水下。在这次奇袭中，卡尔逊运用的都是八路军的战法。准确地说，这只是八路军游击战的皮毛，但是美国人就依靠这点皮毛打胜了。

奇袭马金岛后来被拍成一部叫作《工合》的电影，其实就是工农合作的意思，卡尔逊一知半解地把工农合作叫作

“工合”，而美国人也以为“工合”的意思就是游击战。

如果美国人觉得奇袭马金岛值得拍成电影，那么中国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中，值得拍成电影的太多了，只是我们那时候的中国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里有心思和设备拍电影。

卡尔逊以后还参加了塔拉瓦岛、塞班岛、硫磺岛的登陆战，“卡尔逊的近战兵”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后来，他被提升为准将。

八路军的战法这么好，自然是不缺徒弟的，美国人学，日本人也学，可是美国人学成功了，日本人却失败了。

日本人败在生搬硬套，败在他们的榆木疙瘩脑壳。

跟着八路军学游击战的是日军 59 师团，这个师团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师团部设在山东。1942 年，日军以在中国的独立混成第 10 旅团和在日本国内的留守第 1 师团为基干组建第 59 师团。

59 师团有一个独立讨伐大队，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准备以游击对付游击。他们觉得研究成熟后，就出动便衣队去根据地寻找八路军，这群便衣队衣衫褴褛，冒充拾粪老汉，却每人顶着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八路军一看这副打扮，打！便衣队几乎被全歼。

那时候的日军便衣队经常冒充根据地的老百姓，有的还冒充八路军。我们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中都能看到。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是在接下来的百团大战中发挥出色。

“三枪八路”

百团大战，最是从井陉煤矿开始的。

山西是煤矿储存大省，1937 年 8 月，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一个月，板垣征四郎率领第五师团就沿着太行八陉偷袭山西，进攻大同。晋绥军与日军激战，无法抵挡日军飞机、坦克的强大攻势，晋北重镇大同失守。

大同失守后，日军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

彭家集是当年为日军在大同煤矿挖煤的劳工。他出生在河南固始，日军占领了固始后，就哄骗他们说，要修铁路，给工钱，他就和同村庄的 18 名少年报了名，“那时候，等在村子里就是死，没有吃的，不去就不能活命。”

报名后，日军就把他们拉到了一千里外的大同，下井挖煤。不但不给工钱，而且不能吃饱，经常遭受毒打。

18 名乡党都死在了矿井里，活着的只剩下了彭家集一个人。

在大同煤矿里，彭家集的工作是端着铁锹给推车里装煤，一铁锹煤有十几斤重，动作稍微慢一点，就遭到监工的鞭打，每天天没有亮就下矿井，出来的时候已经满天星星，躺在地上浑身疼痛，连一步也迈不动。

当年，大同煤矿的矿工成千上万，操着不同的口音，后来据资料记载，矿工们来源于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因为大同煤矿储量丰富，而大同本地的人难以满足日军贪婪的胃口。

彭家集至今还能记得，有一年夏天，因为空气污染，环境恶劣，大同煤矿开始蔓延传染病，矿工身上长满黑黄色的脓包，正在干活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日军挖掘了一个大坑，把那些他们认为有病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统统推进了大坑里，然后浇上汽油烧死，哀号声通宵达旦。当年的报纸登载，仅一次烧死的劳工就有 2000 人。

20 年后，大同农村战天斗地改造梯田，翻出了一具具白骨，这就是以后资料中所说的“万人坑”。日军在抗战时期，仅仅在大同煤矿，被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达到 15 万人。

在日军的眼中，中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中国人是给他们创造财富的工具。日军的眼中只有能够带来巨额财富的，能够让战争机器运转的煤炭。普通的日本士兵是这样，日本的将领也是这样。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据说在此地西面，隔着中条山脉的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高原一带有大煤田，储藏量在 2000 亿吨以上。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缺点是离海远，但其储藏量极为丰富，而且和日本煤矿比，第一，绝对不进水，不需要排水设备，坑口是个简单的斜坡；第二，绝对不会发生瓦斯爆炸等事故；第三，煤层坚实，不需要坑木。

冈村宁次说大同煤矿的煤炭距离大海远，这是为了将煤炭走海路运往日本的。

日军在山西各处疯狂挖掘，为了防止八路军偷袭，日军进行了防范措施。冈村宁次写道：在场地周围圈上大围墙、铁丝网等，并设置枪眼；在外围冲要设置据点，昼夜警卫；警卫队员一般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仍用华人，以当地退伍的日本兵为骨干。

这里所说的场地，就是煤矿。

日军占领下的煤矿惨无人道，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残害致死。

这些苦难的劳工，每天都等待着八路军来解救。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最初叫作破袭战，战役的重点是破坏日军的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和同蒲铁路（大同一

蒲州)，本来，主战场在山西境内，然而百团大战的第一声枪响，却在井陉煤矿响起，井陉煤矿在河北。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自抗战八年来对日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作战。

当时，种种因素促使八路军不得不打这一仗。

南岳会议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纲领是不再进行新的战略进攻，全力巩固已有的占领区。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说，此时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在后方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日军不断给后方增兵，建立碉堡，扩大占领区，《彭德怀自述》中说：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由于日军的力量增强，八路军的生活越来越困难，1939年八路军全盛期，建立了20个抗日根据地，仅仅山东根据地一处，就下辖96个县，人口1350万人。而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大片根据地被日军割裂蚕食，八路军手中的县城只剩下

了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那时候，日伪军广泛渗入了八路军的根据地里，有时候一天都能遇到好几拨日伪军，八路军的生存随时遇到威胁和挑战。

这种情况打不打？当然要打！

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党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日军的“囚笼政策”给八路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战斗一开始，日军沿着铁路和公路快速增兵，武器占有绝对劣势的八路军不得不退出战斗，看着到嘴边的肥肉让狗吃了，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徒唤奈何。

外公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们侦察到山西繁峙县的一座日军碉堡里只有 20 个鬼子和伪军，就决

定端掉这座碉堡。夜晚，一连八路军悄悄潜行到了碉堡外，准备攻击。碉堡里有一个给日伪军做饭的厨师，是繁峙当地人，这个厨师每隔几天就要出来买菜买肉，八路军的交通员做好了这名厨师的工作，让他做内应。外公说，如果没有内应，一连八路军手持手枪和步枪是绝对打不下日军的碉堡的，即使碉堡里只有日军一个班。

碉堡到底是什么样子？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区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

现在看看，没有重武器和内应，别说八路军攻下碉堡，就连水沟都过不去。

那天晚上漆黑一团，八路军来到了碉堡外面埋伏，静候内应出现。半夜的时候，内应悄悄打开了碉堡门，放下了吊桥，八路军一拥而上，冲向碉堡。

然而，就当一部分八路军冲进碉堡的时候，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发现了，鸣枪报警。一百多名八路军不得不分成两拨，一拨对着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射击，一拨清理碉堡里的日军。

碉堡院子里的日军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然而，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架起机枪，对着八路军疯狂扫射。碉堡外的八路军无法通过吊桥进入碉堡，碉堡里的八路军也无法通过吊桥走出碉堡。一挺机枪让八路军束手无策，一挺机枪打得八路军抬不起头来。

一挺机枪倒也罢了，等你打完子弹，八路军就会要了你的小命。然而，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远处响起了日军汽车的引擎声，雪亮的灯光照着碉堡，日军的援兵开着汽车顺着公路赶来了。八路军危在旦夕。

后来，八路军搜集了所有的手榴弹，堆放在一起，才将日军的哨兵炸死了，也将碉堡顶掀翻了，而八路军也有多人被炸伤。

八路军冲出碉堡后，日军的援兵已经赶到了，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八路军且战且走，外公突然感到手掌火辣辣地疼痛，一看，一颗三八大盖子弹击穿了他的手掌。

八路军的营连一级都没有医务人员。外公按照农村的土方子，抓把黄土按在枪眼上，止住了血，然后用布片包扎，跟着战友撤退了。这场不成功的战斗，坏就坏在日军的援兵，坏在鬼子畅达的交通线。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很需要破袭他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

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炮。

八路军很穷，不但没水喝，而且连装水的坛子都没有。

八路军的兵工厂那时候资源奇缺，而技术人才都是大学里的爱国流亡学生和南洋归来的华侨，工人则是乡间的铁匠，地址就在人烟稀少的山洞里。兵工厂当初不会造枪，只能对损坏的枪支修一修，后来，随着八路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武器严重不够用，一个班上战场，只有三四杆步枪，其余的十几个人拿着大刀长矛，依靠缴获日军的武器是完全不现实的，歌曲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是为了表达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八路军几乎每夺取日军一杆步枪，都要搭上好几条人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兵工厂只能开始制造武器。1939年冬季，当德国的兵工厂里生产出了飞机和潜艇的时候，当日军的兵工厂里坦克源源不断地开往中国战场，当美国一艘艘航空母舰从兵工厂里下水的时候，中国的八路军兵工厂里才生产出了第一杆

步枪。当年，朱德刚好 55 岁，这杆步枪就被命名为五五式步枪。

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设在黄崖洞，黄崖洞在山西黎城县，从两山之间的夹缝进去，在悬崖峭壁的背后就是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八路军的第一杆步枪就是这里生产的，等到抗战后期，这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迫击炮了。

外公说，八路军当年打扫战场的时候，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东西，甚至连弹壳也捡拾，把弹壳送给兵工厂，装上炸药，下次还能用。

很长时间里，我对外公口中的日军表示怀疑。我怀疑日军的作战能力，因为在影视剧中，日军都是不堪一击的。

长大后我才知道，外公的讲述是真实的。

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毫无疑问是很强的，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兼之有武士道的洗脑，把一个个士兵锻造成了战争机器。中国的士兵中，95%以上都是文盲，我在采访抗战老兵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日本的士兵中，可能没有文盲，因为当年每个日本士兵都有一本《步兵操典》，每个华北日军都有一本冈村宁次编写的《剿共指

南》，战后每个日本士兵都能写出回忆录，他们的回忆录中逻辑清晰。有文化和没文化，在战场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有文化的人能够进行归纳总结，情报搜集，信息传递，而没文化的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

日军普遍枪法很准，抬枪就打，不用瞄准，就能击中目标，这是用子弹喂出来的。每一个日军在上战场前，已经打过了至少三百发子弹。中国士兵上战场前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摸过，当兵后有限地供应子弹，尤其是八路军，一杆步枪只能发到几粒子弹，没有子弹，又怎么能训练出神枪手？

李宗仁就曾经说过：“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以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抗日将领宋希濂将军也说过，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八个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杆步枪，就能够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行动。

一直到抗战末期，日军的战斗力依然令人畏惧。松山战

役、腾冲战役，国军都是以集团军几万人的兵力进攻日军大队千人的编制，国军伤亡近万人，日军伤亡千人，伤亡比高达 10：1。而且，此时国军的武器比起抗战之初已经大大提高。

很多老兵说，日军把八路军叫三枪八路。八路军一支步枪一般只有四发子弹，伏击日军的时候，打过三枪，就一定要发起冲锋，和日军拼刺刀。能够拼过日军，就不开枪；如果拼不过日军，就用枪里仅剩的最后一颗子弹对着日军射击。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用极为简陋的武器，要与日军厮杀，其惨烈和悲壮是可想而知的。

夜袭井陉煤矿

1940 年的春天和夏天，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八路军在平原上步步后退。日军像奔跑过快的马车，成为了强弩之末；八路军像压缩的弹簧，蓄满了力量。日军正在得意忘形连战连捷的时候，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罩了下来。

《孙子兵法》有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广筑碉堡，每个碉堡安插着几十个人，坚硬的碉堡对于八路军手中的枪支来说，看起来好像坚不可破，实际上，碉堡让日军兵力分散，狭窄逼仄的碉堡里是日军的天下，而广阔的碉堡之外，是八路军的天下。

日军修建碉堡，等于作茧自缚。

彭德怀看出来，这是一个反击的好时机。

《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 7 月上旬开始准备，8 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 22 个团（晋察冀十个团，129 师八个团，120 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

但是，后来，谁也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会越打越大，刚开始本来只想动员 22 个团，没有想到参加的部队越来越多。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抗战激情极为高涨，大家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压和封锁，只要听说哪里打仗，没有接到命令的部队也去参与，最后变成了 105 个团和日军作战。

105 个团，有多少人？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八路军》一书介绍，当时的参战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有 27 万人。这些团有大有小，大的五六千人，小的只有几百人。

1940 年 8 月 20 日夜，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战斗打响了。

这天晚上，八路军的 22 个团一齐动手袭击日军，作战任务是破坏日军的铁路和公路，拔掉日军的据点。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在河北境内，刘伯承、邓小平的 129 师既有河北又有山西，贺龙、关向应的 120 师在山西境内。22 个团一字摆开，目的就是要让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彻底陷入瘫痪。晋察冀军区，是 115 师一部班底发展起来的，另一部班底跟着罗荣桓去了山东，师长林彪此时在苏联养伤。

此前，日军已经察觉到了八路军在集结，在调动，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日军还以为八路军集结的目的，是为了进攻国军。这些在后方维持治安的日军，简直愚蠢到家。

按照时间来计算，井陉煤矿战斗应该是百团大战的揭幕战，井陉煤矿靠近正太铁路，要破坏铁路，必须拔掉这座驻有日军的煤矿。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战斗的规模会有多大，谁也没有想到这次 22 个团的破袭竟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连锁反应。

东王村是石家庄市井陉煤矿边的一座村庄，李伯力在这里生活了 80 多年。

李伯力说，那天晚上，大概是半夜时候，突然就响起了枪炮声，他一骨碌爬起来，隔着窗户向外望去，看到天空都是红的，枪声像爆炒黄豆一样，一直响到了天亮。他吓得缩在墙角，想看又不敢看。村子里的人都睡醒了，但是没有人敢走出门，没有人敢点灯，害怕灯光会引来枪子。天亮后，枪声停歇了，有一队队扛着枪的八路军走过来，大家很高兴，开了门去迎接八路军。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军队。问他们鬼子呢？八路军笑着说，都打死了。

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杨成武。

杨成武是一名异常骁勇善战的将领。长征路上驰名全军的红四团是开路先锋，杨成武在该团担任政委，团长王开湘。抗战开始，杨成武任八路军 115 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捷。

杨成武最为人熟知的，是 1939 年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时，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杨成武指挥大小战数十次，每次都精彩纷呈。

井陘煤矿战斗，在杨成武的战斗生涯中又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8月20日夜晩，杨成武带着袭击部队来到煤矿外围时，看到日军毫无察觉，日军根本就不会想到，在这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死神张开了有力的羽翼，向他们扑来。

后来的史料记载，战斗是在当天夜晚10时打响的。三颗红色信号弹突然升空，矿区里一片漆黑。守卫煤矿的日军哨兵正在举头望明月时，八路军的枪弹就扫了过去，日军哨兵迫不得已倒了下去，一个个低头思故乡。

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

就在井陘煤矿爆炸声响成一片的时候，129师接近了寿阳以南的车站和据点，120师也潜伏在了榆次的日军据点周围。

李伯力说，八路军是抬着梯子爬上了电线杆，将电线剪断的。矿区里一片黑暗，八路军就冲了进去。冲到高墙边时，

攻不进去了，因为高墙上架着电网，这个电是发电机的电，防止矿工翻墙逃跑。八路军用破开的篮球裹着铡刀把，砍向电网。电网被砍断后，八路军就翻墙进去了。煤矿的四个角各有一个碉堡，八路军很快就攻了下来，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大碉堡，八路军攻打的时候费了力气，因为没有重武器，日军的射击孔又非常小，里面能望到外面，外面望不到里面。八路军组织人去爆破，一个人上去了，还没有接近碉堡，就牺牲了；再一个人上去，又牺牲了。在这个碉堡外面，牺牲的八路军最少有几十个人。后来，终于有人接近了碉堡，把碉堡炸开了，八路军冒着日军的机枪子弹，冲进了碉堡，全歼了日军。

经过一夜的激战，井陉煤矿被占领了。当时，井陉煤矿里有 3000 名矿工，大家平时受够了日本人的气，八路军攻打日军的时候，有一些大胆的就帮助八路军，挖掘壕沟，设置掩体。碉堡被攻破后，矿工们用刀把每一具日军的尸体都砍得稀巴烂。

战斗结束后，有很多矿工参加了八路军。

当时，八路军将日军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捣毁了，然后放水淹没了矿井。对于已经开采出来的堆积如山的煤炭，搬又搬不走，又不能留给日军，八路军就把煤油倒上去，放火点

燃，据说，大火一直燃烧了半个月。

到了中午，八路军要撤退，很多人想不通，我们占领了煤矿，为什么又要走？这一走，日本人又来了，那何必打这一仗？聂荣臻亲自打来电话，做这些战士的思想工作，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占领煤矿，而是消灭敌人，这里的敌人没有了，换个地方，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去哪里。杨成武也给战士做工作，游击战就是这个样子，要赶紧走。

后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报告中称：正太路破坏极为严重，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当时，负责华北战场的是日军第1军，第1军司令官叫筱冢义男，这个老鬼子的名字在电视剧《亮剑》中多次出现过。

筱冢义男对八路军的突袭反应异常迟钝。8月21日凌晨，第1军司令部就接到了八路军多处袭击的报告。而一直到中午，司令官筱冢义男才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然而，他们又能有什么对策，八路军四面开花，正太线上，无处不激战，无战不惨烈，唯一的对策就只能是速派援兵。可是，日军在后方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又哪里会有兵力可派。在漫长而重要的正太线上，日军只部署了第4、第8、第9这

三个残缺不全的独立混成旅团，兵力不到 4000 人。

当日，筱冢义男拼凑起了一支援兵，包括第 1 军的卫生兵，一共 40 个人。这 40 个人驰援寿阳，没想到很快就被击毙，没有一个回到司令部。

直到现在，昏庸无能的筱冢义男才明白，八路军要打大仗了。

8 月 20 日这天晚上，八路军 22 个团几乎同时开战，都取得了辉煌战果，而井陉煤矿之所以被人们记住并经常提起，有两个原因：一是百团大战的揭幕战，一是此战救起了两名日本小姑娘。

井陉煤矿的一座碉堡被攻破后，八路军冲进碉堡，打开手电筒，看到日军的死尸中，还躺着一个穿和服的女子，女子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完全被吓傻了，神情木然，没有哭也没有闹。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井陉车站副站长，倒在地上的一堆死尸中，就有她的父母。

而碉堡里，还有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孩，是这个小女孩的妹妹。

八路军战士将这两个小女孩抱出来，交给营长，营长又交给团长，最后一级一级地交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的

手中。

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落款是8月22日，而信中所说的石家庄是日军的指挥部。聂荣臻在信件中说明了两个小女孩的来历，并控诉了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

那个小女孩后来死亡了，大孩子现在还健在，她名叫美穗子，多次来到中国，每次来的时候，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情，就泪流满面，感激不已。

外公可能参加了 8 月 20 日夜晚开始的那场破袭战，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15 年，我不知道他所属的部队，也许他从来没有给我说过，也许说过，但是我忘记了。那时候我还小，整天缠着外公给我讲打仗的故事，我只关注战场中的激烈场面，而对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都不感兴趣。

外公说他在山西打过鬼子，还打过煤矿，但是不是井陉煤矿，我不知道。

外公说过，他们没有见过电灯，打下煤矿后，战士们围着电灯泡看稀奇，有人用电灯泡点旱烟锅子，有人嘴巴对着电灯泡想吹灭。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外公的家乡架了电线，有了电灯，人们有说有笑，围成一圈，开心得不得了。外公说：“我见过电灯。”村里人说：“你吹牛吧，我们都是第一次见电灯，你个破老汉咋能见过呢？”这件事情我记忆特别深刻。

外公说过他们破坏敌人通信设施的事情。第一次看到电线杆子和电线，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但是连长让破坏，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名战士爬到电线杆上，手刚摸到电线，就掉了下来。后来，营长来了，营长说电线是铁的，拽是拽不断的，只能用钳子剪断。钳子的把手有橡胶皮，能够阻隔电，这样才打不死人。

刚开始战士们只是剪断电线，然后就离开了。但是日本人很快就接好了。营长就说，这样不行，剪短了电线要带走，我们要用，把电线杆弄坏。那时候的电线杆都是木头的，八路军战士剪断了电线后，就砍断电线杆，或者架火点燃了。

外公说，那时候破坏铁路，对于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八路军来说，难度太大了。亮铮铮的铁轨一直铺到了遥远的地方，下面是整齐排列的枕木，枕木和铁轨连接在一起，要拆开根本不可能。战士们抱起大石头砸铁轨，石头开裂了，而铁轨连个印痕都没有。铁轨砸不开，那就先拆开枕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枕木下面的石子清理干净，卸下枕木，而铁轨还连在一起。后来，来了一个有文化的八路军，他拿来扳子，给大家示范说，找到铁轨有缝隙的地方，下面就有螺丝，只要把螺丝拧开，铁轨就能拆下来。八路军这才知道了窍门。

八路军战士把铁轨拆得横七竖八地摆在路边，架火烧着了枕木，远处据点的日军想来增援，但是一出据点就遭到伏击。破坏铁路和袭击日军的据点都是同时进行的。

八路军战士要离开了，营长来了，营长说，这些铁轨都是好钢材啊，不能丢掉，带回去能给我们造手榴弹和炮弹。

那时候八路军没有大炮，国军的大炮也极少。八路军手中只有缴获日军的少量迫击炮，但是炮弹也少得可怜。

游击队里有土炮，八路军需要攻坚战的时候，游击队就抬着土炮支援了。土炮是把老碗口粗的结实松木，一锯两半，中间掏空，然后用铁丝紧紧箍在一起。打仗的时候，给炮管里装上铁砂、铁钉甚至瓷片一类的尖利物品，点燃火药，前面的铁砂、铁钉、瓷片就会喷出去。土炮对日军的杀伤力很大，远远超过了枪支。枪子打过去，只能留一个弹伤，但是土炮轰过去，日军全身都是伤口，每个伤口里都是铁砂、铁钉和碎瓷片，每个伤口都在淌血，土炮把日军打成了马蜂窝，日军军医在杀猪一样的号叫声中，需要耐心仔细地一个个剔除伤口里的碎片，往往还没有剔除干净，日军伤兵要么流血身亡，要么疼痛而死。

土炮威力巨大，但是对日军的炮楼无法构成威胁。土炮发射的铁砂、铁钉打在炮楼的墙壁上，炮楼浑然无绝。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每攻下一座炮楼都要花费很大力气。

对付炮楼，只能用炸药包轰炸，而要轰炸，八路军又无法接近炮楼，怎么办？八路军就发明了土坦克。

土坦克，就是把松木板钉成长三米，宽一米半的床板，上面蒙上厚厚的棉被，棉被被水浸湿。攻打炮楼的时候，两个八路军爆破手藏在土坦克下，胸前挂着炸药包，双手举着湿漉漉的床板，一步步接近炮楼，日军的子弹打不着床板

下的八路军，打在湿漉漉的棉被上，吱吱作响，但无法穿透厚厚的松木床板。为了避免日军投掷手雷、手榴弹轰炸土坦克，八路军神枪手和机枪一直瞄准炮楼的射击孔，只要日军一露头，子弹就飞过去。土坦克到了炮楼下，如果爆破手还活着，就在炮楼下挖一个洞，把炸药包放进去，轰炸炮楼。

然而，在日军严密的防守和交叉火力中，土坦克一般很难抵近炮楼。

八路军又发明了土飞机。

日军是野炮、坦克、飞机，八路军是土炮、土坦克、土飞机。八路军实在太穷了，打仗的时候，每杆步枪才能配发四颗子弹。

因为八路军太穷太土，日军就叫八路军为“土八路”。

八路军的土飞机是让日军坐的。

攻打炮楼的时候，八路军无法接近，就在炮楼外的壕沟里向炮楼的方向挖，日军也很聪明，八路军从外向里挖，他们就从上往下挖，准备截断八路军的地道。为了引开日军的注意力，八路军一般都会挖两条地道，一个是明道，一个是暗道。明道是故意让日军看的，暗道才是进攻的通道。暗道挖到了炮楼下面，八路军就把火药堆在一起，一声巨响，炮

楼被炸塌了。这就是土飞机，让日军坐的土飞机。

那时候八路军没有炸药，都是火药，自己熬制的火药，威力不足，每炸一座炮楼都需要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火药。

一座炮楼，可以有几十个人把守，往往只有几个十几个日军，剩下的都是伪军。伪军在日军的驱使和淫威下，不敢有任何反抗，只能逆来顺受。

与八路军作战的，有日军，也有伪军。

有时候，八路军抓住伪军的特点，能够成功地策反伪军，这样的事例在抗战中很多。

八路军老兵说，有时候在激战间歇，八路军就展开了政治攻势，他们对着伪军喊：“都是中国人，过来吧，一起打鬼子。”伪军喊：“不能说，皇军就在跟前呢。”八路军喊：“什么皇军，是鬼子！”伪军不吭声了，八路军接着喊：“什么时候想通了就过来，随时欢迎。”八路军和伪军互相喊话，日军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后来，伪军果然就悄悄投诚了。

一门山炮建奇功

即使炮楼里日军人数稀少，但是八路军仍然难以攻破，因为没有重型武器。

8月20日的破袭战中，八路军129师终于拥有了一门山炮。

缴获这门山炮的，是129师新七旅旅长易良品。

易良品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易良品担任772团团长。那时候刘伯承是师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浴血西征，能够活下来的多不容易啊，哪一个不是百炼成钢？而能够在这群威猛之士中担任团长，就知道易良品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772团团长易良品，特别骁勇善战，人称“夜老虎”。

百团大战开始的时候，易良品已经由 772 团团长升为新七旅旅长。

这天晚上，八路军袭击了河北省故城县西高村附近的一座炮楼，炮楼里的日军求救，驻守德州的日军赶来增援，增援的有几百人，更有一门高头大马拉着的野炮。而那时候，八路军连野炮都没有见过。

日军增援心切，没有派出警戒哨，就急急赶来，他们经过西高村的时候，遭到了易良品新七旅的伏击。激战过后，日军逃跑了。

战场上留下了一门野炮和六发炮弹，拉炮的高头大马被打死了。

八路军战士围着这门野炮，左看看右看看，稀奇得不得了，他们都知道这门大炮肯定威力巨大，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操作。

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从来都是轻装上阵，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机动灵活，来去如风，没有重武器，即使有重武器也没法带。大家围着这门崭新铮亮的野炮，犯难了。带吧，没法带走，也没人会用；炸掉吧，又心有不甘，觉得可惜。

易良品和后方兵工厂取得联系，兵工厂派去了从南洋来

的技术人员，将野炮拆开，涂上凡士林油，用白布小心地包裹，然后装在马车上，拉到深山里掩埋了，一同掩埋的还有六发炮弹。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别人忘记了，连易良品也忘记了。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希特勒着手实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预计投入 4000 辆坦克，5 万门大炮和 5000 架飞机。还是在这一个月，德国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开始了，双方互相击落的飞机就有 3000 架。而八路军 129 师别说飞机和坦克，连野战炮也才开始拥有。

这就是装备的差距。

一年后，八路军在河北省清河县到南宫县（注：南宫 1986 年 3 月 5 日由县改市）的一条日军交通线上展开破袭。

那条公路长达 50 里，是一条交通要道，日军在公路两边建造了 16 个碉堡，像钉子一样钉在公路上，阻拦八路军的通行。日军的“囚笼战术”，就是要用碉堡和公路困死八路军，限制八路军的活动，让八路军在穷困的山中冻死、饿死。

这些碉堡里驻扎着伪军两个团和部分日军。其中，最大、

最坚固的碉堡，建在当时的南宫县马古庄附近。这个碉堡里有 30 多名日军和 300 多名伪军。



易良品

房宽宝是河北南宫马古庄人，他说日军当初为修建那座碉堡，从附近的村庄抓了几百个劳力，修建了半年时间。碉堡的围墙是双层，两面用青砖砌成的墙壁，墙壁里面填充的是炭渣和瓷片。所谓的炭渣，就是农村烧煤后留下的残渣，异常坚硬；所谓瓷片，就是盆盆罐罐打碎后的残片，同样很坚硬。将这些东西捣碎后填充进墙壁中，墙壁就会坚硬如石。

房宽宝见到了八路军的那次破袭，而攻打那座碉堡的，正是易良品的新七旅。

房宽宝说，1941年7月的一天黄昏，村庄外突然开来了很多八路军，统一的灰军装，肩上扛着步枪，大家都很兴奋。以前，村子里也有过游击队，游击队人数很少，三三两两，穿的衣服也和农民一样，头上包着白头巾，而八路军统一戴着灰色的有檐帽，看起来非常精神。

一名八路军走进了房宽宝家，告诉他们说，夜晚不要出来，尤其是管好孩子，不要乱跑。那名八路军战士走后，房宽宝的父亲悄声说，可能要打仗了。这时候，八路军已经把村外的日军碉堡包围了。

果然打仗了。天黑后不久，村外的公路上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房宽宝和哥哥趴在窗口向外望，看到远处的枪子像萤火虫一样飞舞，有的向左边飞，有的向右边飞。枪声一下一下响的，那是步枪；枪声连成一片的，那是机枪。房宽宝说，当时看得既害怕又紧张。

枪声响了一夜，由于八路军缺乏重武器，无法攻克这座坚固的碉堡。

天亮后，枪声停了，八路军撤了下来。有一小支队伍经

过了房宽宝家门前，他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汗水和尘土，有一个八路军战士腿脚负伤了，用绷带扎着大腿，一个八路军战士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向后走。

这支八路军，就是易良品的军队。

易良品攻击了一夜，没有攻克，只好将碉堡围了起来。天亮后，日军居高临下，能见度高，对进攻的八路军极为不利。

旅部召开会议，研究攻取碉堡的办法，大家都一筹莫展。突然，易良品想起了一年前百团大战刚刚开始时，缴获又掩埋的那尊大炮，如果有大炮，何愁碉堡不能攻克。大家一致认为，刨出大炮，用炮攻。

房宽宝说，南宫到故城有一百多里，那尊大炮埋在故城，没有在南宫，八路军在村子里征集了两头骡子和一头毛驴，三个八路军骑着奔向故城。那时候，农村里很少有马，仅有的马匹也被日本人征用了。

两头骡子和一头毛驴气喘吁吁地奔到了一年前掩埋山炮的那个地方，三个八路军战士将大炮挖了出来，又从附近的村庄找到两辆架子车，将这些还涂着凡士林裹着白布的山炮炮架、炮筒和炮轮、炮弹抬上架子车，拉到了南宫境内的

兵工厂。这个八路军的小型兵工厂，名为兵工厂，实际上只能做一下枪械修理和子弹再造的初级技术活。所谓的子弹再造，就是给八路军捡拾回来的弹壳里装上火药或者土制炸药，再造一颗子弹。

山炮很快就组装完毕。两头骡子拉着山炮，后面跟着毛驴，两边走着八路军，这支世界上最奇特的炮兵部队，一路浩浩荡荡地杀奔而来。

野战山炮闪亮登场。

山炮来到了新七旅，八路军像看新媳妇一样，满怀热情地围上来，他们看看山炮，又看看远处高耸巍峨的碉堡，不敢相信这玩意能够轰开碉堡。

易良品亲自指挥轰击，能够熟练使用迫击炮的炮手第一次操作山炮，有些紧张，炮弹打高了。炮弹带着凌厉的呼啸声，掠过碉堡的上空，在距离碉堡 100 多米远的空地上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地动山摇，飞溅而起的泥土比碉堡还高。即使在几公里外，也能听到这声山炮的怒吼。碉堡里的日军和伪军完全被吓傻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八路军还有山炮，八路军怎么会有山炮呢？即使日军，山炮也是很少的。日军的山炮一般配置到师团一级，而独立混成旅团通常是没有山炮这样的重武器的。

八路军一共只有六发炮弹，现在仅剩五发了。

易良品让人将山炮推到距离碉堡 100 米的距离，抵近射击。碉堡里的日军和伪军看着对准他们的炮口，居然忘记了射击，有人还站在碉堡上看。

第二发炮弹出去了，碉堡上空浓烟滚滚。烟雾散尽后，碉堡只剩下了半边。

八路军欢声雷动，立刻发起攻击，冲进了碉堡里。碉堡里仅剩的日军和伪军都满脸乌黑，神情萎靡。日军负隅顽抗，全部被击毙，200 多名伪军全部举枪投降。

攻打了一夜的坚固碉堡，居然被一发炮弹轰塌了。

马古庄碉堡攻破后，八路军战士神采飞扬，欢呼雀跃，每个人都像过年一样兴奋。易良品让两匹骡子拉着山炮，沿着公路向前行进，战士们簇拥着山炮，像水浒中的阳谷县人民簇拥着打虎英雄武松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得意扬扬和喜气洋洋。咱老百姓啊，今儿呀么今儿个真高兴……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明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前面是八路军新七旅，后面是房宽宝和一大帮小孩子，他们要跟着八路军看山炮怎么轰碉堡。

山炮过来了，又遇到一座碉堡，在碉堡外苦苦攻打的是另一支八路军，他们围着山炮，疑惑地问：“这能行？就这么一个铁疙瘩，能轰开碉堡？”新七旅的炮兵得意地说：“你们看好了。”他麻利地装弹、瞄准、发射，一发炮弹过后，碉堡被轰开了半边。碉堡外的八路军异常惊讶，沉默片刻，立即大声呼叫着发起冲锋，碉堡里只剩下跪在地上求饶的敌人。

两个碉堡被攻破。现在只剩下三发炮弹，而碉堡还有 14 个。

野战山炮声惊天动地，声闻数里。八路军簇拥着大炮向前行走，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百姓。这种情景很多年后，房宽宝都能记得非常清楚。

房宽宝说，老百姓过去一直受日军的欺负，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抓起来，说你私通八路；看到有人家家境殷实，就要征粮交钱，如果不给，也说你私通八路，抓起来毒打，日本人那时候杀个人就像杀个鸡，青年人都争着去投八路，每回日本人来的时候，老人孩子跑不赢，被杀了很多。现在，八路军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大炮，所以老百姓感到扬眉吐气。

房宽宝还说，八路军为啥武器差，而战斗力强，因为八路都是自愿参加的。当了八路，家里就有地方上的人照顾，分了田分了粮，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打仗都不惜命。

碉堡里的伪军听到山炮声，魂飞魄散，有的碉堡上站着伪军，看到八路军把山炮支起来，炮管对准碉堡，赶紧开门投降。八路军优待俘虏，只要是投降了的伪军，都不会杀的。投诚了的伪军，先让吃一顿饱饭，愿意参加八路军的，双手欢迎；想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14 座碉堡，只有两个遭受了抵抗，这两个碉堡里有大量日军，八路军如法炮制，将两个碉堡里的日军全歼了。

新七旅仅仅用三天时间，帮助友邻部队拔掉了 16 座碉堡，而山炮炮弹还没有用完。

驻守邢台的日军听闻八路军拥有山炮，攻击犀利，大为震怒，立即调集重兵，前来报复。可是，等他们赶到南宫的时候，八路军和老百姓早就跑得没影了。

不久，易良品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是陈再道，政委是宋任穷。

百团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 129 师有九位野战旅长，易良品和陈赓、陈锡联都是旅长。后来授衔，陈赓是大将，陈锡联是上将，易良品如果没有牺牲，怎么说也会给一个中将。

日军一直寻找易良品，实施报复，但是八路军那时候化

整为零，在日军包围圈的缝隙穿插，日军次次都扑空。

一门山炮建奇功的易良品，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

1943年3月24日夜半，易良品带着军分区来到枣强县一个叫作杨庄的村子，黎明，日军包围了村庄。易良品组织军分区突围，激战中，一颗子弹穿腹而过。

警卫员背着易良品突出包围圈，来到了西高村，放在一家堡垒户的土炕上。军分区的医生被叫来了，但是，面对穿腹而过的伤口，医生束手无策，他一无器械，二无医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易良品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坚持了七天后牺牲。

5月22日，日军围攻南大马村，易良品的搭档、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夏祖盛也牺牲了。

我在《晋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战史》中看到，仅仅在这一年里，冀南军区牺牲的军分区干部还有：

2月20日，一分区参谋长郭好礼牺牲。

3月25日，二分区政委李忠牺牲。

5月25日，一分区参谋长郑前学牺牲。

8月30日，五分区司令赵义京、副司令陈耀元牺牲。

10月21日，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四分区政委袁鸿化牺牲。

老人们说，那些年，仗打得很惨，八路军是小部队，日军也是小部队。因为八路军武器不如日军，所以总是吃亏。

八路军武器不如日军，所以非常强调射击的精准度，八路军中产生了很多神枪手。

129师师长刘伯承曾指示：“要教地方部队爱护武器，要培养特等射手，造就一枪一敌的神枪手。麻雀战，除政治坚定、地形熟悉外，就靠射击准确。辽县刘二堂神枪手的故事，要到处宣传鼓励仿效。”

刘二堂是八路军中的一名神枪手，辽县就是今天的山西左权县。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

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八路军中还有一名神枪手叫吴德胜。2005 年第四期的《福建党史月刊》也登载了这个神枪手的事迹，他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一个人击毙日军 37 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1940 年，吴德胜来延安抗大学习，正碰到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吴德胜爬上一棵枣树，躲在枝叶后，对着俯冲的日军飞机瞄准，一枪击中油箱。毛泽东和朱德听说有这样一个神枪手，一枪就打下飞机，也赶来看望。

步枪打下飞机，并非不可能，关键是要具备两点，要么打中飞行员，要么打中油箱。

八路军的神枪手击毙的最大日军官职是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常宽治少将。射杀这名少将的，则是共和国开国少将彭清云，“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经救治过他。



彭清云

按照一些公开出版物的记载，八路军先后击毙了两任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一个是常宽治，一个是阿部规秀。独立混成第 2 旅团，谁当旅团长，谁就不得好死。

据记载，被八路军神枪手干掉的，还有日军 59 师团 53 旅团旅团长吉川资少将，他是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山东被八路军或者游击队的神枪手干掉的，然而，是谁干掉的，一

直没有记载。

曾经有一个“二战”狙击手的排行榜，前 50 名中，有 45 个都是苏联人，有一个是芬兰人，其余的是德国人和美国人。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有没有狙击手？

有记载说，1945 年 7 月，日军攻打山东高密，115 师 686 团 2 营 6 连战士张兴来，在十小时内，用 30 发子弹，击毙日军指挥官和机枪手 20 名。按照这样的频率计算，抗战时期，张兴来完全能够击毙日军 100 名而进入这个榜单的。

还有记载说，武汉会战的时候，曾经有一名国军神枪手，在三天之内，击毙日军 57 人，打伤 42 人。如果照这样计算，这名神枪手也完全能够进入这个榜单。

又有人说，在武汉会战中，一名国军神枪手击毙了 112 名日军。这个记录超过了《“二战”狙击手排行榜》中的后几个人。

可是，这个榜单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八路军没有，国军也没有。

我想，当年的中国军人中并不缺少神枪手，而缺少的是统计。很多神枪手射杀了大量日军后，而他自己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后来，我们称这些人为无名英雄。

今天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

不久，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而冀南是日军扫荡的重点。日军占领了冀南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为了困死八路军，他们除了建造大量的碉堡外，还挖掘了三米深的沟渠，筑起三米高的围墙，围墙和沟渠之内，可以行驶日军的汽车和摩托车，哪里有战事，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能赶到；而八路军陷入沟渠里和围墙中，活动会大大受到限制。就这样，日军以相距两三公里的碉堡为点，以封锁沟和封锁墙为线，把冀南平原划分成了各种小方块。如果站在高空中，就能看到日军把平原切割成了米字形、王字形、田字形、井字形等形状，每条线的交点都是碉堡，每座碉堡上的火力都能够覆盖所有的方块。白天，日军在碉堡上有瞭望哨，各条路上都设立了关卡，检查良民证，限制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活动；夜晚，碉堡上有探照灯，不停地转动着，照射着每条道路和每座村庄，监视八路军和

老百姓的活动。日军为了封锁八路军，可谓煞费苦心。

针对日军这种“囚笼战术”，八路军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挖我也挖，你修你的路，我修我的道。

房宽宝说，那些年只记得就是挖，日本人挖，八路军也挖；老百姓被迫给日本人挖，老百姓也主动给八路军挖。那时候华北能挖多长的路？房宽宝说，肯定比万里长城长。

日本人的沟渠把碉堡和碉堡连起来，围墙把村庄与村庄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方便他们的活动。八路军的道沟把日军的碉堡和碉堡孤立起来，把村庄和村庄连接起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日军要出碉堡，先要翻越深深的堑沟，重武器肯定就不能带上，你没有重武器了，八路军还怕你干什么？八路军在道沟里来去自如，能藏能打，能攻能守，形势有利，四面八方的八路军围聚而来，歼灭日军；形势不利，八路逃向四面八方，藏身村庄或地道，日军束手无策，大犍牛掉深井，有力使不上。日军的沟渠三米宽，三米深，是为了方便汽车和摩托车的行驶；八路军的道沟一米深，一米宽，而且拐来拐去，八路军猫着腰，一个跟着一个，可以在道沟里跑得飞快；日军的汽车开不进道沟，而摩托车侥幸进了道沟，也会因为拐来拐去而影响速度，变得比走路还慢。

那时候的冀南平原，变成了一道道迷宫，没有当地人引领，就算是数学家陈景润进来了，也走不出去。

除此之外，八路军和老百姓还发明了地道战，关于地道战，电影、书籍上已经讲了很多。

除了挖道沟，挖地道，八路军还引领老百姓改造村庄。日军能够砌围墙，八路军难道就不会砌围墙？八路军带着老百姓用高高的围墙把村庄围起来，只留一个窄窄的进出口，日军要进来，只能从这里过，别无他途。万一日军攻进来，八路军从地道转移。不但如此，整座村庄都被八路军改造成了军事要塞，每一座房屋都有射击孔，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里面对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你顺着胡同走进去，却发现胡同尽头是一个堡垒；你将房屋包围了，走进房间搜索，而八路军却顺着房顶迂回到了房屋外面，对你形成了反包围。

岗村宁村的囚笼战术是多年研究的结果，但是没有困死八路军。相反，八路军在囚笼战术中发展壮大。

在敌后战场上，伪军远远多于日军。

伪军是怎么来的？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投降的伪军都是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都是各派系的旧军

阎，我要求各军长、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 1942 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 1943 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当时，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有 40 万，其中华北部分就有 30 万。

伪军也出生在中国。

为了清除敌后战场八路军的威胁，以便抽出更多的兵力对付正面战场的国军和太平洋战场的美军，日伪军经常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但是八路军是鱼，人民群众是海，日伪军刚一出动，八路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八路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日军刚一出动，甚至日军还没有出动，八路军就知道了他们的行动。

这是为什么？

当年，八路军策反了很多伪军。

抗战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有很多专业名字，比如武工队、交通站、堡垒户，等等。武工队最重要的一条任务就是策反伪军，铲除汉奸；交通站是以店铺为掩护而传送情报的机构；堡垒户是绝对可靠的人家，八路军的重伤员一般都藏在他们家。

伪军中的很多人都出身贫苦，是被日军抓来的；也有些老伪军因为长官投降日军，自己身不由己当了伪军。

八路军对付伪军有一个很绝的方法。首先，八路军逐村登记了伪军的家庭，让伪属通过写信等方式劝导伪军，不当汉奸，不得罪人，不打抗日武装，一有机会就要离开日军。家中的情况被八路军摸得一清二楚，伪军还敢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吗？其次，八路军和武工队对伪军“上政治课”。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李向阳打下日军碉堡后，把伪军集合在一起说，今天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国际的形势是这样的，苏联红军怎么怎么样；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八路军怎么怎么样……我采访过的老武工队员说，给伪军上政治课都是在晚上，是在没有打下炮楼前上的。

武工队要给伪军上政治课了，事先对碉堡里伪军的情况一清二楚，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做过哪些好事和坏事……碉堡和八路军长期对峙，碉堡里的伪军又不会经常变动，八路军建立了广泛的伪军档案，对每一个伪军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伪军能不害怕吗？敢做坏事吗？

武工队想什么时候给伪军上课，就什么时候来。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来上课；心情不好，我还不来呢。上政治课都选择在夜晚。夜幕降临，武工队员提着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就

出发了，到了碉堡附近，所有枪口都对准碉堡的出口，然后宣传员对着碉堡上课。碉堡里面的敌人只要敢出来，黑暗中的子弹就飞过去了。而武工队埋伏在什么地方？碉堡里的敌人看不到。所以，敌人对八路军给他们上课，是毫无办法，你听也要听，不听也要听。

讲课内容更有意思，武工队员完全就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一样，讲一讲碉堡里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指名道姓地对碉堡里的伪军提出批评或者表扬。就像老师在班会进行总结报告一样，回顾一周来全班的各项工作，听到表扬的人兴高采烈，听到批评的人心存恐惧。武工队怎么会对碉堡里的事情了如指掌？当然是碉堡里有倾向八路军的人，这个人是谁？八路军当然不会说。

武工队在碉堡外喊，我们建立了你们每个人的花名册，你们做一件好事，我们就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就减一分。减到一定的分数，就要砍你们一条腿；继续做坏事，就要取你们的小命。碉堡里的伪军像挨训的学生一样，大气也不敢喘。

上政治课的时候，除了讲到具体的人和事，八路军还给伪军讲国际国内形势，这是伪军们最喜欢听的。伪军们被关在碉堡里，与世隔绝，完全不知道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他

们是聋子和瞎子。每逢八路军上政治课的时候，伪军们都凑近射击孔来听。日军呢？日军听不懂中国话，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铁皮喇叭在喊什么。再说，声音以每秒 340 米的速度传播，无孔不入，小日本的小手掌能够捂住这么多耳朵吗？

上政治课的次数多了，双方就产生了互动，老师的一言堂变成了师生的互问互答。武工队喊了半晚上，嗓子哑了，要回去，伪军还在碉堡里喊：“下次来给我们讲讲国际形势。”

老电影中总会有一句日军的台词：“八路的，狡猾狡猾的。”

八路军确实是非常“狡猾”的。

冈村宁次回忆道：“共军的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

冈村宁次在他的书籍中还痛心疾首地回忆起一场被八路军蒙骗的战斗：有一次，日军在碉堡里，看到远处来了一支送葬队伍，吹吹打打，很热闹。当队列行至碉堡旁时，日军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地放下吊桥，衣衫不整地走出碉堡，

乐哈哈地看着这支队伍。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日军队长应声倒毙，八路军随后冲入碉堡，将残军消灭。

抗战时期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任作战参谋的本政登士，在战后写过一本名叫《自卫队在前进》的书籍，他也提到了八路军假装送殡而歼灭日军的事例：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政登士在这本书中还写道，日军在抗战时期对八路军至少发动了几千次袭击，想要消灭八路军主力，但是收效甚微。他将八路军难以消灭的原因归结为，八路军和老百姓在

一起，兵就是民，民就是兵，根本分不清楚。

在敌后战场，日本人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找冈村宁次和本政登士所记述的这场战斗是哪场战斗。事实上，像这种运用智谋作战的战例，在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中经常会有。八路军不但把日军诱出碉堡进行歼灭，而且还会乔装打扮进入碉堡战斗。在一次乔装打扮进入碉堡战斗时，带队的居然是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易良品的顶头上司，手下有兵将十万人，十年后的共和国上将，此时却身涉险地，化装侦察，日本人打破脑袋也不会想到的。

陈再道奇袭的据点是河北省枣强县南部娄子镇据点，这个据点高大坚固，兵力充足，内有日军 30 多人，伪军上百人，伪警察十余人。八路军攻打多次，无法攻破。

娄子镇据点里生活着 150 名日伪军，这 150 名日伪军像 150 头猪一样吃喝拉撒，每天早晨都需要老百姓进去打扫卫生，担水送菜。有一天早晨，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率领十几个手枪排战士化装成老百姓进去了，事先已经和伪军队长联系好了，伪军队长带着陈再道来到了日军睡觉的房子里，手枪排一枪一个，将还在睡梦中的日军全部消灭了。

当时，陈再道是冀南军区司令员。

几年前，我偶然来到了冀南。在冀南，我先后到过清河、邢台、临西、平乡、巨鹿、武安、临泽、涉县等地方，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冀南敌后战场的深处，了解到了战争年代八路军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

冀南抗战时期，猛将如云。

司令陈再道刚猛异常，传说他每战必抡着大刀片冲上去，身先士卒，凶悍无比。气得徐向前多次警告他：“再打冲锋就毙了你。”陈再道除了刚勇，还极有智谋，经常化装侦察。有一天晚上，出外散步，在雪地上看到大量车辙印，觉察敌情，立即带领骑兵追击，步兵随后包抄，结果歼灭大量日伪军。

政委宋任穷，人称“咬牙政委”，因为在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他总是说：“咬咬牙就过去了。”抗战时期，宋任穷先后有过三个儿女都饿死病亡。老大刚生下来，窑洞落土，掉落到脐带，感染身亡；老二刚一岁的时候，遇到冀南日军扫荡，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结果饿死了；老三也是生下来寄养给老乡，饿死了。拥有十万兵力的冀南军区的政委连着饿死了两个孩子，可以看出当年的抗战有多么艰苦。

以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此时在冀南军区政

治部的组织部任副部长，后来升为部长。

前面写到的卡尔逊曾经来到过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刚好 129 师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也在冀南，而 129 师师部在山西辽县，也就是以后的左权县，卡尔逊问八路军首长一个问题：“你们的师部在山西，而前线在河北，如果发生了战事，怎么来得及请示？”徐向前笑着说：“我们的部队各自为战，交战前不需要请示，游击战和正规战是不同的，只要打胜仗，怎么都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卡尔逊深为折服。

老人们说，那时候八路军和百姓亲如一家，八路军刚来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穿得破破烂烂，连轻机枪都没有几挺，更何况重武器。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过装备精良的日本人？陈再道也知道八路军被人看不起，就带着骑兵队在村庄来回跑，几百匹战马，呼啸而来，马蹄嘚嘚，马鸣萧萧，卷起几丈高的尘土，非常威风，每到一个村庄，就号召大家参军打鬼子。陈再道这招很管用。老百姓一看，八路军兵强马壮，就踊跃报名参军。

八路军非常和气，到了百姓家中，扫院挑水，看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刚开始老百姓见到八路军还害怕，大姑娘小媳妇都躲起来，后来看到八路军一个个长得很精神，身体健

壮，人品又好，就把家中最好的房间让给八路军住。几天后，八路军要开拔了，老头老太太拉着八路军不让走。怎么了？要让八路军给自己家做上门女婿。

那时候村庄里养狗的人很多，而百团大战开始和以后的那几年，八路军都是夜间活动，老百姓担心狗叫声暴露了八路军的行踪，自发地把冀南的狗全部打死了。

冀南的老人们说，那些年，八路军的武工队和情报员向日军渗透，日军的情报员和铁杆汉奸也向八路军渗透。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八路军的情报员白天侦察，夜晚八路军突袭，因为八路军武器低劣；而日军的情报员夜晚侦察，日军悄悄行动，白天突然袭击，因为他们的武器占有绝对优势。

那时候的八路军一晚上都睡不了个安稳觉，刚睡着了，又突然起身转移，害怕被日军包围。外公曾经向我说过，他们最多的时候一夜转移了五个村子。

白天的冀南，风平浪静，而夜幕掩盖下的冀南，剑拔弩张。如果将夜幕突然揭开，一定能够看到双方的军队举目可及，却都在悄然前行。

娘子关战斗和东团堡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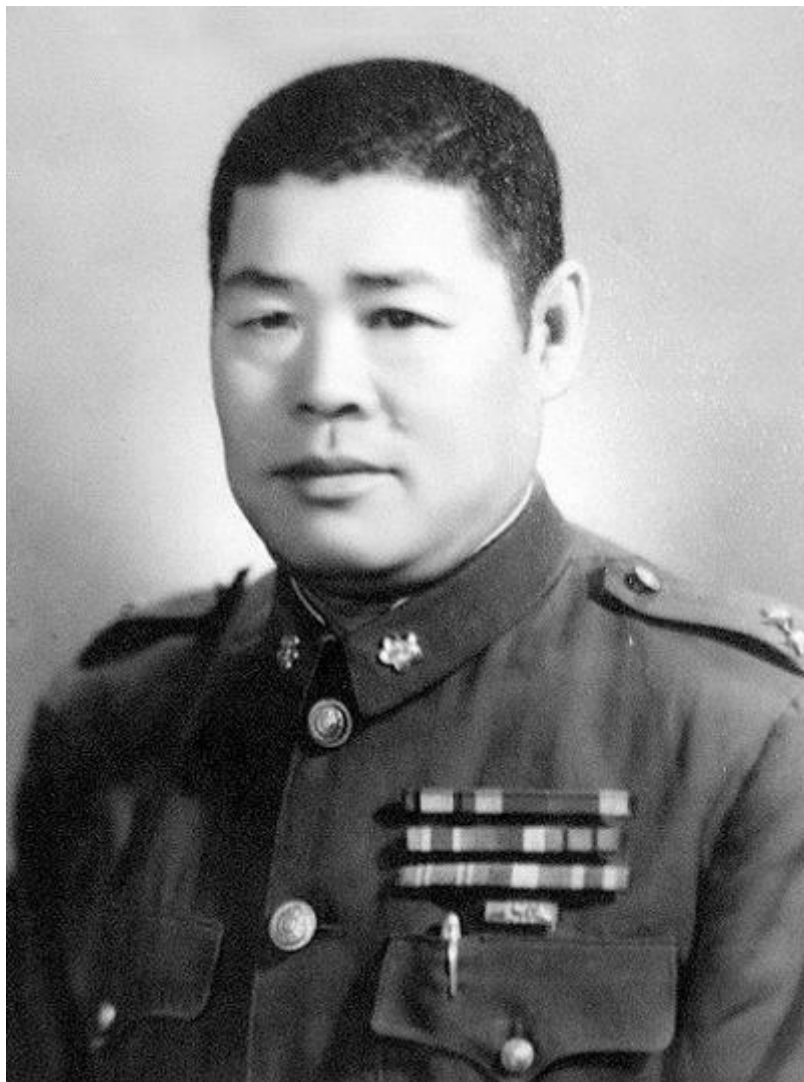
百团大战刚刚开始 的 1940 年 8 月 20 日夜晩，八路军杨成武部奇袭井陉煤矿，易良品部夺取日军野战山炮，八路军另一支部队陈祖林部夜袭娘子关。

陈祖林的这支部队叫作晋察冀边区第 5 团，他任团长。

娘子关是长城的第九个关口，扼守着正太路，易守难攻。三年前，十万晋绥军在这里与日军两个师团激战失败，被迫退出。日军占领娘子关后，依据崇山峻岭修建了四个堡垒，山下的村庄还驻扎有警备队和伪军。

原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王政柱在《百团大战始末》中说，百团大战前夕，彭德怀和左权在一起研究了好几个月，准备向日军发起一场进攻，因为正太路连接着山西和河北，是日军运输最繁忙的一条铁路，所以就选中了将正太路作为破袭

的对象。而娘子关是必须攻下来的一个据点。



孙连仲

当时，为了迷惑日军，八路军把一封书信丢在正太铁路上，这封书信是写给国军孙连仲部的，孙连仲是驻扎在华北的国军总指挥。日军的巡逻队捡到了这封书信，如获至宝，因为这封书信内容是八路军向国军严词抗议，并且说不惜武

力要决一死战。所以，当 1940 年 8 月，八路军集结兵力准备破袭正太路的时候，日军丝毫也不加以防备，还以为八路军是要与国军决战，他们袖手旁观，扬扬得意。

王政柱还说明了百团大战这个名字的来历。百团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使用的名称是正太路破袭战，预计参战兵力 22 个团。第二天天刚亮，也就是 1940 年 8 月 21 日，八路军总部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都是在报告战果，接下来的好几天都是这样。王政柱将各参战部队的番号报告给彭德怀和左权，一共有 105 个团，远远超过了刚开始组织的 22 个团。左权脱口而出：这是百团大战啊。彭德怀振奋地说：好，给延安发报，就叫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名字就这样叫起来了。

娘子关的战斗规模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娘子关下有一个村庄叫作坡底，一位名叫张三娃的老人向我详细讲述了当年的战争情景。

老人说，那天晚上，八路军来了很多人，攻打娘子关上的炮楼，炮楼建在悬崖峭壁上，因为是仰攻，八路军伤亡很大。刚开始，八路军抬着云梯，冲到了悬崖下面。日军凭险坚守，自以为万无一失。八路军的机枪对着炮楼扫射，压制

日本人的火力；悬崖下的八路军顺着云梯向上攀爬，日军从炮楼里扔出了炸药，云梯被炸断了，八路军也牺牲了。没有了云梯，要爬上悬崖很难，八路军就把绑腿绑扎在一起，组织敢死队，冲到了日军炮楼下，搭人梯向上攀登。然后，最上面的战士放下绑腿，把下面的人一个个吊上去。天快亮的时候，枪声停止了，日本人被全部打死，八路军占领了娘子关。

娘子关丢失三年后，这时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听说娘子关又被夺回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家家户户蒸馒头、烙油饼，将它们送到八路军手中。他们打了一晚上，都饿了。

夺取了娘子关上的炮楼后，就可以居高临下攻打日军占据的娘子关车站。如果先打车站而不拔掉炮楼，日军炮楼上的火力就会覆盖车站。

八路军正在攻打娘子关车站时，突然沿着正太路驶来了一辆火车，车上是 800 名准备退伍的日本兵。这些日本兵看到前方正在打仗，立即加入了战团。这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八路军本来兵力占据优势，而 800 名突然出现的日本兵，让八路军一下子处于劣势。

800 名退伍的日本军人一下子搅乱了战局。

当时，团长陈祖林留下 1 营 2 连的 145 人在火车站附近的磨河滩村阻击日军，其余的部队四散分开，破坏铁路，以防日军继续增兵。

1 营 2 连的连长叫邓仕均。

那天晚上，突然天降大雨，磨河滩村后有一条河流，名叫棉河，河流暴涨，邓仕均便将一连人马分成三组，将村子三面的围墙全部凿成射击孔，阻击日军。激战五小时，日军发动了十几次冲锋，都被打退。村子外有一口池塘，池塘里的水满了，水面上漂着日军的尸体。

八路军占领了娘子关车站的消息很快就被华北的日军知道了，日军从四面八方娘子关增兵，八路军和游击队也向娘子关方向增兵。

仗越打越大，这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为了避免 1 营 2 连被日军包围，陈祖林派人通知这个连撤出战斗。三面都是敌人的重兵，只有背后的棉河可以冒险涉过。然而，因为河流湍急，河水又深，有的战士被冲走了。激战竟日，又身涉险地，渡过棉河后，145 名战士只剩下 17 人。

张三娃老人说，这场战斗，他们村的游击队战士全部牺牲了。那个时候，装备极度简陋的游击队战士，和八路军一样勇猛顽强。

周立波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叫作《娘子关前》，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昔阳和顺一带，全是贫瘠不堪的山地。这是山西最穷的地方。矿产没有大量地开采，农产物只有小米，居民生活的大半，倚靠畜产。而现在畜产被敌人劫尽了。敌人是不吃小米的，但他们一定要把它们烧掉，或是撒在沙子里。这用意是显然的，他们要使老百姓一个个饿死……我在营庄住了一夜，我住的房子里，只有一个没有门和抽屉的衣橱。桌椅全被敌人烧掉，要写字，只好匍匐在炕上。炕是砖造的，不能烧毁，但敌军也要用种种方法把它们捣毁。营庄有二三十家人家，却找不出五个好炕。

在另一个村庄的禾场上，有一队游击队正在练习跑步，另一队却在练习掷手榴弹。他们把木头削成假手榴弹，用来反复地投掷。游击队员都没有制服，他们找到什么穿什么。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缴获的日本黄大衣，更有的穿了自己女人的红棉袄，外面罩一件破短衫，热

起来把短衫解开，露出了红色袄子，但大多数人穿的是华北农民的破短袄。

《娘子关前》所写到的和顺，距离娘子关仅有三四十里。

当时，八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一夜，打得难解难分。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仗越打越大。

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了日军一个车厢，车厢里有很多日军的衣服，八路军缺吃少穿，看到有这么多的新衣服，就都搬走了。

娘子关车站的日军还在苦苦支撑着，八路军攻不进去，日军也攻不出来。

黄昏时分，枪声突然停歇，接着，几百名日军出现在娘子关车站通往太原方向一侧，走在最前面的是日军指挥官，身挎东洋刀，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四个扛着歪把子机枪的士兵，再后面是排着方队的士兵。娘子关车站的日军看到来了一支援军，惊喜万分，想着车站外围的八路军已经被肃清了，就一齐跑到了车站外面来迎接。

从太原方向过来的，走在最前面的指挥官突然举起手臂，

身后的四挺机枪突然一齐喷出火蛇，兴高采烈的日军脸上的表情还没有转换过来，就倒了下去。

娘子关车站又失而复得。

20 天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结束。

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百团大战的消息，全国各地竞相举办庆祝活动。

毛泽东在延安得悉百团大战取得辉煌战果，异常兴奋。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这样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蒋介石在重庆也发来了电文：贵部窥此良机，切断华北交通，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王政柱说，彭德怀本来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后，彭德怀高调接受记者采访。

彭德怀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有力地回击了此前一些人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质疑。

日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落得如此惨败。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

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王政柱说，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役，八路军连续奔袭，很多人 20 天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战士们确实已经疲困到了极点。然而，为了扩大战果，在休息了十天后，彭德怀又指挥八路军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挖铁路，第二阶段则是拔据点。

因为正太路破坏严重，日军的交通线陷入瘫痪。为了整修铁路，日军不得不从各据点抽调兵力，这样据点就空了，又给了八路军破袭的机会。

原来，这两个阶段是环环相扣的。

在百团大战的那些日子里，不但八路军打日军，国军也一起揍鬼子。第一战区的卫立煌，第二战区的傅作义分别对日军发起了晋城战役和绥远战役，给八路军帮场子。百团大战刚开始的第三天，卫立煌就发动了晋城战役。截至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第一战区各部在晋南和豫北地区歼敌数千。由于卫立煌牵制了大量日军，晋南和豫北日军的四个师团仅能调出 8300 人，无法形成合围之势，致使八路军

129 师安全转移。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开始的第五天，第二战区的傅作义部就开始了绥远战役。国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日军将大量部队调往绥远一带，河北空虚，八路军趁机扩大战果。日军战史中这样记载：

自 9 月 12 日起，将主力集结于包头、安北、固阳地区……20 日命各队归返原驻地。

也就是说，一直到八路军第二阶段战役开始了，日军的部队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河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还是杨成武取得的。杨成武是八路军一员虎将。

第二阶段战役中，杨成武的任务是攻打涞源。

自八路军挺进敌后以来，杨成武就一直战斗和生活在涞源，涞源有个村子叫黄土岭，一年前，杨成武就是在这里击毙了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涞源，没有人不知道杨成武。一些史料中说，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与阿部规秀之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日军调来了

游击战专家阿部规秀，杨成武打死了阿部规秀，日军开始报复，制定了囚笼战术，八路军为了打破囚笼战术，发动了百团大战。

攻打涞源，最精彩的战斗是东团堡之战。

东团堡距离涞源县城 60 多里，是日军所修建的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如果占领东团堡，则可以切断日军多条重要运输线，八路军多条战线上的战事将没有后顾之忧。

百团大战的那一年，王东牢 11 岁，他说，东团堡战斗打了一晚上，那伙鬼子全部被打死了。

王东牢所说的那伙鬼子，是驻扎在东团堡炮楼的一个日军士官教导大队，共 170 人。这个士官教导大队全部由日军军官组成，战斗力强。王东牢说，他见过东团堡的日军在操练，把瓦罐扔在空中，鬼子一枪就把瓦罐打破了；空中飞过了一只乌鸦，一个鬼子没有瞄准，抬枪就打，乌鸦掉在了地上。这些鬼子非常坏，经常走出炮楼，来到附近的袁家村和五龙沟，看到像八路的人，就抓进炮楼里，等到放出来，就遍体鳞伤。

要打东团堡炮楼，先要攻取馒头山，占领了馒头山，攻打东团堡就简易多了。这就像攻打娘子关一样，要攻打娘子

关车站，先要攻取娘子关上的炮楼。

王东牢记忆中的那天晚上，漆黑如墨，万籁无声，只有满天星光闪呀闪的，像鬼火一样。杨成武把部队分成了两队，一队攻取馒头山，一队攻取东团堡，两队同时进行。八路军的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游刃有余地两线作战。

攻打馒头山很顺利。八路军摸上山顶的碉堡附近，碉堡外面有铁丝网，还有两个站岗的伪军。站岗的伪军听到了响声，持着枪喝问是谁，八路军中有一个战士会口技，口技出神入化，他嘴里发出两只野狗打架的声音，伪军没有在意。

八路军匍匐到了铁丝网前，用手钳剪断了铁丝网，然后摸向站岗的伪军。第一个伪军没有发出一声声响，就被八路军抹了脖子。杀人的时候没有声音，可是杀完人的时候有了响声。八路军把伪军的死尸往地上放的时候，突然脚下传来仓唧唧滚动的声音。日本人像猪一样不讲卫生，吃了罐头，就把罐头盒扔在了炮楼外，被伪军的死尸碰响了。

伪军的死尸发出了声响，第二个伪军哨兵吓坏了，他喊着“八路来了，八路来了”，声音都嘶哑了。八路军一枪将那个哨兵撂倒了。

馒头山碉堡里的日军还没有起床，八路军就冲到了碉堡

跟前，几个炸药包堆在碉堡的门洞里，一声巨响，半个天空都映红了，碉堡塌了半边，八路军冲进去把负隅顽抗的日军杀死了，伪军举枪投降。

攻打馒头山很顺利，打东团堡炮楼却费尽周折。

攻打东团堡的是杨成武的第1军分区第3团，团长名叫丘蔚。

八路军趁着夜色偷偷摸到碉堡前面时，碉堡里的日军已经察觉到了异常，碉堡顶上的探照灯突然打亮了，偷袭的八路军完全暴露在了雪亮的灯光里。八路军一愣神，碉堡上的机枪就响了。

冲！偷袭变成了强攻。

八路军的轻重武器对着碉堡一齐射击，突击队抱着炸药包冲到了碉堡前面，日军突然施放毒气，碉堡下是探照灯的死角，毒气融入了浓浓的夜色中，突击队倒了下去。

王东牢说，八路军强攻不成，就停了下来，少部分人暴露在探照灯的亮光中，大部分人隐藏在黑暗中。碉堡里的日军都是下级军官，强暴又强悍，被武士道严重洗脑，一个个

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刀枪不入，好像是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他们看到八路军只剩下那么一点人，就打开碉堡门，端着刺刀冲出来了，要和八路军白刃战。

日军上当了。八路军就等着要和日军白刃战。

然而，八路军一和日军交手，就感觉这群日军拼刺刀果然很厉害。他们在碉堡外被八路军包围后，三个人一组，背靠背站成一个圆圈，嘶声喊叫着与冲上来的八路军拼杀。长期的食物匮乏，让八路军营养不良；而日军矮小粗壮，食物充足，他们的单个战斗力很强。八路军一直拼杀到了天亮，才将这几十个鬼子消灭了。

碉堡里的日军看到出去就是送死，就掩上大门，像龟头躲进了龟甲里，再怎么拨弄也不会出来。

碉堡有十米高，从外面看，只能看到几个枪眼，不断地向外吐着火舌。

八路军的敢死队匍匐到了碉堡前，用炸药包炸，可是，这个巨大的碉堡太坚固了，炸药包用完了，碉堡还没有倒下来。

战士们从附近的村庄抬来梯子，冲到了碉堡下，12连有一个班长叫王国庆，他身上缠着20多颗手榴弹，攀着梯子向

上爬，他想爬到射击孔下，把手榴弹塞进去，炸死日军。然而，上面的射击孔发现了王国庆，几发子弹射来，王国庆从梯子上掉了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

梯子不行，战士们又抬来了大木料，一声吆喝，将碉堡门撞开了。

排长于勇率先冲进了碉堡里，后面跟着全排战士。日军挺着刺刀，呀呀叫着迎上来，于勇一刺刀捅翻了一个，再一刺刀捅翻了一个。王东牢说，排长于勇是个大个子，比日本人高出了两个头，手臂很长，日本人的刺刀还没有挨身，他的刺刀已经进入了日本人的身体里。

日本人只留下机枪手在射击孔阻击八路军，其余的日军都冲出来堵截，于勇的这个排浴血死战，全排战士牺牲了。日军的几把刺刀逼近了于勇，于勇手臂上、双腿上、头上都是刺刀伤，终于倒了下去。

后来，八路军的后续部队冲进来了，日军再也难以抵挡，只好回到了射击台。

八路军将射击台团团包围，日军走投无路，聚在一起，也将机枪和迫击炮聚在一起，点火自焚。

事后，八路军清点尸体，被烧焦的日军有 27 具。

东团堡被攻破的消息传到涞源县城后，当年驻守涞源的警备司令小柴俊男闻听 170 名日军军官“香消玉殒”，诗兴大发，连夜写成一首《东团堡警备队长恨歌》，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敌赖众攻新手替，我仅百余敌三千。

突击不分昼和夜，决战五日星斗寒。

穷交实弹以空弹，遥望援兵云霓端。

万事休唯一自决，烧尽武器化灰烟。

这首诗歌还算有点押韵，读起来也还算朗朗上口，比打油诗略好。

王东牢说，日酋的这首《长恨歌》，由当时的伪县长刻成石碑，那块石碑现在还存放在涞源县城里。

伤心关家垸

按照时间推算，外公参加过百团大战，但是我不知道他参加过哪一个时期的战斗。

作为八路军战士的外公，他并不知道当年八路军指挥部对于百团大战的部署，也不知道此后几十年来关于百团大战的各种评论，外公出于一个中国人朴素的感情，只知道日本鬼子来到了我们国家，杀人放火，要过安生日子，就必须把这个强盗赶出去。

外公讲过两件事情，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

第一件是外公的负伤；第二件是日本人的罐头。

外公身上有过多处伤痕，被日军的子弹击穿手掌一次，头部被日军刺刀捅伤一次，被子弹划破一次，腿上被日军炮弹炸伤一次。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外公那些伤痕是在哪一次战

斗中负伤的，也忘记了他负伤的具体年月，外公也许向我说过，我忘记了；也许没有说过负伤的具体时间。

外公这几十年来生活一直很不好，因为贫穷，总是和舅舅吵架，外公也只对我说过自己的过去，他的那些战争经历，文盲舅舅是不屑一听的。记得有一次舅舅说外公是革命队伍的逃兵，外公正色道：“我不是逃兵，我是响应号召回家种地的。”

外公说，有一天晚上，他们正在挖公路，日本人的汽车就来了。日本人的汽车上架着机枪，机枪嗒嗒响着，子弹落在脚边噗噗作响，空气中有尘土的气味。日本人跳下汽车，扑了过来，黑压压一大片，八路军挺着刺刀迎上去，在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展开了白刃战。外公说他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壮实的日本人，日本人每做出一个战术动作，就会喊一声，声音很低沉，又很恐怖，像野兽的叫声。外公的步枪和日本人的三八大盖一撞击，他的手臂就隐隐发麻，步枪都差点掉下去。那一天，外公只喝了一碗叫作“哄上坡”的食物，这种食物是把面粉和野菜搅拌在一起，下在锅里煮，连汤带面舀一碗，看起来很多，其实这种食物发虚，很不耐饿，吃完后爬一道坡，就又饿了，所以叫作“哄上坡”。

饿着肚子的外公和日本人拼刺刀，气力上就先输了，外

公不敢和日本人硬碰硬，日本人的刺刀捅来了，他只敢躲闪，好几次日本人的刺刀差点捅进了他的胸膛里。外公力气不如日本人，但是他对地形熟悉，刚才挖路的时候，他知道哪里是平坦的路面，哪里是挖就的深坑。在这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外公将日本人一步步引到了深坑边，他灵活地在深坑边蹦蹦跳跳，而肥猪一样的日本人毫无心理防备便掉进深坑爬不上来。外公捡起了路边的石头砸进深坑里，深坑里传来日本人杀猪一样的叫声。

战斗结束后，外公感到头顶上火辣辣地疼痛，一抹，满手都是鲜血，刚才拼刺刀的时候，头部被日本人捅伤了。

外公说，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很多人都剃光了头发，这是为了受伤之后便于包扎。怎么包扎呢？外公说，从衣服上撕片布包上，不让流血就行了。

外公还说过吃日本人罐头的事情。

那时候的八路军上了战场，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最高兴的事情是能够伏击到日本人的食品。那时候的日本人吃的是牛肉罐头，八路军吃的是“哄上坡”。

外公说日本人的罐头真香啊，吃一口浑身的骨头都酥了。营长说，等到革命成功了，我们也能天天吃罐头。

有一天晚上，他们伏击了日军的车队，车厢里放着很多罐头，八路军高兴得不得了，外公拿起一盒罐头，揭开就吃，可是罐头盒子里装的都是粉末，根本就不能吃，味道很怪。大家都问：“这是什么罐头？怎么这么难吃？”营长赶来后说：“这哪里是罐头啊，这是日本人的骨灰。”大家开始呸呸地向外吐唾沫，有好几个人把肚子里的胆汁都吐出来了。

日军打完仗后，活着的就烧化死了的，把死了的骨灰装进空罐头盒子里，拉回国内，供奉在靖国神社。外公他们把那一车日军的骨灰吃的吃了，扔的扔了，不知道抗战结束后，靖国神社里，在这些日军的名字下面供奉的是什么？

外公说，那时候八路军经常打伏击，缴获的战利品多了去了。不但有日本人的枪支弹药和罐头，还有日本人的饼干和棉衣、香烟、手表、望远镜、地图、书籍……八路军穷，见到什么都稀罕，见到什么拿什么，打扫战场的时候，有时候把日本人身上的棉衣都剥光了。而遇到拿不动的粮食，就全部送给附近的老百姓。

有时候还缴获了日本人的汽车，可是没有人会开，怎么办？刚开始的时候是塞进去几个手榴弹炸毁了，后来觉得这样太浪费了，就将汽车拆开，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轮胎扳手零件，甚至车厢边的挡板，都拿走，风挡玻璃拿不走，就捣

毀了。

我曾经在山西晋南采访过东坞岭战斗，这是国共两党一起伏击日军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29日，地点在陕西省沁水县东坞岭。东坞岭的道路非常狭窄，一面是高山，一面是深沟。当时，日军300辆汽车来到东坞岭，给前线的日军送给养，八路军和国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300辆汽车无一逃脱。

可是，这么多的汽车难住了中国军队，没人会开走。怎么办？就全部烧毁了。当地的百姓说，那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过了20年，这里大炼钢铁，当地人把那些汽车残骸送进了炼钢炉里。

外公说，在根据地里，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夜晚就是八路军的天下。

八路军能够在敌后战场坚持八年之久，而且实力不断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民众的力量。

这一点，连日军也看出来了。

抗战结束后，当年与八路军苦战的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说：“（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

婆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
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本的作战历史和我们这边的有很大不同，除了记载大的战事外，还记载士兵个体的活动。一直在冀南从事围剿陈再道和易良品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在战后有这样的记录：“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所在地。”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虎，老百姓是林，鱼游大海，虎入山林，又怎么能够找到呢？

外公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们几个八路军被日军追赶，躲进了一座村庄里，老乡把他们藏在地窖里，外面掩上柴火。日军赶到后，将全村人集合在打麦场，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在哪里。没有人说。日本人拉出一个孩子，一根一根地折断他的手指，孩子疼得昏了过去，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出八路军的藏身之地。后来，八路军的接应部队打过来了，日军逃跑了。很多年后，外公神情凄然地说，那个

孩子手指都被折断了，不知道他以后怎么生活。外公曾经想去山西寻找那个孩子，可是家中实在太穷了，拿不出路费。没有去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看，是外公一生的遗憾。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刚刚结束，日军就开始了报复扫荡，八路军被迫进行反击。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八路军还有十天的休息时间，而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八路军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一面严令日军坚守碉堡炮楼，一面催促日军沿着铁路和公路两侧围歼八路军。八路军的破袭战被迫进入了阵地战。

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将晋东南的 129 师作为围剿围歼重点，准备将刘伯承的 129 师全歼。

围剿 129 师的日军中，有一支 500 人的队伍，由冈崎谦受率领，对外号称冈崎大队，其实，日军一个大队满员编制 1280 人，大队长的军衔是大佐，而这支队伍充其量只能算半个大队，冈崎谦受的军衔也仅为中佐。

冈崎大队是误打误撞而进入八路军总部的根据地，进入了八路军的兵工厂黄崖洞附近。黄崖洞兵工厂是当年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八路军各个军分区都有兵工厂，但是这些兵

工厂只能做一些枪械维修，而黄崖洞兵工厂可以日产 400 支步枪，所以八路军将领都非常喜爱这个兵工厂。

冈崎大队摸到了八路军的腹地，刺刀架在了八路军的胸前，八路军不能不反击。

一场谁也不想打的战斗不得不开打了。冈崎不想打，是因为众寡悬殊；彭德怀不想打，是因为投鼠忌器。

日军当年其实并没有发现黄崖洞兵工厂，因为这个兵工厂极为隐秘，四面都是陡峭绝壁，进出口仅为一线天，而日军看着地势险要的一线天，哪里敢继续深入。如果当初冈崎大队冒险进入险地，八路军的兵工厂就会遭到破坏，八路军将会陷入更为艰苦的处境。

但是，冈崎没有这个胆量。

冈崎大队在黄崖洞兵工厂附近一出现，彭德怀就命令关门打狗，将这支孤立之敌关在根据地内，予以全歼。

参加围攻冈崎大队 500 名日军的八路军有：129 师 386 旅、385 旅各一部，新编第 10 旅，决死第 1 纵队 25 团和 38 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山炮连。八路军与日军兵力之比，最少有 20：1。

所有人都认为八路军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自己的根据地作战，熟门熟路，冈崎大队来到这里，只能是送死。彭德怀、刘伯承、陈赓等八路军将领也是这样认为。



平型关战斗中第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可惜，事情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杨云溪当年在八路军炮兵团山炮连，他亲眼见证了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战斗。

也是在百团大战的时候，八路军才有了威力强大的八八野战山炮，而易良品缴获的，就是一门这样的野战山炮。

杨云溪说，115 师在平型关围歼日军辎重队的时候，八路军战士看着日军的汽车渐次驶入包围圈，用刺刀和日军厮杀。如果八路军有山炮，就可将日军的汽车一炮打瘫，截断他们的去路和退路，可惜当时八路军没有山炮，只有迫击炮，而迫击炮杀伤力有限，所以此战中八路军尽管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日军，但因为武器不占优，居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后来有记载说，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中，与日军的伤亡比例是 1：1。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说，一定要建立八路军的炮兵团。周恩来从汉口要来了炮兵物资和弹药，还从国军部队里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个叫沈毅，一个叫白泯。八路军的炮兵团就这样成立了。

在参军前，杨云溪是一个店铺的小伙计，他听说这支穿着灰色衣服的队伍去打日本人，就要求加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同意了，派他站岗。当时八路军连多余的军装都没有，小胡子说：“打过几仗，就什么都有了。”杨云溪就穿着从店铺带来的长袍站岗。后来，杨云溪才知道小胡子是一个朝鲜人，八路军炮兵团团长，名叫武亭，而他的祖国朝鲜，在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之前，已经被日本占领了。

在关家垸战斗中，杨云溪在炮兵团里担任观测的任务，

测定炮弹的方向、距离，指引炮兵发射。

杨云溪说，彭德怀一听说冈崎大队来到了根据地腹地，就指令将这支日军消灭了，一个不留。

杨云溪一直能够记得，彭德怀就在距离自己不到 100 米的战壕里指挥战斗，他身靠在战壕的一边，一条腿支撑在另一边。日军的飞机飞来了，在头顶上嗡嗡作响，炸弹激起的尘土溅在了彭德怀的身上，但是他手举望远镜，一动不动。一直跟随着八路军总部的记者徐肖冰赶快拍摄了这个情景，这就是以后百团大战中彭德怀的珍贵照片。

然而，即使八路军副总司令亲临一线指挥，即使处在万名八路军的包围圈中，500 名日军却像蜷缩成一团的刺猬一样，根根竖起的毫针让八路军无从下手。

冈崎大队一出现在根据地纵深，八路军就从四面合围而来，冈崎大队料定难以抵挡，就从黄崖洞西窜，来到了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垵。

冈崎谦受是参谋出身，懂得用兵之道。关家垵是一个地势高耸的山岗，山顶上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平台，这种地形很像沂蒙山区的岱崮，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关家垵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关家

塄北面是悬崖峭壁，东西两面是陡峭的山坡，只有南面坡度较缓，八路军要攻击，只能选择南面。而且，南面还有一个山峰与关家塄隔沟相望，可以组成交叉火力，拦截进攻的八路军。这个山峰叫作柳树塄。塄是北方方言，意思是小山包。

关家塄上还有几十间窑洞，窑洞的主人在战斗快要来临，日本人一出现在视线里的时候，都逃到了山下。日军将这些窑洞全部打通，组成了阻击阵地。即使八路军攻上了关家塄，也难以攻进这些窑洞里。

这个地方太适合防守，而太不适合进攻了。

彭德怀和左权商量如何进攻。

王政柱说，百团大战的时候，八路军总部和延安的每封电文，最后的签名都是彭左，有的作战命令发布者也是彭左。有人不了解彭左是谁，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彭左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我想起了以前读过明代作家张岱《夜航船》序言中的一个故事：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詹台明灭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

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古代对读书人很尊敬。有人考据说，在唐代，如果你没钱吃饭，走进饭馆只要说“我是诗人”，就能吃到免费饭菜。

王政柱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司令是朱德，副司令是彭德怀，参谋长是叶剑英，副参谋长是左权。抗战第二年，朱德就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叶剑英没有去过抗战前线，坚持在抗战第一线的是两个副职：彭德怀和左权，所以八路军的电文署名都是彭左。

杨云溪见过彭德怀和左权，两个八路军高级将领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云溪眼中的彭德怀将军非常耿直，脾气火爆，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是一个非常正义、毫无私心的人。多年后，我阅读《彭德怀自述》也能够看出这一点。

和彭德怀恰恰相反，左权是一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人，他总是面带笑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说话非常客气。彭德怀是霹雳雷霆，而左权是和风细雨，当年八路军最高层的这两个人真是绝配。彭德怀一旦发起脾气，左权就说消消气，消消气，很灵验的，彭德怀很快就脾气变好了。

山崎大队来到黄崖洞兵工厂门口的时候，八路军一个连

队没有阻击，连长带着一连人仓皇逃跑，彭德怀大怒：“枪毙了娘卖逼的。”连长被枪毙了。

山崎大队来到关家垸构筑工事，八路军团团包围，彭德怀严令：“把娘卖逼的日本鬼子干掉。”

八路军攻打山崎大队受阻，伤亡很大，刘伯承想让部队撤下来，彭德怀又一次骂娘卖逼的，他对刘伯承发火：“拿不下关家垸，撤销 129 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他居然要杀刘伯承。

杨云溪说，彭德怀是一个直杠子人，左权是一个聪明人，刘伯承是一个老好人。

因为地势陡峭，道路狭窄，冈崎大队据险坚守，所以，八路军有再多的兵力也无法展开。

几十年来，各种书籍对关家垸的记载出入很大，有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违背事实，大肆渲染。而对战斗的结果也众说纷纭。

战斗是在 1940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3 时打响的，首先攻击日军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直接来到团部指挥的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彭德怀和左权都来到了前线阵地，可见关家垸战斗有多重要。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保卫总部安

全的警卫部队，战斗一开始就把精锐的警卫部队派上去，可见彭德怀和左权歼灭冈崎大队的决心。

冈崎大队就是一把抵近八路军总部的刺刀，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把刺刀折断，付出再大的努力也要折断。

近战、夜战是八路军的特长，这次攻打山崎大队依然需要近战、夜战。八路军并不是喜欢近战、夜战，而是万般无奈才采取这种搏命打法。日军占据了关家垴和柳树垴，兵力集中在方圆几百平方米的两个山头上，如果八路军有飞机，有像美军那样的燃烧弹，只需飞到空中丢下两颗燃烧弹，这股日军就会被烧成木乃伊，可是八路军没有。如果八路军有像苏军那样的喀秋莎火箭炮，有足够的炮弹，只需对准目标，一通猛轰，这股日军也就上了西天，可是八路军没有；如果八路军有像德军那样的豹式坦克，排成方阵，沿着南面的山坡轰隆隆开上去，日军就会被压成肉饼，可是八路军还是没有；如果八路军有像日军那样的毒气弹，只需发射几颗，这股日军就会变成人体标本，可是八路军仍然没有。同一时期的“二战”军队中，中国军队是最贫穷的，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用不屈意志，与日军的钢铁机器抗衡。

特务团偷袭的这个夜晚，冈崎大队意识到将要面临一场恶战，他要以自己为饵，吸引八路军主力进行包围，然后外

围的日军援兵实施反包围，聚歼八路。冈崎大队这天晚上挖了半晚上的防御工事，在特务团攻击开始前不久，刚刚睡着。

起初的战斗相当顺利，特务团的两个尖兵偷偷摸上了关家垸，将两名站岗的哨兵刺死了，紧跟在后的第2营对着窑洞扔出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埋伏在半山坡的大部队呼啸着卷上坡顶，关家垸的第一排窑洞就这样轻易被占领了。

杨云溪说，刚开始非常顺利，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会打得那么残酷。

日军将所有的窑洞打通了，每一排窑洞的前面都挖有散兵坑，第一排窑洞被拿下后，所有的日军都集中在了第二排窑洞里，拼死抵抗。冈崎大队里的每个敌军都明白，现在只能做困兽斗，因为关家垸三面环沟，退无可退，再退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关家垸上极为狭窄，八路军特务团根本就无法投入更多的兵力，只能一个连一个连进行攻击，这就是兵家大忌中所说的“添油战术”。而日军蹲在掩体里，架着机枪，只需要对着出现在视线里的身影开枪就行。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得八路军抬不起头来。

杨云溪说，那天晚上，枪声一直响到了天亮，八路军被抬到山下的伤员一批又一批。每个人的伤口都是在身体前面，都是倒在冲锋的路上。

天亮后，特务团仍旧无法攻占关家垸，只好暂停攻击。

早晨 9 时，大部八路军援兵赶到，对关家垸和柳树垸再次发动攻击。穿着灰军装的身影沿着陡峭的山坡密密麻麻地向上爬，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补上去，鲜血顺着山坡向下流淌。八路军一部甚至已经占领了柳树垸，关家垸也岌岌可危。八路军杀声震天，士气大盛。就在胜利在望时，天空中突然飞来了几架日军飞机，对着山坡疯狂扫射轰炸，八路军躲无可躲，伤亡惨重。

柳树垸上，龟缩在散兵壕里的日军趁机反扑，再次抢占了柳树垸；关家垸上，已经占领了第一排窑洞的特务团，因为后无援兵，不得不再次停止攻击。

关家垸是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八路军所打的第一次大型攻坚战，因为缺乏重武器，伤亡前所未有的惨重，772 团是担任主攻的一个团，1 营 1 连上百人，仅剩 3 人；3 连仅剩指导员和两名伤员；四连仅剩下十几个伤员。这个营被换下来的时候，能够拿起枪支的，仅剩下六个人。电视剧《亮剑》中有这个情节。

现代战争，打的是武器装备，而不是人数。

杨云溪说，他看到有一个八路军战士，站在一具具牺牲的战友尸骨前，大声哭。

杨云溪还说，那时候彭德怀的脾气很大，他抿紧嘴唇，瞪着眼睛，看起来很凶。

八路军最著名的几员将领彭德怀、刘伯承、陈赓，都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的恶仗、险仗，每个人都拥有辉煌的战争经历，他们此后都是共和国的元帅大将，可是此刻，面对 500 名日军残兵坚守的土坡和空中盘旋的日军飞机，硬是没有丝毫办法。

没办法，武器不如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抗日战场上，枪口在后背会被所有中国军人认为是耻辱。而此时八路军的伤兵，没有一个人的伤口是在后背上的。

说一个与伤口位置有关的故事。

滇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很差的军队，和桂军比起来，滇军几乎没有留下可以称道的记载。我想，这可能与滇军没有人在国民政府担任高官有关，桂军有白崇禧、李宗仁，而

滇军有谁？滇军中的云南王龙云的影响力，是远远不能与白崇禧、李宗仁相比的。

然而，滇军在抗战中一直打得有声有色，只是没有为后世的我们所知罢了。

抗战一开始，滇军组成的 60 军四万官兵就徒步一千多里，穿越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跨越浊浪冲天的怒江、澜沧江，来到了长沙，在这里，他们才能乘上火车，开赴徐州，又从徐州一路奔往台儿庄战场。

60 军刚刚到台儿庄战场，就遇到日军进攻，国军将士们来不及喘口气，来不及吃口饭，就投入了战斗。尖刀营与日军奋勇厮杀，营长尹国华和 500 多名战士阵亡，仅生还一个名叫陈明亮的战士。团长莫肇衡身负重伤后，以手指蘸血在路边石头上书写：“壮志未酬身先死”，含恨殉国。旅长王秉璋手持三八大盖，亲自与日军拼刺刀。滇军中的将领都有武术基础，龙云就是一名武术高手，他年轻时候曾经打败过在昆明摆擂台羞辱中国人的法国大力士，所以，滇军中习武成风。

旅长王秉璋手持三八大盖，接连挑死十几名日军后，自己的胸脯上也被日军射了一枪。战斗结束后，旅长王秉璋摇摇晃晃走到了师长张冲面前，笑着说：“师长看看，枪口是不

是在胸前？”

张冲是 60 军 184 师师长，184 师坚守禹王山长达 22 昼夜，当年，此战例被编为军事教材，提供所有国军学习。

很多经历了关家垸战斗的八路军老兵，在以后的回忆录中都说，这场战斗打得实在艰苦。

之所以会打得艰苦，是因为八路军没有重武器。

八路军来到陕北之前，经历了漫长而艰险的长征，一路爬雪山过草地，来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下轻武器。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仍没有重武器。龙云在他的《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说，七七事变后，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他与朱德交谈，问朱德：“这次抗战，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朱德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朱德是龙云的师兄，两人都毕业于云南讲武堂。

为什么只要轻武器？可能那时候红军已经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而重武器不利于运动战，只会带来麻烦。重武器运输难、补给难。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八路军用骡马拉着大炮，如何能够躲过日军炮楼的视线？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重达千斤的重炮，又如何能够转移？而且，就算有了大炮，炮弹呢？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远离西南地区的兵工厂，而自

己又不会生产炮弹，大炮只能称为聋子耳朵。

八路军不是会缴获吗？为什么不缴获日军的呢？

日军每个大队有两门步兵炮，牵引步兵炮的是汽车，日军把他们的大炮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那么容易缴获吗？

百团大战后的 1942 年 4 月 16 日，日军 100 多名军官来到晋中地区视察，第 63 师团高木联 3 大队一部武装护送。八路军太行军区第 3 军分区代司令刘昌毅侦察到这个情况后，率部设伏袭击，日军逃走。打扫战场时，战士们报告说缴获了一门山炮，刘昌毅喜出望外，奔跑过去查看，却发现只有炮架，没有炮筒。日本人不可能出征的时候只带着一尊炮架，刘昌毅让分头去找，果然在小河中找到了日军掩藏的炮筒，炮筒上还有一行日文。日军也知道大炮携带困难，逃跑的时候，就把大炮分解掩藏。

半个月后，刘昌毅收到一封日本人写来的信，信中写道：

将军阁下勋鉴：

4 月 16 日，皇军在榆武公路丢失山炮一门，闻悉现存于贵部。此炮乃天皇赐给吉田旅团长的。吉田先生视此炮为最高荣誉，如其命也。将军如能奉还，皇军将满足阁下提出的一切条件。

此奉，大安！

日本人居然写信向八路军索要山炮，也亏他们想得到。这门山炮，八路军当然不会给的。八路军穷得叮当响，能有一门山炮，就像乞丐捡到了金元宝，怎么会再送回去呢？

然而，此刻，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关家垸，一个几百米高的土坡，500 名日军把守的阵地，让没有重武器的万名八路军难于攻破。

关家垸战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日军伤亡过半，而仰攻的八路军伤亡惨重，几乎每死一个日军，都要牺牲好几名八路军战士。

山下的八路军攻打艰苦，山上的日军日子也不好过，两天两夜，又饥又渴，没有补给，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当时，在一线指挥的陈赓给彭德怀打电话，请求把这股日军放在山下再打，只要八路军撤开包围圈，这股饥渴交迫的日军肯定忙不迭地下山逃命，到时候，日军不再占有地理之利。彭德怀拒绝了陈赓的请求，认为如果放下山来，就很难全歼，目前已经将日军逼上了绝路。陈赓说，这样攻击，代价太惨重了。彭德怀说，打光了，我再给你补充。

陈赓的电话刚刚放下，担任另一路攻击的刘伯承也打来电话，请求停止攻击。刘伯承说，这样的打法，八路军赔不起。彭德怀对刘伯承一口一个老兄，要他一鼓作气，把冈崎大队的残兵全部消灭。刘伯承生气了，他说彭德怀这是蛮干。彭德怀也生气了，他说要撤销 129 师的番号。

当然，彭德怀说的是气话。当时，每个人的眼中都急得喷火。

彭德怀所在的战壕，距离一线攻击部队只有两三里，前线的一举一动他全都看在眼里，八路军战士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茬茬倒下去，他也心急如焚，悲痛难耐，可是，如果不赶紧攻下关家垵，日军从武乡和辽县增援的 2500 名援兵即将来临，129 师将要面临灭顶之灾。

而且，仅有 500 人的冈崎大队，就敢在八路军的根据地横冲直撞，而八路军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消灭，这如何能够让人受得了？八路军以后在江湖如何立足？

还有，这些年来八路军一直在打游击，很少有过攻坚战，如果此次攻坚战失败，八路军以后对攻坚将会心存恐惧。

所以，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股孤立之敌全部歼灭，然后转移，让武乡和辽县的 2500 名日军扑空。

要将这股占据了地理优势的日军全部消灭，太难了。

八路军中足智多谋的老师长刘伯承举着望远镜观察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战士们运用土工作业，挖暗堡逼近日军，然后突然攻击，展开白刃战，这样可以减少牺牲。

八路军中，刘伯承是公认的足智多谋的人。抗战时期，八路军 129 师所经历的大小战斗，只要是老师长刘伯承指挥的，无一不是妙计迭出。刘伯承有“军神”之称，又有“常胜将军”之称，他一生还真的没有打过败仗。

刘伯承的土攻，让所有八路军将士茅塞顿开，129 师 385 旅 769 团团长郑国仲亲自带人挖地道。以后，郑国仲成为东海舰队司令。

关家垸和柳树垸上的激战一直在进行着。因为地域狭窄，八路军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攻击，一个营打光了，再换一个营。

杨云溪说，阵地上杀声震天，双方士兵声嘶力竭的喊叫声，站在几百米的山下也能听见。

彭德怀让杨云溪用迫击炮轰击日军，杨云溪观察后说，由于关家垸上是平台，无法看到日军的具体部署，而且，双

方的士兵缠斗在一起，轰击日军，肯定会伤及自己人。

没有炮火支援，八路军只能一寸一寸地向前进攻，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更要命的是，日军 2500 名援兵已经赶到了关家垸附近，与外围的八路军交火。而在远处，数千名日军乘着汽车，骑着马匹也向关家垸涌来。

日军的目的是全歼 129 师和八路军总部。

1940 年 10 月 31 日 16 时，战斗进行的第三天，彭德怀发出了最后的攻击令，冲锋号吹响了，郑国仲的 769 团一个营呐喊着，挺着刺刀，向关家垸上冲锋；另一个营则把坑道挖到了日军的后面，手榴弹天女散花一般地落在了日军阵地上，冈崎大队长被第一轮从天而降的手榴弹炸死了。

但是，日军三人一组，就地反击。八路军一个营接着一个营旋风般地卷上关家垸顶部的平地，日军来不及装弹射击，就跳出战壕与八路军拼刺刀。八路军肃清了部分残敌，而有 100 多名日军则逃到了半山腰的窑洞里，继续与八路军对射。

北方的窑洞就是土窑洞，都是在山崖上挖凿而成的，如果八路军有重武器，只需一发炮弹轰在窑顶，土窑洞就会坍塌。可是，八路军只有迫击炮，而迫击炮轰击这种土窑洞，

形同隔靴搔痒。

半山腰的激战，竟然从黄昏打到半夜，又从半夜打到天亮。冈崎大队最后的残兵，仍然没有被肃清。

杨云溪说，天亮后，日军的飞机来了，足有十几架，对着进攻的八路军投弹扫射，有八路军被射中了，就沿着陡峭的山崖骨碌碌滚了下去。而日军躲在窑洞里，轰炸不到。而地面上，一股日军冲破了八路军的阻击，拼命要与冈崎大队的残敌汇合。在关家垸，没有重炮的八路军上万人啃不动冈崎大队，而拥有重炮的日军 2500 人却啃动了八路军的包围圈。

武器，在现代战争中，至为重要。

彭德怀和左权发布了撤退命令，八路军功亏一篑，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

这就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惨烈的攻坚战关家垸战斗。八路军一共进行了 18 次冲锋。

关家垸战斗结束后，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实际上也就画上了句号。

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两万余人，让日军和国军都第一次看到了八路军的实力，日军《华北治安战》中如此记载这一幕：“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也改变了所有人对八路军的看法。老八路说，百团大战前，很多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连国民党杂牌军也看不起八路军，而百团大战后，再没有人对八路军微词了，连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说，八路军是真心抗战。

如何看待百团大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彭德怀自述》中有这样两段话：

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

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左权将军牺牲

百团大战后不久，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黯然落幕，几个月后就回家务农；冈村宁次走上前台。

冈村宁次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人。

如果说多田骏采用的是军事侵略，那么冈村宁次采用的则是文化渗透。

很多生活在华北的老人说，在他们童年时代，经常能够看到一小队日本人，排成一排，看到他们就满脸堆笑，从口袋里拿出糖果分发给他们。汉奸们成群结队在村庄出没，涂抹墙壁上“铲除汉奸，驱逐日本”的标语，刷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字样。

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狡猾得多、阴险得多的老鬼子。

彭德怀在 1945 年也说，冈村宁次“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六个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都与中国有关，早年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加过九一八事变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对付八路军，还担任 11 军司令官和老同学何应钦在雪峰山血战，抗战结束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解放军作战。

日本天皇对冈村宁次也相当器重，日本军官在晋升为中将后，一年内不得担任师团长，但是冈村宁次破例了，而且担任的是日本第 2 师团师团长。第 2 师团，是日本最早的七个师团之一，天皇极为重视。

和一般日本指挥官的凶蛮表现在脸上不同，冈村宁次的凶蛮表现在心中，他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戴着近视眼镜，彬彬有礼，实际上心如蛇蝎。他一方面鼓吹中日亲善，一方面实行“三光政策”。这样两面三刀、虚伪狡诈的人最难对付。

在冈村宁次任期里，华北的伪军达到了最高峰，而根据地的艰苦也达到最高峰。

冈村宁次对老百姓进行“宣抚”，进行奴化教育，在学校里推行日语教学，让中国百姓对日本进行文化认同。而对八

路军，一方面在扫荡，一方面在劝降，日军印刷了《告八路军书》、《投降劝告书》等传单大量散发，所到之处的墙壁上涂刷了让八路军丧失斗志、劝告投降的标语，还颁发了大量的良民证和劝降的通行证。

更为稀奇的是，日军还在当时根据地的纸币上印刷了劝降口号：“快下山吧，山中无吃无喝，只能等死。”不但如此，日军还印刷了大量的伪钞，正面是钞票图案，背面是裸体女人，裸体女人的下方印着：“我时常远望，盼望你回来，你仍在打仗，如果你继续打仗，你将会死在战场上！回来吧，倾听我的心声！”

当年处于极度封闭中的中国人，哪里见过裸体女人的图案？很多人见到这张伪钞，可能就会收藏起来。而裸体女人下方的话，则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云溪说，冈村宁次上任后，八路军和根据地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由于日军强大，八路军只能转移，日军实施扫荡，八路军在日军包围圈的缝隙里跳出来，双方就像捉迷藏一样，然而，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发挥了作用，把华北平原划分成网格状，每一个交汇点上都有日军把守，八路军在平原上举步维艰，灵活机动的战术难以施展，而笨重的八路军炮兵团的

行动更为艰险。

1941 年 2 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除留下一个连外，其余的退回延安。

杨云溪留了下来。

他见证到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的情景。

左权将军牺牲在 1942 年 5 月 25 日的清晨，这一天杨云溪永远也不会忘记。而左权将军牺牲的地点，距离他仅有十米远。这些年来，杨云溪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了那天清晨左权将军惨烈的场面。

那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日军有第一军所属的 36 师团、41 师团、69 师团各一部，还有独立混成四个旅团，共计三万余兵力，而八路军总部有两万人，包括野战医院、党校、北方局、新华社等单位，其中能够参加一线作战的，仅有 300 人。300 人打三万人，还要掩护庞大繁杂的非战斗部门转移，其悲壮可想而知。

百团大战后，冈村宁次一直想寻找八路军总部，想寻找八路军主力。他将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

列入了名单中，要求予以击毙或者活捉。

在所有八路军老兵的记忆中，冈村宁次都是一个异常难缠的老鬼子，他打仗善于运用智谋，给八路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这场战斗中，八路军到底牺牲了多少人，一直没有确切的记载。

1942 年 5 月的八路军总部驻扎在山西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辽县，现在叫左权县，这里群山连绵，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是抗战的后方，八路军的根据地纵深，本来万无一失，可是，事情坏就坏在日军的那支“杀人挺进队”。

这是一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日军特种部队，全部穿着八路军的服装，每个人口袋里装着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画像，还带着八路军兵力部署图、假印章、假路条，这支恶魔部队共有 124 人，其中四名军官，102 名士兵，另外还有熟悉山西辽县一带地形的汉奸特务 18 人，携带有收发报机和重武器。

因为训练有素，又因为有汉奸带路，而且武器精良，所以这支小分队是非常恐怖的。

这支小分队的任务就是寻找八路军总部，杀害八路军高级将领。

5月21日，即左权将军牺牲的前四天，这支恐怖的小分队从日军驻地出发了，他们趁着夜色，像传说中的冷血杀手一样，沿着崎岖的山谷谷底，悄然绕过八路军外围的警戒部队，向着八路军总部疾进。

黎明时分，他们已经潜入根据地几十公里。因为天色放亮，不便行动，他们一部分人隐藏在麦田里，一部分人隐藏在废弃的土窑里。那时候，小麦已经快要成熟了，有半人高，趴在麦田里，即使有人从身边路过，也不会发觉。

土窑里的日军架起电台，侦听八路军的来往电报，他们收听到邓小平在太岳发出的电报，马上拿出邓小平的画像，在下方标上了“在太岳”三个字。

几十年后，日本公布了当年这支“杀人挺进队”的秘密，也详细披露了奇袭八路军总部的经过。

5月22日，也就是侦听到了邓小平在太岳的这天，他们和一队八路军遭遇，发生激战，他们迅速占领了高地。那队八路军的命运如何，是全部壮烈牺牲，还是取得胜利，没有记载。

午夜时分，“杀人挺进队”突袭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五军寺，然而，八路军总部已经转移了。

这天，八路军总部收到了民兵提供的消息，有一支身份不明的“八路军”进入了根据地，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总部机关迅速进行了转移，致使“杀人挺进队”扑空。

《亮剑》中，把这支魔鬼部队叫作山本一木的特种作战部队。其实，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不叫山本一木，而叫益子重雄。

后来披露的资料说，八路军总部当天收到的来自民兵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发现一路来历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

这个报告是民兵送来的，而不是八路军送来的，所以我推测 5 月 22 日的遭遇战中，八路军可能全部壮烈牺牲，后，日军转移，行动迅捷，致使民兵感到“去向不明”。

民兵的报告送来后，八路军总部机关立即转移，才于当天晚上免遭攻击。

也是在这一天，另一支日军“杀人挺进队”接近了 129 师师部。这支小分队的首领名叫大川桃吉。这支小分队的经历更为惊险。

冈村宁次派出的是两支魔鬼部队，目标是八路军总部，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冈村宁次想到的是，就算有一路杀人部队出现了失误，另一路也会完成任务。

就在益子重雄的小分队与八路军激战的时候，大川桃吉的小分队进入了一座村庄，村庄的农会主席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队日军，他看着这队穿着草鞋和灰军装，背着汉阳造的八路军，殷勤地找来船只，送他们渡过了漳河。大川桃吉的小分队过河后，走进了一个叫作宋家庄的村庄，老百姓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而当时村庄里还驻扎着一小队八路军战士，真八路和假八路同桌吃饭，谈笑风生，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群冷血杀手。

吃完饭后，得知这个小分队要去一个叫作会里的村庄，因为路途遥远，老百姓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自行车，借给了这队假八路。这队假八路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地赶往会里。会里是 129 师指挥部的驻地，129 师师长刘伯承当时就在这里。

大川小分队本来是要途经会里而奔袭八路军总部的，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刘伯承的 129 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而现在，突然得知 129 师师部居然就在眼前的会里，大川桃吉犹豫了，该不该打？他接到的命令是攻打八路军总部，而

现在眼前出现的是 129 师师部，怎么办。

日本军官都是榆木疙瘩脑袋，他们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从来不知道变通。冈村宁次让大川桃吉奇袭八路军总部，与益子重雄分进合击，而现在 129 师师部突然出现了，一根筋的大川桃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川桃吉决定暂时撤离，躲藏在山谷中，让他好好想一想，再向冈村宁次发报请示，看应该怎么办。

一支百人的“八路军”队伍突然出现在了 129 师所在的会里附近，又犹犹豫豫地撤走了，引起了 129 师哨兵的怀疑，哨兵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果断决定：转移。

刘伯承带着师部转移的时候，大川桃吉还坐在山谷里，双手捧着他的榆木疙瘩脑袋想啊想，想啊想，一直想到了黄昏来临，然后趁着夜色架设天线，给冈村宁次发报请示。冈村宁次确认了会里驻扎的确实是 129 师师部后，命令大川桃吉赶快发动攻击。

当大川桃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会里的时候，才发现会里人去村空，129 师师部已经转移了两小时。

大川桃吉如梦初醒，叫苦不迭，命令全速追赶，一直追到了山谷口，才发现 129 师师部已经退入了山谷中。

大川桃吉只好作罢，他担心在山谷中中了军神刘伯承的埋伏。

大川桃吉的偷袭失败后，就像一头蒙着眼睛的毛驴一样在沟壑间忙碌地转悠。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赶来后，大川桃吉的小分队加入了这股日军，向八路军总部进攻。

大川桃吉丢掉了 129 师师部，而益子重雄却紧紧地咬住了八路军总部。益子重雄的小分队首先与八路军特务团交锋。按照日本的说法，益子挺进队以寡击众将八路军包围，并展开攻击，一直打到了夜晚，益子挺进队攻陷了八路军阵地一角，八路军总部被迫再次转移。中国方面的说法是，益子挺进队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致使特务团进攻极不顺利，到了夜晚，益子挺进队趁夜色逃窜。

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能够知道的是，仅仅依靠上百人的益子挺进队，是不可能剿灭八路军总部的，即使他的胃口再大也吞不下去，即使他吞下去了也消化不了。八路军总部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士，会让益子挺进队吃尽苦头的。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益子挺进队咬住了八路军总部后，三万日军迅速从四面合围而来。从这个现象可以判断出，所谓的益子挺进队，其实就是日军的侦察兵，他们侦察到了八

路军总部的具体方位后，迅速报告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命令日军以最快的速度扑过来。

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王政柱说，左权当时从种种迹象感觉出来，日军要合围八路军总部，因为外围据守的八路军各部不断报告发现了日军在移动。左权和彭德怀商量后决定，转移到南艾铺地区的山沟里。

这天中午，一架日军飞机从远处飞到了头顶，低空盘旋着，掉头远去。

八路军不知道，这架飞机上就坐着日军第1军的参谋人员。发现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传到日军第1军后，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立即把司令部从太原搬到了更靠近八路军总部的长治，然后就派出飞机进行侦察。黄土高原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坐在飞机上，就能将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路线一览无余。

侦察机过后，日军出动了轰炸机，而且四面的日军动用各种能够找到的交通工具，没有交通工具的，就全速奔跑，向南艾铺地区合围而来。

八路军总部陷入了包围中。

日军在步步进攻，八路军在步步抵挡，战斗从未有过如

此激烈，八路军总部也从来没有面临如此险境。

杨云溪说，日军漫山遍野，打都打不完，八路军都打疯了，有的站起身来，端着机关枪拼命扫射，直到倒了下去；有的手持手榴弹，冲进敌群中，和日军同归于尽；有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也顾不得塞进去，只是一个劲地扫射。八路军战士没有一个后退的，直到全部阵亡了，日军才能踩着他们的尸体爬上来。

因为八路军总部人数太多，目标太大，而且非战斗人员非常多，很难摆脱日军的追击，彭德怀、左权，还有罗瑞卿、杨立三和北方局的几个负责人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里开会，决定兵分三路，分散突围。第一路是八路军司令部、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北突围；第二路是政治部，由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领向东南突围；第三路是后勤部，由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领向东北方向突围。

杨云溪跟随着左权这一路突围，而这一路能够作战的兵力只有八路军两个排，七八十个人。

杨云溪说，左权站在一个高坡上，他号召大家，杀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了就是胜利。

左权在高坡上喊话的时候，日军的炮弹就在他的身边爆

炸，他不管不顾，他的声音在炮弹爆炸的间隙声中传来，显得异常悲壮。



左权

左权喊完话后，走下高坡。一颗炮弹在距离他仅有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一匹骡子被击中了，倒在地上，它长声嘶鸣着，肠子流了一地。

这一路八路军冲到了一个叫作十字岭的地方，还没有喘口气，突然，穿着八路军军装的益子挺进队出现了。

八路军司令部和益子挺进队撞个正着。而此前，谁也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益子挺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日军特种部队，而八路军总部是庞大的文职人员，仅有的两个排的警卫武装，不但人数占劣势，而且还分散在撤退队伍的四周，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也没有时间来组织抵抗。

杨云溪说，山谷里到处是人，人挨人，人碰人，因为武器短缺，文职干部都没有枪，有人惊恐叫喊，有人到处乱跑，头顶上，日军的飞机在轰炸，一颗炸弹扔下来，就是震天动地的声响，响声过后，地上就是一片死尸。飞机飞得很低，爆炸激起的黄色尘土，几乎都要溅在后面跟随的飞机上。

有几个少年看到飞机轰炸，就躲藏在了沟岔里，左权跑过去，拉着他们喊：“快走快走，后面有日军追赶。”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空中是呼啸的飞机，八路军总部来到十字岭，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电影《风语者》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危险的时刻，就一定要把掌握密码的人杀死。

因为掌握了密码，就掌握了军队的所有机密。如果掌握密码的人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八路军队伍中，这样的人不叫“风语者”，而叫译电员。

在危险来临的时刻，在面临生死关头，首先要面对死亡的，就是译电员。八路军中的译电员，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大学生。

王政柱和杨云溪都说，在四面合围步步进逼的极端不利的险境中，左权一再叮咛，一定要让老兵照顾好这些译电员，一个也不能走失。在总部撤退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山腰地带后，左权又命令几个人回头寻找，看后面还有没有掉队的。

八路军总部机要科译电员，没有一个落入敌手，也没有一个掉队。

头顶上，日军的飞机还在来回轰炸；山脚下，大批的日军开始登山。

八路军总部目标太大，必须再次分开，觅路突围。

左权要和彭德怀分开了。

左权要求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着仅有的两个警卫排掩护彭德怀突围，彭德怀不同意，他不愿意离开大部队，要和

大家一起突围。

一向温和的左权发脾气了，他对着彭德怀怒吼：“你不走，我怎么打？你走了，我才能放心打。”左权让身边的人推着彭德怀上马，然后派了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和一个警卫排保护彭德怀。彭德怀只好离开了。

彭德怀走后，左权准备带着其余的人突围，突然发现担着文件箱的挑夫没有跟上来。文件箱里，放着八路军总部的各种机密文件，异常重要。

左权让身边的警卫员郭树堡快去寻找挑夫，郭树堡不答应，他说警卫员的职责是保护首长，时刻不能离开首长，尤其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中。

左权说：“你熟悉路径，快去找，我们在北艾铺方向汇合。”

郭树堡含泪离去。

左权带着大量缺乏战斗力的文职人员又开始了突围，人群拥挤着，沿着山间小道快步行走。杨云溪说，刚走出不远，突然看到唐万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他拉着左权的衣袖说：“参谋长，快跟我走。”

左权满脸诧异，他大声问唐万成：“你怎么回来了？老总

呢？”

唐万成说，他们已经掩护彭德怀突出重围，现在是回来接应左权。然而，左权不走。

唐万成不愿意离开，他执意要带着左权一起走，此时，日军的包围圈尚未合拢，如果左权跟着唐万成突围，一定能够冲出去。可是，左权放弃了生的机会，他对唐万成说：“你快点去追老总，老总千万不能出事。”

唐万成还是不愿意走，左权拔出手枪，对着唐万成喊道：“快走！老总要有什么闪失，我枪毙你。”

唐万成眼含热泪，离去。

左权带着这支庞大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继续向北突围。日军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在身边爆炸，有人胆怯了，躲藏在山洞里。左权站在路边高喊：“不要隐藏了，赶快冲，冲出去就是胜利。”他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声音嘶哑。

午后，这支缺乏战斗力的部队来到了十字岭的高坡上，这是日军封锁线的最后一个垭口，只要冲过了这里，就算冲出了重围。不远处的北艾铺，八路军正在急速赶来救援。

垭口上，是日军的一支炮兵部队，他们掉转炮口，对准

这一群手无寸铁的人。

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落下来，左权没有躲避，他回头对着人群喊：“快卧倒！”声音刚落，第二发炮弹又落下来，左权仰面倒了下去，杨云溪就在距离左权十米远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

杨云溪说，炮弹落下来的时候，大家让参谋长赶快避开，可是他不管不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了下去。

左权就这样牺牲了，他是八路军抗战时期牺牲的官职最高的指挥官。

左权完全可以不死，他有两次生还的机会，第一次，他完全可以跟着唐万成突围，可是他没有去；第二次，日军第一颗炮弹落下后，他完全可以躲避，可是他没有躲避。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左权选择了死。

左权倒下去了，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扑上去，看到左权头部、胸部、腰部都中弹了，已经停止了呼吸。

杨云溪说，当时形势异常危急，根本就来不及掩埋，也根本不可能抬走，大家把他手中紧握的小手枪取下来，将他抬到路边的灌木丛中。然后，继续分头突围。

然而，日军太多了，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漫山遍野，从四面冲了过来。有一支突围队伍被日军逼到了悬崖边，这里，已经退无可退，前面是凶残的日本人，身后就是万丈深渊。有人喊：“有枪的留下来，没枪的跳下去，不能当俘虏。”于是，一群又一群八路军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山谷中堆满了尸骨。

杨云溪说，他跟着一群人冲到了山谷，看到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头上也缠着绷带，身边的人都带着伤。后来，他跟着罗瑞卿冲出了包围圈。

两天后，日军撤退。

三天后，杨云溪见到了彭德怀，有人把左权的左轮手枪交给彭德怀，彭德怀没有接，他眼圈发红，难过得背过身去。

而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与滕代远的妻子林一，在日军合围时，躲进了山洞内，没吃没喝，三天后，八路军总部的搜寻队发现她们时，她们已经奄奄一息。

十字岭战役，是八路军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而这次战役中，一共有多少八路军壮烈牺牲，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我能够了解到的是，在这次惨烈的战役中，八路军至少牺牲了 8000 人，也有人说是 9000 人。

在十字岭战役中，牺牲的八路军领导人还有：八路军司令部秘书长张友清、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政委孙开楚、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瀚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有一年，我在新华社工作，听讲述新华社历史时，才得知十字岭战役中，新华社牺牲了 46 人，而整个抗战中，新华社牺牲的人共 110 人。

左权是黄埔一期，是陈赓和徐向前的同学，是林彪的师兄，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中极少数的黄埔生之一。而且，左权黄埔毕业后，又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学历的，仅有左权一人。

陈赓、徐向前、林彪上过黄埔军校，但没有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刘亚楼、李天佑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但没有上过黄埔军校。只有左权一人，接受了中国和苏联最高军事院校的教育。

而在国民党军队方面，能够接受中西方最高军事院校教育的，也只有廖耀湘将军一人。廖耀湘是黄埔六期，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拿破仑一手创办的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后任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军长。

左权是中国抗日军人中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

左权留苏回国后，和共产党军队中另一个奇才林彪搭档，创造了不败战绩。当时，林彪是红一军团军团长，而左权是红一军团参谋长。林彪是一个很孤傲的人，但是唯独和左权惺惺相惜，两人共事五年，配合默契，情谊深长。因为林彪的特立独行和卓尔不群，红一军团政委换过好几个，但是红一军团的参谋长始终是左权。

左权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当年红一军团的老红军说，左权书不离手，为人谦和，思维缜密，寡言少语，但是一说话就说到了点子上。

杨云溪说，日军从十字岭退走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着战士找到那片灌木丛，从附近村庄的老乡家中买到一口棺木，就地掩埋了左权将军。

不久，日军截获了八路军“左权失踪”的电报，又杀上了十字岭，到处挖掘寻找，终于挖出了左权将军的棺木，打开后拍照，照片登载在了当时的日伪报纸上。

左权家乡在湖南醴陵，他连续 17 年没有回家，左权的母亲一直以为儿子就在红军队伍里，一直不知道左权牺牲的消息，直到 1949 年，解放军进入醴陵，左权的母亲才得知儿子已经牺牲了七年之久。

左权牺牲的时候，女儿左太北仅两岁。刘伯承与左权关系极好，刘伯承将儿子起名刘太行，左权将女儿起名左太北。

百团大战后，敌后战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日军全面围剿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殉国。

但是，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外公说，八路军刚刚渡过黄河的时候，来到山西前线，不但卫立煌的中央军看不起，阎锡山的晋绥军也看不起，那时候的八路军武器落后，服装破烂，被山西人蔑称为叫花子部队，八路军竖起抗日义旗，半天没有一个人来报名参军，百姓宁愿去晋绥军，也不去这支吃不饱饭的叫花子部队。接着，平型关大捷、七亘村大捷、阳明堡大捷……山西的老百姓说，这是一支打胜仗的部队，于是队伍迅速扩大。

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势。如果没有百团大战，就不会有以后八路军的百万军队。

老百姓喜欢的是抗日的部队，他们愿意加入的，也是真正抗日的部队。

国军在正面抗战，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一个是阵地战，

一个是游击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抗战方式。两个战场都同样悲壮惨烈。

如果没有正面战场上史诗般的血流成河的抗战，中国就会灭亡；同样地，如果没有敌后战场中大面积的迂回穿插牵制围歼，中国也会灭亡。正是因为有大面积的游击战术，让日本人顾此失彼，不得不把一个个师团一个个旅团分成小队，在敌后战场寻找同样分成了小队的中国军队，没想到中国军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零敲碎打，积少成多，取得了胜利。

抗战的胜利，是所有中国人的胜利。

第三章 上高会战

老兵口述

【邹继衍】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一道防线。

上高地处赣北，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无法摆放更多的兵力，所以中国军队就采取梯次防守，一共布置了三条防线，我们 70 军是第一道防线，49 军是第二道防线，74 军是第三道防线，除此之外，还有地方部队采取游击战，在侧翼和背

后偷袭日军。当日军冲破了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我们就撤往两边的高山上；当日军在第三道防线前面受阻后，我们 70 军和 49 军就从山上冲下来，包围日军，予以歼灭。这种战法当时叫磁铁战法。

我们第一道防线打得非常艰苦。那时候，日军有飞机、大炮，而我们营只有机枪，机枪对飞机、大炮起不到作用。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就挖掘战壕，然后在战壕底部再挖掘横向的窑洞。日军轰炸和打炮的时候，我们就藏在窑洞里。炮声响过后，日军就会冲锋，这时候我们再出来阻击。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坚守的那座山叫米山，全是石头，日军的炮弹落下来，碎石乱溅。有一次，日军一阵炮弹过后，我们一个连队就伤亡了 30 多人。

我们坚守到夜晚，发现日军攻破侧翼阵地，将我们快要包围了。那天夜晚，我们准备突围，但是又没有上级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否则就要杀头。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团部的传令兵赶过来了，让我们撤离，我们就离开了战场。

后来才知道，指挥部是要把日军装进口袋里打，所以下令让我们撤离。

【朱光第】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二道防线。

1941 年的元宵节刚过，我们就接到了要开赴上高的命令，当时我们部队还驻扎在浙江金华，从浙江到江西，当时只有一种小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还有日军的飞机轰炸，走走停停，躲避日军飞机，叮叮当当走了十几小时，我们才来到江西鹰潭。从鹰潭到上高还有 500 里，没有汽车，我们全靠一双脚赶路。

我们跑到上高附近的时候，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看到日军烧毁尸体的火焰还没有熄灭，灰烬中还有日军的尸体。

那天晚上我们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身上中弹了，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把我射穿了。后来，有战士把我背到了后方，安置在一座破庙里。破庙里全是伤兵，前半夜听到的都是呻吟声、哭叫声，后半夜声音小下去了，很多人死了。

天亮后，来了一个医生，查看伤员，摸一个，摇摇头；再摸一个，摇摇头。他走到我跟前，摸摸我，对身后的人说：“这个还活着，抬出去。”两个人就把我抬到破庙外面。

后来，我在白鹭洲医院得到了救治，活了下来。

【尹同道】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三道防线。

我以前上黄埔军校炮科，本来学三年，因为战争爆发了，我们这一期学了两年就毕业了。军校本来在广州黄埔，日军攻打广州，我们搬到了湖南醴陵；后来，日军又进攻醴陵，我们又搬到了贵州都匀。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 74 军任炮兵排长。

上高会战的时候，74 军布置在第三道防线。

上高会战有 20 多天，那些天里，我们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没有洗过一次澡，拉着大炮不停地走，日军走到哪里，我们就布置在哪里。

为了拉大炮上山，我们把大炮拆成零部件，背着上山，遇到悬崖峭壁，还需要用绳索把这些铁家伙绑牢后，吊上去。

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大炮，派了飞机轰炸。有一次，炮

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爆炸的气浪将我掀起了好高，万幸的是，大炮完好无损，没有遭到破坏。我们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最好的武器就是这些大炮。

上高人民对我们非常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给我们送粮食、送水。正因为他们提前破坏了交通要道，让日军的坦克、大炮运不上前线。

【魏杰】

我也是坚守第三道防线。

1941 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政府请我们吃饭，饭还没有吃完，就接到师部命令，让我们赶往阵地，说是要打大仗了。我们的师长本来是廖龄奇，但是这时候在外地，就让张灵甫代理师长。

当时，上高县县长叫黄贤度，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上高会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年上高县只有 12 万人，黄贤度组织了三万人给军队搞后勤。他说上高县有三个保证：第一，保证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手中；第二，保

证把上高附近的道路破坏彻底，不让日军坦克、大炮行走；第三，保证上高县不出一个汉奸。这“三个保证”很了不起，保证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营坚守的那座山叫龙形山，山上全是石头，不能挖掘工事，就只能把石头垒起来，用来抵挡。天上飞机炸，不停地轰炸，我们和日军打得很苦。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怕，心里想：自己是单身，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守住了龙形山，然后追赶被打败的敌人。

上高会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战役，日军两个师团和中国军队打，突然有一个师团就离开了，我们扭住剩下的一个狂揍，差点把那名师团长活捉了。

【曹立刚】

我是谍报队的，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

刚刚进入 1941 年，我们谍报队就发现江西境内的日军行动异常，调动频繁。队长派我和一个队员去南昌侦察，我们看到开出南昌东去的火车，窗口都有日军的头颅伸出，而

开进南昌的火车窗户看不到人头。按照常规，这是日军在向南昌东部运兵，日军要在南昌东部打仗了，当时的日军也放出风来说，他们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鹰潭那时候还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仔细一想，这一点又不合常规。要在哪里打仗，要给哪里增兵，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日军不可能让铁路两边的人看到他们在向南昌东面运兵。所以，到了夜晚，我们藏在郊外的草丛中，看到火车远远开来了，我们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阴谋，开进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就说明日军在向南昌增兵，火车上拉的是日军和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后来果然证明了，日军在向南昌增兵，上高会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上高会战后，我潜入南昌，探看日军下一步行动。在南昌的上海酒楼门口，我看到日军戒备森严，不让外人进入酒楼吃饭。当时我就坐在酒楼对面的茶楼上，看到挎着指挥刀的老鬼子一个个走进了酒楼，他们要在那里开会。不多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34 师团师团长犬贺茂自杀未遂，被几名鬼子抬了出来。

纯属无事生非

当八路军炮兵杨云溪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激战的时候，74军炮兵尹同道冒雨开往江西上高前线。

在那里，一场名叫上高会战的战役，即将打响。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取得完胜的战役。

我们打开一张江西省地图，来了解一下上高和上高会战。

上高是位于赣北的一座小县城，至今人口仅有 36 万，而在 1941 年的会战爆发时仅有 12 万人。上高地处湘赣交通要道，而在 1941 年，江西的日军要进入湖南，必须经过上高，日军又将占领薛岳将军占据的长沙作为中国正面战场第一要务。上高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而 1941 年时，19 集团军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上高。

无论对于日军还是中国军队来说，这个赣北小县都异常重要，日军挖空心思要占领，中国军队全力以赴要坚守。

上高一失，江西日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长沙危矣。



当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防区为湖南全省、江西大半部、湖北南部。薛岳，人称“老虎仔”，他的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营长。

罗卓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 19 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薛岳一样，都出生在粤北，不同的是，他是梅州人，

薛岳是韶关人。他又和薛岳一样，都毕业于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保定军校，不同的是，他毕业于 8 期炮科，薛岳毕业于 6 期步科。

19 集团军下辖 49 军、70 军、74 军和第 2 挺进纵队，挺进纵队相当于游击队。74 军是 19 集团军的主力。上高会战打响的时候，陆续参战的还有 72 军和江西保安纵队。江西保安纵队，是江西省政府下属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大约相当于警察部队。然而，在上高会战中，这支“警察部队”照样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上高会战是因为百团大战引起的。所以说，全国形势一盘棋。

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疼了华北日军。华北日军要开展扫荡，剿灭八路军，但是感觉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日本大本营申请增派军队。大本营就决定将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 33 师团调往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现在，安义属于南昌下属的一个县。

33 师团隶属于抗战八年中，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第 11 军，当时第 11 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大本

营将 33 师团调往华北敌后战场极为不满，又加之耳闻大本营还要将他调离，所以，既不满又郁闷。事实上，在 33 师团还没有去往华北，他就先一步被调离了。

当时的华北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了百团大战的日军，惊恐不安，日军大本营将认为最能干的冈村宁次调往华北，专门对付八路军。

33 师团还没有调走，而 20 混成旅团却提前从上海调来南昌了。20 混成旅团有 8000 人，是日军最负盛名的第 5 师团改编的。抗日战争开始后，第 5 师团几乎参加了中国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并于 1939 年配合日本海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准备从南部进攻中国，没想到被中国的机械化第五军和凶蛮的桂军阻挡在昆仑关一线，第 5 师团遭到重创，21 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师团长中村明人被解职，8000 名残兵败将被用军舰运往上海，接受心理治疗和心灵鸡汤。第 5 师团在广岛重新征兵，开赴了印度支那，后又开往太平洋战场。

8000 名在昆仑关战役中饱受摧残的第 5 师团余孽，在上高战役开始前，来到了江西，接替 33 师团布防。

而一直驻扎在南昌重镇的，则是日军的 34 师团。

现在，在赣北的，中国军队是第 19 集团军：49 军、70

军、74 军、第二挺进纵队，九个半师，共约 84000 人；日军是 11 军下辖的 33 师团、34 师团、20 混成旅团，两个半师团，共计 65000 人。

日军师团有一个惯例，每逢师团调动的时候，一定要在调动前惹是生非，破坏一番，然后再走。所以，1941 年 2 月，33 师团接到了开往华北的调令后，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等待时机，想与 19 集团军打一架。

驻扎在南昌郊外的 33 师团想打架，而驻扎在南昌城里的 34 师团也想打架。

33 师团和 34 师团都是 1939 年 2 月在日本本土成立的，又同时于 3 月份到达中国，被编入第 11 军。33 师团打的第一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被打疼了；34 师团参加的第一仗是南昌会战，打赢了，所以还不知道疼。

33 师团还没有开拔，20 混成旅团已经报到了，34 师团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赣北的日军兵力从来没有这么充足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向赣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定稳操胜券。现在，日军 65000 人，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至少需要 20 万左右，才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而现在，近在咫尺的 19 集团军仅有 84000 人，所以 34 师团认为日军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 19 集团军的番号从中国军队的

作战序列中抹去。

34 师团驻扎在南昌，19 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 120 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仅用两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 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 11 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 34 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 18 师团，在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作战，被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 15 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 34 师团信心爆棚，摩拳擦掌，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信了！

于是，在汉口的第 11 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已经拟好了

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稿，俟前线将士凯旋一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军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日军第 11 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

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 33 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 34 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

33 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 1941 年 2 月 14 日。

第 19 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写道：

2 月间，敌利用伪组织，两次放出将进攻鹰潭、临川之消息，3 月初间，又在赣江东岸方面，施行诸种欺骗手段……并征用民夫四千多人修补道路，空军与战车亦极活跃，似有向临川、鹰潭进犯模样，实则吸引我注意力于赣江东岸，施行其声东击西之惯技也。

老兵曹立刚是 19 集团军司令部谍报队的一名队员。谍报队员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1940 年冬季和 1941 年春季，日军一直在叫嚣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当时鹰潭在中国军队手中。谍报队就派出曹立刚和一名谍报队员，埋伏在南昌附近，他们看到，开出南昌的火车上，窗口都有日军人头在晃动，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口，看不到日军人影。

这一现象让曹立刚感到蹊跷，日军要向哪里增兵，要在哪里作战，这是军事机密，怎么会轻易就让人识破呢？到了

夜晚，曹立刚和那名队员藏身在铁路边的草丛中，看到火车开来了，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诡计。开往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充分说明，日军是在向南昌增兵，车厢里拉的是士兵和大炮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

除了谍报队员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外，日军也意外暴露了自己的阴谋。

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写道，司令部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了不断出现“鄱阳作战”的字样，而且频繁出现“丰城、清江、新余、上高”等地名，而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第3飞行团司令远藤三郎写给34师团师团长贺茂的信件，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

当时，司令部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日军想要进攻上高了。上高是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

这个远藤三郎脑子不但进水了，而且进豆浆了。

当时的赣北形势是，敌强我弱，19集团军与33师团和34师团长期鏖战，而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第20混成旅团，而第20混成旅团的前身第5师团曾经横扫华北战场，击败

了阎锡山几十万晋绥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团。所以，日军上下都想当然地认为，19 集团军被歼灭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按照常规想法，在这种没有胜算的情势下，19 集团军应该退避，不要与日军接战。但是，19 集团军司令部决定，采用磁铁战术，将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变成一块磁铁，将日军吸引在上高附近，然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包抄，将日军一举歼灭。



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缴获日军的部分武器

上高会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来电报：“上高失守，师长以上，提头来见。”而在上高会战开始前夕，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大喊：“我意已决，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提头来见。”

罗卓英是知识分子出身，考取保定军校前，在粤北的一所中学任校长。在保定军校和陈诚是同学，关系密切。

上高会战前，双方都在释放烟幕弹。

日本在对中国军队用计，号称进攻鹰潭；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用计，号称进攻南昌。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的计策，而日军没有识破中国军队的计策。日军向鹰潭方向运动了四天后，就折返而回；中国军队只派出小部队大张旗鼓进攻南昌，而大部队秘密部署在日军进攻上高的必经之路上。

1941年3月，正逢江南梅雨天气，连阴天，连绵雨，将赣北泡成了一块充盈的海绵。阡陌小道和泥巴路面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走，不适合穿着皮鞋的日军行走，却适合扛着步枪的中国军人行走，适合穿着草鞋的双脚行走。所以，当笨重的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完毕时，中国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日军兵分三路：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

成旅团。

战争一开始，日军骄横轻敌、缺乏统一指挥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3月15日，当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发起进攻时，34师团在南昌按兵不动，谁也不知道战争打响的这一天，34师团在南昌干什么。一直到3月16日，中路的34师团才开始了进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高会战时，日军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部，这才是最要命的。日军两个半师团与中国九个半师交战，却没有统一指挥，两个半师团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这是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木下勇的《鄱阳作战》中记述：

军司令部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导和调整的记录，始终没有找到。而且，这是三个兵团并力作战，第11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的。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会战开始，各司令部的意见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对于上高会战部署的记录找不到，对于上高会战没有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然而，木下勇有一点没有写到，上高会战的时期，正是 11 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前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往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此后开始了对敌后根据地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后 11 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刚从第七师团师团长任上调来。就在这个空白期，上高会战爆发了。

园部和一郎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他一上任就遭遇上高会战，一战就损失惨重，马上就被贬为军部参议，此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结一下上高会战中日军指挥官的结局也是很有意思的。上高会战后，11 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贬；34 师团长大贺茂带着数百残兵败将侥幸逃脱，被就地免职；20 混成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也遭处罚。在上高会战后，唯独 11 军参谋长木下勇和 33 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没有遭受处罚。可是，木下勇死于 1945 年 7 月 7 日，樱井省三死于 1985 年 7 月 7 日。两个人都死于卢沟桥事变的 7 月 7 日，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惩罚？

惨烈的外围阻击战

1941 年 3 月 14 日夜半，安义前线，大量日军斥候部队在中国军队警戒线内出没，并向守军阵地发炮。3 月 15 日凌晨 3 时，日军大部队鼓噪而行，大举进攻。上高会战爆发了。安义，驻扎着日军 33 师团。这支即将离开江西正面战场调往华北敌后战场的日军，成为上高会战的急先锋。

阻挡 33 师团的，是中国军队 70 军。

邹继衍是 70 军 107 师 320 团一营少校营长，他亲历了上高会战的全过程。

早在上高会战爆发前的 1 个月，邹继衍就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秘密文件，得悉日军即将向上高发起进攻。邹继衍所在的 107 师驻扎在奉新县，为 33 师团进攻上高的必由之路。打开江西省地图就能够看到，奉新县和 33 师团驻扎的安义

县接壤，两座县城相距仅有 20 公里。

邹继衍接到的命令是，“敌如进犯，立予坚决迎击”。那时候，为了保密，作为下级军官的营长邹继衍，是不可能知道 19 集团军制订的磁铁战术和诱敌深入的计策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有浴血疆场，以死报国。

邹继衍的防区里，有一座山峰叫作米山，地势险要，邹继衍派一连携带一挺重机枪登上米山，据险坚守；派第 2 连坚守米山下的开阔地带，挖掘壕沟；派第 3 连作为全营的预备队，坚守第二道防线。那时候，中国军队里还没有大量使用地雷，为了对付日军坦克的攻击，战士们把集束手榴弹埋在土坑里，然后用绳子牵引着，躲藏在路边的草丛中，等到日军的坦克经过，就拉响手榴弹。这样，即使集束手榴弹侥幸炸毁了坦克，但拉响手榴弹的战士因为行踪暴露，也难以生还。

中国战场大量出现地雷，是在冈村宁次来到华北战场大举进行扫荡的时候，才开始大批量生产的。后来，这种中国军队眼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敌后战场被引进到正面战场，在 1944 年的桂林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就曾经用地雷阻击日军的进攻。

1 营的前面还有 3 营，3 营营长叫王学钦。米山的前面

还有虬岭，邹继衍的 1 营坚守米山，王学钦的 3 营坚守虬岭。日军 33 师团要向上高方向攻击，先要迈过奉新这道坎，而中国军队要在奉新阵地阻击日军，第一道防线为虬岭，第二道防线为米山。第 2 营又部署在第 1 营和第 3 营的后面。因为山形水势，中国军队只能采取梯形防守。这样的地势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日军依靠飞机、坦克和大炮，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而中国军队只能节节反抗，第一道防线守不住了，退往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守不住了，只能继续向后退却。

当日军向 3 营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邹继衍只能在后观看，因为 3 营的狭窄阵地，无法再装上邹继衍的 1 营人马。想想看，上高会战发生地的赣北，方圆只有几百里，而中日双方的十余万人就在这个狭小的区域里胶着厮杀，确实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即使 1 营没有进入虬岭一线阵地防守，虬岭上的人数也显得过分稠密，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对着虬岭狂轰滥炸，而没有飞机和高射炮的中国军队只能被动挨打，所以第 3 营伤亡很大，邹继衍看到担架不断地从虬岭上抬下，战士们的鲜血流了一路。

飞机和山炮轰过后，日军发起了冲锋，3 营依托有利地形，奋起还击。邹继衍站在米山阵地上看到，虬岭附近浓烟

密布，火光冲天，枪炮轰鸣，声震山岳，当时的激烈战况完全能够想得到。

从凌晨 3 时到午后 2 时，王学钦指挥的 3 营战士与日军激战了 11 小时，日军无法攻克虬岭。后来，日军十余辆坦克强行通过虬岭防线，迂回到了虬岭后方，对 3 营进行前后夹击。

107 师师长宋英仲得知 3 营处境危急，就命令 3 营向后撤退。3 营坚守 11 小时，宋英仲没有命令 3 营继续坚守，没有命令 3 营与阵地共存亡，而是看到情况危急，下令撤退，可以看出，师长宋英仲应该知道罗卓英诱敌深入的计策的。

这是上高会战的第一战，3 营以 500 人坚守阵地，抗击日军 33 师团 33 步兵联队荒木正二的前锋部队立体进攻，长达 11 小时。这个战绩无论如何都是很不错的。

3 营撤出虬岭，日军随后尾追，邹继衍的 1 营放过了 3 营后，突然杀出，迎头痛击日军。

1 营驻扎的米山，和虬岭一样，也是一道天堑。

日军的战术异常僵化，每逢进攻，先轰炸，再炮击，后冲锋，总是一成不变的三板斧。邹继衍事先在阵地各个制高点设置了高射机枪火力点，专门用来对付日军的飞机轰炸，

日军的飞机一出现在低空，各个机枪火力点就对准飞机猛烈扫射，让日军飞机不敢低空飞行，只能躲在高空中盲目投弹，有时候，日军的飞机还把炸弹投在进攻的日军队伍中。这样误炸的事例，在日军中很多。比如，此次与国军 70 军交战的日军 33 步兵联队联队长荒木正二，以后就是死在缅甸战场上，他的死亡也很有意思，是被日军的飞机误炸而死的。



轰炸过后，日军开始了炮击。由于 19 集团军事先知道了日军会来攻打上高，所以命令 70 军加强防务，70 军在所有的阻击点都挖掘了战壕，而且这种战壕下还挖有横向的洞穴，便于躲避日军的炮弹，所以，日军虽然炮声隆隆，但是收效

甚微。

炮击过后，日军开始了冲锋。然而，米山周边是一片开阔地，中国军人躲在事先挖好的战壕里，只要日军冲到了射程之内，只需用轻重火力照着视线内的人影招呼就行了。所以，日军一直攻打到了黄昏，依然无法突破邹继衍指挥的 1 营阵地，遗尸上百。

米山下战果可喜，可是米山上却险象环生。

坚守米山下的 2 连，在挖掘工事的时候，将工事边的石头全部捡起来，挖掘深坑进行掩埋。这样，如果日军的炸弹落在阵地上，就会减少威力。炸弹如果落在石头上，石屑纷飞，每一块石片都是刀片，造成的杀伤力是非常惊人的。

然而，米山上怪石嵯峨，漫山遍野都是石头，坚守的 1 连毫无办法。而且，在这样的石头阵地上，也无法挖掘战壕，所以，当日军的炮弹落在米山上的时候，战士们只能借助峭壁，蜷起身体，保护自己。这一天，日军的炮弹过后，1 连就被飞溅而起的石块和石片砸伤了 30 多个人，还有一挺轻机枪被炸坏了。

炮弹过后，日军开始了冲锋。在武士道精神的蛊惑下，日军冲锋的时候都挺着刺刀，高喊着“呀，呀”。一名北方的

战士对连长易孝生说：“这些个日本人咋还把咱叫爷爷呢？”在北方很多乡村，对爷爷的口头称呼不是 ye，而是 ya。易孝生笑着说：“叫爷爷也不顶用，爷爷照样揍他个龟孙子。”

日军冲到了距离阵地仅有几十米的距离，易孝生站起来喊：“揍龟孙子！”躲在石头后的战士一齐站起身来，所有的枪支一齐喷出火舌，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倒下了一片。然而，后面的日军依仗人多，照样鼓噪而上，1 连仅有的一架重机枪欢叫着，日军像叠罗汉一样一层层倒了下去。

就这样，1 连依仗着绝对有利的山势，坚持到了黄昏。

入夜，米山的前哨阵地上突然出现了十几名老百姓，他们满脸惊恐，对着前哨阵地坚守的一个班打着手势，让别开枪，还用含混不清的话语喊着。战士们感到很蹊跷，阵地上怎么会出现老百姓？战前，老百姓已经被疏散到了遥远的山区，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这十几个老百姓来到前哨阵地，突然从衣服下掏出短枪射击，原来这些人是日军的便衣。战士们奋起还击，子弹像蝗虫一样在夜空中飞窜。几分钟短兵相接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这下日军吃了大亏，他们手中都是短枪，而战士们手中都是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番激战，日军一个个倒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了一名日本兵，他看着四面合围而来的滴着鲜血

的刺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作揖，口中喊着：“爸爸饶命，爸爸饶命。”

战士们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鬼子兵还会说中国话。他们将这名鬼子兵拎起来审问，鬼子兵说，他出生在台湾，是被日本人抓了壮丁。

午夜时分，更多的鬼子偷袭上来，包围了前哨阵地。坚守在前哨阵地的一班战士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抵挡日军的冲击。副班长负伤了，班长命令副班长带着全班仅有的一挺轻机枪撤出战斗，向后归队。副班长要求留下来作战，班长厉声喝道：“快走，不能把机枪留给日本人！”副班长只好含泪离开前哨阵地。

战斗过后，前哨班除负伤的副班长幸存外，其余 11 人壮烈牺牲，那名台湾士兵也死在了前哨阵地。

我查阅资料，得知这名班长名叫胡晃。

日军突破了前哨阵地后，继续向着米山蜂拥而来，易孝生带着全连血战，战至黎明，全连伤亡惨重，退到了米山主峰阵地。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来，随同太阳出现的，还有日军的飞机，飞机飞临米山主峰，狂轰滥炸，形势危如累卵。连长

易孝生派来通信兵，向营长邹继衍请求支援。营长邹继衍打电话给团长王陶，说明了米山阵地当前的战况，团长王陶表示，他会请示师长，看如何处置。几分钟后，团长王陶打来电话说，师长宋英仲已经知悉了目前的情况，鉴于米山前无据点，后失依托，防守困难，命令全团战士后撤五华里，围绕米岭为轴心，建立一个半圆形的防守工事，继续坚决地不顾伤亡地阻击敌人。



中国军队指挥官率部冲锋

我们从这些通话中可以分析出来，罗卓英诱敌深入的磁

铁战术，只通知到了师长一级，连团长也不知道。然而，诱敌深入不是不战就跑，让日军追在后面，被动挨打，而是节节防守，将外围的日军逐渐引入里圈，然后外线部队聚而歼之。

邹继衍命令易孝生的那一连战士后撤，当这连战士归还建制时，发现已经伤亡过半。

战后，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开战第一天的战况是这样写的：

我逐次转入米岭、狮子棱等主阵地，与敌相持，黄昏后，敌千余由潦水南岸两师结合部钻入棺材山一带，我27团之一部，与敌激战彻夜。

千名日军从70军预九师和107师的结合部突袭，而预九师27团的一部竟然能够和日军激战彻夜，不能不承认19集团军的战斗力很不错。预九师的这一个团的一部，居然能够和数量相等，也许超过自身数量的日军，从黄昏打到天亮，着实让人振奋。

按照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部署，部队番号前面加上“预”，都是新编部队，装备不如正规师，战斗力也不如正规师。一

个预备师能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日军肯定没有想到；上高会战第一天就打得这样艰苦，日军肯定也没有想到。

74 军 57 师的老兵尹同道说，上高会战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耳闻到远处的炮声，没有去增援，而是向上高城外急速前进。

尹同道是黄埔 16 期 20 纵队炮科毕业生，他是 1938 年秋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岛上上课没有多久，因为广州失陷，黄埔军校又搬迁到了湖南醴陵，不久，醴陵又失陷，黄埔军校又从醴陵搬迁到了贵州都匀。军事学校在一年内搬迁了两次，学生在三个地方上课，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黄埔军校的学制本来是三年，可是因为战事紧急，第 16 期学员只学习了两年，就匆匆毕业了。尹同道被分配在 74 军 57 师炮 2 团做排长。

尹同道说，在 74 军，从军长到排长，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74 军的大炮是 75 毫米德国造山炮，威力惊人。尹同道所在的炮排有两门这样的山炮。但是这样的山炮也有缺点，就是适合阵地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因为炮身笨重，搬运非常

困难。

上高会战开始前，尹同道所在的 57 师驻扎在江西省清江县泗溪镇，现在，清江县改名为樟树市，从地图上能够看出来，樟树市距离上高县直线距离也有近百公里。

1941 年 3 月的赣北，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不堪。75 毫米的德国造山炮因为缺少机车牵引，炮兵们只好将大炮拆成零部件，每个人扛着一部分在漫天大雨中向上高奔跑。为了减轻负担，他们丢弃了炮身前的挡板。尹同道说：“大炮没有了挡板，就等于赤膊上阵，日军的炮弹打过来，你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炮筒很重，尹同道看到两个人抬着，在大雨中奔跑，他们的肩膀渗出了血迹，殷红一片。

19 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开战第一天的部署是这样写的：

第 74 军 51 师在原位置，保持机动，准备策应各方作战；57、58 两师，应适时占领第三阵地线。

罗卓英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当日军筋疲力尽攻到上高

城外的第三阵地时，74 军才突然出击。74 军下辖 51 师、57 师、58 师。51 师师长是李天霞，57 师师长是余程万，58 师师长是廖龄奇，但是因为廖龄奇有病，由副师长张灵甫代为指挥 58 师。

李天霞，在上高会战中表现出色，完全不像一些影视剧中出现的那个贼头贼脑、獐头鼠目的腌臢货色。上高会战后，蒋介石将第一号“陆海空军武功状”奖给了李天霞。李天霞是黄埔三期，和死守衡阳的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是同班同学。

余程万，就是那个震惊中外的常德保卫战的指挥者。

张灵甫，后来成为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从米山撤出后，邹继衍率领 1 营战士坚守米岭。

战斗刚刚开始了两小时，邹继衍所在阵地的右翼就已经被日军突破，日军像蝗虫一样拥过来，一颗颗炮弹就在营部周围爆炸。邹继衍命全营仅有的两挺重机枪一左一右占领营部附近的制高点，向着蜂拥而来的日军没命地扫射；又命令 2 连长强国臣带着一个加强排，迂回到日军背后逆袭；然后，邹继衍带着防毒排，挺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上去。防毒排，这是全营仅有的预备队，由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不到万不

得已，营长邹继衍是舍不得用他们的。

米岭上，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爆炸声，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被炸弹炸飞又落下的断臂残肢。不知道过了多久，夜幕降临了，日军退却了。战士们摇摇晃晃地靠在一起，清点人数，发现排长刘兴国和 60 多名战士牺牲了，3 连连长何鑫左手和右肋受了重伤。

入夜，为了防止日军偷袭，战士们顾不得疲劳，就地挖掘壕沟。而日军也因为疲劳过度，没有偷袭。

夜色愈来愈浓，邹继衍登上了米岭主峰，看到米岭之下，前后左右，都是火光。在这样漆黑的夜晚，火光像一条腰带，围绕在米岭的周围，大约有十几里长。夜色像汹涌澎湃的大海，而米岭则是一座孤独的岛屿，海水随时都会把这座孤岛淹没。邹继衍神色凝重，他明白，他们已经被日军彻底包围了。

在鏖战尚未开始，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战场上的动态，1 营营长邹继衍就与 2 营营长鲁麾戈约定，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与日军的接触地带全部点上火把，这样，站在高处，对战场上的形势就能够一目了然。

现在，1 营和 2 营已经全部被日军包围了，而 3 营王学

钦部因为驻扎在虬岭，最先与日军交手，激战 11 小时，丧失战斗力，已经撤出了战场。

战场上一片静寂，只有火把在夜风中无声飘摇，中国军人困了，日军也困了，然后，也许后半夜，也许天亮，日军就会发起攻击，1 营和 2 营危在旦夕。

邹继衍想率领部队趁着夜色和日军疲乏，突围而出，可是，没有师部和团部的命令，邹继衍不敢自做主张，如果带队突围，就是擅离职守，是会被杀头的。想与团部和师部联系，已无可能，下午的一番拼杀，营部的电话线被炸断，电话机也被炸坏。

怎么办？不能擅自突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生死弟兄无谓地牺牲。

邻近午夜，邹继衍带着传令兵摸黑来到了 2 营的防区，很顺利地找到了 2 营营长鲁麾戈，他问 2 营是否与团部取得联系。鲁麾戈说，他们的电话机也被炸坏了，两次派人与团部联系，至今都没有回来，不知道团部的情况怎么样。

邹继衍指着山下的火光对鲁麾戈说：“两营弟兄的生死存亡压在你我的肩上，我们必须趁着夜色突围，拂晓前一定要冲出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鲁麾戈沉吟良久，他说：“军人守土有责，没有命令擅自后退，会军法从事。”

邹继衍也犹豫了，两人枯坐无言，一筹莫展。

后来，他们商定，每营各派两名精干聪明的战士，寻隙越过日军的包围圈，向后方寻找团部或者师部，无论是否能够寻找到，凌晨两点都要赶回来。到时候，再决定是否突围。

四名战士走出去后，邹继衍感到肚子饿了，这才意识到几乎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草草填过肚子后，邹继衍向自己1营的防区走去，时，夜色苍茫，寒星寥落，清风拂面，细雨沾衣，走出了几百米远，前面突然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个是2营派出去的联络兵，两个是团部的传令兵。

邹继衍带着这四名战士又返回2营营部，他们带来了团部的消息，团部让他们赶快趁着夜色撤退，渡过锦江。

中国有三条河流都叫锦江，一条在江西，还有两条在贵州和四川。在江西的这条锦江是赣江的支流，流经万载县、上高县和高安市。

邹继衍和鲁麾戈又商量撤退的方案。鉴于1营连日激战，伤亡惨重，而2营作为预备队，伤亡较轻，由2营掩护，1营先撤，等到1营撤出一个小时后，2营再撤退。

1 营趁着夜色悄然疾行，人衔草，马衔环，枪上膛，刀出鞘，队伍的前面集中了全营所有的机枪手，只要遇到日军阻拦，就猛扑上去，全部消灭。幸好一路没有敌情，他们顺利来到了锦江边。

锦江边，团部派来接应的人和十几条渔船，埋伏在草丛中，一看到 1 营走近，就迎了上来。自发前来的渔民划着渔船，载着血染征袍的战士，驶入了浓墨般的夜色里，驶向锦江对岸。

1 营人马刚刚渡过锦江，掩藏好船只，天色大亮，头顶上飞来了九架日本飞机，对着渡口狂轰滥炸。战士们埋伏在草丛中，不露行踪。日本飞机轰炸了一会儿后，看到没有反应，就飞向远方。

邹继衍继续等候断后的 2 营，可是，视线里没有 2 营人马出现。他们去了哪里？

1 营撤走后，2 营开始了行动，可是，日军已经发觉了他们的意图。

当 1 营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冲向锦江岸边时，日军的哨兵已经发现了他们，然而，那些力量单薄的哨兵和小队日军不敢与这些破釜沉舟的中国军人交火，他们选择了逃避和报

信。而等到大队日军赶来的时候，1 营已经迅速冲出了包围圈，而 2 营却被他们围住了。

通往锦江的道路被日军切断，2 营只能且战且走，寻隙突围。整整两天来，2 营一直与日军交战，直到午夜时分，2 营才在高安方向渡过了锦江。

邹继衍后来回忆说，从虬岭到米山，再到米岭，70 军 107 师 320 团打得相当顽强，迟滞了日军对上高的进攻速度，为上高保卫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但是，战争才开始了两天，邹继衍的 320 团就损失了 500 多人，战士们作战不可谓不勇敢，然而，武器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制空权完全由日军掌握，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被日军洞悉，中国军队坚守的山峰都为石山，炮弹和炸弹落下来，杀伤力巨大。所以，中国军队只能选择节节抵抗，渐次消耗日军的战斗力。

负伤了，很难得到医治

70 军挡住了日军的第一波攻击，49 军和 74 军全速向上高外围集结。

朱光第是 49 军 26 师 78 团 1 营 2 连 6 排排长，上高会战前夕，朱光第所在的部队还在浙江金华布防。

1941 年的元宵节刚刚过完，朱光第就接到命令要紧急开往赣北，因为日军要进攻赣北。从金华到赣北，少说也有七八百公里，千里奔袭，必须轻装上阵，朱光第平时很喜欢读书，不得已就将那些视若至宝的书籍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只带着枪支和干粮袋，就随队开拔了。当年，金华到鹰潭有一种小火车，而这一条线路正好在中国军队的控制区里。朱光第坐在阴暗潮湿的小火车里，一路叮叮当当地开往江西。车厢里塞满了士兵，人挨人，人挤人，彼此连一转身的空间也没有。空气污浊，让人欲呕。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

的是，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刺耳的啸叫声掠过天空，即使在密封的车厢里也能够听到。火车一看到飞机，就全速行驶，与飞机赛跑，而一遇到飞机在前方投弹，火车又紧急刹车，坐在车厢里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那时候的火车速度很慢，又加之以松柴做燃料，动力严重不足，他们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折磨，才来到了鹰潭。

在鹰潭，他们听说日军已经开始进犯高安和上高，顾不上做顿饭，顾不上休息，又一路奔跑着向上高方向赶来。而从鹰潭到上高，还有 500 华里。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很少有汽车，他们只能依靠一双脚板行走，淞沪会战的时候，川军出川抗日，很多人一路走到了上海。徐州会战结束后，他们又依靠一双脚板走到了河南、湖北和安徽。

夜晚，朱光第带着尖刀排来到了一座村庄，村庄里杳无人迹，没有鬼子，也没有百姓，村庄里，凡是能够燃烧的东西都被烧光了，凡是能抢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显然，这座村庄遭受了日军的血洗。

他们继续向前疾走，走到了天亮，突然闻到空气中飘荡着浓烈的臭味，接着看到远处有一股黑烟冉冉升起。他们跑

到近处，才看到是日军焚烧尸体的火堆。几具日军的尸体已经被烧毁了，灰烬中有几粒闪闪发光的铜纽扣，是日军军服上面的，火堆旁还有一把日军的指挥刀，和一架望远镜，显然烧毁的尸体中，有一具是日军的指挥官。

日军无论是战败还是战胜，都有焚烧尸体的规定。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说日军战斗后有运走尸体的习惯，这是不对的，想想看，拉运尸体，这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在情势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怎么可能呢？那时候的日军都是在战斗后将尸体焚烧，装在盒子里，带回国内，以便在靖国神社供奉。

朱光第根据日军尸体的焚烧状况，判断出就在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战斗，然后中国军队撤退了，一部分日军去追击，一部分日军在这里将尸体焚烧，而且，焚烧尸体的日军刚刚离去。

突然，朱光第看到视线里出现了人影。

朱光第果断命令全排仅有的两挺轻机枪飞速占领附近的高地，其余的战士全部散开，借助所有的隐蔽物藏身。

视线里的人影越来越清晰了，走在前面的日军举着膏药旗，晨风吹得旗帜和他们帽子后的屁帘布呼啦啦作响，是日

军。

日军还没有走到近前，而头顶上掠过了两架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膏药标志和飞行员戴着风镜的脸也能看到。日军飞行员欺负中国军人没有飞机和高射炮，在他们的头上肆无忌惮地盘旋，尖厉的啸音震耳欲聋。

一颗炸弹扔下来了，就扔在距离朱光第几米远的地方，炸弹爆炸后，激溅而起的尘土扑打在朱光第的身上，尘土中还挟裹着浓浓的硫黄味。朱光第在地上滚了两滚，滚进了刚才炸弹爆炸的弹坑里。紧接着，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落在十几米开外，朱光第又滚进了第二个弹坑里。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老兵都知道，飞机不可能连续两次将两颗炸弹丢进同一个弹坑里。

飞机扔过六颗炸弹后，就飞走了。全排战士没有一个伤亡，大家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有一个战士笑着说：“日本的老母鸡跑到俺们中国下蛋来了，寻不着窝。”

飞机飞远了，步兵走近了，视线里密密麻麻都是日军，足有上百人，而朱光第这一排人只有 30 多个。

朱光第喊道：“不要怕，把狗日的放近了再打。”

日军越来越近，距离不到 100 米。日军冲锋的时候都端

着刺刀，猫着腰，训练有素。朱光第端起刚刚缴获的日军望远镜，看到最前面的一个日军举着指挥刀，皮肤黝黑，嘴角挂着一滴摇摇欲坠的口水，是个佐官。朱光第放下望远镜，喊声“打”，两挺机枪欢叫着，子弹像泼水一样泼向敌军，那个举着指挥刀的日军佐官仰面倒了下去，指挥刀丢在了一边。日军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有两挺欢叫的机枪，也可能没有想到飞机轰炸过后，中国军队还能顽强抵抗。他们扭转身去，寻找有利地形，中国军队从各种隐蔽物后站起来，对着日军举起了步枪，一颗又一颗子弹啸叫着钻进了日军的屁股里，阵地前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十几具日军的尸体。

中国军队无一伤亡。他们打了日军一个突然袭击。

高地上，两挺轻机枪飞快地更换弹匣，等着日军发动第二次冲锋。

可是，日军没有再进攻。

朱光第正感到奇怪，突然9班长提着步枪跑来了，他对朱光第说：“排长排长，鬼子从左边凹坑里上来了。”朱光第向左边望去，看到在左边远处的草丛里，日军弓着腰悄悄摸上来，像一群贼娃子。朱光第回头喊道：“7班长，带上一挺机枪堵住左边的鬼子，一个也不让过来。”

7 班长姓刘，现在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刘班长答应一声，带着十几个人，扛着一挺机枪过去了。

面前敌情不明，日军有没有后续部队，日军本来应该向上高方向进攻，而现在掉头进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不知道。朱光第想把眼前的情况报告连长，可是来不及了。左边的日军摸上来了，正面的日军也开始进攻了。

朱光第对着弟兄们大喊：“今天是你死我活，弟兄们想活命，就把这群狗日的干掉。”

弟兄们跟着高喊：“把狗日的干掉。”

两挺机枪欢叫着，一挺对着左面，一挺对着正面，步枪也像爆豆一样地响起来，绵稠而紧密。在双方仅有 100 米的阵地上，子弹像鸣叫的知了一样飞来飞去，不断地有人倒下去。

日军依仗人多，越逼越近，距离国军的简易阵地只有四五十米了，他们那一张张因为长期太阳暴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中国军队的子弹已经不多了。

朱光第举起刚刚缴获的日军指挥刀，扭身对着弟兄们喊：“上刺刀，跟我冲，把狗日的压下去。”

朱光第说：“打仗有个窍门，和敌人快要拼刺刀的时候，你要先能够冲起来，你冲起来了，就把对方的士气压下去，你就占了赢面。谁先冲起来谁占便宜。”

朱光第又说：“人总是说生死弟兄生死弟兄，都只是说说，只有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才是生死弟兄，弟兄们要活就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

日军越来越近，弟兄们子弹已经不多了，纷纷从腰间抽出刺刀，装在步枪前。汉阳造和三八大盖不一样，汉阳造的前面没有装刺刀，要拼刺刀的时候，需要取出来，再装上去；三八大盖的前面装有刺刀。几十年后，中国才研发了半自动步枪，前面装有折叠式刺刀，需要拼刺刀的时候，把刺刀打开就行了。

汉阳造在拼刺刀方面不如日军的三八大盖，这是因为汉阳造完全仿制德国八八式步枪，德国的枪械专家也专程来到汉阳兵工厂设计指导。德式的机械制造全球闻名，德式武器在杀伤力方面一贯领先，汉阳造的子弹威力超过三八大盖的子弹，德国人注重的是技术领先，而不是拼刺刀精神，所以，仿德式的汉阳造强调的是子弹的威力，但是在拼刺刀的时候，不占上风。

很多老兵说，被汉阳造射中的日军，很难活命；被三八

大盖射中的中国军人，伤口包扎一下，过几天又出现在战场上。

但是，汉阳造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射程不够。

朱光第准备带着弟兄们冲锋的时候，传令兵突然指着他的后背喊：“排长，血，你的血。”

朱光第用手摸向后背，摸到了一手鲜血，他的后背负伤了，就在他刚才对着弟兄们喊话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射中了他。

朱光第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日军打伤的，我也没有感觉到疼。摸到一手血，我才感到有点疼。”

传令兵要扶着排长朱光第向后面转移，朱光第一把推开了传令兵，他喊道：“别管我，日本人就要到跟前了，和狗日的拼了。”

高处的机枪换过了新的弹匣后，又欢快地响起来，日军倒下了几个后，全都愣住了，他们趴伏在地上，向着中国军队的阵地射击。排附将浑身是血的朱光第拉过来，扛在肩膀上，转身向后跑去。

跑出了几百米远，迎面看到一队中国军人急如流火地跑

来了，因为奔跑过快，有的大口大口喘着气，脸色腊黄；有的眼睛歪斜，口水流在了衣服上，也顾不上擦一把。一名军官模样的人问排附：“前面怎么样了？”排附说：“正打哩。”军官模样的人回头喊：“快点，跟上。”他提着盒子枪跑走了。

朱光第看着从身边跑过的增援部队想：弟兄们有救了。

排附扛着排长朱光第来到了一座院子里，这里就是中国军人的包扎所。排附将排长朱光第放在包扎所后，扭身又跑向战场。排附姓何，他的名字忘记了。

包扎所里还有很多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和地上，呻吟声此起彼伏。一名中年医生走过来，他用剪刀剪开了朱光第的衣服，朱光第看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他的身体穿过去了，前胸后背都是弹孔，现在，朱光第才感到钻心一般的疼痛，他握紧拳头，身体颤抖着，额头上都是汗珠。

他想，受了这么重的伤，他可能快要死了。

医生用绷带将朱光第的前胸后背包扎好以后，又让他吞吃了一粒止痛药，没有水，他只能干咽下去。朱光第的手触到了腰间，这才发现腰上一直别着那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胸前还挂着缴获的日军望远镜。朱光第对医生说，请他收下这把指挥刀和望远镜，以后打仗还有用的。医生小心地解下

指挥刀和望远镜，放在一边。

朱光第又说：“请你写信告诉我母亲，就说他的儿子是为国牺牲了。”他告诉了医生自己家的地址。

医生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在一张纸片上记下了他的话，点点头说：“好，你安心下去吧。”

医生的脸上平静如水，他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景。

医生对着门外一招手，进来了两个当地的农民，他们把朱光第扶上担架，抬出了院子，一路小跑着抬到了一座破庙里。

破庙很破，彩色的泥塑东倒西歪，透过房顶能够看到蓝蓝的天空，显然这里遭受过日军的轰炸。破庙里空气污浊，尘灰气味和血腥气味汹涌澎湃，刺激得人直想打喷嚏。案几上，木门后，地面上，到处都是伤兵，有的睁开眼睛，无神地望着屋顶；有的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否还活着；有的形容枯槁，轻声呻吟着；有的头歪斜着，一动也不动……中国的士兵，在战场上负伤后，只能被安置在环境恶劣的破庙里，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唯一的药物就是止疼药，此后，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能挺过来的，就捡了一条命；挺不过来的，就做了无名烈士，死后连一块墓碑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他们

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他们像一粒灰尘一样，轻飘飘飞起，又轻飘飘落下。我想起了看过的美国电影《珍珠港》和美国的其它“二战”电影，与中国抗战同一时期的美军战地医院窗明几净，医药齐全，受伤的美军士兵不但能够在安静的医院里得到疗伤，还能和漂亮的女护士谈恋爱。

朱光第在破庙里度过了难挨的一晚，那一晚，不断有伤兵被抬进来，刚开始还在呻吟，后来就悄无声息。那一晚，所有的伤兵都粒米未进，饥肠辘辘。朱光第身上的伤口疼如刀绞，一会儿他疼昏过去，一会儿又醒过来。月光从庙顶上的破洞照进来，照着破庙里一张张木然的失去血色的脸和渗透了血液的绷带。朱光第看着这一切，感觉宛若梦境，恍若隔世。

天亮后，破庙外进来了一名医生，他一个个摸着伤兵们的脑袋，又从他们一个个的身体上跨过去，他摸到奄奄一息的朱光第面前时，对着门外喊：“这个还活着，快点送走。”

门外进来了两个人，也是当地农民打扮，他们将朱光第抬上了一辆牛车。鞭子一声脆响，老牛慢腾腾地上路了，翻山越岭，不停不歇，到了下午，朱光第来到了吉安白鹭洲第14后方医院。

这座医院里有一台X光机，而医生有很多都来自盟国医

疗队。那个年代的中国医生绝大多数都是中医，西医非常少。中医对外伤的治疗效果，远远不及西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外国的医生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他们学习，只要我们具有了他们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时候从外国来到中国的医生有多少？没有具体的资料记载，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在新一军从事医疗救治工作的外国医生就有 500 人，这是新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孙克刚提供的数据。在所有外国医生中，最著名的是白求恩，他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而在中国广为人知，成为知名度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老外。

那天，一名外国医生对朱光第的伤势进行了 X 光检查，发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前面的肋骨缝隙进去，穿过肺部，从后面的肋骨缝隙贯出，距离心脏和脊椎骨仅有一厘米。

直到现在，朱光第已经负伤超过 20 小时，他才得到诊断。在前线，医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包扎，而在后方医院，他才得到了全面的诊治。

朱光第躺在床上，听到一个中国医生说：“多亏是三八大盖，这要是汉阳造的子弹，肯定没命了。”

给朱光第检查伤势的那名外国医生用汉语说：“你的命真大。”

如果那颗子弹不是三八大盖的，如果那颗子弹再靠近心脏一厘米，如果日军狙击手在射出了第一颗子弹后，再射出一颗子弹，朱光第肯定就牺牲了。大难不死的朱光第躺在病床上，眼睛湿润了。

朱光第在吉安白鹭洲第 14 后方医院躺了一个月，他每天都牵挂着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作战，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活着。每天都有伤兵不断地被送进来，从他们的交谈中，朱光第知道第 19 集团军的将士们在高安和日军作战，在上高和日军作战，他的心揪紧了，他知道上高是罗卓英司令部的所在地，日军攻到了上高，说明形势千钧一发。

大家的心都揪紧了。那些天里，病房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大家都在想着，在这场大战中，中国军队失败了，日本人有可能突然打到这座医院里。

突然有一天，病房里来了一个伤员，他的一只臂膀没有

了，但是他眉飞色舞，笑逐颜开，他转告前方的消息说，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中国军队一直将日本人赶到了南昌城里。

病房里欢声雷动。

不久，朱光第在医院里领到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作《上高会战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上高会战的经过。朱光第第一次得知，这次会战中国军队采取的是“磁铁战术”。

原来，上高会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得知这次会战的战果，异常振奋，他下令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上高会战手册》，分发全军，鼓舞士气。

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朱光第是 1941 年元宵节当天晚上知道部队要打仗了，而另一名抗战老兵魏杰是提前一天知道这个消息的。

魏杰是 74 军 58 师 172 团 3 营副营长，他至今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

搞后勤的县长是共产党员

1941 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宴请 74 军驻扎在上高县的营以上军官。

黄贤度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年后的今天，在上高县城还有人提起这个抗日县长。上高会战中，因为后勤工作做得好，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能够吃上饭，而弹药也比较充足。后勤的有力保障是中国军队取胜的根本。而做后勤工作的，就是黄贤度。黄贤度的身份是国民党县长，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

黄贤度是江西上饶人，29 岁的时候在湖南加入了国民党，两年后的 1938 年，在他的老师黄道介绍下又加入了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颁发党章、党徽之类的东西，黄道说同意他加入共产党了，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组织中，也只有黄道一个人知道他是共产党

员。那时候入党形式很简单，情况特殊。

黄道是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 1900 年，比黄贤度大七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邵式平是同学，并一起在江西开展工作。南昌起义时，和刘伯承秘密联络，并参加了起义。后，与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将领方志敏一起在江西策划武装暴动。红军开始长征后，黄道在闽北从事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和陈毅、张云逸来往甚密。1939 年，黄道在江西樟树市送别了赴桂林的周恩来后，突然发病，住进旅社，求药问医。党史记载，国民党特务派凶手把毒针打入黄道体内，致其死亡。

黄道死后，黄贤度改由当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单线联系。郭潜密令黄贤度发动社会关系，出任上高县县长，中共江西省委还将一批中共党员秘密派到上高，担任各部门重要职务，那时候的上高县，政府秘书、各乡区长、学校校长、警察局长、所有的政府部门官员，全是中共党员。这种情况，国民党一点也不知晓。

上高会战开始后，黄贤度积极号召民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前线将士服务。1987 年 7 月 7 日的《赣中报》曾经登载过对黄贤度的访谈，在这篇文章中，黄贤度说：“当时，

我的公开身份是县长，为了配合这次会战，我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了大批民众支援参战部队，并担负了维持战地治安、疏散战略物质、抢运弹药粮草、接送伤员的任务……民众的抗日激情很高。战斗之中，上高县共组织了四分之一的民众支前。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破路，保障我方军用通信线路的活动。县自卫队也在各方路口查缉甄别，维持秩序，并协助疏散妇孺，使得我方作战部队减少了后方顾虑。”

同一日期的《江西日报》也刊登了黄贤度的回忆录，他写到了上高百姓参战的动人场面：

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为了部队能打败日军，上高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设立接待站，成立向导队。峨坑村民王会元为我军带路，包抄围歼日军一个中队，自己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蒲城青年熊先移为我军刺探日军情报遭敌追捕，不屈不挠，以身殉国。在墓田、泗溪、杨公圩等战场上，当地人民群众自发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配合军队作战，通歼倭寇。

我在上高采访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上高战役很特殊，特殊在于前线作战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后勤供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众。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携手取胜的漂亮战役。

人们还说，当年，当罗卓英告知黄贤度中国军队要在上高大打一场时，黄贤度马上说，上高人民绝对能够做到“三保”——保证运输畅通，把军粮、弹药及时运到前线，把伤员及时转运后方；保证破坏彻底，在交通要道上挖掘堑坑壕沟，让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丧失殆尽；保证后方没有汉奸特务，上高县 12 万人不会有一个当汉奸。

12 万人确实没有一个当汉奸；12 万人中，有三万人从事后勤运输；日军所要行走的所有道路都被挖断；前线作战的国军都能吃上饭；每一个日本特务进入上高，都会被绑起来交给军队……共产党员黄贤度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共产党具有卓越的发动群众的能力。

那天晚上，74 军 58 师 172 团 3 营副营长魏杰正在吃饭，突然电话响了，是军部打来的，军部要求所有将士立即归队。魏杰说：“我们饭还没有吃完，就散了，情况这么紧急，肯定是要打大仗了。”

将士们归队后，副师长张灵甫站在队前宣布命令。魏杰说，张灵甫是一个大个子，人长得很高。58 师师长是廖龄奇，但是此时没有归队。58 师师长就由张灵甫代任。

廖龄奇和张灵甫是一对老搭档。在 74 军，廖龄奇任副师长时，张灵甫任旅长；廖龄奇任师长时，张灵甫任副师长；廖龄奇被杀后，张灵甫继任师长。

廖龄奇早先在叶挺手下任职，在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汀泗桥战役中，因作战勇猛，被打残右臂，后只能用左手写字，左手打枪。淞沪会战时，德械师 88 师奋力鏖战，战况紧急，廖龄奇火线升任旅长，坚守上海两月余。南京保卫战中，廖龄奇率领全旅坚守城墙，手下两个团长相继阵亡，他全身浴血，仍拼死坚守。撤退命令下达，才率领仅剩的数百人撤到江北。后，被调到 74 军 58 师。

74 军 51 师师长是李天霞，与张灵甫素来不睦，两人谁也不服谁。张灵甫在 51 师当旅长，不愿意受李天霞压制，就调到了廖龄奇的 58 师任旅长，不久就升为副师长。

很多书籍在写到上高会战时都说，是廖龄奇指挥 74 军 58 师，这是不对的。其实，指挥 58 师作战的是副师长张灵甫。魏杰说：“在整个上高会战中，他接到的都是张灵甫的命令，从来没有见到廖龄奇。”我在上高战役结束后的《忠勇官兵表彰表》中，也没有见到廖龄奇的名字。

上高会战结束后，廖龄奇病愈归队，74 军参加了第二次湘北战役。战役前夕，廖龄奇回老家河南祁阳结婚，没有参

战。此战国军伤亡惨重，追究责任，有人就说廖龄奇临阵脱逃，蒋介石盛怒之下，就枪毙了廖龄奇。



罗卓英

上高会战后，第 19 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战斗部署，罗卓英是以战斗力较弱的第 49 军和 70 军作为赣江两岸的诱击兵团，在第一线和第二线抵抗日军。

在将日军引诱到第三线阵地后，向两翼张开，准备侧击日军。74 军为决战部队，部署在第三线阵地，当日军来到阵前时，“即以猛虎在山之态势，与敌决战，协同各兵团，将敌合击而聚歼之。”地方武装的挺进第二纵队和江西保安纵队和赣北各县自卫队，在日军后方“破坏交通通讯，袭击后方据点，并发动民众，向敌后实施全面扰乱”。

此战法当时被称为“磁铁战法”。

魏杰所在的 74 军 58 师就在第三线阵地。

那天，张灵甫给魏杰布置任务，他说，上高城北面有一座山，名叫龙形山，守住了龙形山，就等于守住了上高城的北面屏障，然后可以居高临下，痛击日军。

当时，营长陈鳌在重庆集训，副营长郭伦初代理营长，另一位副营长魏杰接受了在龙形山阻击日军的任务，在张灵甫面前立了军令状，愿意与阵地共存亡，然后，他带着第 8 连和一个机枪排开赴龙形山。

魏杰说：“接受任务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畏惧，我是单身，死了就死了，就算为国捐躯。”

魏杰带着弟兄们来到上高城北的龙形山阵地前时，看到光秃秃的龙形山，突然大吃一惊，山上没有草木，一览无余，

毫无遮挡，如果开战，日军的每一发炮弹都能够直接命中目标，弟兄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

事已至此，怎么办？弟兄们望着魏杰，魏杰指着龙形山，斩钉截铁地说：“军令状已立，我们绝不后退一步，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座山上。”

龙形山下有一条河流，魏杰命令战士们在河边挖掘壕沟，壕沟边扎起草人，作为疑兵，迷惑日军。然后，魏杰分出一部分人在山上挖掘战壕，山上石头异常坚硬，用铁锹铲下去，只能铲出一条白印子，无奈之下，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垒起来，作为屏障。

当天，无战事。

傍晚时分，从高安方向拥来了一大群逃难的百姓，拖儿带女，哭声震天。他们站立在河边，彷徨无计，惊恐不安。显然，日军已经占领了高安县城。魏杰请示上级该怎么办？上级指示不要管，严防日军偷袭。魏杰说：“我当时想了又想，该怎么办？如果去援救乡亲们，日本人突然出现了怎么办？如果不救乡亲们，又于心何忍？”战士们看着悲怆无奈的乡亲们，询问魏杰。魏杰下定决心，说：“我们抗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救国救民，老百姓有困难，哪能不管？”魏杰分出一半士兵监视日军，另一半士兵护送乡亲们过河。值得庆幸

的是，日军没有衔尾追赶。

士兵们将乡亲们送到通往上高的道路上时，日军还没有出现。魏杰知道日军很快就会进攻，高安已失，与之接壤的上高，很快就会遭受日军侵袭。他命令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只派出固定哨和流动哨密切注意高安方向的动静。

当天夜晚，平安无事。

天亮后，日军出动了。

老兵们回忆起抗战时期日军的战术，总结出两个特点：一是夜晚日军大部队绝不出动，严格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時間，这是由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决定的，飞机、坦克、大炮利于白天作战，视线开阔，目标明确，却都不利于夜战；二是日军每逢作战，先是飞机轰炸，然后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而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太多，只能选择奇袭、夜袭和死守，所以付出的代价就比日军惨重得多。

魏杰说，那天东边刚刚出现了一道霞光，日军的飞机就出现了。

在上高会战中，日军拥有飞机百余架，这百余架飞机组成第三飞行团，由远藤少将指挥；而中国军队没有一架飞机，

中国空军的飞机早就在抗战之初消耗殆尽。上高会战的两个
月后，一个名叫陈纳德的美国人带着一批美国志愿者来到中
国。这群美国人带来的，只有 68 架飞机。而日本当时有多少
架飞机？仅仅陆军航空兵就有 1500 架飞机，而海军航空兵
的飞机数量远远大于陆军航空兵。

天空中出现了两架日军飞机，它们在万道霞光中飞过来，
银白色的机翼闪闪发光。魏杰判断出这应该是日军的侦察机，
因为日军的轰炸机如果出动的时候，一定会像苍蝇一样一哄
而上，狂轰滥炸，而侦察机只会一架两架。当年，日军欺负
中国军队没有飞机，它们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出动的时候，从
来都没有战斗机护航。

魏杰让士兵们趴在壕沟里，避免被日军飞机发现。一名
机枪手要对空射击，魏杰劝告说，飞机飞行极快，要被射中
的概率几乎为零，而且还会暴露目标，不划算。

日军的飞机果然来得很快，战士们刚刚来得及俯下身体，
飞机就飞到了头顶上，它们在龙形山的山顶上盘旋着，扬扬
得意，魏杰看到了机翼上像烧饼一样的膏药旗鲜艳夺目。

飞机在龙形山上盘旋了两圈后，就继续飞向西方。

魏杰让所有人做好准备，他知道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

不久，天空中出现了日军五架轰炸机，五架轰炸机呼啸着掠过龙形山，将河边壕沟上的稻草人炸飞了，日军错误地将那些稻草人当成了中国军队。第一波轰炸过后，空中又出现了十几架日军飞机，对着龙形山和龙形山周围疯狂投弹，魏杰说：“面对日本人的飞机，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在弹坑中跳跃着、躲避着，爆炸的热浪和蒸汽扑过来，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了。”

轰炸过后，远处传来了沉闷的声响，是无数双皮鞋一起叩击地面的声音，这是日军进攻的脚步声，那时候的中国军队都穿着草鞋，条件好的能够穿上布鞋，而日军都是牛皮鞋和猪皮鞋。魏杰一声大喝，士兵们像土拨鼠一样，从掩体里钻出来，抖落掉头上、身上的尘土，准备迎击日军。魏杰举起望远镜，他看到日军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他们喊着号子，排了队形，队伍中还有一面挑在枪刺上的膏药旗，膏药旗四周行走着几个腰挎指挥刀的日军。这一定是日军的指挥官。

魏杰高声喝叫两名重机枪手，把所有的弹匣都准备好，他用手指着日军的太阳旗，对机枪排张排长说：“一会儿枪一响，你们照着太阳旗玩命地打，把这几个带刀的全打死。”

张排长笑着说：“你放心，狗日的来咱这里，就是送死来了。”机枪排排长的名字已经忘记了，只知道他姓张。

日军慢慢地逼近了飘荡着硝烟的龙形山，他们大喇喇地走着，一二一，一二一，喊着号子，膏药旗在风中呼啦啦地飘呀飘，这种情景很像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场景，日军可能没有想到国军会在寸草不生的龙形山上布防，因为这样光秃秃的山岗太不适宜防守了；日军或者想到龙形山上有国军布防，但国军肯定已经在多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下丧失了战斗力，所以他们趾高气扬地、坚定不移地走过来，排着操练队形，而不是战斗队形。

日军慢慢地接近了龙形山，魏杰高喊一声：“打！”士兵们从掩体里一齐露出头来，伸出枪支；重机枪欢叫着，子弹像泼水一样落在了日军整齐的队伍里。日军经过短暂的抵抗后，纷纷向后逃跑。魏杰举起望远镜，再也看不到那面耀武扬威的膏药旗和那几把自鸣得意的指挥刀了。

那几个日军指挥官是多大的官儿，魏杰不知道，但最少也是佐官。

日军逃跑后，魏杰接到了 58 师师部的电话，说日军已经在正面战线全部退却，应立即发起攻击。魏杰带着士兵们发起了冲锋，他站在山顶向两边望去，看到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到处是仓皇逃遁的日军和英勇追击的国军。他们一口气追赶到了日军驻地，看到几间房屋里，日军的行军锅里还盛

着大米稀粥，他摸着锅底，稀粥还是热的。日军逃跑得非常狼狈，连稀粥都来不及喝。

查阅日军资料得知，与魏杰他们交战的，是日军 34 师团 216 联队第 2 大队。日军一个大队有 1200 人，而魏杰率领的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最多也就 200 人，1200 名日军与 200 名国军一触即溃，日军 34 师团的战斗力难道就这么不济？不是的，是因为日军第 2 大队当时已经意识到，他们陷入了 74 军 58 师的包围圈中，如果他们逃得慢了，就会被包了饺子。

34 师团 216 联队第 2 大队大队长木下重四郎不知道他面前的对手是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他没有料到这场会战日军会败得很惨，也没有料到他的性命会丢在上高城外。

上高县的当地人说，魏杰所战斗的那条河流叫浦水，这里距离上高县城有十多公里。

浦水上有一座五孔石桥，这座桥被称为官桥，官桥边有一条官桥街，上高会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33 师团擅自离去

日军开始上高会战的时候，共有三支作战部队，分别是 33 师团、34 师团、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为什么此时仅剩下 34 师团？那两支日军在哪里？

中国人对于 33 师团和它的师团长樱井省三应该很熟悉，因为这是一支和中国多支部队交战的日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33 师团和日军另外三个师团将中国军队赶入了野人山。

而此时，第一次缅甸战役尚未开始，33 师团还在江西与中国军队作战，此战过后，33 师团就要在师团长樱井省三的带领下，开往华北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中国军队作战。

按照时任日军第 11 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日记中的记载，33 师团是在 34 师团的请求下才参加这场中国称为“上高会战”，日本称为“锦江作战”的战役的。田中

新一这个名字，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后来担任日军第 18 师团师团长，在缅北丛林中被孙立人的新一军打得满地找牙。新一军老兵梁振奋曾送给我一张“十八师团关防大印”的拓片，说起过他们缴获这枚大印的情景，我奇怪田中新一的这枚关防大印居然全部是隶书汉字，也许日文中的这几个字和汉字是相同的。

田中新一的日记记载，在“锦江战役”中，34 师团表现很踊跃，而 33 师团则表现消极。其实想来，33 师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再过几天就能够开往华北敌后战场，他们才不愿意在江西与中国军队拼杀，消耗实力，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最后的功劳却都归于 34 师团。

日军第 11 军参谋长木下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 33 师团的作战目的：“33 师团与 34 师团相策应，从左侧攻击第 70 军，将其压制在锦江。”换句话说，33 师团只是将第 70 军赶到 34 师团的战线，就算完成了任务。在这场中国军队上下一心，志在必得，国共两党通力协作的战争中，而 33 师团并不想尽全力。

由于上高会战中日军缺乏统一部署，也由于 33 师团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在激战正酣的时候，战场上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3月19日，也就是上高会战开始后的第四天，34师团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攻占了距离上高仅有几十公里的高安，日军的汽车再有一小时就能够开进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的驻地上高县。而同一天，33师团击退了中国军队第70军的两个师，将这两个师赶到34师团的战线上后，趁着夜色悄然从战场上撤离。而33师团撤离的凤凰圩，距离上高同样只有几十公里。

天亮后，当被33师团一路追赶的第70军第19师和预九师站在连夜加固的阵地前瞭望，突然发现阵地前空无一人，昨夜夜半还在嘈杂喧嚣的日军突然像屁一样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第70军两个师的将士大喜过望，他们扭过头来，全力以赴对付已经陷进包围圈却不自知的日军34师团。

日军34师团在上高会战中吃了大亏，原因就在于33师团将第70军的这两个师——第19师和预九师赶到了他们侧背。这两个师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向着34师团全力出击。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在他的作战回忆中写道：

22日，向毕家前进的师团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辎重部队和野战医院都遭到了敌人袭击，伤亡惨重。这部分重庆军，就是上面所述的，受33师团压制向南而来的预

九师和第 19 师。据此，第 33 师团达到的作战目的，势必使重庆军攻击 34 师团的侧后背。

如果 33 师团没有将第 70 军两个师赶到 34 师团的侧背，情况也不会这样糟。在整个上高会战中，33 师团是在给 34 师团帮倒忙，有了 33 师团，还不如没有 33 师团。

第 19 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在 3 月 18 日有日军 33 师团与第 70 军交战的详细记录，而在 3 月 19 日就没有了关于 33 师团的记载。

日军大本营和第 11 军军部也不知道 33 师团会从战场上突然消失，知道 33 师团这种神秘想法的只有师团长樱井省三一人，他带着手下的一万多人一路向东北行走，当大本营和第 11 军军部知道第 33 师团擅自离开战场，而 34 师团被优势中国军队围困的时候，33 师团已经在赣北的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了上百公里。日军军官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性由此可见一斑，怪不得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中经常发生下级军官胁迫上级军官，甚至刺杀上级军官的情形。

临阵脱逃，这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都是重罪，甚至是死罪，而 33 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毫发无损，依旧担任师团

长。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占尽赢面却临阵脱逃的，也许只有 33 师团和樱井省三这一例。樱井省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33 师团擅离战场，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在哪里？

战斗力最弱的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被中国军队阻击在赣江东岸，早就失去了战斗力，现在，他们由进攻改成了防守，而中国军队已经由守转攻。这支在昆仑关战役中被中国军队打残了的武装，七拼八凑地改编成一支混成旅团，滥竽充数地投放在江西战场，而且独当一面，与势在必得的中国军队作战，日军也太拿自个当腕儿了。

3 月 19 日对于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的记载是这样的：日军强渡赣江时，埋伏在江边的第 49 军 26 师 76 团第 2 营赶到，乘敌半渡，予以重击，歼灭半数，残敌慌乱落船，退守江心沙滩，旋敌约 50 人，复乘民船四艘前来增援，仍被我击沉，敌大部复落江中，该敌从此不敢再觊觎我赣江东岸矣。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的另一支袭击陈家坊，争袭清江城，第 49 军 26 师 76 团另外两个营飞兵赶到，与敌激战，大胜，残敌依据房屋寺观顽抗，遗尸甚众，樟树、清江得以确保无恙。

3月19日是改变战场进程的一天，日军33师团擅自撤离，第20独立混成旅团被打得晕头转向，中国军队当前之敌仅剩34师团。

34师团一路捷报频传，师团长大贺茂也许还在纳闷，为什么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而33师团和第20独立混成旅团却裹足不前。大贺茂不知道他是一头扎进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他就要大祸临头了。

然而，此时日军34师团尽管进入了包围圈，但是依靠精良的装备，依靠坦克开道，直趋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19集团军司令部仍然很危急。

大贺茂也明白，即使被中国军队包了饺子，但是只要攻取了上高，摧毁了第19集团军指挥部，就是胜利，外围的中国军队就会不战而退。中国军队尽管将34师团包了饺子，但是没有一副好牙口，仍然难以啃动。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因为武器落后，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消灭日军的例子很多。最近的就是八路军的关家垸战斗，八路军上万人在彭德怀、刘伯承、陈赓三位名将的指挥下，愣是啃不动山崎大队残敌把守的阵地，而日军大队援兵乘车赶来，八路军最后衔恨离去。

如困兽一般的 34 师团不顾一切地冲向上高，像一条撞进房屋里的疯狗一样，中国军队提着枪支从三面痛击日军，像手提木棍痛击疯狗一样。

上高会战从现在开始，才真正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蓝介愚当时在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他亲眼见证了上高会战的始末。全面抗战前，蓝介愚是广州一所中学的校长；抗战爆发后，蓝介愚毅然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 12 期，毕业后就一直跟随在罗卓英身边，先后参加了上高会战、缅甸战役等重大战事。

1949 年 2 月，蓝介愚跟随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蓝介愚在高校担任教官，而刘伯承元帅任该校校长。

上高会战前夕，蓝介愚曾经做过一首《赣北战歌》：

天苍苍，水茫茫。

鄱阳湖畔好战场，

赣江两岸阵堂堂。

短兵时相接，长刀映日光。

战时归来饮百盅，

醉将敌血写诗章。

上！上！

南昌还有巍巍的古庐山，

滔滔扬子江。

天苍苍，野茫茫。

上高东北好战场，

锦江夹岸阵堂堂。

挥戈除小丑，弹落阵云黄。

歼灭倭奴三百万，

黄龙痛饮返家乡。

上！上！

紫金山在望。

前头更有巍巍的长白山，

滔滔黑龙江。

时隔 70 多年后，这首歌曲的曲谱已经失传了，但是仅仅看看这些歌词，就让人血脉贲张，豪气干云，我们仿佛看到了烽烟滚滚的战场，看到了勇士们持枪跃进的雄姿，听到了先辈们奋勇杀敌的呼喊声，嗅到了风中吹送的硝烟气味。

在上高会战前夕，司令部参谋蓝介愚得到了很多情报，这些情报今天看起来特别有意思：南昌的日军调动极为频繁，北上的火车上，每一个窗口上都露出人头和枪支；然而在南下的火车上，看不到人头和枪支。按照这种表面情况判断，日军是北上增兵，要在北面作战。可是，中国军队的坐探得到的情报是，他们夜间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到北上的火车车身飘浮，声音轻脆；而南下的火车车身沉重，声音沉闷。

中国军队九江的坐探传来情报说：日军要求百姓夜晚关闭门窗，不得向外窥视，但百姓从脚步声判断出，日军有大部队经过九江；中国军队南昌的坐探传来的情报是：日军大部队乘军舰从鄱阳湖登陆。

这些情报中，就有前面写到的老兵曹立刚提供的情报。

这些看似无关的、互不相连的情报，综合起来，就能够

形成一条情报链：日军北上运兵是虚，南昌屯兵是实；九江在南昌之北，鄱阳湖在南昌之东，大批日军在这两地出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南昌。各路日军正在向南昌集结，准备发动战争。

1941年3月15日，日军果然兵分三路，从南昌方向出发，向19集团军进攻。

守卫在上高会战第一线阵地的邹继衍提到了日军的炮兵，而守卫在这场会战第三线阵地的魏杰都没有提到日军的炮兵，按照日军的作战惯例，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可是在上高县城附近的战斗中，日军飞机轰炸过后，步兵就直接冲锋，日军的炮兵部队在哪里？

蓝介愚给出了答案。

上高会战前的一个月，19集团军根据情报分析出日军会进犯上高后，就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共产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带领三万民众拿着镢头和铁锹，将所有的道路都破坏殆尽。日军要修复这样的道路，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漫长的时间，这对于战机稍纵即逝和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显然是不适宜的。日军迫于无奈，只能选择乡间小路，翻越

崇山峻岭，排成一路纵队向上高前进。而遇到陡峭的山崖，日军的马匹都不能通过，更何况大炮。

所以，日军的炮兵部队只在开战之初，对付中国军队外围部队的时候，才发挥了作用，而对付第三线阵地的 74 军时，炮兵鞭长莫及，汉口日军总部便派出了远藤少将的第 3 飞行团和一支海空飞行队，前者有飞机 120 架，后者有飞机 50 架。这 170 架飞机充当的是炮兵的角色。

上高会战开始后，各支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渐次抵抗，梯次防守，节节退后，目的在于诱敌深入。然而，由于日军异常凶悍，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扼守锦江南岸的第 70 军 107 师（邹继衍所在的那个师）一败涂地，第 70 军的另一个预九师在经过了一天激战后，收容到的部队仅有六个营。

在第二道防线上，中国军队的第 49 军 26 师与日军的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缠斗，这支部队，就是抗战老兵朱光第所在的那支部队。

在第三道防线上，尹同道所在的 74 军 57 师和魏杰所在的 74 军 58 师与日军厮杀。《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说，会战之初，日军每天行进 60 华里。

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候，第 19 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在江西

吉安，吉安距离上高有将近 400 里，罗卓英闻听战事已开，昼夜兼程从吉安赶往上高；副司令刘膺古和 74 师 58 师师长廖龄奇都在南岳衡山接受培训，廖龄奇此时还生病。上高会战初期的指挥官其实是第 19 集团军参谋长罗为雄。蓝介愚说：“罗为雄一向未经战阵，前线败退后，脸色苍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常以电话壮他的胆：‘不要害怕，敌人是扫荡战，打了还会回去的。’”

罗卓英一回到上高，两小时后就召开会议，研究战局动向，有说坚守上高的，有说撤离上高的，各抒己见，各不相让，而罗卓英则说：“上高以西无险可守！”当时是夜晚八时。

南昌位于上高东面，中国军队要撤退，只能向西撤退。如果向西，则会被日军一直赶到长沙，对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部构成威胁。

夜晚 10 点，会议还在继续，但已决定了坚守上高，让各参谋电话通知各部队。第 74 军参谋长陈瑜在电话里反对固守上高，罗卓英快步上前夺过电话训斥道：“你是谁？是陈参谋长？作战期间，讲话不准牢牢骚骚。”

第二天，朱光第所在的第 49 军 26 师得到了李天霞带领的第 74 军 51 师的支援，迎头痛击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斩获甚众。邹继衍所在的第 70 军 107 师冒着倾盆大雨向上高

方向疾进。尹同道和魏杰所在的第 74 军 57 师和 58 师互成犄角之势，形同铁叉，要将 34 师团又一个透心凉。

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3 月 22 日晨，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分出了一个联队，突然回窜锦江南岸，袭击上高侧背，司令部特务营拼死抵抗。

在上高会战极为激烈的时候，74 军参谋长陈瑜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赶快撤出上高县城，罗卓英大声呵斥陈瑜，并且派中将总参议陈襄前往 74 军督战。王耀武看到陈襄，明白罗卓英的用意，他赶紧打电话大声对罗卓英保证说：“请总司令相信我，我是能够贯彻您的命令的。”罗卓英一面激励王耀武，一面从特务营抽出第 2 连去增援 74 军。

一个军，居然需要一个连去增援，说明当时的战斗有多艰苦。

特务营去了一个连，仅剩下两个连，两个连要与一个联队的日军交战，兵力明显不够，罗卓英又打电话让李天霞从 51 师抽出一个团，15 分钟内跑到锦江南岸击退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这个联队。

李天霞派出一个团，击退日军这个联队。

锦江南岸暂保无虞。

游击式防御战术

然而，57 师和 58 师却激战正酣。

双方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互相胶着。57 师师长余程万打电话向军长王耀武请求援兵，王耀武手中已无援兵可派，他知道向罗卓英也要不到援兵，罗卓英在司令部最危急的关头，把一个特务连都划拨给他了。王耀武在电话里对余程万说：“必须固守上高，失了阵地，提头来见。”

这天黄昏，57 师的阵地被日军攻破，师预备队也被日军击退，日军沿着阵地缺口，蜂拥进入上高城，上高城眼看就要失守，在此危急关头，余程万派出敢死队，手舞大刀冲了上去。双方在城墙下激战一个时辰，敢死队终于击退了敌人。

是夜，月色朗润，照着城墙下一眼望不到边的死尸。

57 师在激战，58 师也在激战。

58 师代理师长张灵甫的师部驻扎在官桥街，官桥街距离上高仅有 15 公里。

和那个时候国军将领惯用的挖掘壕沟坚守不一样，58 师决定变换战术。如果将 58 师有限的兵力放在正面阵地上，与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日军硬碰硬，58 师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而且，漫长的长达十公里的战线，58 师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设防，而日军只会攻击一点，在这一个点上，集中兵力的日军像锥子一样轻易就刺穿了 58 师的防线，而 58 师其他地方的兵力想要回援这一个点，哪里还来得及？

58 师不愿意这样被动坚守，他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在战场上，如果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牵着对方的鼻子走，那么就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日军在进攻，58 师在防守，又如何能够牵着日军的鼻子。

58 师想了一个好办法。

58 师下辖 172 团、173 团、174 团。

大敌当前，58 师只派出了 174 团一个营去迎击。日军在前进，这个营也在前进，双方相向而行。

一个营如何能够抵挡如狼似虎的日军 34 师团？这明显是以身饲虎。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着“臭棋”。

然而，58 师还嫌不够，又将这一个营分成了九个排，让 58 师的先锋部队以排为单位迎向日军。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58 师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8 师不愿意在十公里宽的阵地上平均投放兵力，把阵地当成一把破扇子，日军的刺刀一捅就会捅穿；58 师只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作为尖刀，寻找日军的刺刀，另外的部队在干什么？在阵地后面睡觉。

这一个营，这九个排，像章鱼的九根触须，伸出了很长很长，寻找着日军的进攻方向，他们不是去与日军决战，而是侦察日军的动向。一旦有一根触须碰到了日军，其余的触须马上缩回来，与后方的大部队做好准备，迎击日军。

原来是这样的。58 师派出的这一营人马，不是先锋部队，而是侦察部队。

日军把自己当成了锥子，58 师也把自己当成了锥子，这是一场锥子与锥子的战斗，不是锥子与扇子的战斗。

与 58 师作战的日军是 34 师团 216 联队。

抗战时期，日军的一个师团编制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中国军队一个军下辖三个师，日军一个师团下辖三个联队，那么日军一个联队的编制也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下辖三个团，一个联队下辖三个大队，那么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团。

日军 34 师团 216 联队的先锋是第 2 大队，大队长名叫木下重四郎。

5 月 20 日凌晨，木下重四郎率领着第 2 大队浩浩荡荡地向官桥镇杀奔而来，在一个名叫交椅山的地方与 58 师一个游动侦察排相遇，侦察排依靠有利地形与日军一个联队发生激战，并派人飞速向后方传递情报。然而，在强大的日军攻击下，侦察排再骁勇善战，也不是对手，侦察排如果拼死抵抗，于事无补，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他们不会做这样折本的生意，他们节节抵抗，退守到了玛瑙山。

坚守玛瑙山的，是 58 师 172 团 2 营第 6 连和 3 营第 8 连。

两个连，要对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

战况注定是惨烈的。

木下重四郎很快就发现面前的国军数量稀少，他命令日军步兵在当面攻击，骑兵从后路包抄。玛瑙山很矮小，南方的很多山都很矮小，号称“天南第一柱”的广州白云山，也仅仅 300 多米高。玛瑙山更为矮小，日军的骑兵可以骑着马一直冲到山顶上。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在玛瑙山上殊死抵抗，以便给后方的部队调兵遣将、安排布防赢得时间。

就在这两连中国军队与日军一个大队激战的时候，58 师派出的另外八个侦察排，飞速向玛瑙山后的防御阵地集结，而早已经养精蓄锐的 58 师其余部队，像渔夫一样张开罗网，等着鱼儿游进来。张灵甫判断出，日军是向官桥方向进攻，妄图打开从官桥通往上高的通道。

中国军队两个连从早晨一直坚守到了中午，日军一个大队没有前进一步。午后，日军九架飞机飞临了玛瑙山上空，对着矮小的玛瑙山倾泻了上百颗炮弹，接着，木下重四郎命令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可是，仍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

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

黄昏来临了，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已经抵挡了日军 12 小

时的进攻，而就在这宝贵的 12 小时里，58 师完成了集结。两个连开始撤退玛瑙山。

玛瑙山战斗，第 8 连连长雍徵先壮烈殉国，第 6 连连长张才根身受重伤。两个连阵亡 80 多人。而日军死亡的更多。

木下重四郎在 58 师主阵地上，最先遇到的是 172 团，团长名叫王伯雄。

王伯雄面对冲来的日军，集中了全团所有的轻重机枪，对着敌群疯狂扫射。木下重四郎在王伯雄面前没有找到丝毫便宜，便想绕开王伯雄的 172 团，在距离官桥 1.7 公里的万子桥上过河，迂回进攻官桥。

木下重四郎在迂回，中国军队 174 团也在迂回，木下重四郎想迂回进攻官桥，174 团想迂回包围木下重四郎，就这样，174 团与木下重四郎的 216 联队第 2 大队像一对恋人一样在万子桥上意外邂逅，不期而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174 团猛打猛冲，和日军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 714 团战士专打带指挥刀的，216 联队第 2 大队很快就被击溃，而木下重四郎在国军第一波攻击中就被无数子弹打成了筛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作战史室编写的《锦江作战》这样

描述当日的战事：

步兵 216 联队第 2 大队木下少佐指挥部队开始准备渡泗水时，在官桥东面一点七公里的万子桥遭到阻击，木下第一个战死，该大队的指挥力量立即下降。接着，在渡河开始全部山炮不停地射击，在炮火的旁边与成群的敌人应战。

日军这里所说的“山炮”，应该是 74 军的山炮，因为江南梅雨天气，道路泥泞，而且所有大路小径都被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率领的三万民众挖断，日军的大炮无法运至前方，日军只能用飞机代替大炮进行攻击。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这一天的战斗是这样写的：

激战至 14 时许，日军陆续增达 2000 余，并以一部迂回到黄蜂岭侧背，中国军队从早晨战至夜晚，敌人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另一路，敌主力万余于今晨集结龙潭圩附近后，以一部千余，于 12 时许，在九架飞机掩护下，经石坑、墓田圩向我 58 师 172 团官桥街附近阵地猛扑，该师即以 174 团由左翼向敌迂回，进占交椅山、上斜岭向南侧进，威胁敌后，激战至黄昏，双方伤亡惨重，

旋敌主力赶至增援，向我左翼实施反包围，我以态势不利，趁夜撤入泗水西岸主阵地。

58 师放弃了官桥，趁夜渡河，来到了泗水西岸。

一条河流挡住了日军西进的脚步。

中国军队的主动撤退，让 34 师团师团长大贺茂错误地认为面前的军队不堪一击，攻占上高只在“弹指一挥间”。

大贺茂太骄傲自满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刻，大贺茂已经为 34 师团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自开战至今，34 师团节节胜利，骄横的大贺茂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皇军穿着牛皮鞋的牛气哄哄的脚步，天气挡不住，泥泞挡不住，中国军队的阻击也挡不住。

此时，大贺茂的左右翼都已空虚，樱井省三的 33 师团认为成功在望，已经撤退到了遥远的几百里之外；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被李天霞的 74 军 51 师和宋英仲的第 70 军 107 师阻击，举步维艰。按照常规，大贺茂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再左右呼应，对上高进行钳形攻势。可是，大贺茂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他认为仅仅凭

借 34 师团，就能够拿下上高城。

就这样，大贺茂像一头莽撞的大犍牛，一步步踏进了伏击圈，而他竟浑然不觉。

打仗，仅有二杆子是不行的，还要有脑子。

34 师团被包围

在上高城外，阻击日军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交战的，不只有李天霞的 74 军 51 师，还有其他部队，邹继衍的第 70 军 107 师 320 团第 1 营就参加了战斗。《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有这样一句话：“51 师李师长指挥 107 师由刘公庙、太阳圩、灰埠之线东攻，务将该敌歼灭之。”李师长是李天霞，这说明，当时，担任攻击日军第 20 独立旅团的总指挥是李天霞，邹继衍所在的部队是归于李天霞指挥。

李天霞的部队给邹继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高战役首先与日军交锋的是邹继衍的部队，他们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渐次撤退后，在高安附近休整了一天，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让他们火速开进，保卫上高。

邹继衍带领着残缺不全的 1 营人马，征尘未洗，就在午

夜时分出发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空中没精打采地摇摇欲坠，道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摔倒。战士们一个牵着一个，像陕北的说书盲艺人一样在午夜的旷野跋涉着，满身泥水。邹继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行进途中，不断碰到友军，其中有的是刚从前线作战受损撤到后面休整，有的是从这一地段调到另一地段堵击的，还有大批是从后方赶来合围的。真是人马辐辏，比肩接踵。这些部队，大部分属于杨森部队的川军，还有一部分滇军。天明以后，我看到当中很多队伍，大都衣服破烂，军容欠整，武器装备杂乱陈旧。”

这支部队一直行进了 27 小时，从午夜一直行走到了第二天下午 3 时，整整 27 小时里，他们没有埋锅造饭，饿了，就抓一把已经被雨水泡湿了的饭团，塞进嘴巴里；渴了，就用手舀起地上的积水。那时候，他们能够饿着肚子连续暴走 27 小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

我在采访当年参加上高会战的 74 军 57 师炮兵排长尹同道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20 多天没有吃过一餐饭。”

没有吃饭，那么依靠什么充饥？尹同道说，炊事班把大

米炒熟，灌在干粮袋里，饿了，就抓一把吃，就是这样，还不敢多吃，吃完了就没有了，会饿肚子。

下午3时，邹继衍带领着1营人马来到了一个两山夹峙的山垭前，这里有74军51师的一个营把守。邹继衍出示了参与上高会战的命令后，这个营才放他们通行。

74军51师的这个营给邹继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以非常羡慕的笔触写道：“我见该营官兵精神饱满，军容甚壮，他们使用的武器，步兵是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每连有捷克造轻机枪九挺，还配有六〇炮、榴弹炮，机枪连配有马克沁重机枪六挺，每连有战斗兵156名。”

一个连有九挺轻机枪，六挺重机枪，还有六〇炮和榴弹炮，这样的装备实在是够好。34师团师团长贺茂竟然在这样的装备齐整的中国军队面前骄傲自满，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自我膨胀。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作为师团长的大贺茂只知己而不知彼，如果再不失败，就没有天理了。

大贺茂的目的是攻占上高城，攻占上高城，就彻底摧毁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斩杀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抗战至今，日军还没有摧毁过国军集团军级别的司令部，而此前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集团军司令，也只有第 33 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

大贺茂要建立不世功勋。

大贺茂认为形势对他极为有利。

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就设立在小小的上高县城，司令罗卓英也在上高县城，而他的指挥部此时距离上高仅有十公里，前锋还一度攻进过上高城墙，被 74 军 57 师敢死队抡着大刀片赶出来了。在上高县城周围，攻城的日军人数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军队有大炮，但是日军有飞机，飞机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大炮，大贺茂认为他握有胜算。

大贺茂千算万算，但是漏算了一点：中国军队不仅仅前面的上高有，而且四面八方都有，这是一个口袋阵。

自上高会战开战以来，中国军队步步退守，中国军队的诱敌之策让大贺茂一步步走进了设置好的陷阱里。但在大贺茂的眼中，他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节节败退，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中国军队像弹簧一样，被 34 师压到了弹丸之地上高城外，当弹簧被压到最小的时候，它积蓄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大贺茂带领的 34 师团在上高外围与 74 军 57 师和 58 师激战昼夜，吃了大亏，他直到现在才发现中国军队布防在第三线的 74 军和布防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日军像潮水一样冲向上高城，而 57 师和 58 师像堤坝一样岿然不动，让日军的攻势化为虚无。74 军的另外一个师 51 师，正在与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激战。

在碰出了满头疙瘩后，大贺茂终于明白自己遇到了劲敌。

大贺茂呼叫日军第三飞行团司令远藤少将，急派飞机增援。

日军的飞机出动了，一时间遮天蔽日。远藤少将除了派遣轰炸机外，还亲自坐着一架飞机飞临上高城外，向大贺茂空投了一封信件。

远藤少将没有想到，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没有飘落到大贺茂的手中，而是飘落在了中国军队阵地，被送到了罗卓英的手中。

这封信件是这样写的：

上高占领，迂延时日，敌军整顿态势，后方扰乱，亦渐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转移……

从这封书信中能够看出，远藤少将越俎代庖，给大贺茂出谋划策，让大贺茂占领了上高后，就赶紧退出，以免前功尽弃。

远藤少将很搞笑，你怎么知道大贺茂就能够占领上高？

罗卓英从这封书信中读到了另一种内容：大贺茂的目的是要占领上高。

日军的作战目的明确了，形势一下子明朗了。

罗卓英立即命令外线的所有军队，火速向上高集结，将34师团包围并歼灭。除此之外，罗卓英还密令各部队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争取活捉大贺茂。大贺茂想斩杀罗卓英，罗卓英想活捉大贺茂，两个司令官想要将对方的最高指挥官置于死地。罗卓英的这封电报编号9714，内容如下：

据确报，被困于官桥南茶罗一带之敌，内有敌卅四师团大贺师团长以下重要军官，兹职为彻底歼灭该敌，获得光荣战果，着各部迅速合编奋勇队，于本感夜向官桥查罗之敌猛扑，兹将奋勇队编组及给与办法开列如下：

（甲）参加攻击队伍以师为单位，各奋勇队一百至三百名；（乙）被选为奋勇队之官兵除每人先发一次荣誉金官

一百元，兵五十元外，能有俘获时再予特奖；（丙）俘敌师团长赏洋五万元，旅团长两万元，联队长一万元，大队长五千元，中队长二千元，小队长以下军官一千元，士兵三百元，联队旗一万元，完整大炮一门一万元，其余照规定加倍给奖；（丁）奋勇队官兵之伤亡抚恤标准，照晋一级请恤申报核备，罗卓英感核植印。

这封电文中的“奋勇队”，就是敢死队。

34 师团师团长太贺茂在什么地方，罗卓英居然一清二楚，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出色的情报工作，而传递情报的是谁，是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领导的上高县民众。当地的百姓说，日军到了哪里，黄贤度掌握得清清楚楚，马上给部队通知。

一个师组织一支敢死队，而不是一个营一个团，说明仗打到了这个份上，一个师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多少了。俘获师团长太贺茂奖励五万元，俘获联队长奖励一万元，而缴获一面联队旗帜也是奖励一万元，日军每支联队的旗帜都是天皇亲授，整个联队将旗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日军一个联队不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是不会烧毁旗帜的，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没有缴获到日军一面联队旗帜，只在腾冲战役和松山战役中，逼迫日军烧毁了两面联队旗帜，此后，这两个联队

的番号被永远从日军的编制中抹去。

邹继衍在上高激战中看到了日军蝗虫一样的飞机，他用“虽在黑夜，仍然枪炮轰鸣，响彻终宵”来描述当年战争的激烈。按照惯例，日军白天进攻，夜晚宿营。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都是这样的。而现在，日军被裹在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想不想打不是由他说了算，而是由中国军队说了算。

尹同道说，那些天一直在打，一直在转移阵地，拉着大炮不停地走。刚开始是因为不明日军的进攻方向，炮兵只能在后方防守；等到看清了日军是要进占上高后，炮兵就向上高城疾进；大炮对着日军轰了一阵后，日军转移，大炮也要跟着转移；日军走到哪里，大炮就要跟到哪里。要搬运大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场 1941 年春季的战争中，在这场江南梅雨天的惨烈厮杀中，日军仰仗的是飞机，国军仰仗的是大炮。“不停地打，不停地走，拉着大炮，绳索都把肩膀磨破了，脚都走肿了，衣服汗湿了，又暖干，再汗湿了，又暖干了，20 多天没有吃过一餐饭，没有洗过一次澡，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臭味，离老远就能闻到，一停下来，苍蝇就围着满身飞。”

尹同道所在的 74 军与日军激战的时候，邹继衍所在的

70 军和 49 军在侧后对 34 师团进行了合围，邹继衍曾经站在高处看到了当年战争的一幕。

邹继衍眼中的上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高城池的东面、西面、北面都是山峰，南面则是锦江。三面临山、一面临水的上高城，绝对是天堑。想当初罗卓英把司令部设置在这里，就是因为上高在江南水乡平畴漠漠中的独特地势，而 34 师团师团长大贺茂最终吃了败仗，就因为没有考虑到上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孙子兵法》中早对地形有过解释：“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上高城应该是孙子

所说的六种地形中的第五种：险者。孙子对这种地形有这样的解释：“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意思是说，如果遇到险地，我先占据了，一定要占据高处迎击敌人；如果敌人先占据了，就赶快离开，不要攻打。

上高这样的险地，已经被罗卓英占据了。孙子都说了，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攻打，而大贺茂还要攻打，能不败吗？

《孙子兵法》对将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能够利用地形打仗的，才是上将，才能取胜；不能利用地形打仗的，是庸将，是要吃败仗的。

要与日军作战，先要登上上高城三面的高山，而日军 34 师团全部布置在上高城南面的锦江南岸一望无际的田畴上。也只有这些阡陌纵横的水田，才能摆放数万兵力决战。

邹继衍是在拂晓带领着 1 营人马登上上高城外的山顶的，至于是哪面的山岭，他没有说。邹继衍在向山顶上攀爬的时候，日军已经开始了对上高城的攻击，喊杀声如同滚雷一样，相隔着一道山岭也能听见，硝烟弥漫，像云朵一样在山顶上缭绕不散。太阳刚刚升起来，看到鲜血流淌的战场，也惊悸

一般地躲进了云层里。从南昌方向飞来了日军的飞机，先是二三十架，后来增加到了上百架，日军飞机像蝗虫一样，在上高城的上空盘旋飞舞，俯冲轰炸，上高城变成了一片火海，能燃烧的都已经燃烧了，能倒塌的都已经倒塌了。在倒塌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军人抖落掉身上的泥土，挺着枪支钻出了火焰，向城外扑去。而在上高城外，日军沿着已被轰炸得崎岖不平的道路向城里进发，他们枪上的刺刀像丛林一样闪着寒光。

邹继衍说，他眼看着上高城被炸得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日军的炸弹落在上高城里，炸得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这是我参战以来所仅见的。”而上高会战战报也显示，此次战役日军出动飞机之多，“为上海战役之后所仅见。”上海战役，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常说的淞沪会战。

站在山上的邹继衍都感到震耳欲聋，上高城里的 74 军 57 师更是处境危急。57 师炮兵尹同道说：“飞机投掷的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刚开始还能听到爆炸声，后来就听不到了，耳朵已经没有了听觉，眼睛紧紧地盯着山下的日本兵，不停地填装炮弹，不停地发射。飞机炸弹爆炸的气浪将我掀翻了，我顾不得查看身上有没有伤，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着大炮赶快换个地方。大炮发射了几发炮弹后，就暴露了目标，飞机会来轰炸，需要赶快转移阵地。日军的攻击被打退后，

我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全身软得像稀泥。看到旁边有人的嘴巴在动，但就是听不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听到对面人的说话声，像苍蝇叫一样。”

中国地下党员王道平当年在县政府任职，他在战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长留浩气满乾坤》。这篇文章写到了他所看到的战场情景：

我方战壕挖好了又炸平，炸平了又重挖，整个山头几乎被炸弹碎片翻了过来。在血肉与泥土互相搅拌、互相渗透的土地上，士兵们正在抢挖战壕。他们满脸都是烟尘和鲜血，牺牲的同志身上棉衣被炮火撕裂成缕缕碎片。没有炸倒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丫。在树丫上，牵挂着被炮火炸起的衣带破布、残肢断手和血污的人头，在呼啸的早春寒风中摇摆。

王道平还在一次劳军中看到了 74 军军长王耀武，他这样写道：

军长一直守在指挥所里，桌上摆着几架电话机，还有作战军事地图。由于战斗紧张，电话特别多，无法安静休息，使得这位军长整个下颌红肿，声音嘶哑，他的

食指和中指，因为时时标示地图而磨破了皮，血迹殷殷。

邹继衍站在山顶上，看到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短兵相接的一幕，他说：“等到敌人的步兵冲锋到了有效射程，设置在战壕、山洞里的各种轻重武器，一齐打响，子弹就像泼水一样撒向敌群；配备在后方的远程炮、大口径火炮，也紧跟着发出吼声，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眼看上高城近在咫尺，就是无法再上前一步，这场恶战持续了 12 小时。”

守卫上高城的 57 师，就是后来在常德保卫战中被人们称为虎贲师的 57 师。然而人们只知道 57 师的常德保卫战，却不知道 57 师的上高保卫战。57 师，人称虎贲师，这个称号是从成功守卫上高时赢得的。

“虎贲”来源于《书经》中的《牧誓》篇。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武王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此后，人们就把历朝历代英勇无敌的军队称为虎贲师。

余程万任师长的 57 师有四个团：169 团、170 团、171 团，另外还有一个野补团。上高城正面的攻防极为狭窄，双方都不能在这个面上投放更多的军队，余程万只派一个团与日军交锋，其余的三个团在后休息。过一段时间，再更换正

面交锋的这个团，四个团轮番固守，让余程万手中有了充裕的兵力，应付自如。而反观日军，大贺茂则是命令日军一拥而上，蚂蚁一般的日军暴露在了 57 师的火力之下，像排着队接受宰杀的羔羊一样。

攻打上高城的日军有多少？当时，潜伏在草丛中的中国军队情报人员提供的数据是，日军通过锦江上的一座石拱桥时，排成纵队前行，一直行进了七小时，后队还没有过完。我们可以做一道算术题，考虑到乡间的石拱桥比较狭窄，就以日军惯常采用的四列纵队计算，每列纵队通过潜伏人员眼前需要三秒钟，那么一小时内通过 1200 列 4800 人，七小时通过的就是 30000 人以上。事实上，当时日军在上高会战一开始投入的是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共计五六万人，樱井省三的 33 师团中途离开，日军在第一线和第二线并没有损失多少兵力，用来攻打上高城的兵力肯定在 30000 人以上。

余程万坚守上高城长达两天一夜。

余程万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军政部长何 3680 密电，本师铄日与南昌之敌激战旬日，于上高以东地区，本师首当其冲与敌主力周旋昼夜，以拉锯肉搏凡五次，几濒于危……

从余程万给何应钦的电文中可以想到当日战况的激烈。

上高会战时，当时的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战况，上高会战结束后一月，报纸上还能见到关于上高会战的报道。从这些即时报道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争的真正情况。但是，为了避免被日军侦悉中国军队各部布防情况，当时报纸上所有中国军队的部队番号全部以某某代替。然而，时隔70年后，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依然能够闻到浓浓的硝烟味。

曾天耸是马来亚（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独立后才叫马来西亚）华侨，祖居广东梅州，练就一身好武艺，祖父、父亲都在马来亚经商，家境异常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曾天耸就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日军全面侵华后，曾天耸回到梅州家乡，踊跃参军，报效祖国，担任机枪手，每战必奋勇争先，杀敌甚众，1940年8月升为排长。上高会战中，曾天耸带着一排人防守一个叫经楼的地方，进犯的是日军少尉宫内同明率领的一队日军。双方激战时，曾天耸带着一排人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挺着刺刀纵横挑杀，毙敌八名，其中包括日军少尉宫内同明。后，因为气力衰竭，中弹身亡，死前还在对搀扶他的战友大声疾呼：“我杀了八个鬼子，值了！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追击。”

杨义清是一名班长，此战立有战功。一天，30多名日军逃到了一个叫作刘村的村子里，躲在了了一座砖墙大院里，关起房门，负隅顽抗。杨义清将全班手榴弹集中在一起，隔墙扔进，30多名日军全部死亡，杨义清缴获了两挺机枪。

李洪坤也是一名班长，带着十几个士兵在一个名叫邓村的地方防守，午夜时分，看到有一名日军指挥官骑着白马在阵前出现，李洪坤将白马击毙，日军指挥官从地上爬起，仓皇逃窜，李洪坤与日军指挥官对射，左臂被击伤，他顾不得包扎，继续追击。后来，出现了十余名日军，而李洪坤的十余名士兵也赶来了，双方发生激战，日军被打退，残敌五名逃入了一座民宅里，包括那名指挥官。李洪坤向屋里扔进了两颗手榴弹，五名日军全部毙命，检查尸体，那名指挥官是一个中佐。弟兄们纷纷向李洪坤祝贺，李洪坤说：“这个鬼子军官真倒霉，他碰到了我这个不怕死的。”

李才是桂林人，在部队里做伙夫，练过武术，力气很大。上高战役中，因为中国军队伤亡过大，杂役兵——伙夫、马夫、公役等都派上战场，李才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在石头街阵地上，李才与敌军拼刺刀，一口气连杀三名鬼子，他笑着对同伴说：“听说鬼子拼刺刀厉害，我看也不怎么样。”他收拾地上日军的枪支时，被埋伏在草丛中的日军掷弹筒炸死。



李天霞

《江西民国日报》1941年4月24日曾刊登了一篇《赣北劳军记》的文章，它写到了某师师长某某某，重创池田旅团。这位某某某师长讲到两件事情，流下眼泪。第一件是：一位士兵与日军白刃肉搏，彼此互以刺刀插入对方腹部，相持不下，终至气绝身死，犹屹立不倒；另一件是：有一个华侨子弟任排长，有万贯家产，家人屡促回去，毫不为动，每战必身先士卒，此战壮烈殉国。

池田旅团，就是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而重创池田旅团的，则是 74 军 51 师师长李天霞。这位某某某师长，必是李天霞无疑。李天霞所说的那个华侨子弟，应该就是曾天耸。

国共合作的经典战例

74 军与日军作战，而邹继衍所在的 70 军只能在山上观看，每当看到战况极为激烈的时候，他就向上级请战，但每次都遭拒绝。

74 军在浴血奋战，而 70 军在袖手旁观，为什么这样做？罗卓英怎么想的？当时 70 军的将士们都想不通，他们只能站在山上大声呐喊，为 74 军助威，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上级不让他们下山一步。

战后，人们才明白了，上高城外的战场只有那么大，有再多的兵力也难以摆放，只能白白地给日军的飞机当成靶子。罗卓英是让邹继衍所在的 70 军养精蓄锐，让实力最强的 74 军逐渐消耗日军 34 师团的锐气。等到合适的时机，70 军再出击。

何时是合适的时机？是对 34 师团包围圈形成的时候。

3 月 24 日，这是 34 师团大贺茂对上高城最后的舍命一搏。

这天早晨，一轮血红的太阳升起来，照耀着弹丸小城上高，也照耀着城内城外中日两方几万名士兵。大贺茂将被 74 军 51 师击溃的 20 旅团仅剩的 3000 人编成一个大队，与 34 师团合兵一处，向上高城全线进攻。阵地上短兵相接，无论是中正式步枪还是三八大盖，在打完一发子弹后，都来不及装弹，双方的士兵就缠在了一起，用刺刀、用砍刀、用拳头、用牙齿，用最原始的武器和最原始的本能与对方搏杀，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少将李翰卿带领着 57 师敢死队，一人一把大刀片，一字排开，对着每个扑上前来的日军狂砍，刀光映着日光，血色染着曙色，煞是好看。日军的手臂和鲜血四散飞溅，尸体摞了一层又一层。敢死队里有人阵亡，马上又有后面的人补充上来。地面上都是血迹，黏稠的血迹像牙齿一样咬住了他们的鞋只，让他们挪不开脚步。在中国军人的大刀片面前，日军终于胆怯了、退却了。

仅仅在这一天，日军就在上高城外丢下了 2000 多具尸体。

我在一份《陆军第 74 军第 57 师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

表》中看到，最高统帅部表彰的第一个人不是 57 师师长余程万，而是李翰卿，足以说明李翰卿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

上高战役结束后，李翰卿又率队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依旧带着敢死队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他身上多处负伤，血流不止，仍指挥敢死队与日军拼杀，最后血流殆尽，壮烈殉国。

黄昏时分，各路中国军队已经聚集在了上高城外，对日军形成了包围，日军被赶进了一个南北长十里，东西长 30 里的椭圆形包围圈中。

邹继衍说：“当天夜晚 6 时，上面发出了攻击命令，所有合围的部队，立即向当面之地发起进攻，守城的后备军，也从城郊分路出击。日军抱头鼠窜，纷乱后撤。”

尹同道说：“我们在山上，能够看到包围圈中的日军，大炮不需要瞄准，就射向包围圈中，一颗炮弹过去，一片火光，敌人就倒下一大片。”

直到这时候，愚蠢而狂妄的大贺茂才知道中计了。日军《锦江作战》中记录：

在此情况下，师团长大贺茂一面向汉口的第 11 军司令部请援，一面命令部队于 24 日返回。军司令部惊悉

战况激变，立即命令 33 师团出动，并由军参谋长木下少将协同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大根大尉疾速向南昌前进。第 33 师团立即再次出动，并由军参谋长木下少将协同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大根大尉疾速向南昌前进……33 师团立即奉命再次出动，以荒木支队为右纵队，以 214 联队为左纵队，与 34 师团取得联系，掩护该师团撤退。

然而，已经晚了。

被围困的 34 师团四面楚歌，为了打通一条逃跑的缺口，大贺茂呼叫南昌所有的飞机赶来增援，日军还动用毒气在前开路。一批批英勇的中国士兵没有死于拼杀中，而死于日军的毒气中。不但如此，日军为了逃跑方便，还把大批化学武器遗弃在上高战场。时隔 50 年后，一群民工在泗溪官桥街挖掘地基，不慎挖到了锈迹斑斑，已在地下埋藏了半个世纪的一枚毒气弹，造成当地 1300 多人中毒。后来，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了 200 多枚毒气弹。而日军当初到底把多少毒气弹遗弃在了上高战场，至今还无法知道。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 3 月 25 日这天的战况有详细的记载。34 师团被围后，急切呼叫九江的日军赶来增援。从

地图上看，九江距离上高应该有三四百里远。然而，因为赣北的日军当初倾巢出动攻打第 19 集团军，留在九江的日军也没有多少，前来救援的仅有 2000 人。

当天下午 4 时，34 师团主力拼命向官桥靠拢，赶来救援的 33 师团先锋部队和来自九江的增援部队也乘着汽车向官桥扑来，就在抗战老兵魏杰曾经坚守的龙形山一带，中日双方的军队再次短兵相接，“我官兵奋勇抵抗，与敌血战，彼此伤亡惨重。”此时，坚守在官桥一带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为了减少牺牲，不得已撤退。“敌增援之兵，遂得进入官桥与被围之大贺合流，本部当时尚未所知也。”本部，指的是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

现在包围圈里被包围的，不只有 34 师团，还有前来增援的日军。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还提到了邹继衍所在的 70 军 107 师。107 师的任务是连夜经过上高城，在南面攻击日军。

3 月 25 日下午，邹继衍带着 1 营人马从北面的山上下来，走进了上高城，眼前的县城让他大吃一惊，曾经被称为赣西北明珠的上高连日激战，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一间房屋是完好的，没有一面墙壁没有倒塌，战前 74 军修筑的碉堡和阵地，被日军的炸弹彻底犁平了，空气中散发着硝烟和

尸臭的气味，异常难闻。上高城里少有人影，好像一座死城，天空中飞翔着一群群乌鸦，它们在一具具无人掩埋的尸体上飞起又飞落，一声声刺耳的叫声让人背脊发麻。曾经在这里血战了十天的 74 军 57 师撤离了上高，此刻在继续追击敌人。

第 19 集团军少校参谋蓝介愚说：“57 师追击日军的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那么就是说，这支虎贲师此时仅剩下一个营还有战斗力。

邹继衍带着 1 营人马渡过锦江，向前追赶，因为是第二批出击的部队，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顽抗的敌军已经被第一线追击部队肃清。到了黄昏时分，他们看到一群人在薄薄的暮色中仓皇逃窜，有的瘸着腿脚，有的吊着手臂，邹继衍带着队伍冲上去，那一群负伤的日军就跪在地上举起了手臂，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邹继衍清点战利品，看到有长短枪二十余支，小钢炮炮弹和机枪子弹几箱。

邹继衍带着部队继续追击，看到路边全是日军的尸体，尸体的手臂被割掉了；追到了半夜时分，看到月光下的日军尸体又有了变化，手臂完好，而手指被割走。日军有战场上带走尸体的习惯，带不走就烧，来不及烧就带走一条手臂，而手臂都来不及砍就带走一根手指。从这一路上日军尸体的变化情况，能够看到逃跑的日军有多狼狈。

追击了大半夜，他们饿了，可是没有时间埋锅造饭。突然有战士在路边找到了一口行军锅，锅里是大半锅米饭，行军锅边倒着几名日本兵。可能是厨师。日军连做好的米饭也来不及吃，就仓皇逃窜了。

天亮后，空中出现了十多架飞机，对着中国军队狂轰滥炸。后来，日军的飞机投掷毒气弹和炸弹。“我45团团长张雅韵，亲临督战，被炸殉国。”后来的战报中这样写。我查了一下资料，第45团属于第72军新编15师。

然而，尽管有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还是前仆后继，向包围圈中的日军发起集团冲锋，将日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日军的《锦江战役》记载：

27日，第34师团大贺茂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照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土地王庙在五日前已成为待命的敌第9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六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度过了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八中队，终于在土地王庙村西段遭受优势的重庆军攻击，

致使该中队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第2大队六角少佐曾将该中队编入自己指挥下，在采取援助措施的同时，向歩兵团司令部请求援兵，但得到的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8中队，迅速向旅团司令部集结。另外，在黑暗中听到炮兵第八中队求救声的歩兵第216联队第8中队，待到28日天明出击时，发现附近有300名重庆军对他们进行了攻击。

从日军的这段记载中可以想到当初大贺茂是何等无助，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34师团司令部，如今拱卫他们的只有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和医院的医生护士，而且全部带伤带病，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山炮队之所以没有死亡，是因为炮兵跟在歩兵的后面，要不然这些炮兵早就被打死了。

然而，躲在歩兵的后面也不能躲过劫难。他们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被中国军队包围了，旁边的日军连救他们的勇气也没有。

现在，大贺茂身边只剩下了后勤人员，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贺茂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活捉大贺茂，正当其时。

当时，敌我双方的军队已经完全打乱了编制，中国军队的长官找不到士兵，士兵也找不到长官，将士们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一组，只要看到穿着中国军队衣服，就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只要看到穿着黄色衣服的日军，就冲过去猛打。到处都是枪弹声，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弥漫的硝烟，到处都是飞溅的鲜血。日军的飞机在高空中盘旋良久，始终不敢投弹，只好又飞走了。中国军队的炮兵将炮口调试后对准，对准后又调试，也终于放弃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变成了肉搏战。

74 军 58 师的追兵攻占了一座叫作傲古山的地方后，看到山下满是日军的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惨叫声如同云朵一样，缭绕不散，初步估计这些日军伤兵有 2000 人。58 师误打误撞，竟打进了 34 师团的野战医院。守卫这些伤兵的日军在 58 师的猛烈冲击下，抱头鼠窜，把这些哀叫不绝的失去了反抗能力的伤兵，丢给了中国军队。

以前看书，书上说日本人如何强硬，如何宁死不降，如何不抛弃不放弃，看来都不尽真实。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在落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至于说到日军的战略，就更是极差，从这次上高会战中就能够看出

来。没来由地就突然攻打险地上高，没来由地 33 师团就突然撤离，没来由地三支部队各自为战谁也不管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恐怕只有日本军队才有，因为日本军人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

58 师的追兵绕过这些嗷嗷惨叫的日军伤兵，继续追赶，日军在前面没命地奔逃，中国军队在后面舍命地追赶，当战争变成了一场长跑比赛，双方赛的不是战斗力，而是脚板。在一个叫作杨公圩的地方，58 师的追兵捉住了一群日本逃兵痛殴，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作战命令和军用地图，得知这股敌军竟是 34 师团师团长贺茂的司令部随从人员。既然逮住了司令部，那么大贺茂肯定就在附近。追兵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报告了代理师长张灵甫，张灵甫又报告了军长王耀武，王耀武报告了司令罗卓英，罗卓英大为振奋，立即命令各部追兵奋勇向前，仔细分辨，一定要逮住 34 师团师团长贺茂。

上面引用的日军《锦江战役》中的文字已经说明了，这天，跟随大贺茂奔逃的日军有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而到现在，司令部被打散了，独立山炮队被消灭了，病员输送队和野战医院被打垮了，后卫部队早就被击败了，大贺茂留下了什么？只剩下了行李。大贺茂只能带着行李奔逃。

曾经牛气哄哄的大贺茂，危在旦夕。

28 日午夜，一支中国军队在追击中，看到前方有一座村庄，几十名日军依靠房屋和断墙阻击，而远处，有几名日军在仓皇奔逃。中国军队向着村庄发起攻击，日军负隅顽抗。后续的中国军队源源而来，将村庄里的日军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再去寻找那几名日本鬼子时，发现他们已经消失在了夜色中。

那几名逃走的日军中，就有 34 师团师团长大贺茂。

中国士兵与奇功擦肩而过。大贺茂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一天夜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还有岩永汪少将。

岩永汪，此时是 34 师团 34 步兵联队联队长，后来升为 116 师团师团长，率兵攻打衡阳，与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交战。

在官桥失守后的第四天，58 师向守卫在官桥的日军发起凶猛攻击，“残敌不支，纷纷退入官桥街，我即乘胜冲入街内，与敌巷战，格斗至黄昏，将官桥镇完全占领，残敌约六百，悉数被歼，遗尸枕藉。”

58 师打扫战场，只找到八名日军伤兵，过不多久，就有七个死亡了。审问剩下的一个，他供述说，在中国军队冲入

官桥镇的时候，岩永汪就身受重伤，被卫兵抬着逃跑了。

58 师群情振奋，奋起追赶，想要找到岩永汪，可惜，没有找到。

33 师团大部队昼夜兼程，赶来营救被包围的 34 师团。

天空中是蝗虫一样的日军飞机，地面上是洪水一样的 33 师团，它们扑向了中国的包围圈。在棠浦构筑防线阻击日军的第 70 军第 19 师本来实力就较弱，现在又腹背受敌，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防线终于被攻破。

33 师团搀扶着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 34 师团，刚刚走出了五公里，来到虎形山，又被尾随的中国军队追上了。

一场激战又开始了。

33 师团不得不就地构筑工事，展开阻击。中国军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前仆后继，杀声震天，日军匆匆构筑的豆腐渣工程纷纷倒塌。日军《锦江战役》中记载：“我展开所有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弹药用尽，只能接受空投弹药，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于 4 月 2 日返回了原驻地。”

4月2日,33师团背着被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34师团返回南昌,中日双方又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日军战报中的上高会战结束了,而事实上,激战还在继续,一直到4月9日,赣北战场上才没有了枪声。

我找到了一份“中央社上高一日电”,电文如下:此次赣北战役,敌军官被我击毙经查明者,复有滨田联队长、板垣田中大队长等三名。

查找资料得知,滨田联队长,是33师团步兵214联队联队长;而板垣田中,则是34师团217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这两个日酋前面有“复”,说明在他们之前,还有日酋被击毙过。

所以,日军死亡的官佐不止这三个。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统计,中国军队伤亡20533人,其中阵亡9682人,阵亡上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六名,上尉32人,而中尉和少尉军官阵亡多达216人。抗战老兵说,那时候打仗,士兵战术素养不够,营连排长往往身先士卒,带着士兵们冲锋,所以牺牲特别大。我从《上高会战第19集团军营以上指挥官姓名表》中查知,参战的营长共有130人,营长的官职一般是上尉和少校,那么这次阵亡的营长就要占

到参战营长的 30%，而连排一级的阵亡就更大了。

而在战后的后方医院，又有 141 名伤员牺牲了，其中，尉官就有 11 人，包括两个营长和五名连长。

《上高会战敌军伤亡概计表》统计，日军共伤亡 15800 人，其中死亡 6252 人。死亡的官佐有联队长一名，系 33 师团步兵 214 联队联队长滨田；大队长四名，系 33 师团 214 联队第 2 大队长横田、34 师团 217 联队第 3 大队长田中、34 师团 216 联队第 2 大队长木下、20 旅团 105 大队长森重；另外有中队长和小队长六名。而伤者最高级别是 34 师团 34 步兵联队长岩永汪。

上高会战震惊全国，各方面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蒋介石称为“空前胜利”。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第 19 集团军以敌我双方最接近的比例，取得了最值得称道的战果。

参谋总长何应钦称赞上高会战：“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

当时的报刊赞扬上高会战是“媲美台儿庄战役的赣北大捷”。

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上高会战开始后的第二天，就跟踪报道上高会战，宣传战果，直到会战结束。

上高会战被作为经典战例写进了教材里，向全军散发。

上高会战后，第 74 军获颁荣誉旗一面，此旗蓝缎上绣有白色飞虎，又称飞虎旗。飞虎旗是对一支作战部队的最高奖励，74 军获得的这面是第一面飞虎旗。抗战时期一共颁发过 17 面飞虎旗，而 74 军就获得两面。

第 19 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和第 74 军军长王耀武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时期，共颁发了 166 枚青天白日勋章。我们耳熟能详的抗日将领，比如白崇禧、薛岳、孙立人、张自忠、廖耀湘、戴安澜、胡璉、方先觉等，都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

74 军 51 师在上高会战中几乎全歼第 20 独立混成旅团，而且和 58 师一起收复了官桥镇。战后，51 师获得了第一号武功状。守卫上高的 57 师获得了第二号武功状。

武功状的全名叫“陆海空军武功状”，抗战时期共颁发过 107 张，而李天霞的部队就荣获了 14 张，包括参加上高会战的第一张和参加雪峰山会战的第 107 张。在上高会战中，李天霞任 74 军 51 师师长；在雪峰山会战中，李天霞任 100 军军长。

李天霞极为珍视他在上高会战中所获得的第一张武功

状，他将原件复印了很多张，发给士兵，还邮寄了一张给儿子。在给儿子的那张复印件上面，他写了一行字：“创建最伟大之战绩，获得本一号武功状……”

51 师战歌也与第一号武功状有关，51 师的战歌是这样的：

听！这气壮山河的吼声，是勇士的呼号。

看！这沸腾的热血，奠下了万世不朽的武功。

51 师的同志们，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哨，担任保卫中华的先锋。

发冲冠，吹起冲锋号，踏平三岛，光我华胄。

我们有钢铁的意志，我们有空前的武功。

挺起胸膛，举起刀枪，不让太阳升到三岛上，

歌颂吧！我们有第一号武功状。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74 军 51 师和 57 师分别获得第一号武功状和第二号武功状，第一号武功状写进了 51 师的战歌中，57 师还获得了虎贲师的称号。58 师呢？

从手头能够找到的《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表》中，我看到 57 师有 59 名官兵受到表彰，而 58 师只有 12 名官兵受到表彰，没有找到 51 师的表彰表，想来也会和 57 师相当。张灵甫没有获得武功状，原因在于官桥的失守。

上高战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1 年 4 月 19 日，罗卓英向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编号 4555 号，电文内容是与 34 师团长大贺茂有关的。

电文内容说，4 月 14 日，大贺茂在南昌市上海酒楼召集 34 师团的残兵败将开会，讲述了此次上高会战的惨败，讲到动情处，涕泪俱下，痛不欲生，拔出手枪自杀，血洒酒楼，左右急忙抬着大贺茂送往医院，经抢救才活过来。

老兵曹立刚也讲到了这个情节。他当时潜伏在上海酒楼对面的一家茶楼上，看到上海酒楼前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让进入，而一名名老鬼子却鱼贯而入。不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几名鬼子抬出了一名老鬼子。那就是自杀未遂的大贺茂。

也许大贺茂是真的自杀，也许是逢场作戏。我怀疑这家伙是演戏，如果你想自杀，何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自杀的

方式有很多种，总有一种适合你。你莫非就这样不中用，连枪都打不准？

大贺茂出院后，就被解职，成了无业游民。这名日军师团长以后是什么结局，不得而知，因为他很早就退出了战争的舞台。

上高会战能够取得胜利，和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组织的良好后勤供给是分不开的。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时候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上高会战的胜利，也是上高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第 19 集团军总司令部重新规定各部向各县购米数量表》中，写明每日要向驻地购买大米 53304 斤，每月 1599120 斤，这么多的大米，仅仅一个上高县是远远无法供应的，表中还列举了上高周边的奉新、靖安、宜丰、丰城、清江、新余等几个县。

在采访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在上高县档案馆看到了保存至今的一份《民国政府三十年代案卷一号》，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陆军第 74 军司令部副官处义民字第 85 号函开：

……此兹指定代购乡镇分列于后：

一、禾草五万斤指由四乡代购每乡一万二千五百斤

二、黄豆二十五石指由两乡平均代购每乡一十二石
五斗

这封信函是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写给 74 军副官处的回信。74 军副官处请求黄贤度帮忙代购战马草料五万斤和黄豆 25 石，黄贤度回复说交代哪几个乡镇采购。

这份案卷还有一份会议纪要，是《上高县出钱劳军运动会会议议程》，里面写到了“第一、二区各募足 1750 元，三区募足 1500 元，各机关团体募足 1000 元。”募足钱干什么？当然是交给中国军队打鬼子。

黄贤度和上高百姓给 74 军 57 师老兵尹同道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尹同道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黄县长太好了，上高百姓太好了。”

尹同道年近百岁，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然而，他还能清楚地记得上高很多地名和当年很多战友的名字。

那一年，我去上高采访，在上高县档案馆找到一份当年的上高地图，对照对尹同道的采访记录，上面的地名，包括村庄名称，全都能对上。尹同道还向我说起过一个名叫孔献庸的炮兵营营长，一个名叫代梅山的连长，我在《上高战役表彰名单》上，也全都找到了。



在整个上高会战中，上高百姓不但出钱，而且出人。上高县政府工作人员王道平的回忆文章说，上高县百姓组成的支前大队，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还有小推车，而上高会战中，百姓全部是肩扛手提，因为道路已经

全部被日军的飞机炸断了。

这些支前民工去前线的时候背的是弹药和粮食，回来的时候抬的是伤员，“部队打到哪里，运输队和担架队就跟到哪里，他们已经成为作战部队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一天，锦江上的石桥被日军飞机炸断，运输队与前线的联系中断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冒着危险，组织人员架起了一座简易的浮桥，然后组织运输队快速通过浮桥。敌机在空中扫射，炸弹在浮桥旁边爆炸，掀起冲天巨浪，但是没有人停下来，“人流滚滚，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流入前线阵地，一条钢铁运输线飞架锦江两岸。”

在后期对日军 34 师团的包围中，中国军队迂回穿插，从修水调来了两个师，可是来到凌江口，面对浊浪翻天的江水，束手无策，上高县政府在县长黄贤度的带领下，又紧急动员附近的民众，搜集所有材料，帮助军队过河，于是，木排、竹排甚至门板、棺材板都送来了，一座浮桥很快就搭成了。经过一夜急渡，两个师的中国军队顺利切断了 34 师团的退路。

战后，罗卓英也盛赞上高百姓：“民众效力，尤其是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装备优势，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

70年后，我采访当年参加过上高会战的74军58师老兵魏杰，他和尹同道一样深有感慨地说：“上高的百姓太好了，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百姓？”

对上高会战很有研究的上高县前博物馆馆长方向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的文章，文章中说：

上高会战大捷，是指挥人员运用战术的巧妙，是抗日将士血肉换来的硕果，是军民协作取得的成就，是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杰作。

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胜利，也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的大胜利。